

刘琴丽，女，1972年生于四川省邻水县。1994年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学士学位。1994～1998年分别在四川省邻水县复盛、丰禾中学任教。1998年考入陕西师范大学唐史研究所，2001年毕业，获历史学硕士学位。同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2004年毕业，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任教于湖南省湘潭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发表有：《五代巡检研究》（《史学月刊》2003年第6期）、《从出土墓志看唐代的武贡举》（《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3期）、《再论唐代的斋郎与挽郎》（《江汉论坛》2005年第9期）等论文数篇。

·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近期新书

汉代城市社会	张继海 著
唐代武官选任制度初探	刘琴丽 著
北宋西北战区粮食补给地理	程　龙 著
明代海外贸易制度	李庆新 著
明朝嘉靖时期国家祭礼改制	赵克生 著
明清之际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	〔韩〕金成修 著

《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学术评审委员会

主 任 委 员　齐世荣

副主任委员　金冲及

委　　员　（以姓名汉语拼音为序）

陈铁健　邓小南　郭松义　经君健

李世安　刘桂生　刘家和　阮芳纪(常务)

王思治　王小甫　谢寿光　阎步克

于　沛　张椿年　张振鹗

《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沈志华

编　　委　（以姓名汉语拼音为序）

陈东林　丁一川　李丹慧　宋月华

徐思彦　杨　群　张　丽　张　彤

赵秀荣

《东方历史学术文库》书目

1994 年度

《魏忠贤专权研究》，苗棣著

《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高王凌著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河南冀东保甲制度研究》，朱德新著

《江户时代日本儒学研究》，王中田著

《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化道路》，沈志华著

《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中英关系》，李世安著

1995 年度

《中国古代私学发展诸问题研究》，吴霓著

《官府、幕友与书生——“绍兴师爷”研究》，郭润涛著

《1895～1936 年中国国际收支研究》，陈争平著

《1949～1952 年中国经济分析》，董志凯主编

《苏联文化体制沿革史》，马龙闪著

《利玛窦与中国》，林金水著

《英属印度与中国西南边疆（1774～1911 年）》，吕昭义著

1996 年度

《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许檀著

《清代地方政府的司法职能研究》，吴吉远著

《近代诸子学与文化思潮》，罗检秋著

《南通现代化：1895～1938》，常宗虎著

《张东荪文化思想研究》，左玉河著

1997 年度

《〈尚书〉周初八诰研究》，杜勇著

《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以造像记为中心的考察》，侯旭东著

《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陈爽著

《西域和卓家族研究》，刘正寅　魏良弢著

《清代赋税政策研究（1644～1840 年）》，何平著

《边界与民族——清代勘分中俄西北边界大臣的察哈台、满、汉五件文书研究》，何星亮著

《中东和谈史（1913～1995 年）》，徐向群　宫少朋主编

1998 年度

《古典书学浅探》，郑晓华著

《辽金农业地理》，韩茂莉著

《元代书院研究》，徐梓著

《明清高利贷资本》，刘秋根著

《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尚小明著

《晚清保守思想的原型——倭仁研究》，李细珠著

1999 年度

《唐代翰林学士》，毛蕾著

《唐宋茶业经济》，孙洪升著

《七七事变前的日本对华政策》，臧运祜著

《改良的命运——俄国地方自治改革史》，邵丽英著

2000 年度

《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东周墓葬制度》，印群著

《中国地名学史考论》，华林甫著
《宋代海外贸易》，黄纯艳著
《元代史学思想研究》，周少川著
《清代前期海防：思想与制度》，王宏斌著
《清代私盐问题研究》，张小也著
《清代中期婚姻冲突透析》，王跃生著
《农民经济的历史变迁——中英乡村社会区域发展比较》，徐浩著
《农民、市场与社会变迁——冀中11村透视并与英国农村之比较》，侯建新著
《儒学近代之境——章太炎儒学思想研究》，张昭军著
《犹太民族史上的东方一页：一个半世纪以来的上海犹太人》，潘光　王健著
《俄国东正教会改革（1861～1917）》，戴桂菊著
《伊朗危机与冷战的起源（1941～1947年）》，李春放著

2001年度

《〈仪礼·丧服〉考论》，丁鼎著
《南北朝时期淮汉迤北的边境豪族》，韩树峰著
《两宋货币史》，汪圣铎著
《明代充军研究》，吴艳红著
《明代史学的历程》，钱茂伟著
《清代科举家族》，张杰著
《清代台湾的海防》，许毓良著
《清末民初无政府派的文化思想》，〔韩〕曹世铉著

2002年度

《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任士英著
《王学与晚明的师道复兴运动》，邓志峰著

《混合与发展——江南地区传统社会经济的演变（1900～1950）》，马俊亚著

《敌对与危机的年代——1954～1958年的中美关系》，戴超武著

2003年度

《部落联盟与酋邦》，易建平著

《西周封国考疑》，任伟著

《〈四库全书总目〉研究》，司马朝军著

《1500～1700年英国商业与商人研究》，赵秀荣著

2004年度

《后稷传说与稷祀文化》，曹书杰著

《明代南直隶方志研究》，张英聘著

《西方历史叙述学》，陈新著

2005年度

《汉代城市社会》，张继海著

《唐代武官选任制度初探》，刘琴丽著

《北宋西北战区粮食补给地理》，程龙著

《明代海外贸易制度》，李庆新著

《明朝嘉靖时期国家祭礼改制》，赵克生著

《明清之际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韩〕金成修著

《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改版弁言

从1998年起，文库改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设立文库的初衷，“出版前言”都讲了，这是历史记录，改版后仍保留，这也表明改版并不改变初衷，而且要不断改进，做得更好。

1994年，面对学术著作出书难，由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毅然支持，文库得以顺利面世，迄1997年，已出版专著25部。1998年，当资助文库的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面临调息困难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又慨然接过接力棒，并于当年又出了改版后专著6部。5年草创，文库在史学园地立了起来，应征书稿逐年增多，质量总体在提高，读者面日益扩大，听到了肯定的声音，这些得来不易，是要诚挚感谢大家的；而需要格外关注的是，我们的工作还有许多缺点、不足和遗憾，必须认真不断加以改进。

如何改进？把这几年想的集中到一点，就是要全力以赴出精品。

文库创立伊始就定下，资助出版的专著，无例外要作者提供完成的书稿，由专家推荐、采取匿名审稿，经编委初审、评委终审并无记名投票通过，从制度上保证选优原则；评委们对专家推

荐的书稿，是既充分尊重又认真评选，主张“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前后两家出版社也都希望出的是一套好书。这些证明，从主观上大家都要求出精品。从客观来说，有限的资助只能用在刀刃上；而读者对文库的要求更是不断在提高，这些也要求非出精品不可。总之，只有出精品才能永葆文库的活力。

出精品，作者提供好书稿是基础。如“出版前言”所指出的，开辟研究的新领域、采用科学的研究新方法、提出新的学术见解，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达到或基本达到这些条件的，都是好书。当然，取法乎上，希望“上不封顶”；自然，也要合格有“底”，初步设想相当于经过进一步研究、修改的优秀博士论文的水平，是合格的“底”。有了好书稿、合格的书稿，还需推荐专家和评委的慧眼，推荐和评审都要出以推进学术的公心，以公平竞争为准则。最后，还要精心做好编辑、校对、设计、印装等每一道工序，不然也会功亏一篑。

5周岁，在文库成长路上，还只是起步阶段，前面的路还长，需要的是有足够耐力的远行者。

《东方历史学术文库》编辑委员会

1998年9月

《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出版前言

在当前改革大潮中，我国经济发展迅猛，人民生活有较大提高，思想观念随之逐步改变，全国热气腾腾，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举国公认，世界瞩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发展而尚待完善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也会产生一定的负面效应，那就是在社会各个角落弥漫着“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止；深渊之下，无所不入”的浊流。出版界也难遗世而独立，不受影响，突出表现为迎合市民心理的读物汗牛充栋，而高品位的学术著作，由于印数少，赔本多，则寥若晨星。尚无一定知名度的中青年学者，往往求出书而无门，感受尤深。这种情况虽然不会永远如此，已使莘莘学子扼腕叹息。

历史科学的责任，是研究过去，总结经验，探索规律，指导现实。我国历来有重视历史的传统，中华民族立于世界之林数千年者，与此关系匪浅。中国是东方大国，探索东方社会本身的发展规律，能更加直接为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借鉴。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对历史学科十分关心，但限于财力尚未充裕，资助项目难于面面俱到。我们是一群有志于东方史研究的中青年学人，有鉴于此，几年前自筹资金设立了一个民间研究机构，现为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创业伊始，主要是切

磋研究。但感到自己研究能力毕竟有限，于是决定利用自筹资金设立“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资助有关东方历史的优秀研究成果出版。凡入选的著作，均以《东方历史学术文库》作为丛书的总名。

我们这一举措，得到了老一辈史学家的鼓励，中青年同行的关注。胡绳同志为基金题词，在京的多位著名史学专家慨然应邀组成学术评审委员会，复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允承出版；全国不少中青年学者纷纷应征，投赐稿件。来稿不乏佳作——或是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或在深度和广度上超过同类著作；或采用了新的研究方法；或提出了新的学术见解，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百花齐放，绚丽多彩。这些给了我们巨大的鼓舞，也增强了我们办好此事的信心。

资助出版每年评选一次。凡提出申请的著作，首先需专家书面推荐，再经编辑委员会初审筛选，最后由学术评审委员会评审论证，投票通过。但由于基金为数有限，目前每年仅能资助若干种著作的出版，致使有些佳著不能入选，这是一大遗憾，也是我们歉疚的。

大厦之成，非一木能擎。史学的繁荣，出版的困难，远非我们这点绵薄之力能解决其万一。我们此举，意在抛砖引玉，期望得到海内外企业界，或给予我们财务支持，使我们得以扩大资助的数量；或另创学术著作基金，为共同繁荣历史学而努力。

《东方历史学术文库》编辑委员会

1994 年 9 月

目　录

绪　论 …… 1
一　问题的提出 …… 1
二　概念界定 …… 2
三　唐代以前的武官选任概况 …… 4
四　唐代武官选任的时代背景 …… 6
五　研究综述 …… 15
六　文章内容 …… 21
七　研究方法及难点突破 …… 25

第一章　唐代武官的铨选 …… 26
第一节　安史之乱以前的武官铨选 …… 26
一　铨选机构及官员 …… 26
二　铨选对象 …… 32
三　铨选时间 …… 36
四　南曹磨勘 …… 37
五　铨试内容 …… 38
六　注拟、过官及殿庭谢恩 …… 39
第二节　安史之乱以后武官铨选制度的演进 …… 41
一　兵部铨选职能的继续弱化 …… 41
二　地方藩帅有权选任本镇武职军将 …… 43

三　护军中尉等北衙禁军统兵宦官有权选任属下军将 …… 43
四　中书门下的武官选任权力 …… 44
五　墨敕授官 …… 45

第二章　军功入仕 …… 48
第一节　墓志所见唐代的勋官入仕 …… 48
一　勋官入仕者获取勋官的现状及社会构成 …… 50
二　勋官的放选时间 …… 57
三　勋官的释褐官品及官职 …… 59
四　勋官的仕途前景 …… 60
第二节　直接军功入仕 …… 61
一　军功奖赏的制度规定 …… 62
二　军功入仕者的实际授官状况及仕途前景 …… 68
三　军功滥授现象 …… 72

第三章　门荫入仕
——以卫官为中心 …… 78
第一节　唐代卫官述论 …… 79
一　卫官的类别和配置部门 …… 79
二　卫官的考课与简选 …… 81
三　卫官入仕为武官的情况 …… 83
四　卫官系统内部的迁转 …… 84
五　卫官制度的衰落 …… 87
第二节　千牛入仕 …… 89
一　千牛的入仕率极高 …… 90
二　千牛入仕一般循吏部选 …… 91
三　千牛的释褐官品 …… 92
四　千牛的释褐官职 …… 93

五　千牛的仕途前景 …… 94
第三节　墓志所见唐折冲府卫官 …… 96
一　充任情况 …… 97
二　入仕情况及在官僚群体中的角色地位 …… 101
三　余论 …… 102

第四章　科举入仕 …… 106
第一节　唐代武举 …… 106
一　制度概述 …… 107
二　及第人物与授官情况 …… 110
三　结论 …… 121
第二节　唐代的制举武科 …… 128
一　及第人物 …… 129
二　结论 …… 148

第五章　唐代中后期方镇使府武职僚佐的辟署制 …… 157
第一节　辟署方式及对象 …… 158
一　辟署方式 …… 158
二　辟署对象 …… 161
第二节　方镇使府武职僚佐的官职奏荐及迁转 …… 163
一　方镇使府武职僚佐的官职奏请 …… 164
二　方镇使府武职僚佐的迁转 …… 172
第三节　方镇使府武职僚佐的社会构成和地域分布 …… 175
一　使府武职僚佐的社会构成 …… 175
二　使府武职僚佐的地域分布 …… 177

第六章　其他选任方式 …… 182
第一节　来朝蕃客授官 …… 182

一　来朝蕃客授官的历史原因 …… 183
二　授官机构和授官制度 …… 183
三　来朝蕃客授官的方式 …… 189
第二节　唐代宦官的武官授予 …… 192
一　宦官授予武官的历史原因 …… 192
二　宦官授予武官的历史现状 …… 194
第三节　其他选任方式 …… 196
一　由文转武 …… 196
二　荐举 …… 197
三　投诚 …… 199
四　卫士、白丁、官健因年劳或才能授官 …… 199
五　征召入仕 …… 200
六　以亲戚授官 …… 201
七　特例选官 …… 201

结　语 …… 203

附　录 …… 212
附表 1　唐代千牛入仕表 …… 212
附表 2　唐折冲府卫官充任表 …… 232
附表 3　唐代制举武科科目及登科表 …… 242
附表 4　唐代中后期方镇使府武职僚佐任职表（780～907）
…… 250

参考文献 …… 275

后　记 …… 291

CONTENTS

Introduction / 1

1. Putting forward a question / 1
2. The conception defining / 2
3. Brief account of the military officials selection before the Tang Dynasty / 4
4. Historical background about the military officials selection in the Tang Dynasty / 6
5. Research summary / 15
6. The synopsis of the dissertation / 21
7. Research approaches and the breakthrough of difficult points / 25

Chapter One Selection system about military officials of the Tang Dynasty / 26

Part 1 Selection system about military officials before the rebellion of An Lu-shan / 26

1. The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 and officials of selection / 26
2. The object of selection / 32
3. The time of selection / 36

4. Check-up of the selected files and the choose of candidates / 37
5. The contents of examination / 38
6. Being appointed and reexamined and giving thanks to the emperor in the palace / 39

Part 2 Evolution of the selection system about military officials after the rebellion of An Lu-shan / 41
1. The unceasingly weakening of the selecting function of the Military Department / 41
2. The power of the commander of fang-zhen to appoint its local military officials / 43
3. Hu-jun zhong-wei, the commander of the bei-ya center government troops, having the power to appoint his subordinates / 43
4. Some selection power obtained by zhong-shu men-xia / 44
5. Appointment of the local military officials by fang-zhen itself / 45

Chapter Two Being a military official by rendering meritorious service / 48

Part 1 Study on the officials by way of xun-guan in the Tang Dynasty according to Inscription / 48
1. Being an official by way of xun-guan according to the record of inscription / 50
2.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xun-guan's obtaining and its social composition / 57
3. The first official position and rank xun-guan obtained / 59

4. The prospect of xun-guan's official careers / 60
Part 2 Being a military official directly by rendering meritorious service / 61
1. The system of rewarding meritorious service / 62
2. The actual appointment and prospect of the of ficials awarded by meritorious service / 68
3. The phenomenon of excessively rewarding meritorious service / 72

Chapter Three Being an official by way of men-yin: concentrating on wei-guan / 78
Part 1 Commentary on the wei-guan of the Tang Dynasty / 79
1. The category and allocated organization of wei-guan / 79
2. The system of examination and selection of the wei-guan / 81
3. Being a military official of wei-guan / 83
4. The internal promotion and shift of the wei-guan / 84
5. The decline of the system about wei-guan / 87
Part 2 Being an official by way of qian-niu / 89
1. The extremely high rate of its being an official / 90
2. Its selection generally governed by Li-bu / 91
3. The first official rank qian-niu obtained / 92
4. The first official ranks the qian-niu rewarded / 93
5. The prospect of qian-niu's official careers / 94

Part 3 Wei-guan in zhe-chong-fu of the Tang according to the record of inscription / 96
1. The situation of the post that wei-guan in the zhe-chong-fu filled / 97
2. Its first position, and its role and status in the official group / 101
3. Further discussion / 102

Chapter Four Being a military official by examination / 106
Part 1 Wu-ju in the Tang Dynasty / 106
1. Overview of the system / 107
2. People passed the examination and their first official positions / 110
3. Conclusion / 121
Part 2 Military examination directed by the emperor in the Tang Dynasty / 128
1. People passed the examination / 129
2. Conclusion / 148

Chapter Five The employing system of the local military officials in fang-zhen during the middle and later periods of the Tang Dynasty /157
Part 1 The employing style and object / 158
1. The employing style / 158
2. The employing object / 161
Part 2 Being applied for official ranks and the moving of official positions about the local military officials / 163
1. Being applied for official ranks / 164

2. The moving of official positions / 172
Part 3 The social composition and region distribution about the local military Officials / 175
1. The social composition about the local military officials / 175
2. The region distribution about the local military officials / 177

Chapter Six Other selection styles / 182
Part 1 Rewarded official position to the bo-ke been to the Tang court / 182
1. The historical reason of being rewarded about the bo-ke been to the Tang court / 183
2. The organization and system of the rewarding / 183
3. The styles of rewarding officials about the bo-ke / 189
Part 2 Being rewarded military officials about the eunuch in the Tang Dynasty / 192
1. The historical reason of being rewarded military official positions about the eunuch in the Tang Dynasty / 192
2.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rewarding military officials about the eunuch / 194
Part 3 Other selection styles / 196
1. Officials moving from civil to military / 196
2. Recommending / 197
3. Surrendering / 199

4. Selection from Soldiers, commoners, old officials and the talented / 199
5. Selection by calling up / 200
6. Rewarded officials to the relatives / 201
7. Special cases of selection officials / 201

Conclusion / 203

Appendix / 212
Table 1 Being officials by way of qian-niu in the Tang Dynasty / 212
Table 2 Filling the position of wei-guan in the zhe-chong-fu of the Tang Dynasty / 232
Table 3 The subjects and lists of passed people in the military examination directed by the emperor in the Tang Dynasty / 242
Table 4 The positions about local military officials in the middle and later periods of the Tang Dynasty (780 ~907) / 250

Bibliography / 275

Postscript / 291

绪　论

唐代武官选任制度在整个中国历史长河中，具有明显的过渡性和开创性。其过渡性表现在，部分武官的选拔方式，沿袭前朝成法，如以军功、门荫等方式选拔武官；开创性表现为武举的创立、来朝蕃客授官的制度化等方面。但是中国古代武官的选拔，潜在的制度规则居多，成文的制度条文相对较少，唐代也不例外。纵观唐朝武官的选任方式，主要有门荫、军功、科举、辟署、蕃客入朝、由文转武、从降将中选拔、荐举等。

一　问题的提出

为何要研究唐代武官的选任，研究意义何在？这是本课题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

中国古代文官制度高度发达，与此相对应的武官选任制度怎样？这是学界研究的薄弱环节，也是笔者的兴趣所在。唐高祖云："平乱任武臣，守成委文吏。"① 作为国家政权坚强支柱之一的军队，在抵御外敌、维持国内政治秩序和稳固封建王朝的统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武官的素质如何，其选举制度能否选拔出合格的军事人才，直接关系到军队的战斗力和国防实力。因此，武官选任与文官一样，都理应同时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长

---

① 《旧唐书》卷75《孙伏伽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第2636页。

期以来，学界更多的是关注唐代文官的选任，唐代武官的选拔受到冷落。其间既有史料缺乏的因素，也与武官选任制度不完善以及长期以来人们的重文轻武等观念有关。

军队的强弱，与军官素质有关；而军官素质的高低，又直接与选任方式相连。科举制度产生后，中国古代文官的选拔日趋制度化，并不断发展、完善；与此相对应的另一部分人群——武官的选任程序和方式，也就成为本文关注的焦点。因为，对这一制度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加深对唐代军制的了解，清醒认识唐代军队的权力结构，以及国家对军队的控制力度，而且还可以成为研究唐代文、武关系以及社会文化发展趋势的基础性工作之一。但从目前发表的相关文章来看，大部分系统性不强、深度不够，因此研究的空间还很大。

二　概念界定

唐代流内九品官阶主要包括职事官、散官、勋官、爵、卫官五大系统，它们相辅相成，各有其用。“勋以叙功”，授予立功将士；“爵以定崇卑”，标明官员的身份等级；散官即“阶”，“以门荫结品”，根据父祖官位确定铨选叙官时的品级，然后“劳考进叙”；职事官则“随才录用”[①]，卫官为门荫入仕的重要途径之一。

唐代武官分为散官和职事官两大系统，“武散官，旧谓之散位，不理职务，加官而已。后魏及梁，皆以散号将军记其本阶，自隋改用开府仪同三司已下。贞观年，又分文武，入仕者皆带散位，谓之本品”[②]。唐代“武散阶四十有五”[③]，其中有十六阶是

① 《旧唐书》卷42《职官志》一，第1785页。
② 《旧唐书》卷42《职官志》一，第1805页。
③ 《新唐书》卷46《百官志》一，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第1197页。

授予少数民族首领的，如怀化、归德将军之类。然而，仅有武散官名号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武官，因为他们还需番上宿卫，四品以下，番上期满，还要参加兵部铨选，才能进入职事官行列[①]。武散官入仕后，也不一定充任武职，文武散官与文武职事官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对应关系。王寿南先生认为："'职事官'有职、有位、有权、有责，乃是真正的'文官'，不过，每一'职事官'必带'散官'，'职事官'乃是现职，通称'官'，'散官'则为铨叙之阶级，亦称'阶'。"[②] 武官也是如此，只有武职事官才称得上真正的武官，但这一概念也主要适用于唐代初期。因为，从高宗以来，军事使职逐渐出现，职事官日益阶官化，我们便难以从官称本身来判定官员的职事为文抑或为武。故此处须借用阎步克先生对中国古代官阶制划分的概念，来对唐代武官进行定义。

阎步克以"品位分等"和"职位分等"来概括中国古代的官阶制度，认为品位分等以人为中心，职位分等以事为中心，唐代散阶制则属于品位分等的范畴[③]。本文所探讨的"武官"主要采用职位分等的办法，以职事为本位来界定唐代的"武官"。

以"职事"划分唐代的武官，系统较为庞杂，因为唐代武官本身处于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在玄宗以前府兵制为主的时代，唐代武官主要指十六卫、东宫六率府、北衙禁军以及地方折冲府的军官，如十六卫、北衙禁军的大将军、将军、中郎将、郎将、司阶、司戈、中候、执戟、长上，东宫率府之率、副率等，折冲府之都尉、果毅、别将等。此外，行军系统、镇戍系统等还有部分武官。睿宗至玄宗时期，边境开始设置节度使，镇戍制逐

---

① 《新唐书》卷46《百官志》一，第1197页。

② 王寿南著《唐代政治史论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第5页。

③ 阎步克著《品位与职位》，中华书局，2002，第2～48页。

渐被节度使体制所取代，府兵制也日趋瓦解，这时的地方武官已经部分演变为节度使体制下的武职僚佐，这是一个新旧体制并存的时代。安史乱后，随着天宝八载（749）府兵制的废除，地方武官沿袭节度使体制进一步发展，真正的地方武官则演变为节度、观察、团练使下的武职僚佐，原府兵官称主要用来作为迁转之阶；中央禁军在安史之乱后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是原有的北衙禁军几乎丧失殆尽，重组后的北衙禁军主要为神策军、北衙六军（左右神武、左右羽林、左右龙武军）和飞龙兵；南衙禁军主要为金吾卫、威远营和皇城将士[①]。这些部门的将领和使职才具有真正职守，原南衙十六卫的武官官称虽然保持，但主要用来作为高级将领的迁转之阶。可见，真正意义的武官，在唐代只能从职事上进行区分。

三　唐代以前的武官选任概况

1. 选举机构的沿革

夏商周朝，由于文武官职合一，因此，这一时期的选官机构文武不分。春秋战国之际，战争频繁，武将在政治生活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但是，直到秦统一中国以前，列国官制中似乎并没有明确的文、武之分[②]，也就谈不上文武官吏的分开选拔问题。

武官选任机构的渊源至少可以上溯到西汉，当时相国府和太尉府内设有东、西两曹，其中太尉府的“东曹主二千石长吏迁除及军吏”[③]。可见，此时虽然出现了负责军吏（即武官）的选举

---

① 齐勇锋：《唐后期的北衙六军、飞龙、金吾、威远和皇城将士》，《河北学刊》1989年第2期，第82页。

② 张金龙著《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制度研究》，中华书局，2004，第4页。

③ 《后汉书》志第24《百官志》一，中华书局点校本，1965，第3559页。

机构，但并非专职，仍与文官的选举机构合一，因为它还要负责二千石长吏的选任。东汉沿用此制。魏晋南朝，长期主持武官选举的机构是吏部，中护军只是在曹魏、西晋初期，主持过一定范围内的武官选举；北朝，武官的选举也由吏部掌管；“隋朝兵部极可能未曾参与武官选举”[①]。由此可知，唐以前的文武官僚选拔机构，并没有彻底分开。

2. 选拔途径

雷渊深、季德源对中国古代武官的选拔途径做了归纳总结，认为大体有七途，即世袭、军功、荐举、武举、行伍、差遣与院校培训[②]。在这些选拔途径中，属于唐以前者有世袭（包括西周春秋时期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世卿世禄制、魏晋南朝以世兵制为基础的世袭军官、西汉以来盛行的任子制亦即门荫制）、军功（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军功爵制）、荐举（包括荐举、察举、乡举、辟除）、行伍（从普通士兵中选拔）、差遣（如秦汉以后的监军御史、东汉末期的领兵刺史）等，这些选拔途径体现了中国早期武官选任制度的发展历程，有进步的一面，如军功选拔武官；也出现过历史的逆流，如魏晋南朝的世袭军官。所有这些选拔方式，都与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有一定联系。唐以前，中国社会经济和文明处于封建社会发展的前期，因此，武官选任制度中存在一些非理性因素，亦属当然。

3. 选拔对象的变化

唐代以前的武官选拔对象，大体来说，发展趋势为从社会阶层狭窄到宽泛，其间也有例外，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夏商周朝，在世卿世禄

---

① 陶新华著《魏晋南朝中央对地方军政官的管理制度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3，第232～258页。

② 雷渊深、季德源：《中国历代军事职官制度》，《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4期，第4～7页。

制下，官吏选拔以血缘纽带为基础，武官选任也不例外，社会阶层极少流动性。春秋战国之际，社会发生了急剧变革，各国之间交战频繁，为了增强竞争能力，一些诸侯国打破传统局限，“授予非公族出身但有军功者以较高的爵位和官职，这就是军功爵制的缘起”①。其中秦国实行的二十等爵制最为有名。军功爵制为其他社会阶层民众进入军官阶层铺平了道路，军官的选拔对象大为增加。秦、西汉实行征兵制，普通国民都有当兵的义务，因此，军官来源的社会阶层相对广泛。东汉征兵制式微，以募兵制为主，召募成员主要来源于“社会闲散成员和囚徒。募兵范围日益扩大，往往不暇选择，召募而来的士卒的素质当有较大下降”②，这必然影响到军官的素质和来源对象。魏晋南朝实行世兵制，士兵全家从老百姓中脱离出来，变为军籍，士兵及其子孙世代为兵，身份地位低下；这一时期的军官选拔，主要实行世袭军官制，武官选拔对象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军官的身份地位也相对不高。从西晋“八王之乱”到西魏府兵制形成以前，北方许多政权一般说“胡族部落系统用于打仗，汉族编户系统用于耕织”，实行胡汉分治；北魏也是实行军民分治，战斗属胡人、准胡人，农桑则属汉人③。少数民族成了这一时期的军官主体。西魏实行的府兵制，也是一种军民分治的贵族兵制，普通百姓无权当兵。经过周武帝、隋文帝的府兵制改革，府兵来源对象扩大，实现了平民化，从而为军官阶层一定程度的平民化起了奠基作用。

四　唐代武官选任的时代背景

任何一个朝代的官僚选任，都离不开社会大环境的综合影

---

① 雷渊深、季德源：《中国历代军事职官制度》，《中国史研究》1993 年第 4 期，第 5 页。

② 刘昭详、王晓卫著《历代兵制浅说》，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第 71 页。

③ 陈寅恪著、万绳楠整理《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合肥：黄山书社，1987，第 110、113 页。

响，唐代武官选任制度也不例外，受到政治、经济、军事、官制变迁以及文化背景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1. 政治背景

唐朝建立初年，统治者面临着重大的内外安全问题：国内存在着一些较大的割据势力，周边又有强大的突厥政权的威胁，国际贸易通道——丝绸之路也不畅通，等等。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展开一系列的军事斗争和外交活动。为了鼓励将士征战，唐朝初年大力奖赏军功，军功人仕成为这一时期的升迁捷径。当时的一些功臣武将还能够进入决策阶层，充任宰相，如李靖、李勣、侯君集等①。可以说，唐代初年的战争环境、政治斗争形势，给军功人才提供了一个恰当的时机，这是他们此时期兴盛的根本原因，因为他们成为社会的重要需求之一。

高宗以来，随着战事的日渐减少，加上“开国之初的老将帅相继去世，朝廷已有将帅乏人之忧。……从垂拱元年（685）开始，由于缺乏得力将才，唐朝对突厥的进犯处于守势”②；另外，武则天上台以后，为了破坏传统的“关中本位政策”，打击关陇集团，“大崇文章之选，破格用人”，“以遂其创业垂统之野心”③；并于长安二年（702）创立武举，给世胄子弟中不喜文却长于骑射者“提供一个以科第入仕的机会”④，以扩大统治基础，赢得更多的政治支持。

睿宗至玄宗时期，面对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不断骚扰，唐

① 《旧唐书》卷67《李靖传》，第2480页；《旧唐书》卷67《李勣传》，第2486页；《旧唐书》卷69《侯君集传》，第2509页。

② 唐群：《武则天开创武举时的形势分析》，《武则天研究论文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第322页。

③ 陈寅恪著《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见《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第18页。

④ 唐群：《武则天开创武举时的形势分析》，《武则天研究论文集》，第325页。

朝中央开始改变边防的军事体制，设立节度使，逐渐代替了原有的边镇都护、都督，作战时代替了早期的行军总管，这种体制确实在一个时期内有效地保卫了唐朝的边疆安全。但是，军政大权日益落入边境将领之手的危险却被忽视了：节度使与长征健儿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边将专军的局面。由于健儿是招募而来的，他们为职业军人，升迁改转多出自节度使①。因此，节度使利用为属下将领奏授官职的机会，在合法外衣的遮蔽下，不断扩张自己的势力，并居间掌握了所属部将的任命权，使得节度使体制内部武将的任命逐渐与中央脱节，武官选举权力呈现出下移趋势。

安史乱后，朝廷为了使节镇之间互相制衡，藩镇从边疆延伸到了内地，中原、东南、西南一带都广设节度使，原来节度使奏授辟用文武僚佐的制度也从边疆延伸到了内地，并实现了制度化和普遍化。其中，河北藩镇割据一方，由于实际上的政治独立，直至唐亡，这一地区的武官任免几乎都由当地节度使负责，朝廷基本上不过问。

其余藩镇（黄巢起义以前）的情况则有别，大部分听命于朝廷，也有欲仿效河北三镇，实现割据自立者。但经过德宗、宪宗时期的平藩努力，朝廷又逐渐将其纳入中央化轨道，表现之一就是在文武僚佐的任命上，中央要对其进行宏观调控。调控的方法有三：一是规定使职僚佐的选择范围，二是规定使职僚佐的员额，三是规定使职僚佐的官品由朝廷任命，升迁改转亦由朝廷决定②。不过，这些条文在具体的执行中，并非完全奏效。一些强

---

① 《旧唐书》卷43《职官志》二："其在军镇要籍，不得赴选，委节度使铨试其等第申省"（第1832页）。

② 宁志新：《唐朝使职若干问题研究》，《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第62～65页。

藩官吏自署、不申阙员的情况仍然存在，一部分半独立状态和仍忠于朝廷的藩镇，随着辟署奏授制的盛行，也发展为“从幕僚中择人以摄、假、试等名义占据所管支州、支县的官职，然后上报中央奏授，甚至不履行奏授手续，直接占住官阙”①。这些以假、摄等名义占住地方文官官阙的，正如第五章所述，很多是藩镇武职僚佐。这样就形成了地方军官对地方文官的侵权行为，这一侵权的实质，既是文武官僚集团之间权力争夺的反映，也是中央朝廷与地方之间权力争夺的反映。

在使节镇之间相互制衡的同时，唐朝中央也着力建立一支强有力的禁军，以对抗藩镇，这就是边镇军——神策军的禁军化。经历了安史之乱、朱泚之乱等一系列变乱的德宗，鉴于建中四年（783）泾师之乱中，禁军的救驾不力，于贞元十二年（796），将神策军兵权正式交给宦官，并“置护军中尉、中护军，分提禁兵”②，确立了宦官统领神策军的制度。此后，北衙禁军将领的任命，基本上由护军中尉等统兵宦官负责，由之牒送中书门下，为所属武将奏请官职③，中央兵部无权插手。

黄巢起义动摇了唐朝中央的统治，之后，藩镇势力更为强大，中央威权失坠，根本不存在对地方的控制问题。表现在武职僚佐的任命上，就是藩镇墨敕授官盛行④。这一局势，从实质上宣告了唐朝统治的终结。

此外，唐朝前期，国力强盛，“周边的蕃国部落都在唐朝的势力控制范围内”，他们与唐朝的关系可大体分为隶属关系、半

---

① 宁欣：《唐代的选人与官阙》，《人文杂志》1991 年第 5 期，第 98 页。

② 《新唐书》卷 207《宦官传·总序》，第 5856 页。

③ 《资治通鉴》卷 246，唐文宗开成三年（838）八月“开成以来”条及胡注，中华书局，1956，第 7936 页。

④ 洪迈著《容斋四笔》卷 10“唐藩镇行墨敕”，中华书局，2005，第 750～751 页。

隶属的附庸关系和名义上的附属关系三种[①]。对于这些蕃国部落，唐朝主要设置羁縻府州进行管辖，“以其酋长任都督刺史，予以高度之自治权。甚至委异族以中央要职，与汉人比肩于朝”[②]。对于那些款附归朝的外族，唐朝也有一套授官原则，即依据其蕃望大小授官[③]，这是“天可汗”形式下，唐朝国力强盛的体现，也是当时民族融合与民族交流的形式之一。入朝蕃将，是唐代武官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有唐一代的军事产生了深刻影响。

2. 经济形势

唐代初年，土地兼并尚未盛行，长期战争后留下来的荒地被朝廷掌握，成为他们将小民束缚在土地上的重要手段，这也是唐代初年府兵制能够顺利推行的原因之一。武则天以后，社会经济开始发生变化，玄宗时期土地兼并已经比较严重，故才有宇文融的括户行动，丧失土地的府兵无力承担沉重的兵役负担，再加上将领的苛虐行为，因此，府兵纷纷逃亡，这直接导致了府兵制的瓦解。失去土地的流民，刚好为另外一种兵制的诞生提供了兵源，这就是募兵制度。唐代中后期的节镇军队，召募的很多都是失去土地的无业游民。可见，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成了兵制变革的动力之一。而兵制的变化，又直接影响到武官的选任对象和选拔方式。

3. 兵制变化

欧阳修将唐朝兵制的变化分为三个阶段，即府兵、骕骦和方镇：“盖唐有天下二百余年，而兵之大势三变，其始盛时有府兵，

---

① 张国刚：《唐代的蕃部与蕃兵》，张国刚著《唐代政治制度研究论集》，台北：文津出版公司，1994，第94～95页。

② 傅乐成：《唐代夷夏观念之演变》，傅乐成著《汉唐史论集》，台北：联经事业出版公司，1997，第210页。

③ 《册府元龟》卷999《外臣部·请求》，中华书局，1960，第11722页。

府兵后废而为骥骑，骥骑又废，而方镇之兵盛矣。及其末也，强臣悍将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于京师，曰禁军。”①概言之，唐朝军事制度的变化，大体分为三个阶段②。第一时期，从唐初至玄宗之前。这一时期的兵制，“府兵为其核心，兵募为其主体，蕃兵为其补充”③。第二时期，玄宗开元、天宝年间。这一时期，节度使体制在边疆广泛建立，原来的零星军镇实现了区域协防；中央禁军也在建设之中。在府兵制瓦解过程中，唐朝在边镇主要实行招募镇兵轮番戍边④；至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实行了长任兵制⑤。其特点为：兵农分离，终生为兵，兵士的父母妻子与兵士同居边境州，子孙世袭当兵⑥。第三期，即安史之乱以后，节度使体制从边疆延伸到内地，藩镇遍布全国。安史之乱以后的藩镇兵，很多也是职业军，这大大影响了唐代军官的社会构成。

4. 官制演进

唐朝建国初年（唐高祖至唐太宗时期），由于战争频繁，为了鼓励将士征战，以军功授勋较为常见，但当时并未出现滥授现象。自高宗以来，“战士授勋者动盈万计”⑦，而且“渐及朝流”⑧，即普通士人也可以授予军功。另外，勋官还可以“以散阶回充”⑨。这种泛勋现象，使勋官不再为人所重，从而降低了军功入仕在人们心中的分量。

---

① 《新唐书》卷50《兵志》，第1323～1324页。

② 孟宪实著《唐前期军镇研究》，北京大学2001届博士论文，第3页。

③ 孙继民著《唐代行军制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公司，1995，第83页。

④ 王永兴著《唐代前期军事史略论稿》，北京：昆仑出版社，2003，第104页。

⑤ 《资治通鉴》卷214，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五月癸未条，第6829页。

⑥ 王永兴著《唐代前期军事史略论稿》，第104页。

⑦ 《旧唐书》卷42《职官志》一，第1808页。

⑧ 《旧唐书》卷42《职官志》一，第1807页。

⑨ 杨志玖、张国刚：《“辨贵贱、叙劳能”——隋唐五代品阶勋爵制度》，《文史知识》1985年第12期，第78页。

高宗时期，引起武官选任制度变化的另一因素是镇军内部存在的使职系统。它们与原有的武职事官系统有别，其使职名称有军使、副使、总管、子将、押官等[①]。这些军事使职的任命，朝廷有相应的制度规定："副使、总管，取折冲已上官充；子将已上取果毅已上充。"押官以"别将及镇戍官充。"[②] 此外，当时还出现很多地方长官兼任军事使职的情况，如都督、都护、刺史兼任军使等。军事使职是在旧有武职事官体制外产生的另一官制系统，它的出现对原有官制、武官选任都带来了一定冲击，促进了职事官的阶官化。

中宗、睿宗以来出现的员外官、斜封官，使武官队伍迅速膨胀。玄宗上台以后，曾下令停废员外官，但开元二年（714）的敕令明确指出，皇亲及诸亲五品以上、军功人员、宦官不在停废范围之内；天宝七载（748）的敕文也规定，皇亲、军功人员、龙武军、诸蕃官、宦官等可以注拟员外官[③]，其间，员外武官必有许多。故玄宗时期，在旧有武职事官体制外，又有军事使职、员外武官的存在，这给武官队伍的膨胀提供了制度上的便利。

泛阶对整个官僚制度的影响也相当大，所谓泛阶，"就是官员的阶品不依劳考进叙，而是由皇帝在某种规定的范围内普遍赐予"，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大赦赐阶，二是优待进阶，三是特宠加阶[④]。当大量的人得到散官，地位都提高后，导致散阶泛滥，不再为人所重，正如勋官的命运一样。特别是肃、代、德

① 孟宪实：《唐代前期的使职问题研究》，吴宗国主编《盛唐政治制度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第198页。

② 〔日〕广池千九郎校注《大唐六典》卷5"兵部郎中"条，西安：三秦出版社，1991，第121、122页。

③ 《唐会要》卷67"员外官"，中华书局，1955，第1179、1180页。

④ 张国刚：《唐代阶官与职事官的阶官化》，《中华文史论丛》1989年第2期，第75页。

三朝，因散官授受太滥，故“遇到需要酬功勋、叙位望、或羁縻武臣的时候，遂不得不用职事官。于是凡职务已旷废，而又地崇望高的中央职事官几乎尽成赏功叙位的空衔头”①。这种情况，也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职事官的阶官化。

天宝八载，府兵制度废除，府兵官称在唐代却一直沿用，其本身就是作为阶官使用的，与职事完全脱离关系。唐代，阶官化的武官官称主要有十六卫和折冲府的武官官称。安史之乱后，武职事官的阶官化就更为成熟。唐代中后期，还出现了一批阶官化的武职僚佐职名，如散兵马使、散十将、散虞候、同兵马使、同散兵马使、同十将等；此外，押衙、虞候等本身也阶官化了，常常作为内外军将的兼职②。晚唐以来，许多武职僚佐还被藩帅差遣至地方行政部门，充任文职，掌管地方行政事务，即所谓的“吏化军职”③。“吏化军职”也是阶官化的一个表现，因为其带着军职头衔，而从事地方文职事务，对地方行政权力形成了侵权行为。

5. 文化背景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文治武功都取得辉煌成就的时代，它建立了胡汉二元政治。这种统治状况使唐代社会呈现出多元的文化形态，即儒、释、道三教并行，同时还存在很多西来的宗教，如祆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和欧洲的景教等。这些现象表明，唐代儒教国家的政治框架并没有充分地建立起来，整个社会充满了浓厚的宗教色彩和异域色彩，胡化现象严重，而胡人崇尚武力；再加

---

① 孙国栋：《唐代中书舍人迁官途径考释》，孙国栋著《唐宋史论丛》（增订稿），香港：商务印书馆，2000，第48页。

② 张国刚：《唐代藩镇军将职级考略》，《唐代政治制度研究论集》，第169～171页。

③ 陈志坚著《唐后期中央和地方关系研究——以州的制度为中心》，吏化军职“指押衙、虞候、散将等军职，内容广泛，而又没有一个明确的系统”。北京大学2000年博士论文，第79页。

上唐初军功是致身贵显的捷径，因此，当时全国上下形成了一股尚武热潮。贞观、永徽年间，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百姓人人投募，争欲征行，乃有不用官物，请自办衣粮，投名义征”的盛况①。正是在这股尚武思潮中，唐初武将的地位相对较高，如李靖、李勣、侯君集皆以军功官至宰相，一般百姓也可因军功而提高社会政治地位②。

然而，武则天当政以后，为了打击关陇集团，笼络人心，推崇进士文词之科，通过科举选拔人才。于是，尚武之风开始转衰，文事渐盛。“尚武之风的嬗递大致在玄宗时代已告明朗，随之科举（主要是进士科）成为社会风尚所归，科举入仕成为极荣耀的事”③。“当时公卿百辟无不以文章达”，“太平君子唯门调户选，征文射策，以取禄位，此行己立身之美者也。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无所易业，大者登台阁，小者仕郡县，资身奉家，各得其足，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④。可见，由于朝廷用人政策的转变，唐朝的文化氛围发生了急剧变化，尚文风气日渐兴盛，“士有不由文学而进，谈者所耻”⑤。“奇谋雄武”之人难以出人头地。不过这里的“文”指“文学”，而不是儒学。

儒家思想的抬头是在安史之乱以后，此时人们对胡族习俗开始厌恶，故胡人所喜爱的尚武观念遭到汉人厌弃。中晚唐时人杜牧云：“不知自何代何人分为二道曰文、武，离而俱行，因使缙

---

① 《旧唐书》卷84《刘仁轨传》，第2793页。

② 任士英：《唐代尚武之风与追求功名观念的变迁》，郑学檬、冷敏述主编《唐文化研究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第285页。

③ 任士英：《唐代尚武之风与追求功名观念的变迁》，《唐文化研究论文集》，第288页。

④ 王文锦、王永兴等点校《通典》卷15《选举》三，中华书局，1988，第357～358页。

⑤ 《全唐文》卷520《侍御史摄御史中丞赠尚书户部侍郎李公墓志铭》，中华书局，1983，第5289页。

绅之士不敢言兵，或耻言之；苟有言者，世以为粗暴异人，人不比数。”[①] 唐天祐二年（905）的敕文也谈到，“近代浮薄相尚，凌蔑旧章，假偃武以修文，竞弃本而逐末。虽蓝衫鱼简，当一见而便许升堂；纵拖紫腰金，若非类而无令接席”[②]。反映出世人鄙视武将，把武将看做非类的心态，这样的价值观念必然影响武官选任制度的发展演进，以及武官在人们心中的分量。晚唐时期，很多武官纷纷改转文职[③]，不能不说与这一文化氛围有一定关系。

由此可见，文化背景、国家的用人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社会的价值判断，而价值判断又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武官选任制度的发展演进。

五　研究综述

有关唐代武官选任制度的研究，到目前为止，学界还没有出现一部系统性专著。许多论著都是在探讨文官制度的同时，顺便涉及武官[④]。由于史料缺乏，尽管陈志学、郭绍林等人力图对唐代武官选任制度做整体论述，但系统性不强、深度不够[⑤]。因此，深入研究这一课题，无论从学术发展还是从社会参考价值来看都显得十分必要。相对于众多的文官选任制度研究而言，武官

---

① 《资治通鉴》卷244，唐文宗大和七年（833）七月“杜牧愤河朔三镇之桀骜”条，第7892页。

② 《旧唐书》卷20下《哀帝本纪》，第791页。

③ 《旧唐书》卷19下《僖宗本纪》，第705页。

④ 如宁欣著《唐代选官研究》，文津出版公司，1995；王勋成著《唐代铨选与文学》，中华书局，2001。

⑤ 刘健、唐永干：《论“武选”的缘起与功能——中国古代“武选”“武举”丛论之一》，《南京体育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第79～81、142页；陈志学：《试论唐代武官的入仕途径》，《中华文化论坛》2002年第3期，第57～65页；郭绍林：《唐代选拔军事人才的途径》，《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第87～88页。

方面的研究成果可谓凤毛麟角。其状况大致如下。

1. 有关唐代军功入仕的研究

由军功进入官僚集团，是唐代武官入仕的途径之一。唐朝制度规定，立有不同等级的军功，便给予不同奖赏，其中，最基本的是授予勋官；也有部分军功特异者，可由白身直接入仕[①]。唐朝初年，由于受尚武思潮的影响，勋官地位较高；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其地位日益下降，勋官也不再为军功阶层所独有，这是目前学界已经达成的共识，松永雅生、陈苏镇、杨志玖、张国刚、金锡佑等人都著文对此问题进行论述[②]。但是，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和理由，勋官也不例外，在傅玫、余新忠等人看来，勋官存在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其能够获得经济上的实惠[③]。金锡佑则认为，勋官存在的重要价值在于通过充任勋官，能够享有一些特权，如赎刑权、课役制度上的特权、"荣宠"地位；更重要的是，国家通过大量赐予百姓勋官，能够实现对人民的一种支配，即有效地动员人民的力量[④]。

尽管勋官人数众多，然而要入仕却并非易事，在文献史料中很难见到勋官释褐为官的例子，这不能不说与其仕途艰

---

① 《大唐六典》卷5"兵部员外郎"条，第124～125页。

② 〔日〕松永雅生：《唐代の勋官について》，《西日本史学》1952年第12期，第20页；陈苏镇：《北周隋唐的散官与勋官》，《北京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第29～36页；杨志玖、张国刚：《"辨贵贱、叙劳能"——隋唐五代品阶勋爵制度》，《文史知识》1985年第12期，第76～82页；金锡佑：《唐代百姓勋官考论》，《东方论坛》2004年第6期，第89～97页；孙继民著《唐代瀚海军事文书研究》，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2，第139～151页。

③ 傅玫：《唐代的勋官》，载于《庆祝杨志玖教授八十寿辰中国史论文集》，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第93～107页；余新忠：《唐代勋官的实际意义》，《铁道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第33、34、39页。

④ 金锡佑：《唐代百姓勋官考论》，《东方论坛》2004年第6期，第93～96页。

辛有很大关联。正是由于相关方面的材料贫乏，我们难以真正了解唐代勋官入仕的原貌，对此问题作具体探讨的学者也极为少见。但是，在正史中，通过立功而直接入仕者却不乏其人，最典型者莫过于薛仁贵、刘客奴。薛仁贵，以征辽东功，释褐游击将军、云泉府果毅①。刘客奴，开元中，单骑斩室韦首领段普恪，“自白身授左骁卫将军，充游奕使”②。这类人群是唐代武官的主要来源之一。毛汉光先生从社会阶层的角度探讨了唐代军功入仕者的情况③，但并没有对唐代前后期军功入仕的制度规定、升迁前景等问题作具体分析，而这直接关系到军功入仕者的前途和命运。另外，随着军功入仕人数的日益膨胀，其对整个官僚制度和官僚机构所造成的影响，也应引起充分关注。

2. 有关门荫入仕的研究

门荫入仕，是唐代官员仕宦的主要途径之一，它常与科举并提。受荫任者，一般要通过充任色役而参加铨选。爱宕元、毛汉光、吴宗国、宁欣、金铎敏等人，探讨了唐代的门荫入仕问题，但主要集中在门荫入仕为文官一类事例上，较少注意入仕为武官的情况④。宁欣、张兆凯等人还从宏观的角度，讨论

---

① 《新唐书》卷111《薛仁贵传》，第4140页。

② 《旧唐书》卷145《刘全谅传》，第3938页。

③ 毛汉光著《唐代统治阶层的社会变动》，台湾政治大学1968年博士论文。

④ 爱宕元：《唐代的官荫人仕——以卫官之路为中心》，载刘俊文主编《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六朝隋唐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第244～275页；毛汉光：《唐代荫任之研究》，《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55本第3分，1984，第459～542页；吴宗国：《唐贞观二十二年敕旨中有关三卫的几个问题——兼论唐代的门荫制度》，载北京大学中古史中心编《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论文集》第三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第149～175页；〔韩〕金铎敏：《唐代前期的官人范畴——以卫官为中心》，《魏晋隋唐史研究》第六辑，2000，第119～143页。

了门荫与入仕之间的关系①。然而这些学者关注的焦点是文官，较少涉及武官。门荫入仕之武官，在官僚架构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与入仕之文官相比，又有何特点？这些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

3. 有关武举及制举武科的研究

唐代，门荫和科举是居主导地位的选官方式，这主要针对文官而言，对武官则未必尽然。虽然在一些有关科举制度的研究论著中，作者一般皆会涉及唐代武举②，但只是简略地介绍唐代武举的设立时间及考试内容，并未做深入细致的考索。有关武科的考试分为武举和制举两途，武举创立于武周长安二年，这在学界已经达成共识；制举则是沿袭前代传统。

目前学界对武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武则天创立武举的原因；（2）武举的内容；（3）唐代废除武举的原因。这些研究成果③，以高明士、陈志学、许有根、潘孝

---

① 张兆凯著《汉—唐门荫制度研究》，岳麓书社，1995；杨西云：《唐代门荫制与科举制度的消长关系》，《南开学报》1997年第1期，第60～65页；宁欣：《唐代门荫制与选官》，《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3期，第76～82页。

② 吴宗国著《唐代科举制度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刘海峰著《唐代教育与选举制度综论》，文津出版公司，1991。

③ 陈志学：《唐代武举述论》，《四川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第94～99页；高明士：《唐代的武举与武庙》，《第一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台湾学生书局，1989，第1016～1069页；林伯原：《论唐代武举的建立及到两宋的发展》，《体育科学》1989年第1期，第16～19页；潘孝伟：《唐代的武举》，《安庆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1期，第43～49页；管益农：《中国古代的武举制度》，《华夏文化》1995年第4期，第14～15页；许有根著《武举制度史略》，苏州大学出版社，1997；唐群：《武则天开创武举时的形势分析》，《武则天研究论文集》，第321～325页；任立达、薛希洪著《中国古代官吏考选制度史》，青岛出版社，2003，第191～243页。

伟、任立达、薛希洪等人的文章或论著为代表，主要从制度层面进行讨论，缺乏实证性说明。除开创之作外，很多文章皆相互沿袭，创新较少，而且对制举武科缺乏专论（“制举武科”这一概念，是笔者借用台湾学者高明士的提法[①]）。近来，笔者在阅读墓志等材料时，发现了十多位武举及第者，以及部分制举武科及第人物，笔者便欲通过这些人物个案来做实证性研究。

4. 有关唐代藩镇辟署制度的研究

藩镇辟署制是唐代中后期藩镇选用文武僚佐的一种典型用人制度，长期以来，学界对此问题的探讨不断深入，已经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尤其以严耕望、砺波护、张国刚、卢建荣、戴伟华、石云涛等人的成果为代表[②]。其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文职僚佐的辟署和武职僚佐的职名、职级考证上，具体而言，探讨了文职僚佐的以下内容：第一，辟署制出现的原因；第二，辟署对象；第三，辟署幕职之规定；第四，幕职的社会地位和出路等。进入21世纪，日本学者渡边孝对藩镇辟署制度的研究又取得了

---

① 高明士：《唐代的武举和武庙》，第1039页。

② 砺波护著《中世贵族制的崩溃和辟召制——以牛李党争为线索》和《唐代使院的僚佐和辟召制》，分别见于《东洋史研究》，1962，第1～26页；《神户大学文学部纪要》，1973，第85～119页。杨志玖、张国刚：《唐代藩镇使府辟署制度》，《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1期，第130～137页。郭润涛：《中国幕府制度的特征、形态和变迁》，《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1期，第3～14页。卢建荣：《中晚唐藩镇文职幕僚职位的探讨》，《第二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中国唐史学会编，文津出版公司，1993，第1237～1271页。戴伟华著《唐代方镇文职僚佐考》，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石云涛：《唐后期方镇僚佐迁转》和《唐后期有关方镇使府僚佐辟属对象的限令》，分别见于《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4辑，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第140～152页；《唐研究》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第259～278页；石云涛著《唐代幕府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宁欣著《唐代选官研究》。

突破性进展，他将幕职官分为上下两级，指出上级幕职官实际上被士族把握，但其所指主要仍是文职僚佐；对于下级幕职官，他认为新兴阶层可以通过幕职官和藩府武职、州县官等地方官职的迁转而进入国家官僚机构①。

与文职僚佐相比，武职僚佐的研究则较为冷落，除了对其职名和职级的考证外，其余研究尚未深入开展。如方镇武职僚佐的选拔对象有哪些？与文职僚佐的辟署相比，存在怎样的差异性？武职僚佐的仕途前景、社会阶层状况怎样？其选用方式对中央原有的铨选权力、武官结构会造成何种冲击？对中央和地方藩镇之间的关系会带来怎样的影响？这些问题都有深入探讨的必要。

5. 有关蕃客入朝授官及其他选任方式的研究

蕃客指外来的少数民族，蕃将则为有唐一代武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关方面的研究可参见陈寅恪、章群、马驰等人的论著②。这些论著虽谈到蕃客的授官制度，但对于具体的授官情况却缺乏探讨。特例选拔武官，郭绍林有专文介绍，他认为，在唐代，以科举考试和战争为正途来选拔军事人才；异途则有因借题发挥使皇帝中意而被提拔者，利用体育爱好而猎取军职者，中央禁军将校借贿赂宦官而谋取军镇节度使职务者。但是其概括很不全面，大有补充的必要③。

综上所述，有关唐代武官选任制度的研究，目前学界探讨的

---

① 〔日〕渡边孝：《唐后半期の藩镇辟召制についての再检讨》，《东洋史研究》60～1，2001，第30～68页；《唐代藩镇における下级幕职官について》，《中国史学》11，2001，第83～107页。

② 陈寅恪：《唐代蕃将与府兵》，《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三联书店，2001，第296～310页；章群著《唐代蕃将研究》，联经出版公司，1986；马驰著《唐代蕃将》，三秦出版社，1990。

③ 郭绍林：《唐代选拔军事人才的途径》，《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第87～88页。

重点主要集中在：一，武官的入仕途径（门荫、科举、军功、辟署）；二，武举的创立、考试内容、兴废原因及社会意义。其他方面的研究则显得相对薄弱，全面、系统的整体研究更是付诸阙如。即使以上两方面，研究深度也嫌不够。如，在探讨武官入仕途径时，往往仅探讨途径本身，较少涉及其他，如仕途前景等；武举的研究则缺乏具体的事例作支撑。除此而外，唐代制举武科的情况如何；由此途入仕，升迁前景怎样；入仕者在地域上的分布情况如何；造成这一现象的深层原因是什么；方镇武职僚佐的选任和武官的荐举等也是当今研究的一大薄弱环节。外族人士入朝授予武官的情况也缺乏深入探讨，特例选官也须大力补充才较完整。此外，从宏观的角度看，唐代武官选任制度对当时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造成了怎样的影响？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六　文章内容

鉴于以上研究状况，本文拟研究以下内容。

第一章　唐代武官的铨选

本章分为两节，以安史之乱为界，分前后两个大时段来探讨唐代武官的铨选情况。

第一节《安史之乱以前的武官铨选》。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一是玄宗以前，武官铨选由兵部统一负责；玄宗以后，承继睿宗以来的节度使体制并进一步发展，朝廷将节镇军官的选举权力下放，由节度使代替中央兵部主持所属武官的选举。实际上，节镇军官的选任是通过奏授辟署制进行的。玄宗时代，是武官选举发生变化的时代，新旧体制并存。本节主要围绕着兵部的铨选对象、铨选时间、考试内容、考试合格后的注拟授官、过官以及南曹的档案整理工作等问题展开论述。

第二节《安史之乱以后武官铨选制度的演进》。安史之乱以

后，武官铨选沿袭玄宗以来的发展趋势，兵部的铨选职能继续弱化，地方藩帅、北衙禁军的统兵宦官和中书门下形成了另外一个占主导地位的武官选举系统。

第二章　军功入仕

本章分两节进行讨论。

第一节《墓志所见唐代的勋官入仕》。以勋官入仕的具体实例与制度规定作对比研究，认为：第一，高宗以前，勋不滥授，此后，授予勋官等级有偏高趋势；第二，勋官入仕主要为中低级官僚子弟提供出路；第三，勋官入仕在不同时期，进入仕途所花费的时间长短不一，大致分为高宗咸亨以前、咸亨至开元十八年、开元十八年以后三个阶段；第四，勋官的释褐官职与散官结品不成正比例关系，勋官入仕循吏部选者居多；第五，武周以后，国家限制勋官进入五品高官行列。

第二节《直接军功入仕》。根据唐代前后期不同的军功奖赏原则，分析了唐代军功入仕的变化，包括入仕标准、叙录军功的部门以及所授官职等。并分析了不同时期军功入仕者的实际授官状况与仕途前景、军功滥授现象以及造成军功滥授的原因。

第三章　门荫入仕

本章分为三节。

第一节《唐代卫官述论》。从总体上分析了唐代卫官的类别和配置、卫官的考课和简选、入仕为武官的情况及其在系统内部的迁转、卫官制度的衰落等问题。

第二节《千牛入仕》。笔者运用七十几位以千牛身份入仕的人物事例，进行定量分析。探讨了千牛入仕者释褐官品、仕途前景及仕历等问题。认为，千牛的起家官品较高，也容易官至五品以上，他们是国家文职官僚的后备队伍，而不是武官人才的重要

来源，因为实际释褐为武官的人数有限。随着时代发展，千牛的地位处于一个不断降低的过程中，不但起家官品降到与科举出身者相当，人数也在不断减少。

第三节《墓志所见唐折冲府卫官》。笔者运用墓志材料，考证了折冲府卫官的性质、充任此类卫官的社会阶层、仕途前景，以及它们在整个卫官群体中的地位等。

第四章　科举入仕

本章分为两节，即武举和制举。

第一节《唐代武举》。笔者运用墓志材料，在考证这些武举及第人物的同时，分析了其出身、入仕、授官和仕历等情况，并进而探讨了唐代武举的贡举部门、武举考生的来源地区、武举的历史地位等问题。

第二节《唐代的制举武科》。笔者在运用传统文献的同时，也尽量使用一些石刻资料，在考证的基础上，分析制举武科及第者的出身、来源地区、及第后的释褐官品和升迁情况、仕途前景等问题，并对唐代制举武科的科目进行分析研究。

第五章　唐代中后期方镇使府武职僚佐的辟署制

本章分三部分进行讨论。

第一节《辟署方式及对象》。藩镇武职僚佐的辟署方式大致有：藩帅主动从境外辟请、被辟者旅居方镇或主动投奔藩帅而被藩帅看中、他人推荐、因亲戚或故旧关系而被辟署、公开招募才能之士、因军功而署以武职等几类。辟署对象主要有：白身、有出身者、前资官、现任官、他镇武职僚佐、军将子弟、罪人和盗贼等。

第二节《方镇使府武职僚佐的官职奏荐及迁转》。藩镇军将官职的奏请，分为宪官、检校官、试官或职事官等几个层次。其

官职迁转，分为职级和朝官两条升迁轨道。军将职级由藩帅自行署置，而朝官的奏请和迁转则由藩帅向中央提出申请。宪宗以后，由于平藩的成功，朝廷又逐渐将武职僚佐的官职奏请和迁转纳入中央化轨道，对使府武职僚佐的官职奏请和迁转逐步进行限定，表明中央政府对地方藩镇的控制有所加强，但是这种加强的力度是有限的。

第三节《方镇使府武职僚佐的社会构成和地域分布》。笔者通过大量的人物事例进行量化分析，发现武职僚佐之辟召制，未能完全成为寒素阶级出入官场的通道；相反，在很大程度上，它被中低级官僚所把持，尤其是军官群体，将其作为子弟进入官场的阶梯，反映出军官群体内部的世袭现象。另外，方镇武职僚佐以北方人居多，这是由当时的军事布局决定的。

第六章　其他选任方式

本章分为三节。

第一节《来朝蕃客授官》。探讨了来朝蕃客授官的历史原因、授官机构和授官制度、来朝蕃客授官的具体方式。

第二节《唐代宦官的武官授予》。探讨了宦官授予武官的历史原因及授官现状。

第三节《其他选任方式》。除以上选拔途径外，唐代武官的选任事实上还存在由文转武、荐举、投诚、卫士·白丁·官健因年劳或才能授官、征召入仕、以亲戚授官、以尚主拜官、以钱买官、因国家庆典授官等多种途径。

结　语

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其一，对整篇文章的论点作了大致概述；其二，探讨了影响唐代武官选任的基本因素，认为大致有三，即政治信任、才能和裙带关系；其三，探讨了武官选任与军

队控制的关系。

七　研究方法及难点突破

制度并不仅仅是一些死板的条文规定，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往往会体现出一定的灵活性。因此，如何从死板的制度条文走向活的制度研究，是本文的努力方向。鉴于此，文章主要采用个案考释、定量归纳、定性分析等方法，从实证角度来探讨唐代武官选任制度的基本面貌。定量研究方法在史学界存在争议，但是，“我们不能指望历史研究中所使用的计算方法具有高度的精确性，因为我们必须依赖前辈的著述和历史记载，以及各条史料的相互印证。要允许有一定的误差。然而，如果我们谨慎地使用这种方法并与其他研究成果相结合，那么所得出的估算数可以是有用的。”① 而且，通过这些与数字有关的讨论，有可能看出历史发展的趋势和意义。

笔者在研究中面临的主要困难是资料不充分，传统文献较少涉及唐代武官的选任制度，故本文在材料收集上遇到一定障碍。不过，大量的出土墓志、笔记小说、唐人文集为研究唐代武官选任制度提供了契机，尤其是出土墓志为我们提供了大量中低级武官的入仕经历，填补了正史与文献记载的缺陷，使系统研究武官选任制度成为可能。本文除大量运用墓志材料外，在一些具体问题的研究上也力图取得突破。比如，对武举、制举武科、卫官（包括千牛、折冲府系统卫官等）、方镇使府武职僚佐的辟署制等方面，尽可能作系统论述。当然，这些问题的研究真要取得实质性进展，并非易事，故在讨论中难免有不当之处，敬请各位学贤指正。

---

① 张仲礼著、李荣昌译《中国绅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第 70 页。

第一章　唐代武官的铨选

有关唐代官员的铨选，目前学界关注的重点是文官，而较少注意武官，致使相关方面的研究成果极为贫乏；这与史料有限等因素有关，加之很多有关武官铨选的叙述夹杂在文官中，因此研究起来难度较大。展现在笔者面前的，仍然是武官铨选受到文官制度深刻影响的痕迹，故在一些过程的描述中，不得不借助于文官铨选制度，来尽量恢复武官铨选的一些基本面貌。

唐代铨选制度并非处于静止状态，而是处于一个渐进式的变化过程中，因此，笔者将之大体分为安史之乱前、后两个大时段来进行论述。

第一节　安史之乱以前的武官铨选

安史之乱以前的武官铨选也并非一成不变，事实上，在节度使体制成立前后，武官铨选制度已在发生潜移默化的变革。

一　铨选机构及官员

唐代选授之法，“凡诸王及职事正三品以上，若文武散官二品以上及都督、都护、上州刺史之在京师者，册授。五品以上皆制授。六品以下、守五品以上及视五品以上，皆敕授。凡制、敕授及册拜，皆宰司进拟。自六品以下旨授。其视品及流外官，皆

判补之。凡旨授官，悉由于尚书，文官属吏部，武官属兵部，谓之铨选。唯员外郎、御史及供奉之官，则否”①。可见，只有旨授官才参加铨选，他们为六品以下的一般京官和地方官。

册授的唐代武官（包括武散官在内）主要有骠骑大将军、诸卫大将军 、镇军·辅国大将军等②。制授官指三品以下、五品以上的官员，他们由皇帝下制授官，唐代武职官属于此范畴者，如诸卫郎将、诸卫率·副率、王府典军·副典军、折冲都尉、上府果毅都尉等。敕授官指六品以下的常参官、供奉官，以及六品以下、守五品以上、视五品以上的官员。所谓“守”，指散官品阶低于职事官阶③，守五品以上职事官，指散官品阶在五品以下而所任职事官品在五品或五品以上者。

册授、制授、敕授官不在铨选之列，他们皆由“宰司进拟”④。鉴于五品以上官员的选授文武不分，故本章主要探讨六品及其以下武官的铨选情况，这也是其与六品以下文官铨选的差异之处。

1. 中央兵部铨选

唐代，旨授武官的选授由兵部尚书、侍郎负责。《通典》载：兵部尚书掌武官选举，“亦为三铨，制如吏部。尚书所掌，谓之尚书铨。侍郎所掌，其一为中铨，其一为西铨。各有印。”⑤

但《大唐六典》、《旧唐书》所载与之有出入，前书云：“〔兵部〕尚书为中铨，两侍郎分为东西铨。”⑥ 后书载：“尚书、

① 《通典》卷15《选举》三，第359页。
② 《通典》卷19《职官》一，第471页。
③ 《旧唐书》卷42《职官志》一，第1785页。
④ 《通典》卷15《选举》三，第359页。
⑤ 《通典》卷23《职官》五，第641~642页。
⑥ 《大唐六典》卷5“兵部尚书侍郎”条，第112页。

侍郎分为三铨。尚书为中铨，侍郎分东西。”[①] 王勋成先生在划分兵部三铨时，直接采用了《大唐六典》和《旧唐书》的记载[②]，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大唐六典》成书时间早于《通典》，《旧唐书》沿用《六典》而未采纳《通典》的记载，必有缘故。因此，笔者认为，兵部三铨应采用《大唐六典》的记载，即尚书掌中铨，两侍郎分东西，与吏部三铨有一定出入。

吏部三铨确立于高宗总章二年（669），当时扩大编制，增加侍郎一员，以“本员为中铨，新加员为东铨”[③]。与之同步进行的是，兵部侍郎也在同年增加一员[④]，则兵部三铨也理应在同年确立。长寿二年（693），兵部侍郎竟达到三员，因为当年又增加侍郎一员；长安四年（704）裁掉一员[⑤]。以后（至安史之乱以前），兵部侍郎基本上保持两员的编制。

兵部尚书和侍郎分领掌选，《通典》略云：

大唐自贞观以前，尚书掌五品选事。贞观二十二年（648）二月，文部侍郎卢承庆兼检校兵部侍郎，仍知五品选事。承庆辞曰：“五品选事，职在尚书，臣今掌之，便是越局。”太宗不许，曰：“朕今信卿，卿何不自信也。”由此言之，即尚书兼知五品选事明矣。至景龙中，尚书掌七品以上选，侍郎掌八品以下选。至景云元年（710），宋璟为尚书，始通其选而分掌之，因为常例。开元以前，诸司之官兼知政事者，午前议政于朝堂，午后理务于本司。自开元以来，宰相员少，资地崇高，又以兵吏尚书权位尤美，而宰臣多兼领之，但从容衡轴，不自铨综，其

① 《旧唐书》卷43《职官志》二，第1832页。
② 王勋成著《唐代铨选与文学》，第210页。
③ 《唐会要》卷58“吏部侍郎”，第1005～1006页。
④ 《唐会要》卷59“兵部侍郎”，第1030页。
⑤ 《唐会要》卷59“兵部侍郎”，第1030页。

选试之任皆侍郎专之，尚书通署而已，遂为故事。或分领其事，则列为三铨，四年（716）六月敕，其员外郎、御史并余供奉官，直进名敕授，自此不在吏部。尚书掌其一，侍郎分其二①。

可见，武德、贞观年间，兵部尚书、侍郎原则上也分品掌选，兵部尚书掌五品铨选，六品及其以下武官由兵部侍郎负责。唐代初年武官五品，皆作文官六品叙②，因此，当时兵部尚书掌武官五品选事也有可能。中宗景龙年间，吏部分品掌选明确，即尚书掌六、七品选，侍郎掌八、九品选。至睿宗景云元年，吏部尚书宋璟打破侍郎、尚书分品掌选的制度，开始通其选，但仍分掌之。兵部也可能随之进行了一系列相应变革，毕竟我们不能忽略文官制度对武官的直接影响。史料还表明，开元以来，由于宰相常兼任兵部尚书一职，故兵部侍郎的权力不断扩大，专掌选事。“中唐以后，尚书六部的部内事务主要由副手侍郎负责，尚书只是虚荣而无实权”③。

玄宗天宝三载（744），停止了部分低级武官的番试。敕云：“习武人官，已经精简，随番更试事颇为烦。其武官，自今已后，因番试及过中书门下，宜停。”④ 由“习武人官，已经精简”一语，表明那部分停止番试者应为职事官。那么，参加番试及过中书门下的武官应包括哪些呢？据《大唐六典》：

① 《通典》卷23《职官》五，第631～632页；《唐会要》卷74“论选事”：“唐承隋制，初则尚书铨掌六品、七品选；侍郎铨掌八品选。……其后，尚书、侍郎通掌六品以下选。”（第1333页）另参见《唐会要》卷58“吏部尚书”，第1004页。

② 王勋成著《唐代铨选与文学》，第142页。

③ 张泽咸著《唐代阶级结构研究》，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第93页。

④ 《唐会要》卷59“兵部侍郎”，第1030页。

凡应宿卫官，各从番第：诸卫将军、中郎将、郎将，及诸卫率、副率，千牛备身、备身左右、太子千牛，并长上；折冲、果毅，应宿卫者，并一日上，两日下；诸色长上若司阶、中候、司戈、执戟，并五日上、十日下。诸应外职掌押当及分司者，则年支焉。[①]

唐代文武五品以上官员无须铨试，故这部分停止番试者，应低于五品。由史料可知，停止番试的武官应包括在京城宿卫的果毅都尉、司阶、中候、司戈、执戟等；而五品以上宿卫之武官，则主要停止其过中书门下这道考核程序，因为五品以上官员，由中书门下负责选授。京城宿卫的低级武官停止番试后，兵部的工作量相应减轻，也就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兵部自身的选举权力。

兵部有东都选，“其东铨者，贞观元年（627），京师谷贵，始分人于洛州置选。至开耀元年（681），以关外道理迢递，河洛之邑，天下之中，始诏东、西二曹两都分简留放，既毕，同赴京师，谓之东选”[②]。安史之乱前，卢奕也曾“留台东都，兼知武部选”[③]。

此外，从现有史料看来，兵部似乎没有南选。

2. 节度使主持节镇武官选举的兴起

玄宗时期，对于远在边疆戍守或作战的将士而言，他们不可能亲自赴选，故朝廷设置了一套变通办法：“其在军镇要籍，不得赴选，委节度使铨试其等第申省。”[④] 即节度使代替中央兵部主持节镇官员（包括军官）的铨试工作，有权提出人选，但是

---

① 《大唐六典》卷5“兵部郎中员外郎”条，第116页。

② 《（宋本）册府元龟》卷629《铨选部·总序》，中华书局，1989，第2020页。

③ 《新唐书》卷191《卢弈传》，第5526页；另参见同书同卷第5518页。

④ 《旧唐书》卷43《职官志》二，第1832页。

必须奏请朝廷批准。虽然这一史料没有指明具体时间，但是由于《大唐六典》成书于玄宗时期，节度使也是睿宗以来才出现的新官职，因此，这一制度理应为玄宗时期的规定。可见，玄宗时期，武官选举出现了一个新现象，即节度使代替中央兵部主持节镇军官的选举事宜，从而使节镇军官的选举权力有从中央分离出去的趋势。

在具体实例中，我们见到此时期节度使体制下的军官，其官职任免是通过奏授辟署制实现的。所谓奏授辟署制，是指“行军统帅对僚属的辟署计划要上报朝廷并得到批准后才能有效，要先‘奏’后‘授’，其特点是行军统帅的自辟与朝廷的任命相结合”，节度使的奏授辟署制直接接受、继承了行军的辟署制[①]。具体实例如：天宝六载（747），高仙芝“代夫蒙灵察为安西节度使，便奏〔封〕常清为庆王府录事参军充节度判官”[②]；天宝十三载（754）二月，哥舒翰奏“安邑曲环为别将”[③]。关于开元、天宝年间，边镇（节度使）使府僚佐的构成、辟用和迁转情况，石云涛先生有详细考证，兹不赘述[④]。

可见，开元、天宝时期，“边镇幕府已经在酝酿形成一个与吏部铨选制度不同的新的用人体制”[⑤]。这种用人体制存在着明显的弊端，因为它不仅分割了朝廷的部分选官权力，还“容易形成辟主和被辟署者之间的依附关系，使辟署制成为辟主尤其是野心家扩大个人势力的工具。它一旦与地方势力结合，还会成为维护地方割据势力的手段”；就是在玄宗时期，“这种限制辟署制

① 孙继民：《唐代行军统帅僚属制度及其对藩镇形成的影响》，《河北学刊》1992年第6期，第94、96页。
② 《旧唐书》卷104《封常清传》，第3208页。
③ 《资治通鉴》卷217，唐玄宗天宝十三载二月己丑条，第6926页。
④ 石云涛著《唐代幕府制度研究》，第85～158页。
⑤ 石云涛著《唐代幕府制度研究》，第157页。

的‘奏授’纯粹变成了徒具形式的公文和有名无实的空壳”，可以说正是“辟署制促成了割据藩镇的形成”[①]。玄宗天宝年间，全国军队人数为57万，节度使兵力占了49万，这种兵力上的极度反差，表明中央兵部所能有效控制的军官选拔群体大大减少，铨选权力受到严重削弱。一旦节度使久任边疆，便容易利用此选举权，形成边将利益集团。不过由于玄宗时期，中央威势尚在，因此，还能够有效地驾驭边疆藩镇。但是这种任官体制所显露出来的弊端，却是非常严重的。

此外，在一些地方州府，也设有选举武官的机构，“〔地方州府之〕兵曹、司兵掌武官选举、兵甲器仗、门户管鑰、烽候传驿之事”[②]。“武举选拔应属‘武官选举’工作范畴。若此推测成立，则可知三府（京兆、河南、太原）的兵曹参军事和各都督府的兵曹参军事以及各州的司兵参军事就是职掌本州府武举选拔的官员”[③]，负责推荐他们到京城去参加省试。

二　铨选对象

兵部的铨选对象大体包括以下几种。

1. 六品以下的武职事官

武官不守选[④]，因为他们主要做宿卫工作，自诸卫将军以下，按其工作性质，有的“一日上，两日下”，有的“五日上，十日下”[⑤]。天宝三载以前，中央宿卫之武官还要进行番试，前面的史料已有明证。

---

① 孙继民：《唐代行军统帅僚属制度及其对藩镇形成的影响》，《河北学刊》1992年第6期，第97页。

② 《旧唐书》卷44《职官志》三，第1919～1920页。

③ 任立达、薛希洪著《中国古代官吏考选制度史》，第193页。

④ 王勋成著《唐代铨选与文学》，第211页。

⑤ 《大唐六典》卷5“兵部郎中员外郎”条，第116页。

2. 卫官

唐代卫官主要包括千牛、太子千牛、三卫、执仗、执乘、亲事、折冲府校尉、监门校尉·直长等[1]，他们皆由兵部简试。凡千牛备身、备身左右及太子千牛，“五考，本司随文武简试听选”；三卫“考满，兵部校试。有文堪时务，则送吏部；无文则加其年阶，以本色迁授”；凡亲事帐内“皆限十周年，则听其简试。文理高者送吏部，其余留大（本）司，全下者退还本色”[2]。

可见，这些卫官番考满后，由兵部举行考试。若兵部校试合格，再根据其自身的文、武才能，决定是参加文选还是武选。卫官宿卫考满，然后参加吏部简选的例子，如达奚思敬，“总章中，以仁勇校尉守左卫率府翊卫，秩满，以文艺优长，简入吏部，后解褐承奉郎、行幽州新平县尉”[3]。

《太平广记》中也有一则生动的例子：

> 唐初。裴略宿卫考满。兵部试判。为错一字落第。此人即向仆射温彦博处披诉。彦博当时共杜如晦坐。不理其诉。此人即云。少小以来。自许明辩。至于通传言语。堪作通事舍人。并解作文章。兼能嘲戏。彦博始迴意共语。时厅前有竹。彦博即令嘲竹。此人应声嘲曰。竹。风吹青肃肃。凌冬叶不凋。经春子不熟。虚心未能待国士。皮上何须生节目。彦博大喜。即云。既解通传言语。可传语与厅前屏墙。此人走至屏墙。大声语曰。方今圣上聪明。辟四门以待士。君是何物。久在此妨贤路。既推倒。彦博

① 《旧唐书》卷42《职官志》一，第1796～1803页。

② 《大唐六典》卷5“兵部郎中员外郎”条，第116、118页。

③ 《文苑英华》卷930《蜀州青城县令达奚君神道碑》，中华书局，1966，第4891页。

云。此意著博。此人云。非但著膊。亦乃着肚。当为杜如晦在坐。有此言。彦博、如晦。俱大欢笑。即令送吏部与官。出《启颜录》①

据此例，卫官宿卫考满，有无文武才能，主要根据其所试判文来裁定。有文者，送往吏部铨选授官；无文者，则留在兵部选授。

3. 勋官、武散官

勋官由兵部简试，“上柱国以下番上四年，骁骑尉以下番上五年，简于兵部，授散官”②。授文散官还是武散官，史料并未明言。散官并不具备铨选资格，必须再次番上才行。

武散官由兵部掌管，共二十九阶，“凡怀化、归德将军，量配于诸卫上下，其余并兵部定其番第。……番满者，六品已下，并听预简选。量其才能，或留本司，或送吏部。五品已上者，则奏闻”③。可见，武散官六品以下，番满由兵部校试，与卫官一样，兵部校试只是其取得铨选资格的一道程序，最后还要根据其自身的文武才能来决定是参加兵部铨还是吏部铨，从而分流进入文武官僚队伍。

4. 品子、视品国官府佐等

品子是六品以下子孙和勋官三品以下五品以上子，他们主要充当王公和三品以上官的亲事、帐内，定期上番；不上番的，纳钱代役，叫做纳课，这部分人即纳课品子。品子也有被差充经管公廨本钱的，称为捉钱品子。他们纳课或捉钱满一定年限，由州解送兵部，参加武选，合格者量文武授予散官。

---

① 《太平广记》卷254《裴略》，中华书局，1961，第1974～1975页。

② 《新唐书》卷46《百官志》一，第1190页。

③ 《大唐六典》卷5“兵部郎中员外郎”条，第115～116页。

武选，凡纳课品子，岁取文武六品以下、勋官三品以下五品以上子，年十八以上，每州为解上兵部，纳课十三岁而试，第一等送吏部，第二等留本司，第三等纳资二岁，第四等纳资三岁；纳已，复试，量文武授散官。若考满不试，免当年资；遭丧免资。无故不输资及有犯者，放还之。凡捉钱品子，无违负满二百日，本属以簿附朝集使，上于考功、兵部。满十岁，量文武授散官。其视品国官府佐应停者，依品子纳课，十岁而试，凡一岁为一选。自一选至十二选，视官品高下以定其数，因其功过而增损之。①

可见，这部分参加武选者，由兵部校试，但这并不能决定其以后的文武官员属性。因为他们获得文武散官后，还须再次番上，才能取得铨选资格。取得选官资格后，还需守选1～12年。此外，“六品已下、九品已上子”，还可以参加流外铨②。

5. 武举及武制科及第者

武举最初由兵部员外郎主持，至开元二十六年（738），改由兵部侍郎掌管③。武制科及第者，也由兵部侍郎负责铨选授官，这可以从萧颖士为武制科及第者邵翼所作的《为邵翼作上张兵部书》一文得知，全文的中心意思就是希望张侍郎能够授予其相对较高的职事官位，而不要授予其末品的一旅之长④。

另外，吏部文选官员也可申请改转武选，但条件是：“吏部

① 《新唐书》卷45《选举志》下，第1174页；另参见《玉海》卷117《选举·文武选》，京都：中文出版社，1977，第2238页。
② 《大唐六典》卷2“吏部郎中”条，第38页。
③ 《唐会要》卷59“兵部侍郎”，第1030页。
④ 《文苑英华》卷670，第3445～3446页。

选人请武选者，宜取强壮身材六尺以上，籍年四十以下，堪统领者。”①

以上为兵部铨试的主要对象，人数众多，仅诸卫三卫、监门直长就有“三万九千四百六十二人”，“亲事、帐内万人”，“纳课品子万人”②，加上自四品以下武散官、六品及六品以下武职事官等，数量就更为庞大。所以，兵部的铨试工作非常繁重。

三　铨选时间

兵部在正式铨选前，要颁布选格，史料虽未明言，但我们从文宗时期的两则史料可推知。大中五年（851），中书门下的一则奏请中提到“今年新格”和“废旧格”几字③，表明兵部选格原则上要每年颁布；此外，文宗时发布的“暂停吏礼兵三部选举敕”也提到，“仍准今年格文”数语④。中晚唐之际，兵部权力遭到严重削弱，其仍能颁布选格，主持武官的铨试工作；则在初、盛唐时期，兵部颁布选格，主持铨试工作更是情理之中的事。兵部颁布选格后，下级部门便根据选格确定选人。选人以“十月一日起省”，参加冬集，“三月三十日毕”⑤。

选人根据距离京城的远近，分三批赴京师，“每岁孟冬以三旬会其人。去王城五百里，集于上旬；千里之内，集于中旬；千里之外，集于下旬”⑥。安史乱后，因天下多故，吏部铨选已不

---

① 《唐会要》卷59“兵部尚书”，第1029页；另参见《大唐六典》卷5“兵部尚书侍郎”条，第113页。
② 《新唐书》卷45《选举志》下，第1180页。
③ 《唐会要》卷59“兵部侍郎”，第1032页。
④ 《全唐文》卷74《暂停吏礼兵三部选举敕》，第777页。
⑤ 《通典》卷15《选举》三，第361页；另参见《唐会要》卷75“选部下”，第1355页。
⑥ 《大唐六典》卷5“兵部尚书侍郎”条，第112页。

能像前期那样，“每年调集，自乾元已后，属宿兵于野，岁或凶荒，遂三年一置选”。这一举措带来的弊端是，“选人停拥，其数猥多，文书不接，真伪难辨，吏缘为奸，注授乖滥，而有十年不得调者”。因此，贞元八年（792），吏部接受陆贽的建议，“吏部分内外官员为三分，计阙集人，每年置选”①。兵部铨是否做过类似调整，因史料缺乏，未详。

四　南曹磨勘

“南曹起于总章二年，司列少常伯李敬元奏置。未置已前，铨中自勘责”②。即在南曹设置以前，选人的解状等文书，由铨司（兵部或吏部）自行负责。

总章二年，南曹设置以来，便由南曹专门负责审核选人的档案材料，“〔兵部〕员外郎一人，掌选院，谓之南曹。每岁选人（人），有解状、簿书、资历、考课，必由之以核其实，乃上三铨，进甲则署焉”③。由于兵部选人众多，开元十三年（725），又将判南曹的员外郎增加为两员，“寻又一人专判”④。《唐会要》记载此事为开元十二年⑤。兵部选人参加铨选时，所交纳解状、簿书、资历、考牒，经过南曹的复核磨勘后，交给三铨部门，准备参加铨试，然而其间却只字未提“判废置”程序，原因为何，待考。

从南曹官员审核选人材料的那一刻，便进入选限，时间是十月一日。选限期内，主持考试的兵部尚书、侍郎、铨注唱官和兵部南曹官——员外郎都要“入宿”⑥。南曹开宿后，便将判成选

① 《旧唐书》卷139《陆贽传》，第3803～3804页。
② 《唐会要》卷58“吏部员外郎”，第1006页。
③ 《大唐六典》卷5“兵部郎中员外郎”条，第125页。
④ 《（宋本）册府元龟》卷629《铨选部·总序》，第2020页。
⑤ 《唐会要》卷75“杂处置”，第1360页。
⑥ 《唐会要》卷24“朔望朝参”，第466、468页。

人的材料申报铨司，参加铨试；而被驳放选人则以长名榜示，发榜时间一般到正月半后[①]。长名榜出现的历史背景，是因为“高宗龙朔之后，以不堪任职者众，遂出长牓放之冬集，俗谓之‘长名’”[②]。天宝末年，“〔杨〕国忠既以宰臣典选，奏请铨日便定留放，不用长名”[③]，使长名榜示的制度在当时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

五　铨试内容

南曹的磨勘工作结束后，便将判成选人送往铨曹，参加铨试。吏部“铨司接到南曹的申报材料后，榜示判成选人交纳家状、保状及试判纸，交齐后，就开始锁铨引验”[④]。武选人也应交纳同样的材料，武选人家状常云：“长形，紫黑，多有髭”[⑤]。由于文武官的职能各异，故考试内容差别很大，文官考身、言、书、判，而武官则不一样：

> 以五等阅其人：一曰长垛，二曰马射，三曰马枪，四曰步射，五曰应对。以三奇拔其选：一曰骁勇，二曰材艺，三曰可为统领之用。其尤异者，登而任之，否则量以退焉。然后据其状以核之，考其能以进之。所以录深功，拔奇艺，备军国，综勋贤也。……其三奇五等之选，有殊尤者，得令宿卫。其宿卫，皆带本官以充。其选人有自文资入者，取少壮

① 《唐会要》卷74“论选事”：“选人每年长名，常至正月半后”（第1335页）。

② 赵贞信校注《封氏闻见记校注》卷3“铨曹”，中华书局，2005，第21页。

③ 《旧唐书》卷106《杨国忠传》，第3244页。

④ 王勋成著《唐代铨选与文学》，第163页。

⑤ 黄寿成点校《南部新书》乙，中华书局，2002，第24页。

六尺已上，材艺超绝，考试不堪，还送吏部。①

其考试内容与武举大体相似，武举考试内容为射长垛、骑射、马枪、步射·射草人、材貌、言语、举重②。故《册府元龟》云："兵部武选亦然，课试之法如举人之制。取其躯干雄伟，应对详明，有骁勇材艺及可为统帅者。"③ 概言之，唐代兵部武选的考试内容可大体分为两类，一是试技艺；二是察身、言。

玄宗天宝元年（742），对长垛一项的考试内容进行了改革，"自今以后，应试选举人，长垛宜以十只箭为限，并入第一院，与两单上；八只入第一院，两只入第二院，与一单上次上；十只不出第三院，与单上；十只不出第四院，与次上。余依常式"④。

总之，兵部考试的内容与武举大体相似，都重视技艺，而不重视文化素质。但与文科考试相比，相同之处在于都有身材、言语的要求。

六　注拟、过官及殿庭谢恩

铨试结束，接下来便注拟官职，兵部尚书和侍郎分铨注拟⑤。选人对所注官职有权拒绝，若三注三唱都不满意，可等待下半年的冬集⑥。选人若无故不参加三试三注唱，就取消选官资

① 《大唐六典》卷5"兵部尚书侍郎"条，第112～113页；另参见《旧唐书》卷43《职官志》二，第1832页。

② 《大唐六典》卷5"兵部郎中员外郎"条，第123～124页。

③ 《（宋本）册府元龟》卷629《铨选部·条制》一，第2023页；另参见《通典》卷15《选举》三，第360页。

④ 《唐会要》卷59"兵部侍郎"，第1030页。

⑤ 《旧唐书》卷106《杨国忠传》，第3244页。

⑥ 《资治通鉴》卷216，唐玄宗天宝十一载（752）十二月"故事，兵、吏部尚书知政事者"条，第6917页。

格，不再给予其补考、补拟注官的机会①。

对所注官职满意者，铨司就将其所注官职等信息制成文书档案，交给尚书仆射检勘，然后由仆射交给门下省审查，进行铨选的最后一道程序：过官。“凡文武职事六品已下，所司进拟，〔门下省〕则量其阶资，校其才用，以审定之。若拟职不当，随其优屈，退而量焉”②。所谓“过官”，就是对兵部、吏部铨选进行复查，若发现不合格者，及时黜退。对于不参加过官的选人，也同样取消注官资格：“其过门下三引，不过者，亦不在更注之限。”③ 顺利过官者，铨选部门便发给告身。然而，门下过官制度在天宝十二载（753）杨国忠兼吏部尚书时，受到破坏，他在给选人注官的同时，便邀请门下省官员坐在一旁，注官完毕便宣称过官结束，没有遵循注官在前，过官在后的程序④。兵部选人的过官制度在此时是否也同样遭到破坏，还有待于更充分资料的发掘。

选人过官结束，随即团甲上奏（团甲，就是将铨试结果汇总成册后上报的材料）。然后由皇帝下旨画“闻”而授官，称奏授，亦称“旨授”。兵部授官时，要发给告身，兵部告身由兵部郎中发放⑤，令史书写⑥。官员领取告身后，在“殿庭谢恩”⑦，随后赴官，铨选便告一段落。

从唐代兵部铨选的全过程可知，它基本上形成了这样一个程序，可表示如下：

---

① 《唐会要》卷75“杂处置”，第1359页。

② 《旧唐书》卷43《职官志》二，第1843页；另参见《大唐六典》卷8“门下省侍中”条，第177页。

③ 《唐会要》卷75“杂处置”，第1359页。

④ 《唐会要》卷74“掌选善恶”，第1346页。

⑤ 《新唐书》卷46《百官志》一，第1196页。

⑥ 《旧唐书》卷166《元稹传》，第4334页。

⑦ 《（宋本）册府元龟》卷629《铨选部·条制》一，第2023页。

颁布选格→集选人→南曹收集解状、簿书等→南曹检勘，（废置详断？）确定选人→试→铨→三注唱→

→简于仆射→过官→团甲上奏→领取告身→殿庭谢恩→赴任

→不服者冬集

兵部是否存在流外铨，任士英认为：那些流外任勋品解于兵部续劳，考满后，由于要从流外资叙，那么，他们在考满的过程中（即考满之前）“有可能由兵部举于吏部流外铨进行铨试”①。即兵部可能没有流外铨。究竟如何，因为相关方面的史料极为贫乏，只有留待未来探讨。

第二节　安史之乱以后武官铨选制度的演进

唐代前期，兵部司的胥吏达139人，与吏部司的141人相比不相上下②，这反映了当时兵部铨选工作的繁重。然而，随着时代发展，兵制的变化，唐代兵部的铨选权力日益受到削弱。影响唐朝铨选制度的，很大程度上是奏授辟署制的出现，即节度使可以代替中央兵部主持节镇军官的选举事宜。安史之乱以后，随着节镇从边疆向内地延伸，这种任官模式也带到了内地藩镇。因此，中央兵部的选举权力延续玄宗以来的发展趋势，呈持续削弱态势。

一　兵部铨选职能的继续弱化

安史之乱以后，中央兵部的铨选职能继续受到削弱，根本原因就在于兵部自身不统兵，而一些统兵机构如藩镇和北衙禁军的

---

① 任士英：《唐代流外官制研究》（下），《唐史论丛》第6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第180页。

② 宁欣：《唐代铨选制度的完善及流弊》，《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4期，第88页。

武官任命，与兵部又没有直接联系，而是归中书门下掌管。当时“有关军将的选补、考课、迁转等军政事务”，要向中书门下汇报[①]。但兵部的选举职能仍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维持，如文宗时发布的“暂停吏礼兵三部选举敕”，提到兵部选举一事[②]。《唐会要》卷59“兵部侍郎”条，大中五年中书门下两省的奏议也提到兵部武选一事。只是其选举权力与节度使体制成立以前相比，大为削减。故陆长源在《上宰相书》一文中提到：“且尚书六司。天下之理本。兵部无戎帐。户部无版图。”[③]《资治通鉴》亦云：“今夏官不知兵籍，止于奉朝请；六军不主兵事，止于养勋阶。”[④]

安史之乱以后，兵部的铨选对象大大减少，主要还有：卫官、武散官、纳课品子、捉钱品子、勋官和武举及第者等。孙国栋认为：“自代宗、德宗以来，军机急逼，而尚书省处理职务的程序，需先由尚书各部制为规程，然后符下九寺执行，迂缓详慎，不能应付急逼的事机。于是户部理财之权被度支、盐铁两使所代替；兵部军政之权，被禁兵和节镇所侵夺；吏部铨选之权，被君相方镇所剥削；刑部、工部于战乱之际，已无事可为。惟有礼部的贡举和吏部一部分铨选仍能维持。”[⑤] 孙氏只看到吏部仍保留部分铨选权力，而忽略了兵部铨仍在一定程度上维持的现实，只是其铨选权力已今非昔比而已。

---

① 刘后滨：《从三省体制到中书门下体制——隋唐五代》，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197页。

② 《全唐文》卷74《暂停吏礼兵三部选举敕》，第777页。

③ 《全唐文》卷510《上宰相书》，第5184页。

④ 《资治通鉴》卷243，唐文宗大和二年（828）三月“自元和之末”条，第7857页。

⑤ 孙国栋：《宋代官制紊乱在唐制的根源》，《唐宋史论丛》（增订版），第201页。

二　地方藩帅有权选任本镇武职军将

节度使体制成立以来，藩帅就居间掌握了属下武官的任命权，只是当时还未完全制度化而已，推行的地域仅局限在边疆。安史之乱以后，为了使藩镇之间相互制衡，朝廷在内地也遍设节度使，这样，藩镇奏授辟署任官的模式就从边疆延伸到了内地，实现了制度化和普遍化。安史之乱以前的情况已如上述，安史之乱以后："今诸道节度、都团练、观察、租庸等使，自判官、副将以下，皆使自铨择。"① 即低级军官的任免完全由节帅负责，而不用奏报朝廷。即使是职级较高的将领，如都知兵马使、正兵马使、副兵马使、都虞候等，藩帅原则上不能自行任命，但事实上，很多高级将领也由藩帅自行废置，然后奏闻中书门下，这将在第五章详细讨论。如此，地方藩镇也就把绝大部分武将的任命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大大削弱了朝廷的选举权力。

三　护军中尉等北衙禁军统兵宦官有权选任属下军将

安史之乱以后的北衙禁军，主要由宦官负责，其军官任免也掌握在宦官手中。如：长庆二年（822）三月，诏曰："如闻近日武班之中，淹滞颇久。又有诸道荐送大将，或随节度使归朝，自今已后，宜令神策六军使，及南衙常参武官，各具由历，并前后功绩，牒送中书门下"②。这里的"神策六军使"，无疑指神策军护军中尉和六军辟仗使。众所周知，护军中尉由宦官充任，是神策军的实际最高领导；北衙六军的"实际军权掌握在六军军使

① 《通典》卷18《选举》六，德宗时人沈既济言，第448页。

② 《唐会要》卷72"京城诸军"，第1296页。

手中。而六军又有宦官任辟仗使”[①]。可见，北衙禁军基层武官的任命，由统兵宦官负责，然后奏请中书门下。

《资治通鉴》亦云：“开成以来，神策将吏迁官，多不闻奏，直牒中书令覆奏施行，迁改殆无虚日。甘露之变之后，宦官专横遂至于此。癸未，始诏神策将吏改官皆先奏闻，状至中书，然后检勘施行。先奏闻于上，禁中以其状付中书，方与检勘由历而施行之。”[②] 即朝廷开始对神策军奏请任命官职权力进行限制。这种限制条文在会昌元年（841）的敕文中再次出现。会昌元年二月敕：“左右神策军，先有奏正员官大将请授官事，起今已后，宜依资改转。如无正员官者，军司欲为奏论，须有功绩者，宜具事迹奏闻，当为甄奖，不在注拟之限。”[③]

限制条文不断出现的本身，便表明制度在实际执行中的效力不大。在现实中，宦官对于中央禁军“拥有完整的军事行政管理权和军队统帅权，包括将吏的选用、军籍的管理等”[④]。可见，北衙禁军内部的武官任命，主要由统兵宦官负责，但是其官员任命形式上被纳入到了中书门下的管辖范围。

四　中书门下的武官选任权力

安史乱后，随着使职体系的发展，尚书六部的职能进一步削弱，中书门下的权力逐渐扩大，并成为新的中枢体制。军事系统内有关军将的任命，原则上要向中书门下申奏，如上文所言之北衙禁军军官，藩镇体制内较高级别的军官任免，也必须

① 张国刚：《唐代北衙六军述略》，《唐代政治制度研究论集》，第152页。

② 《资治通鉴》卷246，唐文宗开成三年（838）八月“开成以来”条及胡注，第7936页。

③ 《唐会要》卷72“京城诸军”，第1297页。

④ 刘后滨：《从三省体制到中书门下体制——隋唐五代》，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第189页。

奏闻中书门下。

开成元年（836）十一月，中书门下奏：准太（元?）和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敕，……其御史中丞以上官，并须因有战功，方得奏请。诸道团练下万人以上军，所奏不得过殿中侍御史。如未有宪官者，不在奏限。万人以下军，不因战功，并不得奏论请。敕旨，依奏。①

中央禁军和地方藩镇武官的官职奏请，都得向中书门下申奏。可见，安史之乱以后，“选官事务，很大一部分归属到中书门下”②，敕授官的范围呈现出扩大趋势。尽管很多时候中书门下只是例行手续，但从制度规定上看，其选举对象的增加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哀帝天祐二年（905），废除了中书门下的铨选职能，将其权力归还吏部，但是未提到将武官选举权归还兵部一事③，原因为何，不得而知。

五　墨敕授官

中宗神龙二年（706），“置员外官凡二千余人。超授阉官七品已上员外者，又千余人”④。中宗、睿宗时期的墨敕授官（即不经由正规的程序，由皇帝、妃主自行任官）现象，给兵部铨选造成了一定冲击。唐玄宗时，逐渐革除此弊端⑤。但随着藩镇割

① 《唐会要》卷79“诸使杂录”下，第1447页。
② 刘后滨：《从三省体制到中书门下体制——隋唐五代》，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第196页。
③ 《（宋本）册府元龟》卷632《条制》第四，第2041页。
④ 《旧唐书》卷42《职官志》一，第1789页。
⑤ 〔日〕中村裕一著《唐代制敕研究》，东京：汲古书院，1991，第690～698页。

据势力的强大，晚唐时期，尤其是黄巢之乱期间及其以后，墨敕授官现象又较为突出。如广明元年（880），郑畋对僖宗曰："道路梗涩，奏报难通，请得便宜从事。""许之。"[①] 由于交通被黄巢起义军截断，朝廷不得不允许各地节度使以"墨敕"的形式授官，实际上是授予各地藩帅自行任命官僚的权力。又如，唐中和二年（882）二月一日碑云："敕宣、歙、池等州都团练、观察使牒。当道先准诏旨，许行墨敕授管内诸州有功刺史、大将等，宪官具件如后：……"[②] 即中央同意这些藩镇在辖境内墨敕授官，实际上也就是将藩镇文武僚佐的任官权，全权交与藩帅。"对于末期唐王朝来说，在全国范围内官吏的任命权就是惟一的统治根据。一旦失去这一权力，国家的财政与军政也就由此分裂，无从统一，分裂割据的局势从此形成"[③]。官员（包括军官）任免权的完全下放，也就意味着中央对地方军队和行政的完全失控，从而在实质上宣告了唐朝统治的瓦解。对于唐末藩镇的墨敕授官问题，日本学者中村裕一先生有深入研究，可资参考[④]。

总之，安史之乱以后，地方武官的任免延续开元、天宝以来的奏授辟署制，北衙军官的任命也由宦官牒送中书门下，然后授予官职。这些事实表明，安史之乱以后，兵部的铨选权力大大削弱。

本章以上论述可大致归纳如下。

唐代的兵部铨，从唐初至唐末，可以大致划分为三个明显的阶段：即唐朝建国至玄宗以前、玄宗时期及安史之乱以后。这三个阶段武官选任制度呈现出明显的变化：第一时期，武官铨选甚

---

① 《资治通鉴》卷254，唐僖宗广明元年"上趣骆谷"条，第8241页。

② 洪迈：《容斋四笔》卷10"唐藩镇行墨敕"，第750～751页。

③ 山根直生：《唐朝军政统治的终局与五代十国割据的开端》，《浙江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第76页。

④ 〔日〕中村裕一：《唐代制敕研究》，第938～946页。

至全国军官的选拔，都由朝廷全权负责。第二时期，为新旧体制并存的时代，边疆节度使的奏授辟署制与中央兵部的武官铨选同时并存。第三时期，武官选任权力进一步分化，兵部、地方藩镇、北衙禁军和中书门下四个部门，都有选任武官的权力，兵部的铨选权在原有基础上更进一步削弱。

晚唐时期，尤其是黄巢之乱以后，出现的藩镇墨敕授官现象，使中书门下的选官权力也受到削弱，从而为军队的地方化、土著化提供了制度保障，反过来又从用人制度这一层面加剧了全国军权的分割。其后兵部铨“变而为三班流外铨，不知自何时。元丰官制行，一切更改，凡选事，无论文武，悉以付吏部”①。即宋代已不存在兵部铨，只有吏部选，这种局势不能不说与中唐以来兵部铨选权力受到持续削弱的态势有关。

① 洪迈：《容斋续笔》卷11“兵部名存”，第352页。

第二章　军功入仕

战争、政变等为军人提供了体制内不断升迁的机会，唐代军功入仕的武将，主要通过三种途径步入官场：一是立功获取勋官，通过上番或纳资，铨选入仕。二是立功后，授予散官或卫官，铨选入仕。三是直接军功入仕，即立殊功，直接释褐为官；或累立军功，进入官僚集团。以下笔者就第一、三种情况进行详细讨论，第二种情况只在文中顺带涉及，不作重点。

第一节　墓志所见唐代的勋官入仕

有关唐代勋官的研究，学界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即勋官的起源、流变、地位变迁、所服色役及存在价值等方面（见绪论）。由于史料限制，迄今为止，还没有专文对唐代勋官的入仕问题进行讨论。近年来，大量的出土墓志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契机，本文便欲运用这些出土资料，对唐代勋官的入仕问题进行专门探讨。

武德初，唐代勋官“杂用隋制”，经过武德七年（624）、贞观十一年（637）的改革，逐渐确立起从上柱国至武骑尉这一系列等级；咸亨五年（674），因为部分勋官与散官名称相同，渐至错乱，故加以厘革，定为十二转[①]。在武德七年至咸亨五年的

① 《旧唐书》卷42《职官志》一，第1808页。

五十多年时间里，因“难以找到由于颁布了武德令而剥夺前代所赐予勋官的记录”，因此，这一时期唐朝事实上存在着“同种两个名称的勋官”，具体见表1。

表1　唐代勋官表

武德令以前“杂用隋制”的勋官		武德令以后勋官	品　级
隋文帝时期	隋炀帝时期		
上柱国	光禄大夫	上柱国	正二品
柱　国	左光禄大夫	柱　国	从二品
上大将军	右光禄大夫	上大将军（上护军）	正三品
大将军	金紫光禄大夫	大将军（护军）	从三品
上开府仪同三司	银青光禄大夫	上轻车都尉	正四品上
开府仪同三司	正议大夫	轻车都尉	从四品上
上仪同三司	通议大夫	上骑都尉	正五品上
仪同三司	朝请大夫	骑都尉	从五品上
上大都督	（朝散大夫）	骁骑尉	正六品上
大都督	（建节尉、奋武尉、宣惠尉、绥德尉、怀仁尉、守义尉、奉诚尉、立信尉）	飞骑尉	从六品上
帅都督		云骑尉	正七品上
都　督		武骑尉	从七品上

说明：表1的制定直接参考了金锡佑《唐代百姓勋官考论》中的“唐代的勋官”表，原表存在一点错误，就是将“帅都督”写成“师都督”，现据《隋书》卷28《百官志》下、《通典》卷39《隋官品令》和《旧唐书》卷42《职官志》一予以改正。《东方论坛》2004年第6期，第90～91页。另外，隋代勋官是十一等，可是在《旧唐书·职官志》一中，咸亨五年的改革却多出“上大都督”一级，不知为何。金锡佑也是直接采纳《旧唐书》的比附等级，未作考证。另外，炀帝时期的其他八尉，在咸亨五年的比附等级中没有提到，极有可能就是在武德七年的改革中，已经被整合到武德令以后的勋官当中。《资治通鉴》卷182将“守义尉”载为“秉义尉”，大业十一年（615）秋八月条，第5700页。

酬勋之等级以军功大小而定，对此，国家有详细的制度规定[①]。获得勋官，并不能直接入仕，他们还须番上服役，获取散官；不愿上番者，纳资；而文武散官四品以下也须番上，才能取得铨选资格[②]。勋官的最高等级上柱国的散官结品为正六品上，以下递降一阶，因此，所有的勋官番上获得散官后，皆要再次上番，才能取得铨选资格；文散官“两番已上，则随番许简，通时务者始令参选”[③]；武散官“自四品以下，皆番上于兵部，以远近为八番，三月一上；三千里外者免番，输资如文散官，唯追集乃上”[④]。可见，勋官入仕不仅要经过多次上番，而且即使番满，获得文散官者，不通时务不能参选；获得武散官者，还得再次上番或纳资才能取得铨选资格。咸亨五年勋官制度改革后，“战士授勋者动盈万计”[⑤]，也增加了勋官入仕的难度。因此，我们在文献史料中很难见到勋官入仕的实例，与制度规定有很大关联。但墓志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相关方面的材料，以下，笔者就制度与历史现实之间作一比较（见表2）。

一　勋官入仕者获取勋官的现状及社会构成

历史研究很难用量化分析，因为史料记载总不全面，但是，大量人物事例所提供的信息，大体上能够反映出历史发展的趋势和方向。在表2所列的21人中，卒于垂拱三年以前的有11人，

① 《大唐六典》卷5“兵部员外郎”条，第124～125页；另参见《新唐书》卷46《百官志》一，第1189～1190页。
② 《新唐书》卷46《百官志》一，第1190、1187、1197页；另参见《大唐六典》卷5“兵部郎中员外郎”条，第115～116页。
③ 《旧唐书》卷42《职官志》一，第1806、1807页。
④ 《新唐书》卷46《百官志》一，第1197页。
⑤ 《旧唐书》卷42《职官志》一，第1808页。

表 2　唐代勋官入仕表

人名	父祖情况	出身及散阶结品	仕　历	卒葬年	史料来源
阿史那摸末	祖启民可汗；父啜罗可汗	“皇唐驭宇，至德遐通。公乃覘风雨以来仪，逾沙漠而款塞。爰降纶玺，用奖忠诚。即授上大将军”	寻迁授右屯卫将军	贞观廿三年(649)	《补遗》第3辑，第345页*；《续集》贞观066，第47页**
胡　信	祖伯，隋临汾县令；父让，隋谒者台登仕郎	“道隆士伍，德茂乡闾，早立功勋，授骑都尉”	骑都尉－泉州参军事－桂州建陵县令	显庆二年(657)	《续集》显庆014，第94页；《补遗》第6辑，第262～263页
段文政	祖恒，周任大都督骠骑将军；父顺，隋任龙州司马	君“内韬文德，外建武功。勋有实归，官无虚授。释褐任骁骑尉，未足酬庸”	骁骑尉－徐州蕲县令－同州白水县令	显庆三年与夫人合葬(658)	《续集》显庆027，第101～102页；《补遗》第3辑，第365页
董　明	祖裕，周给郡司马；父由，隋永城县令	“解褐任隆化府帅都督”	迁左屯卫府长史－高阳郡北平县令	夫人显庆四年(659)与之合葬	《补遗》第6辑，第271页；《汇编》显庆112，第300页***
杨智积	祖靡，隋鹰杨。父神通，居义府果毅、大将军	以功授上柱国	除咸阳府长上左果毅	龙朔二年(662)	《补遗》第5辑，第138页；《汇编》乾封033，第464页

* 本文所用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1～7册，以下简称《补遗》，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2000。

** 本文所用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以下简称《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 本文所用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以下简称《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续表 2

人名	父祖情况	出身及散阶结品	仕　历	卒葬年	史料来源
程知节	曾祖兴，齐兖州司马；祖哲，齐晋州司马；父娄，济州大中正，唐赠使持节瀛州诸军事、瀛州刺史	武德元年，因“间行归顺”唐朝，“蒙拜上大将军”。太宗在秦邸，“引居莫府，授左三统军”	寻拜康州刺史－右二府护军－上柱国、东宫左卫率－右武卫大将军－泸州刺史－行军总管－驸马都尉－左领军大将军－检校原州都督－普州刺史－幽州刺史－左屯卫大将军－镇军大将军－左卫大将军，兼检校屯营兵马－使持节蔡山道行军大总管－岐州刺史	麟德二年（665）	《补遗》第2辑，第203～204页；《续集》麟德019，第151～152页
娄　敬	祖珽，隋任真定太守。父荣，隋任蔡州别驾	“永徽三年，青丘道征，蒙授云骑尉”	龙朔元年，除检校果毅－游击将军、检校果毅同正府领－游击将军、行检校子总管，并知折冲事	乾封二年（667）	《补遗》第5辑，第141～142页；《汇编》乾封051，第476～477页
郭行节	祖，隋顺政府统军；父璜，不仕	公“奋臂从戎，贾勇于行前，运筹于幕下。军还，饮至策勋，蒙授上护军”	上护军－泉州龙溪县令－抚州南城县令－鸡林道子判官兼知子营总管－押运使	咸亨二年（671）	《续集》长寿009，第326～327页；《补遗》第5辑，第213页

续表 2

人名	父祖情况	出身及散阶结品	仕　历	卒葬年	史料来源
韩仁楷	曾祖、祖、父，皆不仕	“永徽元年，从太宗文武圣皇帝讨辽，蒙授勋官武骑尉。既参戎秩，思预文班。二年，选任殿中主事”	武骑尉－殿中主事－尚书水部主事－卫尉寺守宫署令－相州临漳县令－济州东阿县令－邢州平乡县令－荆州大都督府检校长林县令	仪凤四年（679）	《汇编》调露015，第661～662页；《补遗》第2辑，第275页
乐　恭	不详	“永徽四年二月廿二日，诏授武骑尉，至六年十二月卅日，又加授丹水府折冲姚文干记室参军”	记室参军	调露二年（680）	《补遗》第4辑，第382页；《汇编》调露026，第670～671页
司马寔	祖雄，隋大都督平原郡守；父晟，不仕	“贞观中，□以门调，事于齐府。府王纵狼成暴……乃与燕□作逆，擅相招聚，□欲授君四品之位。君叱而言曰：吾当驱尔为俘，何敢授吾伪职。因与杜行敏等同志正城。畴庸有典。乃加上骑都尉，……铨藻后时。所司授郴州司兵”	郴州司兵－广州士曹－泸州录事－利州司马－慈州司马－滑州长史－襄州长史	垂拱二年（686）	《补遗》第3辑，第470页；《汇编》垂拱036，第753～754页
张　成	曾祖护、祖列，不仕；父黄，唐蔚州参军事	从征辽东，“授公上柱国，以酬勋效。天官掌铨人物，选举贤才。……以公久持戎律，武艺少闲。夙厕行流，文充长史”	上柱国－右武卫长史	垂拱三年（687）	《补遗》第2辑，第300页；《汇编》垂拱038，第755页

续表 2

人名	父祖情况	出身及散阶结品	仕　历	卒葬年	史料来源
陆仁俭	曾祖子莹，后魏谯州刺史；祖正礼，周青州司马；父孝友，隋显州司功参军事、唐贝州清河县令	“龙朔元年，以功授上柱国”	上柱国－麟德元年，以前功授左清道卫利仁府左果毅都尉－游击将军－经略使－宁远将军、左卫兴乐府折冲－明威将军，转右骁卫滋源府折冲－历任瓜州、岷州、石州、翼州、延州刺史－嵩州都督	如意元年(692)	《续集》延载005，第335页；《补遗》第5辑，第217～218页
南郭生	曾祖彦，隋任蒲州刺史；祖和，隋任洛州新安县令；父斌，唐任左监门直长	“以龙朔二年乐浪道征。功参百战……式备畴庸。寻授上柱国”	上柱国－检校定襄道左果毅－解褐安东都护府录事参军事－尚方监强山冶正监	延载元年(694)	《补遗》第2辑，第337～338页；《汇编》证圣006，第870页
刘洪预	祖彦，隋普州别驾；父世荣，唐上开府永宁府骠骑	“解褐以上柱国授朝议郎、行殿中省尚乘局奉乘”	上柱国－朝议郎、行殿中省尚乘局奉乘	万岁通天二年(697)	《汇编》万岁通天022，第903～904页

续表 2

人名	父祖情况	出身及散阶结品	仕　历	卒葬年	史料来源
阎　基	曾祖子真，后魏东雍州刺史；祖师臣，隋齐州司马；父令规，唐并州都督府录事参军事	以征辽之功，“勋为上柱国”	上柱国－金州西城县令－唐州司马	圣历二年（699）	《汇编》圣历043，第958～959页；《补遗》第3辑，第512～513页
王　庆	祖相，隋任齐州录事参军；父遏，隋任济州东阿县令	出征高丽，“阅赏酬庸，拜上柱国。军罢，敕授昭武校尉、营州都督府泸河镇将”	上柱国－泸河镇将－雅州、和州镇将－朝议郎行登州司马，仍充南运使	神龙元年（705）	《汇编》开元134，第1249～1250页
宋　祯	曾祖虔，隋莱州司功参军事；祖公弼，唐蒲州长史、渠蔚二州刺史；父大师，洛州司法参军事、密县令	从溟海之伐，授上柱国。仪凤二年，“解褐授昭武校尉、利州嘉川府左果毅都尉”	上柱国－昭武校尉、利州嘉川府左果毅都尉－游击将军、幽州昌平府左果毅都尉－宁远将军、忻州秀容府折冲都尉－制举高第，改授朝议大夫、涪州刺史－平狄军大使、兼朔州刺史－庆州刺史－延州刺史	神龙二年（706）葬	《续集》神龙016，第417～418页；《补遗》第4辑，第401～402页

续表 2

人名	父祖情况	出身及散阶结品	仕　历	卒葬年	史料来源
房　诞	曾祖献，隋朝议大夫、行襄州襄阳县令；祖泰，隋朝议郎、行青州录事参军；父□，唐不仕	乾封年以军功“授轻车都尉，解褐授宣德郎、行沧州胡苏县丞”。	轻车都尉－宣德郎、行沧州胡苏县丞－朝议郎、行黄州司马、柱国－制举及第，授洪州丰城县令、上柱国	神龙三年（707）	《续集》景龙002，第427页；《补遗》第5辑，第291～292页
吕　虔	祖赟，隋幽州都督府长史；父师，唐沧州清池令	“树勋于塞垣，君子居之何陋于蕃郡，以上柱国为玄州司户参军”	上柱国－玄州司户参军	开元十四年（726）葬	《文苑英华》卷955，第5022～5023页
刘　廉	祖友，唐任并州寿阳县令；父□，轻车都尉	君“酬绩策勋，授上柱国。年侵蒲柳，日泊桑榆，□杖承恩，制授邓州司马”	上柱国－邓州司马	开元廿三年(735)	《续集》开元140，第548～549页；《补遗》第4辑，第428页

其所受勋级参差不齐，获得最高一等勋官上柱国者仅杨智积1人，大多数都是获得中低级勋官。表明唐代初年，勋不滥授，统治者对勋官较为看重，因此在授予勋官时，较为谨慎。而此后获得勋官的10人中，仅房诞1人授勋轻车都尉，其余皆为上柱国。表明高宗以来，授予勋官的等级有偏高趋势。过多的授予最高一级勋官上柱国，反映出勋官名号的贬值。这一现象也与史料记载大体相符，高宗咸亨五年以后，由于“战士授勋者动盈万计。每年纳课，亦分番于兵部及本郡当上省司。又分支诸曹，身应役使，有类僮仆”①。

① 《旧唐书》卷42《职官志》一，第1808页。

依靠军功获得勋官，原则上是向所有社会阶层开放的，则其在入仕机会上也理应平等，但事实并非如此。从这些入仕者的社会阶层来看，曾祖、祖、父三代中曾有过仕宦经历的共19人，占了绝大多数，但大多都是地方官，充任京官者极少。其所充任之地方官一般以县官、州府判司为主。这表明，入仕勋官之父祖辈官位都不太显赫，属于官僚的中下层。三代不仕者仅1人，不详者1人，说明在铨选过程中，官僚子弟较一般平民出身者占据优势，毕竟身为官员的父祖能为其子孙提供相应的社会关系资本，比如人际交往等方面的便利条件，这是平民子弟所欠缺的优势。另外，按照制度规定，勋官通过上番获取散官，散官再次上番才能参加铨选，而文散官必须通时务才能参选。在这一点上，平民子弟也无法与官僚子弟相比，因为双方接受教育的机会和条件是不一样的，故在入仕比例上，平民子弟远较官僚子弟低，是情理之中的事。以上21位勋官入仕者中，大部分（15人）都是参加吏部铨，参加兵部铨者（6人）数量相对较少。反映出时人的价值取向，逐渐向文官方面倾斜。

二　勋官的放选时间

按照制度规定，“上柱国以下番上四年，骁骑尉以下番上五年，简于兵部，授散官；不第者，五品以上复番上四年，六品以下五年，简如初；再不中者，十二年则番上六年，八年则番上四年”①。不番上者，纳资。可见，一个勋官取得散官资格，最快需4年。而文散官最少还需两番，武散官最少须八番（出处见前），才能参加铨选。因此，勋官入仕最少也要6年时间。然而，高宗初年，一些勋官仅花一两年或者三年时间便进入仕途，如表2中的韩仁楷，永徽元年（650）授勋武骑尉，永徽二年（651）

① 《新唐书》卷46《百官志》一，第1190页。

便释褐为殿中主事，入仕仅用了一年时间；陆仁俭，龙朔元年（661）授勋上柱国，麟德元年（664）便起家为果毅都尉，仅花三年时间进入仕途。

这些事例与制度规定存在出入，但问题是我们不能确定上述政策出台的时间，与具体实例相比，极有可能是高宗咸亨五年勋官制度改革后出台的政策。因为随着授勋人数的增加，延长勋官的放选年限，增加勋官入仕的难度也在情理之中。玄宗开元十八年（730），侍中裴光庭创立“循资格”，以官位高卑来确立守选年限。[①] 勋官守选大约也始于此时，据开元二十四年（736）敕：

> 王子未出閤者，侍讲、侍读、侍文、侍书，并取见任官充，经三周年放选，与处分。习艺馆诸色内教，通取前资及常选人充，经二年已上，选日，各于本色量减两选与处分：左右卫三卫及五品以上子弟，经七年，杂卫三卫经八年，勋官经九年，并放选，与处分。[②]

此处充任习艺馆诸色内教的勋官，减两选后还要经9年才可放选，表明，勋官的正常守选年限应为11年。这样，开元十八年后，一个勋官从上番到守选期满，原则上需要花费17年或17年以上的时间才能入仕，这又增加了勋官入仕的难度。

由表2中事例可知，大多数勋官入仕者都集中在开元以前，

---

① 《通典》卷15《选举》三，第361页；另参见《新唐书》卷45《选举志》下，第1177页。

② 《唐会要》卷74“吏曹条例”，第1349页；另参见《（宋本）册府元龟》卷630《铨选部·条制》第二，第2028页。

尤其是高宗时期及以前的时代，这种情况不能不说与整个社会思潮及国家制度有密切关系。因为唐代初期，关陇集团还保留尚武思潮，崇尚武功，所以勋官的地位不至于完全沦落，勋官的待遇也较为优厚，还有一部分勋官可以凭借此途入仕。但是，随着勋官人数的增加，国家对勋官入仕的种种政策限定，勋官入仕就变得日益困难。因此，开元以后我们就很难见到有关方面的实例了。

三　勋官的释褐官品及官职

按照制度规定，上柱国的散官结品为正六品上，以下递降一阶。而现实中勋官的释褐官品与其散官结品却未必吻合（详见表2）。如：

胡信，授勋骁骑尉，散官结品从七品下，释褐官职正八品下；

段文政，授勋骁骑尉，散官结品正八品上，释褐官职从六品上；

郭行节，授勋上护军，散官结品从六品上，释褐官职从七品下；

韩仁楷，授勋武骑尉，散官结品从八品上，释褐殿中主事，从九品上；

房诞，授勋轻车都尉，散官结品正七品下，释褐官职为从八品下；

杨智积、张成、陆仁检、南郭生、刘洪预、高慈、阎基、王庆、宋祯、吕虔、刘廉授勋皆为上柱国，散官结品正六品上，然而其释褐官品却参差不齐，从九品至五、六品不等。

可见，勋官的散官结品与其释褐官职不一定成正比例关系，散官结品高，不一定能带来较高的职事官位；散官结品低，也并不意味着释褐官品就低，以上事例清楚地说明了此点。然而，这

些勋官的释褐官职却有一定的规律性可循，即起家为文官者，一般官品较散官结品低，16 人中有 14 人如此；刘廉的释褐官品虽比散官结品高，但其所授州司马一职，“基本上只是优游禄位的闲职，因其品高俸厚而无职事，所以一般用以安排贬退大臣和宗室、武将”①，地位并不显赫。程知节由上大将军——统军而为康州刺史，是因为建国伊始，国家看重军功，因此，依靠军功，入仕较快，授予的官职也相对优厚。起家为武官者，其释褐官品与散官结品大体相当。

四　勋官的仕途前景

武周时期，朝廷对勋官入仕后所充任的官职进行了严格限定，神功元年（697）敕文略云：“有从勋官、品子、流外、国官、参佐、视品等出身者，自今以后，不得任京清要等官；若累限应至三品，不须进阶，每一阶酬勋两转。”② 将勋官充任的官职排除在京城清要官和三品以上官员的行列之外。另外，勋官“五品已上非恩制所加，更无进之令”③。这些诏敕增加了勋官进入五品高官的难度，也是朝廷有意识压制勋官入仕人群（压制在五品官以下）的举措。

由表 2 可知，现实中，勋官释褐为文官，起家官一般为州府参军·司马、县令·尉·丞和中央事务性官员；释褐为武官者，主要授予镇将和果毅之职。在以后的仕历途中，尽管也有极个别官至三品者，然而为地方官和武官，难以进入政务官行列，职位也不清显，这一现象与唐代的制度规定非常吻合。而且从长时段

---

① 张国刚著《唐代官制》，西安：三秦出版社，1987，第 122 页。

② 《通典》卷 15《选举》三，第 364 页；另参见《旧唐书》卷 42《职官志》一，第 1807 页。

③ 《旧唐书》卷 42《职官志》一，第 1806 页。

来看，勋官入仕都难以做至清官、高官。

以上事实表明，入仕途径对一个人乃至对一个社会群体影响的重要性。由于勋官出身，因此，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这一群体的仕途前景，这是唐代社会身份性色彩浓厚的表现之一，也是唐代尚武思潮减退之后，军功入仕阶层地位跌落的反映。

概言之，勋官入仕主要是为中低层官僚子弟提供出路，平民子弟并不占据主流；勋官释褐为官，一般充任地方官和中央事务官；神功元年出台的政策，有意识将勋官入仕人群压制在低级官僚行列。由于受入仕途径的限制，加之守选年限较长，开元以后便很难见到勋官入仕的实例了。

第二节　直接军功入仕

陈志学认为：直接军功入仕者，“其共同特点是谙于韬略，武勇绝伦。长期的戎马生涯，使其立功机缘颇多，故不同于一般的以功授勋而番上兵部者”；而且以军功直接入仕，“无官品限制。唐人步入仕途，一般均要先取得出身始能参选授官，而军功出众、武艺超绝者，则不受此限制而直接入仕。”① 这包括两种情况，一是立殊勋，直接入仕；二是累立战功，然后入仕。前一种情况，在制度中有明确记载，具体内容见下文。后一种情况如张仁楚，“起家唐东宫右率府翊卫。龙朔三年（663），从英公破辽，授上柱国。上元元年（674），从崔智言于清海道破吐蕃，授游击将军。仪凤元年（676），授右卫定功

① 陈志学：《唐代武官的入仕途径》，《中华文化论坛》2002年第3期，第63页。

府左果毅都尉”①。宗羲仲，“从安思顺破鱼海，败五城，授上柱国。又从哥舒翰破吐蕃，收九曲，前后讨伐，稠叠勋庸，累迁游击将军、左武卫中郎将”，永泰三年（永泰仅二年，无三年）终②。

陈志学、毛汉光对唐代的军功人仕问题都进行过一定探讨，但陈氏所论较为简略，而毛氏主要对唐代军功人仕的社会阶层进行分析③。结合以上研究成果，笔者主要探讨他们所共同忽略的一些内容，如唐代前、后期军功人仕的制度规定、军功人仕者的实际授官状况、滥授军功现象及其原因等。

一　军功奖赏的制度规定

唐代前后期，有关军功人仕的制度规定，很难见到完整的敕文，目前史料中仅见《大唐六典》和《新唐书》中的一则记载。《大唐六典》主要反映玄宗一朝的制度。因此，此项记载无疑能够反映唐代前期的军功奖赏原则。晚唐时期，据李德裕会昌四年（844）所上“请准兵部式依开元二年（714）军功格置跳荡及第一第二功状”④，可知唐代后期的部分军功奖赏制度，以及其与开元时期军功奖赏制度之间的关系。

---

① 《补遗》第2辑，第382页；《汇编》长安044，第1022页。

② 《文苑英华》卷927《岭南节度判官宗公神道碑》，第4882～4883页。永泰年号仅二年（765～766），无三年，故此处的永泰三年当为大历二年（767）。出现这种年号误计的情况，可能是他们不知道国家已经更改了年号。

③ 陈志学：《唐代武官的入仕途径》，第62～63页；毛汉光著《唐代统治阶层的社会变动》，台湾政治大学博士论文，1968。

④ 傅璇琮、周建国校笺《李德裕文集校笺》卷16《请准兵部式依开元二年军功格置跳荡及第一第二功状》，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第304～306页。

1. 盛唐时期的军功奖赏制度

据《大唐六典》、《新唐书》[①]，唐代前期的军功奖赏原则如下。

第一，将战士身份分为四等，即上资、次资、下资和无资。上资指见任官员、前资官、常选官；次资指文武散官、卫官、勋官五品已上；下资指五品子孙、上柱国·柱国子、勋官六品以下、诸色有番考人；无资指白丁、卫士、杂色人。身份不同，立同样军功，其奖赏原则不同，反映出等级社会的身份属性。

第二，将战功分为上阵·中阵·下阵、跳荡功、殊功等几个等级，立功等级不同，奖赏也不一样。其中：

---

① 《大唐六典》卷5“兵部员外郎”条：“勋获之等级：谓军士战功之等级，若牢城若（苦）战，第一等酬勋三转，第二、第三等，差减一转。凡破城阵、以少击多，为上阵；数略相当，为中阵；以多击少，为下阵。转倍以上为多少，常据贼数，以十分率之。杀获四分已上为上获，二分已上为中获，一分已上为下获。凡上阵上获，第一等，酬勋五转；上阵中获、中阵上获，第一等，酬勋四转；上阵下获、中阵中获、下阵上获，第一等，酬勋三转；其第二第三等，各递降一转。中限（阵）下获、下阵中获，第一等，酬勋两转；第二第三等，并下阵下获，各酬勋一转。其虽破城阵，杀获不成分者，三等阵，各酬勋一转，其跳荡功不在降限（降字当在功字上）。凡临阵对寇，矢石未交，先锋挺人，贼徒因而破者，为跳荡。其次先锋为（受）降者，为降功。凡酬功者，见任、前资、常选，为上资；文武散官、卫官、勋官五品已上，为次资；五品子孙，上柱国·柱国子，勋官六品已下、诸色有番考人，为下资；白丁、卫士、杂色人，为无资。凡跳荡人，上资加两阶，即优与处分，应入三品、五品，不限官考；次资，即优与处分；下资，优与处分；无资，稍优与处分。其殊功第一等，上资加一阶，优与处分，应入三品、五品，减四考；次资，优与处分；下资，稍优与处分，无资，放选。殊功第二等，上资，优与处分；次资，稍优与处分；下资，放选；无资，常勋外加三转。殊功第三等，上资，稍优与处分；次资，放选；下资，应简日放选；无资，常勋外加两转。若破国王（全）胜，事愈（踰）常格；或斩将搴旗，功效尤异，虽不合格，并委军将临时录奏，皆审其实而授叙焉。”（第124～125页）另参见《新唐书》卷46《百官志》一，第1189页。

上阵上获，酬勋骑都尉。

上阵中获第一等，酬勋骁骑尉。

上阵下获、中阵中获、下阵上获，第一等酬勋飞骑尉，其第二、第三等，分别酬勋云骑尉、武骑尉。

中限（阵）下获、下阵中获，第一等酬勋云骑尉，第二、第三等并下阵下获，酬勋武骑尉。

跳荡功：上资加两阶，应入三品、五品不限官考；次资·下资·无资分别给予即优与处分、优与处分和稍优与处分。

殊功第一等，上资加一阶，入三品、五品减四考；次资，优与处分；下资，稍优与处分；无资，放选。

殊功第二等，上资，优与处分；次资，稍优与处分；下资，放选；无资，在正常酬勋的基础上加三转。

殊功第三等，上资，稍优与处分；次资，放选；下资，择日放选；无资，在正常酬勋的基础上，加两转。

“若破国王（全）胜，事愈（踰）常格；或斩将搴旗，功效尤异，虽不合格，并委军将临时录奏，皆审其实而授叙焉。”

现实中，也有一些因军功授勋、入仕或加阶的情况，但是，由于史料常常省略其立功等级，因此，难以将之与制度作准确的对比。如鲁炅，天宝时期“以陇右破吐蕃”立跳荡功，所酬官职不详[①]；安禄山偏将张孝忠，“破九姓突厥，先登陷阵”，其所立很可能也是跳荡功（凡临阵对寇，矢石未交，先锋挺入，贼徒因而破者，为跳荡），“以功授果毅折冲”[②]；刘客奴，开元中，单骑斩室韦首领段普恪，显然属于“斩将搴旗，功效尤异”一类情形，当时其以白身授左骁卫将军[③]。

① 《旧唐书》卷114《鲁炅传》，第3361页。

② 《旧唐书》卷141《张孝忠传》，第3854页。

③ 《旧唐书》卷145《刘全谅传》附，第3938页。

由规定可知，武将只要立跳荡功、殊功，入仕相对容易，升入三、五品，可以不限官考或减少考选次数。这些规定，一方面使武将只要立功，升迁速度明显会快于文官；另一方面，由于奖赏与身份相结合，因此，高官子弟比一般平民子弟的入仕几率要高，但同时它也给白丁、卫士、杂色人等无资者提供了进入官场的机会。总之，玄宗时期的军功奖赏原则体现出公开性，但并不公平。

2. 唐代后期的军功奖赏原则

由于史料限制，我们难以直接了解唐代后期军功叙录制度的具体变化，只能通过相关史实来侧面印证。据李德裕会昌四年所上“请准兵部式依开元二年军功格置跳荡及第一第二功状”可知[①]，唐代后期，军功奖赏原则与唐代前期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开元中酬跳荡功，止于武官及勋，比今日流例，即事校簿。其立跳荡功与格文相当者，不问军将、官健、白身，便望授监察御史。如已是御史者，超两资授宪官；如官已至常侍、大夫者，临时别望优与处分。其先锋第一功，如无官者，便授检校将军卿监；累官至宾客者，即授御史。其第二功，无官者授检校少卿监及中郎将，累官至宾客者，即与御史”。

即唐代后期，凡战功类似跳荡者，不分身份等级，都有望获得监察御史的官衔；已是御史者，则超两资授官；已是常侍、大夫者，有望获得更优厚的奖赏。立先锋第一、二等功者，无官之白身或官健，都可以授以检校官；累官至宾客者，授以宪官。相较而言，唐代后期的酬赏较厚，很多都赏以文官官衔，而唐代前期主要授以武官或勋官。这一事实，反映出唐代前后期军功奖赏

① 《李德裕文集校笺》卷16《请准兵部式依开元二年军功格置跳荡及第一第二功状》，第304～306页。

原则发生的巨大变化。

第二，唐代前期，对叙录军功有员额限定，“开元格：跳荡功，破贼阵不满万人，所叙不得过十人；若万人以上，每一千人听加一人。其先锋第一功，所叙不得过二十人；第二功，所叙不得过四十人”。这种人数限定，在另一则史料中也能体现出来，“按《兵部格》，破敌战功各有差等，其授官千才一二”①。

唐代后期军功授官无员额限定，对此李德裕建议，“右，三等立功人数，请依开元格收叙。如过此数，并望落下”。

第三，唐代前期，对于招降俘虏的奖赏要求较高，“开元格：招得一万人已上，其头首一人准跳荡功例。一千人已上，准第一等例。贼数不满千人，量差等处分”。对此，李德裕建议应降低标准，并完善激励机制：“若依旧格，难有此例。今望招得一千人，便准跳荡例；五百人准第一等例；五百人以下节级处分”。且认为，以上奖赏应“无军将官健等第”，建议“〔获〕都虞侯（候）已上，仍并别酬官爵”。但是，他的建议最终并未通过审议，故文后云“未审”。

第四，晚唐时期，“比来大阵酬赏，只是十将已上得官，其副将已上至长行，并是甄录”。因此，李德裕认为，应该打破成规，“今但与格文相当，即便酬官，所冀尽沾渥泽”，以鼓舞士气。由于李德裕的建议未能执行，因此，真正以功赏官者，只有十将以上带有军职者。晚唐的军功奖赏，事实上带有浓厚的等级性和身份性。

总之，晚唐时期的军功奖赏原则与开元时期相比，变化表现在：第一，跳荡功所酬官职的变化，唐代前期只酬以武官和勋官，晚唐时则酬以宪官和检校官；第二，军功叙录人数的变化，

---

① 《通典》卷148《兵》一，第3780页；另参见《玉海》卷117《铨选·唐选格》，第2242页。

盛唐时有员额限定，晚唐时则没有，这也是导致中晚唐军功官人数膨胀的原因之一；第三，军功叙录身份的变化，盛唐时，无论白身、卫士还是杂色，只要立功，都可叙录；晚唐时，形成了一种潜在的制度规则，即只有职级在十将以上，才能以功授官，白身和官健即使立功，也难以据此授官。

此外，晚唐时期朝廷发布的一些敕文，也能看出当时的军功奖赏制度：

> 开成元年（836）十一月，中书门下奏：准太（元?）和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敕，……其御史中丞以上官，并须因有战功，方得奏请。诸道团练下万人以上军，所奏不得过殿中侍御史。如未有宪官者，不在奏限。万人以下军，不因战功，并不得奏论请。敕旨，依奏[①]。

懿宗咸通十二年（871），中书门下奏：

> 准今年六月十二日敕，厘革诸道及在京诸司奏官并请章服事者。……诸道节度及都团练防御使下将校奏转试官及宪御等，令诸节度事每年量许五人，都团练防御量许三人为定，不得更于其外奏请。其御史中丞已下（上），即准敕文条疏，须有军功，方可授任。自今后如显立战伐功劳者，任具事绩申奏，如检勘不虚，当别与商量处分，以外辄不得更有奏请。……敕旨，从之[②]。

---

① 《唐会要》卷79“诸使杂录”下，第1447页。

② 《旧唐书》卷19上《懿宗本纪》，第678页；另参见《（宋本）册府元龟》卷632《铨选部·条制》第四，第2041页。

即凡奏请御史中丞已上宪官，须有军功；战功显赫者，可以特殊对待。武宗时又规定："非因战功，不得请正官。其已有正官者，或因停替，亦须待三五年后，方得奏请。"① 将军功作为奏请正员官的唯一条件，而不重视其资限。宣宗时，朝廷对军将所立军功授正官的要求提高，规定必须是"殊功"，才有资格奏请："诸军将非有殊功者，不在奏无（兼）州县官限。素非吏部注拟之处，即不在此限，仍委中书门下准此处分。"②

可见，晚唐时期，军功成为奏请正员官、高级宪官的必要条件。

此外，黄巢起义期间，政府又加大了军功奖赏力度：乾符四年（877）三月，诏曰："若诸军全捕得一火草贼数至三百人已上者，超授将军，赏钱一千贯。如乡村有干勇才略，而能率合义徒，驱除草寇者，本处以闻，亦与重赏。如郑镒、汤群之辈，已为刺史，朝廷故不食言。敕到，宜令诸道明行宣谕，令知朕意"③。

二　军功入仕者的实际授官状况及仕途前景

以上就制度层面叙述了唐代军功的奖赏情况，制度在实际操作中，往往体现出一定的灵活性。

1. 授官状况

第一，府兵体制下的军功授官。

立功授勋，本章第一节已有讨论，故略。根据军功大小，授予官职的情况如下：

军功授卫官：如唐初高捧，"及皇家运始，幕府驱驰。旌力

① 《文苑英华》卷429《会昌五年（845）正月三日南郊赦文》，第2174页。
② 《文苑英华》卷430《大中元年（847）正月十七日赦文》，第2179页。
③ 《旧唐书》卷19下《僖宗本纪》，第698～699页。

表功，授监门直长”①；卒于麟德二年（665）的温濬，“君幼称耿介，早树英□”。“故得功宣四域，威振□□。天鉴孔明，照临先及，遂补任队副”②。

军功授散官：如王敬，贞观五年（631）以军功授□（昭）武校尉；贞观十八年（644），又以军功特授游击将军③。

卫官、散官都已经取得了做官资格，皆是入仕的门径之一。

军功授文武职事官：如贞观年间，薛仁贵以征辽东功，释褐游击将军、云泉府果毅④；开元时，张守珪“初以战功授平乐府别将”⑤；前文所述之刘客奴，开元中，单骑斩室韦首领段普恪，“自白身授左骁卫将军，充游奕使”⑥。卒于大足元年（701）的樊文，“以功擢授昭州恭诚县令”⑦；范安及，“神龙初，以翊赞中兴之功，起家拜朝散大夫、都苑总监”⑧。

可见，唐代以军功入仕，所授官品高低不等，其间虽有身份的差异，但关键因素还在于各自所立军功的大小。与其他入仕途径相比，军功入仕者的释褐官品显示出其机动性与灵活性。战功显赫者，可从白身一跃而为三品官，如刘客奴，这是其他入仕门径所不可想像的。此外，有的军功虽不能直接入仕，但其所获的勋官、卫官、散官，为入仕提供了一种资格。由上述事例可知，军功入仕不仅是选拔武官的途径之一，也同样可以选拔文官，这是唐代文武未能彻底分开的表现之一。

---

① 《补遗》第4辑，第357页；《汇编》龙朔052，第370页。

② 《补遗》第6辑，第305页；《续集》麟德023，第155页。

③ 《补遗》第2辑，第187～188页；《汇编》龙朔083，第391页。

④ 《新唐书》卷111《薛仁贵传》，第4140页。

⑤ 《旧唐书》卷103《张守珪传》，第3193页。

⑥ 《旧唐书》卷145《刘全谅传》，第3938页。

⑦ 《补遗》第5辑，第259～260页；《续集》长安002，第388页。

⑧ 《补遗》第3辑，第66～67页；《续集》开元178，第574页。

第二，藩镇体制下的军功授官。

唐代中叶以来，由于使职差遣的盛行，职事官出现阶官化潮流。当时藩镇武官的任命出现“双轨”现象，即藩镇将士立功后，一方面由藩帅赏以职名；另一方面，由中央授予宪官或朝官，使原本属于兵部的铨选权力受到分割。如：唐僖宗乾符二年（875）四月，“浙西狼山镇遏使王郢等六十九人有战功，节度使赵隐赏以职名而不给衣粮”①；“临安人钱镠以骁勇事〔石镜镇将董〕昌，以功为石镜都知兵马使”②。

立功将士朝官和宪官的授予，由藩镇向中书门下奏请。如张慎思，“唐末为太祖（朱温）诸军都指挥使，从平巢、蔡、兖、郓，皆著军功，表授检校工部尚书兼宋州长史”③；鲁美，“大中戊辰岁（848），统兵防边，党项充斥。机谋筹划，保全城垒，为郡帅甄奖，录功上闻，授殿中侍御史、兼本城教练使”④。

可见，中晚唐时期的军功入仕与安史之乱前相比，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若将士立功，职名由节度使自己赏赐，而朝官和宪官则由藩镇向朝廷奏请。藩帅可以在权限范围内授予立功将士职级、划定将士的立功等级并决定向朝廷奏请官职的立功将士名单。如《平吴元济诏》略云：“其收蔡州、擒吴元济、节度及诸大将等，并从别敕处分。诸立功将士等，委韩弘、裴度、与行营诸道节度使，速条流等第闻奏。”⑤《平杨守亮等敕》略云：“应立功大将节级等，各委本道节度使定其功状，具名衔闻奏，当议

① 《资治通鉴》卷252，唐僖宗乾符二年四月“浙西狼山镇遏使王郢等六十九人有战功”条，第8178～8179页。

② 《资治通鉴》卷253，唐僖宗乾符五年（878）十二月“王郢之乱”条，第8210页。

③ 《（宋本）册府元龟》卷360《将帅部·立功》第一三，第836页。

④ 《补遗》第7辑，第132页；《续集》大中060，第1012页。

⑤ 《唐大诏令集》卷124《平吴元济诏》，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第666页。

处分。”① 立功将士的朝官和宪官由中央授予，但一般须由藩帅向朝廷表奏。所以，安史乱后，立功将士的官职升迁，具有二重性，即职级的升迁与朝官、宪官的升迁。

2. 军功入仕者的仕途前景

唐代初年，很多功臣武将能够进入决策阶层，充任宰相，如李靖、侯君集、李勣等②。至武周时期，由于武曌开始施行破坏关陇集团的工作，崇尚进士科，渐毁府兵制，故玄宗时，“破坏关陇集团之工事竟及其身而告完成矣。此集团既破坏后，皇室始与外朝之将相大臣即士大夫及将帅属于不同之阶级。……关陇集团本融合胡汉文武为一体，故文武不殊途，而将相可兼任；今既别产生一以科举文词进用之士大夫阶级，则宰相不能不由翰林学士中选出，边镇大帅之职舍蕃将莫能胜任，而将相文武蕃汉进用之途，遂分歧不可复合”③。即文武分途，所以，此后我们很难见到纯武将出身而升任宰相的事例。不过，动乱之际，军人自有其存在价值，帝王虽难以真宰相命之，但“使相”名号常用来以赏赐勋臣，如郭子仪、李光颜、乌重胤等，皆以武将出身而获得“使相”名号④。

清朝学者赵翼认为：“及安、史既平，武夫战将以功起行阵，为侯王者，皆除节度使。”⑤ 而且如前所述，至唐代晚期，国家要求藩镇将士必须具备军功条件才可奏请宪官和正员官。

---

① 《唐大诏令集》卷125《平杨守亮等敕》，第676页。

② 《旧唐书》卷67《李靖传》，第2480页；《旧唐书》卷67《李勣传》，第2486页；《旧唐书》卷69《侯君集传》，第2509页。

③ 陈寅恪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第48页。

④ 《旧唐书》卷120《郭子仪传》，第3450页；另参见《新唐书》卷137《郭子仪传》，第4600页。《旧唐书》卷161《李光进传》附，第4222页。《旧唐书》卷161《乌重胤传》，第4224页。

⑤ 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卷20“唐节度使之祸”，第430页。

总之，无论唐代前期或后期，军功都是武官入仕和升迁的捷径，循此途进入官僚集团，对武将而言，前景相对较佳。由于军功入仕主要依靠个人能力，因此，较少受到其他外界因素的干扰，其社会群体的构成状况，相对于其他入仕途径而言，平民化较为突出，据毛汉光统计，有唐一代军功入仕者中，“寒素阶级占百分之六十二，这是所有入仕途径中寒素比例最高者”①。

三　军功滥授现象

天宝以来，滥授军功逐渐成为一突出现象，时“征伐多事，每年以军功官授官十万数”②。杜佑也云：“天宝以后，边帅怙宠，便请署官，易州遂城府、坊州安台府别将、果毅之类，每一制则同授千余人，其余可知。虽在行间，仅无白身者。”③

其实，早在安史之乱以前，军功滥授就已出现，如安禄山曾一次为2500多名立功将士奏请官职，朝廷授予的都是五品以上高官④。哥舒翰也有类似举动，为部将论功，奏请官职⑤。是什么原因导致唐代的军功滥授呢？

1. 唐代军功滥授的原因

直接原因——战争。统治者为了鼓舞士气，必然会对将士进行赏赐。安史乱后，在战争紧急状态下，常常用官爵作为赏赐。如朱泚之乱时，叛军“急攻奉天……贼已有登城者，上与浑瑊对泣，群臣惟仰首祝天。上以无名告身自御史大夫、实食〔封〕五百户以下千余通授瑊，使募敢死士御之，仍赐御笔，使视其功

---

① 毛汉光著《唐代统治阶层的社会变动》，第318页。

② 《唐会要》卷57“尚书省”，第987页。

③ 《通典》卷148《兵》一，第3780页。

④ 《旧唐书》卷9《玄宗本纪》下，第228页；另参见《资治通鉴》卷217，唐玄宗天宝十三载（754）二月己丑条，第6924页。

⑤ 《资治通鉴》卷217，唐玄宗天宝十三载二月己丑条，第6926页。

之大小书名给之，告身不足则书其身”①。

“讨淮西诸军近九万，上怒诸将久无功，辛巳，命知枢密梁守谦宣慰，因留监其军，授以空名告身五百通及金帛，以劝死事”②。

制度层面的原因——武官编制的扩大。唐代建国以来，入仕人数不断增加，为了解决选人众多与官阙的矛盾，唐朝中央曾几次扩大武官编制。

一次是唐中宗时，武官编制中出现的员外官。此后，以军功授员外武官的情况屡见不鲜。如鲁炅，天宝六载（747）为哥舒翰别奏，“后以陇右破吐蕃跳荡功，累授右领军大将军同正员”③；令狐彰，“天宝中，以军功累迁至左卫员外郎将”④；冯河清，“初以武艺从军，隶朔方节度郭子仪，以战功授左卫大将军同正”⑤。开元时期，停废了大量员外官及试官，但是唯皇亲、战功者除外⑥。开元二年明确规定：“起今以后，战攻以外，非别敕，不得辄注拟员外官”⑦。天宝七载（748）又规定：军功、左右龙武军以及诸蕃官，可以注拟内外六品以下员外官⑧。军功入仕可以注拟员外官，使武官队伍迅速膨胀，从而在群体上拉动了武官地位的下降。

其次是中唐时期，扩大中央禁军正员武官的编制。德宗兴元

---

① 《资治通鉴》卷229，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十一月“朱泚攻围奉天经月”条，第7373～7374页。

② 《资治通鉴》卷239，唐宪宗元和十一年（816）冬十一月“讨淮西诸军近九万”条，第7727页；另参见《旧唐书》卷15《宪宗本纪》下，第457页。

③ 《旧唐书》卷114《鲁炅传》，第3361页。

④ 《旧唐书》卷124《令狐彰传》，第3528页。

⑤ 《旧唐书》卷125《冯河清传》，第3549页。

⑥ 《唐会要》卷67“员外官”，第1176页。

⑦ 《唐会要》卷67“员外官”，第1179页；《册府元龟》卷630《铨选部·条制第二》，第7550页。

⑧ 《唐会要》卷67“员外官”，第1180页。

元年（784）“辛丑，诏六军各置统军一员，秩从二品”①。德宗贞元二年（786）九月敕：“十六卫宜各置上将军一员，秩从二品。”② 同年同月，左右神策军也“置大将军各二人，正三品。将军各二员。从三品。至贞元三年（787）五月，敕左右神策将军各加二员，左右神武将军各加一员也”③。贞元三年再次扩大北衙禁军武官的编制，原因在于“上以诸道大将有功劳者，将擢掌禁兵，故增其官员以待之”④。可以说，员外官的盛行、武官编制的扩大，尤其是前者为军功滥授提供了制度上的便利。

德宗时人陆贽认为：“天宝之季，嬖幸倾国，爵以情授，赏以宠加，纲纪始坏矣。羯胡乘之，遂乱中夏。财赋不足以供赐，而职官之赏兴焉。职员不足以容功，而散、试之号行焉。”⑤《资治通鉴》云：肃宗时，“是时府库无蓄积，朝廷专以官爵赏功，诸将出征，皆给空名告身，自开府、特进、列卿、大将军，下至中郎、郎将，听临事注名。其后又听以信牒授人官爵，有至异姓王者”⑥。二者都将滥赏军功归因于安史之乱后国家财赋不足，才用官职作为奖赏。事实上，玄宗时期对安禄山立功部将的授官已经属于滥授，但盛唐时期，国家并不贫穷，却仍然用官职作为赏赐。故国家财富不足难以准确解释军功滥授现象，从制度层面

---

① 《旧唐书》卷12《德宗本纪》上，第340页；另参见《旧唐书》卷44《职官志》三，第1905页；《唐会要》卷71“十二卫”，第1287页。

② 《旧唐书》卷44《职官志》三，第1905页；另参见《唐会要》卷71“十二卫”，第1287页。

③ 《旧唐书》卷44《职官志》三，第1905页；另参见《唐会要》卷72“京城诸军”，第1293页。

④ 《唐会要》卷72“京城诸军”，第1293页。

⑤ 《新唐书》卷157《陆贽传》，第4921页；另参见《玉海》卷117《选举·唐选格》，第2242页。

⑥ 《资治通鉴》卷219，唐肃宗至德二载（757）四月“上以郭子仪为司空、天下兵马副元帅”条，第7023页。

来分析可能更接近历史真实。

2. 军功滥授的影响

滥赏军功，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首先，导致武官人数的急剧膨胀和武官群体的地位下降。在奖赏军功有节制的时代，官员自身的身份地位能够得到突显。但是，奖赏过滥，官员数量膨胀之后，官员本身的身份地位也就相应下降。如，安史之乱期间，由于赏官过多，“诸军但以职任相统摄，不复计官爵高下。及清渠之败，复以官爵收散卒。由是官爵轻而货重，大将军告身一通，才易一醉。凡应募入军者，一切衣金紫，至有朝士僮仆衣金紫，称大官，而执贱役者。名器之滥，至是而极焉”①。洪迈云：“唐自肃、代以后，赏人以官爵，久而浸滥，下至州郡胥吏军班校伍，一命便带银青光禄大夫阶，殆与无官者等”②。

其次，促进了职事官的阶官化和文武之间的分离。武官集团膨胀的结果，使朝廷考虑将武官所充任的官职与文官进行区分：

> 初，贞元时宰相齐抗奏罢州别驾及当为别驾者引处之朝。元和后，两河用兵，裨将立功得补东宫王府官，朱紫淆并，授受不纲。〔韦〕处厚乃置六雄、十望、十紧等州，悉补别驾，由是流品澄别③。

即元和以后，不许立功将士带东宫王府官，而处以地方州之

---

① 《资治通鉴》卷219，唐肃宗至德二载四月“上以郭子仪为司空、天下兵马副元帅”条，第7024页。

② 洪迈：《容斋续笔》卷5“银青阶”，载于《容斋随笔》，第275页。

③ 《新唐书》卷142《韦处厚传》，第4675页；另参见《新唐书》卷49下《百官志》四下：“文宗世，宰相韦处厚建议，复置两辅、六雄、十望、十紧州别驾。”（第1317页）《唐会要》卷69“别驾”，第1215页。

别驾等上佐之职，以辨别流品。不仅如此，中唐以后，朝廷还用固定的高品文官之职以宠勋臣武将。如："唐节度使带检校官，其初只左右散骑常侍，如李愬在唐、邓时所称者也。后乃转尚书及仆射、司空、司徒，能至此者盖少。僖、昭以降，藩镇盛强，武夫得志，才建节钺，其资级已高，于是复升太保、太傅、太尉，其上惟有太师，故将帅悉称太尉。"①

"侍中、中书令为两省长官，自唐以来，居真宰相之位，而中令在侍中上。肃宗以后，始以处大将，故郭子仪、仆固怀恩、朱泚、李晟、韩弘皆为之，其在京则入政事堂，然不预国事。懿、僖、昭之时，员浸多，率由平章事迁兼侍中，继兼中书令，又迁守中书令，三者均称使相，皆大敕系衔而下书使字。"②

"中唐以后中书令、侍中，三公尤为荣贵，然而都用以处勋臣，文人是梦想不到的。"③《旧唐书·代宗纪》云："时方面勋臣升八座者多非正员，朝命正员者以知省事为名。"④

可见，安史乱后，军功武将所充任的官职逐渐与普通文官区分开来，一方面，促进了职事官的阶官化；另一方面，又加速了文武之间的分离。

概言之，军功入仕的制度规定在唐代前后期差别较大，前期主要授予武官和勋官；后期主要授予职级和检校官、宪官。在府兵制为主的时代，军功入仕者主要由中央兵部授以官职；但安史乱后，藩镇兵制下，军功入仕阶层在统属关系上受到了分割，他们变成了二层统属对象，既属于藩帅，又属于中央王朝，即藩帅赏以职级，中央授以宪官和朝官，从而导致中央权力的弱化，一

---

① 洪迈：《容斋三笔》卷7"节度使称太尉"，载于《容斋随笔》，第510页。

② 洪迈：《容斋三笔》卷12"兼中书令"，载于《容斋随笔》，第570页。

③ 孙国栋：《从梦游录看唐代文人迁官的最优途径》，载《唐宋史论丛》（增订稿），第28页。

④ 《旧唐书》卷11《代宗本纪》，第287页。

定程度上加速了唐朝的灭亡。唐代的军功滥授除战争因素外，还与武官编制的扩大有着紧密联系；军功滥授，一方面促进了职事官的阶官化，另一方面促进了文武之间的分离。

本章以上论述，结论如下。

第一，勋官入仕虽然带有军功色彩，但是它与直接军功入仕者不同，大部分选择文官仕进之路，而不是入仕为武官。勋官入仕不仅耗时长，而且入仕后所充任的官职一般居于官僚队伍的下层，很难挤进中上层行列，因为国家有明确的政策限定。直接军功入仕者则不一样，绝大部分人都是充任武官，这是武官来源的一条重要通道。直接军功入仕，不仅升迁速度快，而且充任高官的机会较大，他们往往能够得到统治者的重用。

第二，军功入仕阶层人数的膨胀，导致了勋官和军官群体地位的下降。但双方地位下降的时间不同，前者地位的跌落在高宗显庆年间就已渐露端倪；后者地位的下降是从武周时期开始的。

第三，勋官入仕者中，官僚子弟占据优势地位；而直接军功入仕不同，平民化色彩相对浓厚，它是下层民众向上流动的主要途径之一。

第四，从唐朝历史发展的全过程来看，军功一直是武将官职升迁的重要捷径。

第三章　门荫入仕

——以卫官为中心

唐代门荫入仕为武官的途径较多，如充任斋郎、品子等；卒于天宝三载（744）的马延徽，“太庙斋郎出身，解褐授右武卫翊府队正长上，迁右金吾卫左司戈”[①]；张惟则，“公永贞初，宿卫品子，至元和四年（809），授陪戎副尉、守左骁卫绥州伏洛府折冲”[②]。卫官是唐代武官的来源之一，而且卫官本身为武职，升任武官称“本色迁授”[③]，故此章将卫官作为重点研究对象。

台湾学者毛汉光对唐代卫官做过系统研究，不足之处在于文章仅论及千牛、三卫、亲事、帐内，未对唐代卫官作整体概述，并缺乏对折冲府卫官的研究，千牛类卫官所用墓志材料也远远不够，这是需要补充的三大环节。此外，王永兴、爱宕元、吴宗国等人都对唐代卫官有过讨论，但以上环节都是他们共同忽略的内容。因此，本章就把这三大环节作为重点研究对象。

---

① 《汇编》天宝058，第1570页。

② 《续集》开成003，第925～926页。

③ 《大唐六典》卷5“兵部郎中”条，第118页。

第一节　唐代卫官述论

卫官是唐代门荫入仕的重要渠道之一，它的设置主要是为了解决“社会上庞大的士族子弟如何与政治体系结合”的问题[①]，即为他们成为职事官提供一条门径。此外，卫官本身也有荫成丁之子为品子的特权[②]，为子辈做官提供一种资格。所以，卫官为一特殊的官僚群体，在《旧唐书·职官志》一中，将它与职事官、散官、勋官、爵并立。唐长孺先生认为，《通典》所列唐代内外职掌包括卫官、流外官和杂任三类[③]。可见，卫官为职掌中的一种。王永兴先生认为，色役制有两点共性，即分番服役、不役纳资[④]。但是，卫官群体中如“千牛备身，备身左右，太子千牛，并长上”[⑤]，不具备色役制的主要特点。因此，卫官的性质不应为色役，而应属职掌。由于其职能几乎与军事有关，而且都有品秩，因此，我们大体可以说唐代卫官为军人职掌。以下笔者就唐代卫官的类别、配置部门、考课简选、入仕、内部升迁及衰落等情况作一番大致考证。

一　卫官的类别和配置部门

据《旧唐书·职官志》[⑥]，唐代卫官主要有千牛备身、备身

---

① 毛汉光：《唐代荫任之研究》，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第55本第3分，1984，第479页。

② 王永兴著《唐天宝敦煌差科簿研究——兼论唐代色役制和其他问题》，《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1982，第121页。

③ 唐长孺：《唐代色役管见》，《山居存稿》，中华书局，1989，第168页。

④ 王永兴：《唐天宝敦煌差科簿研究——兼论唐代色役制和其他问题》，《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145页。

⑤ 《大唐六典》卷5“兵部郎中”条，第116页。

⑥ 《旧唐书》卷42《职官志》一，第1796～1803页。

左右、太子千牛、备身、太子备身、亲勋翊卫校尉、亲勋翊卫旅帅、亲勋翊卫队正、亲勋翊卫队副、亲卫、太子亲卫、勋卫、太子勋卫、翊卫、太子翊卫、左右监门校尉、左右监门直长、太子左右监门直长、亲王府校尉、亲王府旅帅、亲王府执仗·执乘·亲事、亲王府队正、亲王府队副、折冲府校尉、折冲府旅帅、折冲府队正、折冲府队副。

卫官根据职事可大致分为如下五类。

第一，千牛类，包括千牛备身、备身左右（“开元中，千牛备身、备身左右，并为千牛”①）、太子千牛、备身、太子备身。千牛备身“掌执御刀，……宿卫侍从。备身左右掌执御弓矢，宿卫侍从。备身，掌宿卫侍从”②。千牛类卫官为皇帝或太子身边的侍卫，“执弓箭以宿卫”，并为供御之仪仗的组成人员之一③。

第二，三卫类，包括亲勋翊卫校尉、亲勋翊卫旅帅、亲勋翊卫队正、亲勋翊卫队副、亲卫、太子亲卫、勋卫、太子勋卫、翊卫、太子翊卫。他们主要负责宫廷警卫，也是卤簿仪仗队的组成人员之一④。东宫率府三卫的职责为太子“宿卫”⑤。此外，玄宗时期，三卫也可充任“书直及写御书人”⑥。

第三，监门卫类，包括左右监门校尉、左右监门直长、太子左右监门直长。他们主要负责宫禁门籍事宜，监门校尉“掌叙出入”⑦。

第四，王府类，包括亲王府校尉、亲王府旅帅、亲王府执

① 《新唐书》卷49上《百官志》四上，第1302页。
② 《新唐书》卷49上《百官志》四上，第1287页。
③ 《旧唐书》卷44《职官志》三，第1902页。
④ 《旧唐书》卷44《职官志》三，第1899页。
⑤ 《新唐书》卷49上《百官志》四上，第1300页。
⑥ 《新唐书》卷47《百官志》二，第1213页。
⑦ 《新唐书》卷49上《百官志》四上，第1286页。

仗·执乘·亲事、亲王府队正、亲王府队副，他们统辖于亲王府的亲事府和帐内府。亲王府执仗亲事、执乘亲事，“每月番上者数千人，宿卫内庑及城门，给稟食”①。具体而言，执仗亲事“执弓仗”，执乘亲事“掌供骑乘”②。亲事“并本贯纳其资课”③，即纳资代役，而不用亲自上番。

第五，折冲府类，包括折冲府校尉、折冲府旅帅、折冲府队正、折冲府队副。折冲府卫官为府兵的基层带兵将领，职掌为“备宿卫”，有时要“以从师役”④，即番上宿卫和随军出征。

从卫官的上番地点（纳资代役者除外）来看，唐代卫官主要分布在中央禁军、太子东宫、亲王府和折冲府，内外一体，共同构成唐代的卫官系统，亦即门荫系统之一。可见，唐代卫官的人员配置主要以府兵制为依托，镇戍系统几乎没有涉及，故府兵制的发展变迁必然对卫官制度带来深刻影响。

二　卫官的考课与简选

卫官进入职事官行列，须经过两次考试，即先本司（兵部）简试，合格者方可参加吏部或兵部铨选⑤，从而分流进入文武官僚队伍。考课和简选是卫官升入职事官前的必备阶段，但是因为各类卫官的身份等级不同、充任的职事也不一样，故考课时间也就存在长短差异。具体情况如表4（据《大唐六典》卷5“兵部郎中”条所作）。

由表4可知，荫任者的父祖官位越高，考课年限就相对越短。千牛类卫官为五考；三卫类卫官根据其所充任的职事及荫任

---

① 《新唐书》卷49上《百官志》四上，第1282页。
② 《新唐书》卷49下《百官志》四下，第1307页。
③ 《大唐六典》卷5“兵部郎中”条，第118页。
④ 《旧唐书》卷44《职官志》三，第1906页。
⑤ 宁欣：《唐代门荫制与选官》，《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3期，第79页。

资格，分别为五考、六考、八考；亲事、帐内为十考，一年一考。显然，荫任资格越高，进入仕途所用时间就相对越短。监门类卫官的荫任资格和考课年限缺载，但三卫“若有才用，考内得补主帅及监门校尉直〔长〕”[①]。即监门校尉和直长很大一部分是从三卫中选拔的。折冲府卫官的荫任资格及考课年限，有待于更充分资料的发掘。

表 4　卫官考课和简选情况一览（部分卫官情况缺载）

卫官名称	荫任资格	考课情况
千牛备身、备身左右、太子千牛	三品以上职事官子孙、四品清官子	五考（入武品折其一考，一年为一考）
左右卫三卫帖仗者	三品以上子、二品以上孙为亲卫；四品子、三品孙、二品以上曾孙为勋卫及率府之亲卫；四品孙、职事五品子孙、三品曾孙、若勋官三品有封者及国公之子为翊卫及率府之勋卫；五品以上、并柱国、若有封爵兼带职事官（“子孙”或“曾孙”为之）为诸卫及率府之翊卫	五考
左右率府之三卫帖仗者		五考
左右卫三卫之他职掌及左右率府之勋卫		六考
诸卫及率府之翊卫		八考
亲事	六、七品子为亲事	十考

卫官考第分为上、中、下三等，与职事官的九等考第和流外官的四等考第不同，“亲、勋、翊卫，以行能功过为三等，亲、勋、翊卫（、）备身，东宫亲、勋、翊卫（、）备身，王府执仗亲事、执乘亲事及亲勋翊卫主帅、校尉、直长、品子、杂任、飞

① 《大唐六典》卷 5“兵部郎中”条，第 118 页。

骑，皆上、中、下考，有二上第者，加阶。番考别为簿，以侍郎专掌之”①。

三　卫官入仕为武官的情况

唐代卫官铨选入仕，主要循吏部选，循兵部选者不占主要地位，当然，也有相当一部分卫官不能入仕②。三卫入仕为武官，主要充任执戟、司戈、率府诸曹参军、府别将、府果毅都尉等职③。此外，卫官入仕还存在充任长上、军事使职、员外武官等情况。如：

杨思玄，“麟德元年（664），解褐授右卫翊卫。天授二年（691），授游击将军、右监门卫长上”④。卒于先天元年（712）的邢思贤，“初任赵王府执仗，迁左卫长上”⑤。卒于开元廿年（732）的张翼，左亲卫出身，转左金吾引驾，迁新城府别将、充安人军子将⑥。终于天宝十载（751）的李献，左卫翊府翊卫，“解褐受君右骁卫冯翊郡兴德府别将”；然而在其墓志题名中，却明言为“右骁卫冯翊郡兴德府别将员外置同正员左龙武军宿卫”⑦。

可见，卫官的释褐官职在不同时代体现出不同的特色，初唐一般以职事官为主，随着高宗以来军事使职的发展，中宗以来员外官的盛行，卫官的释褐官职便明显打上了时代烙印，如李献，

---

① 《新唐书》卷46《百官志》一，职事官的考第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流外官的考第分为上、中、下、下下四等，第1191～1192页。

② 毛汉光：《唐代荫任之研究》，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第55本第3分，1984，第480～482页。

③ 毛汉光：《唐代荫任之研究》，第493页。

④ 《补遗》第5辑，第277～278页；《汇编》神龙009，第1048页。

⑤ 《补遗》第5辑，第317页；《汇编》开元013，第1160页。

⑥ 《汇编》开元373，第1414页；《补遗》第2辑，第496～497页。

⑦ 《汇编》天宝175，第1653页。

授予员外武官；张翼，授予军事使职。

卫官如果立功，升迁会更快，因为他们在身份上属于次资之人。据《大唐六典》和《新唐书》，卫官若立跳荡功，即优与处分；殊功第一等，优与处分；殊功第二等，稍优与处分；殊功第三等，放选[①]。如初唐时的刘师立，左亲卫出身，以诛太子李建成有功，“超拜左卫率”[②]；终于天宝六载（747）的桓义成，“弱冠以门荫补左卫翊卫，寻以材勇被渝关军总管奏充别奏，因功授灵州武略府别将，又改银州龙川府左果毅都尉，仍充子将”[③]。

从以上事例可知，卫官的仕途往往受综合因素的影响。除依靠门荫途径外，有时候还借助于军功，以提升其升迁速度。

四　卫官系统内部的迁转

卫官系统内部并非界限森严，而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体制内可以互相迁转。如前文所云，监门校尉和直长可以从三卫中选拔。此外，卫官内部的迁转事例又如，卒于咸亨二年（671）的于谦，“起家东宫左亲卫，寻迁右千牛备身”，转相州滏阳令，官至左卫郎将、检校左威卫、左武卫二卫将军[④]。

卒于显庆元年（656）的执失奉节，“起家千牛备身、右屯卫长上校尉、振威副尉，转授游击将军、守右骁卫善福府右果毅都尉”[⑤]。

---

① 《大唐六典》卷5“兵部员外郎”条，第124～125页；另参《新唐书》卷46《百官志》一，第1189～1190页。

② 《旧唐书》卷57《刘师立传》，第2298～2299页。

③ 《补遗》第6辑，第435页；《续集》天宝039，第609页。

④ 《补遗》第3辑，第426页。

⑤ 《补遗》第3辑，第362～363页；《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1，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1992，第29页。

卒于麟德二年（665）的房仁悉，“起家晋府执乘。……改授东宫千牛，除左翊勋二府校尉，又除右卫勋一府校尉”①。

卒于咸亨三年（672）的韩昭，“释褐东宫千牛、上台千牛、左卫翊□府校尉、右勋府校尉、陈王府典军”②。

以上事例表明，卫官并非皆能一下子直接入仕，相当一部分仍停留在内部迁转，充当本卫主帅或调到其他禁军去充任主帅。唐代对于千牛的充任资格规定较严，但仍然存在由其他卫官转迁为千牛类卫官的情况，如于谦由太子亲卫转迁为千牛、房仁悉由执乘改授太子千牛。这一现状与永泰二年（766）的官品令较符，千牛备身左右、“卫官已上、王公已下高品子孙起家为之”③。即千牛除由“三品已上职事官子孙、四品清官子”充任外④，其他卫官也可转充。

对于卫官系统内部的人员迁转，我们从吴宗国先生对“三卫考内得补主帅、监门校尉、直长”一事的解释中可以得到某些启示，他认为：三卫补任主帅的原因在于“主帅（校尉、旅帅、队正、队副）、监门校尉、直长的品阶一般都比三卫为高，故三卫考内得补主帅、监门校尉、直长，乃是一种不次提升”⑤。日本学者爱宕元认为：三卫“若服役期间不出差错，经过兵部考试后，即具备了被吏部选做职事官的资格。即使兵部考试落选，还有可能出任上述卫官中的主帅、校尉、直长等官职”⑥。他认为

---

① 《补遗》第2辑，第198页；《汇编》麟德036，第419～420页。

② 《补遗》第2辑，第244页；《汇编》咸亨065，第555～556页。

③ 《旧唐书》卷42《职官志》一，1796页。

④ 《大唐六典》卷5“兵部郎中员外郎”条，第116页；另参见《旧唐书》卷43《职官志》二，第1833页。

⑤ 吴宗国：《唐贞观二十二年敕旨中有关三卫的几个问题——兼论唐代门荫制度》，载9《敦煌吐鲁番研究论文集》第3辑，第154页。

⑥ 爱宕元：《唐代的官荫入仕》，载《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六朝隋唐卷），上海古籍，1995，第248页。

三卫若兵部考试落选，在无法参与吏部、兵部铨的情况下，可以在三卫系统类升迁。同样的道理也应该存在于其他卫官，如千牛、执仗、执乘若铨选落榜，该如何处置？不可能一次铨选落榜就黜退，而应给其留有一定的退路，而此时其身份毕竟与未经铨选者不同，他们已经积累了年资。这时，安排他们的最好职务就是充任本卫或其他卫官中的主帅，如此不但解决了品阶上升问题，还在一定程度上保住了其经济利益。因为千牛也有禄秩，“凡千牛备身、〔备身〕左右，考课赐会及禄秩之升降，同京职事官之制”①。所以，从东宫千牛转任皇帝千牛，随着品阶的上升，禄秩也同样上升。但若从其他卫官转任千牛，或从千牛系统转任其他类卫官，其禄秩又怎样计算，由于史料缺乏，不得而知。

还有一部分门荫出身者直接充任卫官主帅，如司马叡，曾祖徽，后魏充任光禄大夫、骠骑大将军等；祖宾，后魏充任太府卿、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等；父腾，隋仪同三司。君“年甫弱冠，释褐左勋卫校尉”，迁义阳府果毅都尉，贞观廿三年（649）卒②。

韩逻，曾祖高，梁任邵陵王司马；祖月，陈任润州长史、苏州刺史；父护，隋任滁州刺史。君“起家任右武卫翊卫校尉”，释褐右武卫信义府右果毅，永徽四年（653）卒③。

唐高宗时人李谨行，曾祖利，祖□，并代为蕃长。父稽，左卫大将军、燕州刺史、耆国公。君“解褐右武卫翊卫校尉，加游骑将军、上柱国，封五原县男。转右武卫怀信府□果毅都尉”④。

---

① 《大唐六典》卷25“左右千牛卫大将军”条，第455页；参见《旧唐书》卷44《职官志》三，第1902页。

② 《补遗》第2辑，第101页；《续集》贞观063，第45页。

③ 《补遗》第2辑，第125～126页；《汇编》永徽096，第192～193页。

④ 《补遗》第2辑，第291～292页；《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1，第82页。

这些卫官主帅的充任资格如何，史料缺载。从具体事例来看，他们父祖一般为国家官员，自身则直接被授予主帅职务，而后进入官僚队伍。经由卫官主帅入仕，一般充任武官，这是否与他们实际上已经承担了带兵职责有关？既然他们已经有了带兵实践，故循兵部选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由以上论述及制度规定可知，唐代卫官的内部迁转，主要在于卫官本身有不同的品阶，这为系统内部的升迁提供了制度上的便利。另一方面，若千牛、三卫等卫官铨选落榜，该如何处置？不可能一次铨选落榜就黜退，而应给其留有一定退路，而此时其身份毕竟与未经铨选者不同，因为他们已经积累了年资，原则上得考虑其品阶上升问题。因此，这时安排他们的最好职务就是充任卫官主帅或较高品阶的卫官。

五　卫官制度的衰落

唐代卫官主要以府兵制为依托，因此，府兵制的破坏和废除对卫官制度带来了深刻影响。其衰落从以下几个层面体现出来。

首先，天宝八载（749），中央下令废除府兵制[①]，折冲府卫官事实上也就随之废弃。

其次，亲王权势从高宗以来，逐渐削减，时“府官同外官，资望愈下。永淳以前，王未出阁则不开府。天授二年，置皇孙府官。玄宗诸子多不出阁，王官益轻而员亦减矣”[②]。既然不出阁，也就不开府，执仗、执乘等王府卫官失去了存在意义。

再次，监门类卫官的情况史料虽然缺载，但安史之乱以来，南衙禁军的衰落是一不可否认的事实。作为南衙禁军的组成部分之一，监门类卫官也必然受到大环境的影响，而不断衰落。

---

① 《新唐书》卷50《兵志》，第1327页。

② 《新唐书》卷49下《百官志》下，第1305页。

最后，朝廷不断减少千牛、三卫的上番人数，并对三卫的入仕官额进行限定。这些措施对唐代卫官制度都带来了强烈冲击。唐代盛时，“千牛备身八十人，备身左右二百五十六人”①。千牛为长番，不存在纳资代役②。但是至文宗太和年间，“兵部奏：应管左右仗千牛、仆寺·殿中省进马、左右金吾仗长上，共一百六十一员，今三色共请减六十七员”③。即千牛、进马和金吾仗长上，文宗时总共仅剩94人，其人数的削减显而易见。

唐代盛时，“诸卫三卫监门直长三万九千四百六十二人”④。至元和六年（811），“六番三卫，都四千九百六十三人”⑤，显然，这里不包括纳资部分的三卫。文宗大和四年（830），朝廷下令停止纳资部分的三卫，“兵部奏：……其资荫三卫，并请停废，冀清流品，式茂皇猷。敕旨，依奏”⑥。这则敕令在大和五年（831）三月得到重申，只是二者内容稍有出入，五年的敕令云：“其资三卫，并请停废”⑦。即停废对象为那部分纳资者，并非资荫者。大和八年（834），又明令：“文简、武简三卫，每年三铨，都请留六十人为定。……从之”⑧。将三卫每年的入仕人数减少到六十员，而以前则没有名额限制。这一措施，无疑使三卫入仕者在官僚队伍中的员额急剧萎缩。唐武宗时，朝廷又下令停止三卫参加文简的权力，全部变为武简，“自今已后，但令武简，其

---

① 《新唐书》卷45《选举志》下，第1180页；参见《通典》卷15《选举》三，第362页。

② 《大唐六典》卷5“兵部郎中”条，第116页。

③ 《全唐文》卷966《覆奏疏理诸色人仕奏》，第10037页。

④ 《新唐书》卷45《选举志》下，第1180页；另参见《通典》卷15《选举》三，第362页。

⑤ 《唐会要》卷59“兵部侍郎”，第1031页。

⑥ 《唐会要》卷71“十二卫”，第1288页。

⑦ 《唐会要》卷59“兵部侍郎”，第1031～1032页。

⑧ 《（宋本）册府元龟》卷631《条制》第三，第2038页。

文简并停”①。如此一来，三卫便不再向文官输送人才，而全部变为武官的后备队伍。藩镇兵制下，武职僚佐由藩帅自行辟署，然后向中书门下奏闻官职，中央兵部控制的武官员额极为有限，故三卫入仕更加艰难。唐武宗之所以要停止三卫参加文简，可能与三卫假冒资荫太滥有关。因为早在敬宗时，三卫“所用资荫，逾滥颇多”②；文宗时的赦书也明言：“诸色出身，三卫最滥”③。

卫官制度的衰落，除受兵制变革和朝廷政策的影响外，还与科举仕进对其造成的竞争威胁有关。卫官自身的才能浅薄④，也是引起其地位下降的原因之一；在能力与特权的较量面前，前者战胜后者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第二节　千牛入仕

千牛是唐代典型的门荫群体之一，社会地位较高，其卫官品阶如下：千牛备身左右，正六品下；太子千牛，正七品上；备身，正八品下；太子备身，从八品下⑤。他们一般由高官子弟充任，“凡千牛备身、备身左右及太子千牛，皆取三品已上职事官子孙、四品清官子，仪容端正，武艺可称者充。五考，本司随文武简试听选；加阶应入武品，折其一考。四品谓诸司侍郎、左右

① 《文苑英华》卷429《会昌五年（845）正月三日南郊赦文》，文中的“三衙官”，当为“三卫官”，第2174页。

② 《文苑英华》卷423《宝历元年（825）四月二十日册尊号赦文》，第2142页。

③ 《唐大诏令集》卷71《太和三年（829）南郊赦》，第398页。

④ 《通典》卷17《选举》五，洋州刺史赵匡上《举选议》，略云：“诸色身名都不涉学，昧于廉耻，何以居官？其简试之时，虽云试经及判，其事苟且，与不试同。”第423页。

⑤ 《旧唐书》卷42《职官志》一，第1796～1801页。

庶子”①。尽管千牛的身份显赫，但目前为止，还没有相关方面的专论出现，大多只是在论著中间接涉及②。鉴于此，文章主要运用大量的人物个案，通过群体分析，探讨安史之乱前后，千牛的释褐官职·官品、入仕后在官僚群体中扮演的角色地位、仕途前景等问题。对这些方面的深入研究，不仅有助于从宏观上把握千牛地位的动态变迁过程，而且还能从侧面窥视唐代门荫制度的兴衰沉浮。

笔者据传统文献和墓志记载，共收集76位千牛出身者，见附表1。现分析如下。

一　千牛的入仕率极高

千牛入仕，须经过考核和考试：“凡千牛备身、备身左右，五考送兵部试，有文者送吏部。”③ 但若充任武职，也可只经四考④。开元十一年（723），朝廷延长了千牛的考选次数，“准令，千牛二中上考，始进一阶。既是卫官，又须简试，全依职事，颇亦伤淹滞。若五考满者，折为四考；四考满者，折为三考；三考折为二考，二考折为一考。更有胜考，亦准此通折。出经一考，

---

① 《大唐六典》卷5“兵部郎中员外郎”条，第116页；另参见《旧唐书》卷43《职官志》二，第1833页。

② 毛汉光：《唐代荫任之研究》，作者运用文献史料和出土墓志，讨论了千牛的初仕职事官及官历。但由于毛氏所用千牛出身者仅15例，故云：“不足以充分说明千牛、备身类之初仕关系”，《中研院史语所集刊》，55本第3分，第498页；〔日〕爱宕元：《唐代的官荫入仕——以卫官之路为中心》，从制度层面简略叙述了千牛的设置状况及选拔对象，《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六朝隋唐卷），第250页；〔韩〕金铎敏：《唐代前期的官人范畴——以卫官为中心》，文章只是间接涉及千牛，并没有作专门探讨，《魏晋隋唐史研究》第6辑，第119～143页。

③ 《新唐书》卷45《选举志》下，第1174页。

④ 《大唐六典》卷5“兵部郎中员外郎”条，第116页。

不在折成”[①]。将千牛参加兵、吏部铨的时间各延长一年。

尽管千牛要经过考核→铨选程序才能入仕，但他们绝大部分都能进入职事官僚队伍。从附表1可知，76位千牛出身者，仅2人不仕、1人情况不明，其余全部出仕。而这2人中，1人（戴希晋）早死（年仅21）[②]，1人卒年不详，不排除早死的可能。即便如此，千牛的入仕率也高达96.05%，其显赫地位可见一斑。

为何千牛入仕容易？这与其社会地位高、考试简单有一定关联。因为“千牛辇脚之类，课试既浅，艺能亦薄，而门阀有素，资望自高”[③]。故千牛入仕，难度不大。

二　千牛入仕一般循吏部选

附表1中初仕的73人中，有7人官职不详；2人初仕为视品官，授予总管之职；1人（周宝）起家为为武职僚佐。其余63人，皆大致记载了其释褐官职和官品，其中为文职官者53人，武职官者10人。

与卫官品阶相比，起家为文职官者，品阶一般下降，53人中有49人如此，另3人释褐官品高于卫官品阶，1人起家官品与卫官品阶相等。而释褐为武官者，品阶一般较卫官品阶相等或上升。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由于文武铨选的差异性决定的，因为千牛释褐为武官，属于本色升迁。唐制，“兵部简试千牛备身及太子千牛，武资也”[④]。而参加吏部铨选不一样，属于系统外的迁转，故品阶相对降低。尽管如此，绝大部分千牛还是宁愿参

---

① 《唐会要》卷71“十二卫”，第1286页。

② 《补遗》第3辑，第515~516页；《汇编》圣历049，第964页。

③ 《旧唐书》卷87《魏玄同传》，第2851页。

④ 《文献通考》卷34《选举》七，第324页；另参见《玉海》卷117《选举·庆历定任子令》，第2245页。

加吏部选，走文官仕进之途。在有释褐官职记载的63人中，仅10人入仕为武官。这一数据表明，文武官职在唐人心目中的地位和分量是不一样的，由于文官事任权重，远非武官可比，因此，尽管千牛参加吏部铨所需时间要比兵部铨长一年（见前），释褐武官官品也一般高于文官，但绝大部分千牛仍走文官仕进之路。

三　千牛的释褐官品

由表可知，卒于德宗以前的千牛，释褐为文官者46人，其所授官品一般在从六品至从八品之间，其中28人明确释褐为七品，占已知人数的60.87%；另7人不能确知其起家官品为七品还是八品，确知释褐八品官者2人，六品官者7人，五品官者1人，四品官者1人。这一现象表明，千牛的释褐官品大体为七品。这与他们依据父祖资荫所获得的散官品阶大体相当，“凡用荫，一品子，正七品上；二品子，正七品下；三品子，从七品上；从三品子，从七品下；正四品子，正八品上；从四品子，正八品下”①。而千牛的充任资格刚好是要求职事三品以上子孙和四品清官子，尽管用荫所叙为散官品阶，但事实告诉我们，其释褐官品与其用荫规定的散官结品是大体相当的。而且，四品清官（仅包括诸司侍郎、左右庶子）在官僚群体中不占多数，故千牛用荫为八品者肯定不如七品多。

可见，德宗以前，千牛的释褐官品与其用荫之散官品阶大体相当。但此后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卒于德宗以后并有准确释褐官品记载的7人来看，有6人都以九品起家，1人起家为从七品。千牛以九品起家，德宗以前很难见到此类现象，表明唐代千牛的地位呈下降趋势，即他们的贵族身份已不能保证其初仕便有较高官品，而是从九品官做起，这是唐代门荫制度衰落的反映。

---

① 《新唐书》卷45《选举志》下，第1172页。

安史乱后，赵匡曾建议，“杂色出身人，量书判，授中县尉之类。判入第三等及荫高者，加一等。”① 即门荫高者的解褐官职一般为上县尉和中县尉。县在唐代中后期分为赤、畿、望、紧、上、中、下几等，上县尉从九品上，中县尉从九品下②。赵匡的建议是否为朝廷所采纳，不得而知。但从卒于德宗以后千牛起家者的官品皆有所降低可知，朝廷对千牛的释褐官品定有所改动。而且，德宗贞元七年（791），对千牛的充任资格也进行了一定改革③，故千牛的释褐官品发生变化也在情理之中。

千牛释褐为武官，附表 1 中 10 人有 9 人以果毅起家，只是由于折冲府分上中下三等，故难以确知其具体官品。另 1 人授以王府典军，官品较原卫官品阶高，但这并不是主流。千牛释褐为武官，品阶升迁应该有所限定，如于遂古以皇帝千牛“特加四阶，除左武卫龙首府右果毅都尉”④，表明千牛的释褐官品原则上不能超过原卫官品阶的四阶。

四　千牛的释褐官职

安史乱前，千牛的释褐官职可分为以下几类：地方官、中央

---

① 《通典》卷 17《选举》五，第 424 页。

② 《旧唐书》卷 44《职官志》三，第 1921 页。

③ 《唐会要》卷 71“十二卫”：“贞元七年十二月五日，兵部奏事条：取门地清华，容仪整肃，年十一已上，十四已下，试读一小经，兼薄解弓马。其荫取嗣王任常品四品已上清资官，宰辅及文武职事正二品已上官，御史大夫、诸司卿监、国子祭酒、京兆河南尹子孙主男，见任左右丞、诸司侍郎、及左右庶子。应前任并身役荫者。三品已上官，仍须兼三品已上阶。其见任官荫，并不须阶。庶孽酗酒腋疾等，并不应限。一荫之下，不得两人应补；并周亲有见任千牛，亦不在应限。所用荫若是摄、试、检、员外、兼官等，非正阙厘务者，并不在应补限。应用赠荫者，须承前历任清资，事兼门地，与格文相当者。其赠荫降品，请准格处分。敕旨，依奏。”第 1287 页。

④ 《补遗》第 3 辑，第 30 页；《续集》圣历 019，第 374 页。

事务官、谏监官、学官，而以地方官和中央事务官为大宗。安史之乱后的情况则具有一定的复杂性，由于唐后期中央集权削弱，“入仕之路日益狭窄，即便是公卿子弟，也多另辟他径，以求进身升迁”①。故部分千牛出身者被迫将目光下移，到幕府充任文武僚佐，如附表1中之周宝，曾充任良原镇使，反映出传统权势的逐步衰落。

五　千牛的仕途前景

在73位有仕历记载者中，担任过真宰相者5位，即杨师道、杨弘武、崔知温、豆卢钦望和韦待价；使相2人，周宝、于頔。明确官至五品（指职事官）以上者53人，五品官以下者18人，1人（王师表）以后官历不详，1人（执失奉节）官品不能确定为五品还是六品。这一数据表明，附表1中70%以上的千牛出身者都升至高官，可见，千牛的仕途前景非常乐观，即便进士出身，也难以在仕途上与之相较高下。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千牛为皇帝或太子身边的侍卫，本身又是高官子弟，这些因素为其做至高官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关系资本。

当然，我们注意到此处的史料特点，大多是安史之乱以前的人物，乱后的虽然也有一些，但人数有限，而且在僖宗中和以后，就很难见到有关千牛的史料了。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无疑与千牛的人数萎缩及史料贫乏有关。唐代最盛时，千牛备身80人，备身左右256人②。至文宗太和年间，兵部奏，减少千牛、进马和金吾仗长上的人员编制，“今三色共请减六十七员”。这样，千牛、进马和金吾仗长上，总共仅剩

---

① 宁欣：《唐代门荫制与选官》，《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3期，第82页。

② 《新唐书》卷45《选举志》下，1180页；另参见《通典》卷15《选举》三，第362页。

94 人[①]。千牛人数呈现出的递减态势显而易见，这与安史之乱后皇权和贵族权势的削弱有一定关系。

安史乱后，地方势力强大，中央威权下降，唐代的用人权呈现出下移趋势，表现之一便是地方藩镇有辟署文武僚佐的权力。藩镇不但自行辟用僚佐，还往往占据中央官阙，使朝廷选官无阙可授。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千牛人仕困难重重，故一部分千牛到方镇去谋求职位，充当使府僚佐（如周宝），然后通过藩镇向朝廷奏请官职。如此便严重破坏了朝廷有关门荫制度的系列规定。故中央厉行禁止，要求充任千牛、进马者，必须到朝廷承担色役，而不许私自在地方奏授官职[②]。僖宗时期发表的赦文也从侧面反映了唐代后期千牛人仕的困境："其进马、千牛，本限五年方满，近者旋替年深，致使人仕多门，三铨无缺。从今后，如或用年深缺补人，兵部郎官必议贬降。"[③]要求兵部郎官必须给千牛及时注官，改变千牛人仕困难的现状，否则兵部郎官要受惩处。在官阙紧张的唐代晚期，此一赦文能否认真执行，恐怕还有所疑问，而且我们也没有充分的史料来证明其执行情况。

概言之，唐代千牛人仕容易，大部分能够进入高级官僚队伍行列，甚或官至宰相。

但随着科举制度的日益完善，科举阶层对门荫群体造成的威胁日渐明显，文宗以后，"进士科已成为高级官吏的主要来源，以门荫入仁（仕）而做到高官特别是做到宰相的比重大大

---

① 《全唐文》卷966《覆奏疏理诸色人仕奏》，第10037页。

② 《唐会要》卷79"诸使杂录"下，第1451～1452页。

③ 《唐大诏令集》卷72《乾符二年（875）南郊赦》，第404页；另参见《全唐文》卷89《南郊赦文》，将前文"进焉"改为"进马"，"十年"改为"千牛"，据上下文意思，当为"进马"、"千牛"二词，第934页。

下降”[①]。在才学之士的挑战面前，千牛受到排挤是很自然的事，故唐代中后期，千牛的起家官品与前期相比，明显下降。可见，在特权和个人能力的长期较量中，特权因素在不断减弱，个人能力则逐渐凸显。

第三节　墓志所见唐折冲府卫官

唐代折冲府“以三百人为团，团有校尉；五十人为队，队有正；十人为火，火有长”[②]。其中，“每校尉，旅帅二人，每旅帅，队正、副队正各二人”[③]。可见，团、旅、队、火为折冲府的基层组织，团之校尉、旅之旅帅、队之队正、队副为折冲府的基层带兵将领。既然如此，他们的官称性质如何？日本西村元佑根据大谷文书第1261号认为：唐代折冲府队副有上、中、下三等，因此推测折冲府校尉也有上、中、下三等；如果是上队副，就是从九品下的职事官，如果是其以下的队副，则是流外官了[④]。大陆学者李方认为：折冲府之中府或下府“队正也应无品级，校尉则为品官”，“旅帅以下非官员”[⑤]。以上学者的观点存在出入，事实上，“诸卫和折冲府的校尉、旅帅、队正、副队正是卫官”[⑥]。

---

① 吴宗国著《唐代科举制度研究》，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第256页。

② 《新唐书》卷50《兵志》，第1325页。

③ 《大唐六典》卷25“诸府折冲都尉”条，第458页。

④ 〔日〕西村元佑：《通过唐的敦煌差科簿看唐代均田制时代的徭役制度》，《敦煌学译文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第1095页。

⑤ 李方：《唐西州军政官吏的本地升迁》，《敦煌吐鲁番研究》第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第268、274页。

⑥ 吴宗国：《唐贞观二十二年敕旨中有关三卫的几个问题——兼论唐代门荫制度》，《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论文集》第3辑，第153页。

据《大唐六典》、《通典》和两《唐书》，唐代折冲府卫官的品阶如下：折冲府校尉，从七品下；旅帅，从八品上；队正，正九品下；队副，从九品下[①]。只是，在这些史料中，仅《旧唐书·职官志》注明了他们是卫官，这是非常难得的，否则今人很难判定其官称性质。由职掌来看，折冲府卫官实际上相当于吏的地位，故《大唐六典》卷25云：折冲府“校尉六人，以下小吏各有差”[②]。《通典》也将折冲府旅帅、队正、队副称为外职掌的胥史[③]。在文献史料中，笔者未见到将唐代折冲府校尉、旅帅、队正、队副的官品分为上、中、下三等的情况。

尽管今人的研究论著已间接涉及唐代折冲府卫官，但是没有专文出现，可能缘于史料缺乏之故。今天，大量的出土墓志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契机，笔者便欲根据这些墓志材料，对此类卫官作一初步探讨。

一　充任情况

众所周知，卫官中的一部分由官僚子弟根据父祖官品充任，如千牛、三卫、执仗、执乘等[④]，但是折冲府校尉、旅帅、队正、队副的充任情况如何？文献史料缺乏这方面的记载，而墓志材料为我们提供了相关方面的一些情况。

---

① 《大唐六典》卷25“诸府折冲都尉”条，第459页；《旧唐书》卷42《职官志》一，第1799～1803页。据《旧唐书·职官志》一，折冲府校尉和旅帅的品阶有一个逐步下降过程，《武德令》：诸府校尉，正六品下；《武德》、《乾封令》：诸府旅帅，正七品下，第1799～1801页。他们的品阶何时分别降为从七品下、从八品上，难以详考。

② 《大唐六典》卷25“诸府折冲都尉”条，第460页；另参见《通典》卷29《职官》一一，第810页。

③ 《通典》卷40《职官》二二，第1106页。

④ 《大唐六典》卷5“兵部郎中员外郎”条，第116～117页；另参见《旧唐书》卷43《职官志》二，第1833页。

1. 立有军功者直接充任

军功是唐代武官入仕的重要途径之一，军功大小直接决定个人所授官品的高低。然而，立一次军功就能升入职事官者毕竟为少数，对大多数人立功战士而言，只能获得勋官，然后通过上番进入职事官行列。由军功直接升任折冲府卫官的情况，在文献史料中较为少见，而墓志材料为我们展现了这方面的真实情况。如：

卒于麟德二年的温濬，“幼称耿介，早树英□”。“故得功宣四域，威振□□，天鉴孔明，照临先及，遂补任队副”。后历转队正、传芳府旅帅①。

终于如意元年（692）的邢政，占募从军，“以功授右威卫丹川府校尉加上柱国”②。

李修己，“以调露元年（679）正月于定襄军占募，蒙授上柱国景福府校尉，畴军庸也”③。

显然，这三人都是因军功而授予折冲府卫官的，其中两人（邢政和李修己）为募兵。他们立功后，授予的折冲府卫官品级不等，或校尉、或队副，但却难以见到授予三卫、千牛、执仗、执乘这类靠门荫起家的卫官。

2. 勋官充任

部分兵士在战场上立功后，先获得勋官，然后充任折冲府卫官，如：

张羊，“〔贞观〕十九年（645），驾幸辽左，君乃发起冲冠，投募从戎，施功展效。以君远过沧海，诏授勋官一转。永徽四

---

① 《补遗》第6辑，第305页；《续集》麟德023，第155页。

② 《汇编》长寿002，第833页。

③ 《续集》神龙025，第425页；《补遗》第6辑，第369页。

年，授永嘉府队副”①。

高感，占募从军，“破数阵于狼川；……勋锡荣班，功标厚赏。至贞观廿年（646）四月五日，授勋上骑都尉，仍锡物三百段。显庆四年（659）十月廿四日，又除左威卫戡黎府旅帅”②。

仵钦，“贞观廿三年，诏授上轻车都尉。……永徽五年（654），除开福府旅帅”③。

以上诸位都是在战场上立功获得勋官，然后升转折冲府卫官的。按照制度规定，勋官可以通过上番，授予散官，然后再铨选入仕④。然而勋官入仕比较困难，在仕途前景不佳的情况下，充任折冲府卫官，相对而言，能够得到经济上的实惠，因为，中央原则上给予他们一定数量的职分田⑤。

3. 官僚子弟充任

官僚子弟完全凭借其身份而充任折冲府卫官的事例如下。

李表，曾祖感，魏释褐为郡功曹，转申州别驾。祖钟，周起家洺州录事参军，迁卫州临清县令。父通，隋青州司法参军，扬州总管府录事。君“出身洛汭府队正”，永徽六年（655）卒⑥。

王敏，祖多，齐宋城令。父穆，隋恒安府鹰扬郎将。君“释褐永嘉府队正。东征西伐，冒霜露以忘疲；忠鲠不渝，蒙授轻车都尉”。显庆六年（661）葬⑦。

---

① 《汇编》显庆001，第229页；《补遗》第2辑，第137页。

② 《补遗》第5辑，第189～190页；《续集》永隆001，第246页。

③ 《汇编》咸亨024，第526页。

④ 《新唐书》卷46《百官志》一，第1190页。

⑤ 《新唐书》卷55《食货志》五，第1394页。

⑥ 《补遗》第2辑，第134页；《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3，第123页。

⑦ 《补遗》第6辑，第279页；《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4，第68页。

冯安，祖，汝州刺史；父，永嘉府校尉。君“剑气见于青牛，规雄知于纱简。释褐中（伊）川府校尉”，麟德元年卒[①]。

董轴，祖拟，周泾州刺史；父诃，不仕。君“起家授洛汭府队正”，咸亨二年终[②]。

可见，在门荫入仕一途中，官僚子弟还可以通过充任折冲府卫官而迈入官场。但是据文后《唐折冲府卫官充任表》，这些充任者的父祖官位都不太显赫，一般为地方官，表明折冲府卫官的职位有一部分是为基层官僚子弟准备的。

4. 有才能的平民子弟充任

郭冯德，曾祖、祖、父不仕。君以耕鑿为乐，“勋以功宣，职因才授。以天授二年六月授八谏府队副”[③]。郭冯德应为府兵家庭成员，因为墓志未交代其参军一事，只言及他喜欢务农。唐代的府兵与土地相结合，所以，郭冯德乐于农事有其物质基础，唐代府兵本来就是亦耕亦战的部队。但因郭氏才能出众，而被选为折冲府卫官。

董师，祖钦，不仕；父少师，“括囊六籍”。“君弱龄好古，壮发勤书。王粲横戈，俄从武术；班超入幕，忽预兵钤。……制授从善府旅帅”，亡于战场，天授二年葬[④]。董师也是平民子弟出身，战争爆发之际才被提拔为卫官的。

折冲府卫官有一部分来源于平民子弟，这与府兵的征点原则有关：凡“卫士，皆取六品已下子孙及白丁无职役者点死（充）”[⑤]。

---

① 《汇编》麟德029，第415页；《补遗》第2辑，第196页。

② 《汇编》上元003，第594页；《补遗》第2辑，第256～257页。

③ 《汇编》开元203，第1298页；《补遗》第7辑，第367～368页。

④ 《续集》天授005，第309页。

⑤ 《大唐六典》卷5“兵部郎中员外郎”条，第119页；另参见《旧唐书》卷43《职官志》二，第1834页。

5. 制举武科及第者充任

唐代，部分制举武科及第者也授予折冲府卫官之职，如：

张山鳥，祖文为，上轻车都尉；父，不仕。公“起家自举，武艺超绝。越阶授皮氏府旅帅”，乾封元年（666）卒[①]。张山鳥制举登科后，充任折冲府旅帅，其一生实际上并未正除，故墓志铭不言其任何官职。

另外，我们从萧颖士《为邵翼作上张兵部书》一文可知，制举登科后，有“待罪末品，参一旅之长，受偏师之任”的可能，即授旅帅一职[②]。

按照唐代的制度规定，制举登科后，“文策高者特授以美官，其次与出身”[③]。这虽指以文应制举者，事实证明，以武应制举登科后在现实中也同样如此，或释褐为官，或给予出身。

二　入仕情况及在官僚群体中的角色地位

文章共收录折冲府卫官52人（见附表2），仅3人释褐为官，即张团儿、李强和薛岳。为何折冲府卫官人仕较为困难？笔者认为，这可能与充任者的身份地位有关。与千牛、三卫、亲事、帐内这些卫官相比，折冲府卫官的充任对象要复杂一些，有平民子弟混杂其中，据文后附表2，确知父祖情况的有35人，其中平民子弟8人，占了所知人数比例的22.86%，官僚子弟居3/4强。充任情况也千差万别，或以军功、或以才能、或以门第、或科举及第，与那种纯靠门荫起家的卫官有着显著差别。因此，文献史料未能将折冲府卫官与其他卫官相提并论，原因可能就在于此。门荫类卫官在铨选方面有比较整齐划一的制度规定，可折冲

---

① 《补遗》第5辑，第338～339页；《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山西卷，第95页。

② 《文苑英华》卷670《为邵翼作上张兵部书》，第3445～3446页。

③ 《通典》卷15《选举》三，第357页。

府卫官相关方面的材料却非常缺乏。由此看来，朝廷对折冲府卫官的铨选当有另行的一套制度，只是因史料不足，难以详知。可见，唐代的卫官群体可大致分为门荫和杂色两类，折冲府卫官无疑属于后者。

既然折冲府卫官的入仕前景不佳，它就难以成为官僚子弟热衷追逐的职位。此外，附表2中所见之折冲府卫官，绝大多数都是开元以前的人物，之后的则极为少见，这与整个史料的保存状况有关，也与开元时期府兵制的急剧破坏有很大关联。从已入仕的3人来看，都是进入文官群体，而没有充任武官者。

折冲府校尉、旅帅、队正、队副是位于武官之下的一群具体带兵人员，《大唐六典》卷25称之为“小吏”（出处见前），显然，它们是衔接官与普通士兵之间的桥梁，它为普通卫士成为官僚提供了一个“出口”，即只要具备才能和军功，普通卫士也有机会循折冲府卫官之路不断上升，最终有成为职事官的可能。折冲府卫官内部不同品级的划分，也给系统内部的升迁提供了便利，此一升迁情况，在墓志中有清晰的反映。如附表2中之龙澄，从西明府旅帅擢任校尉；温濬从队副转任队正等。

三　余论

明末清初学者王夫之认为；府兵“三百人之团正，五十人之队正，十人之火长，编定而代袭之，无问其堪为统率否也”[1]。可是，从附表2中父祖的职业来看，代袭现象并不明显。而且，府兵系统卫官依靠军功、父祖官位以及自身才能等充任的本身，便说明其选任途径并非单一，如此便加大了卫官内部的人员流动频率。

此外，唐长孺先生根据《唐西州某乡户口帐》，认为：“折

① 《读通鉴论》卷20，中华书局，1975，第604页。

冲府的基层军官自校尉以至队副均按惯例由当地人充当。”① 但墓志表明，也存在由外地人充任的情况，如前所提到的张团儿，高昌人，“前授东宫府门子弟将。属大唐□□，抽擢良能，授洛州怀音府队正”②；张相欢，西州高昌人，“权任伪王帐右。城宾之际，投化归朝，为上赤诚，蒙补怀音队正，旋归本邑，旧位转复”③；张光（元）峻，高昌人，“任伪教郎将军。蒙运载入圣朝，摄蒙□州白石府校尉”④。

陈国灿认为：“张团儿和张相欢都是在唐军攻占高昌后，被迁往洛州任命为怀音府队正的，这也是唐朝廷对内迁高昌贵族及其左右进行安置、利用的一种反映。其任职怀音府的时间多在贞观十八年（644）至廿三年（649）间。”他们所迁往任职之府在“京、洛一线”⑤。不仅高昌贵族被内迁充任折冲府卫官，内地军府也不断驻防西州及西域，“来到西州及西域的军府，绝大部分来自关、陇地区”⑥。这一事实显示出府兵在地域上的流动现象，我们从附表2中人员的籍贯与充任府兵卫官的地域并非完全重合也能得知此点（当然不排除其郡望和现实居住地之间的差异）。另外，我们还能见到一人充任两府卫官的现象，如：周仁哲，任大陆、吴泽二府校尉⑦。虽然我们不能确知其是同时兼任还是先后充任，但都反映出府兵系统卫官人员的任命，在地域上并非完

① 唐长孺：《吐鲁番文书中所见的西州府兵》，《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第31～32页。

② 《续集》永徽022，第68页。

③ 陈国灿著《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第383～384页。

④ 《续集》永徽023，第69页。

⑤ 陈国灿：《吐鲁番出土文献所见之唐代军府》，《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6辑，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第83页。

⑥ 陈国灿：《吐鲁番出土文献所见之唐代军府》，第83页。

⑦ 《补遗》第7辑，第214页。

全处于静止状态。

总之，折冲府卫官的充任情况大体有以下几种，即依靠军功、门荫、才能和科举。从充任对象来看，基层官僚子弟居多，平民子弟也占有一定份额。因此，折冲府卫官与纯靠门荫起家的卫官有一定区别，它带有部分平民色彩。府兵卫官的任命，并非像王夫之所云的那样世袭充任，其本身具有很大的流动性。这种流动性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家庭内部的职业流动，二是人员任命的地域流动，三是平民子弟进入官场的这种向上的阶层流动。由于充当府兵卫官，难以进入职事官僚队伍，因此，它没有成为官僚子弟钦羡的职位；以后，随着府兵制的废除，折冲府卫官也遭到废弃。

通过以上论述，本章可归纳如下。

第一，唐代卫官为军人职掌，可大体划分为五类，即千牛类、三卫类、监门卫类、王府类和折冲府类。其配置部门有京城内外之别，前四类主要配置在京城的官僚机构或王府；最后一类主要分布在地方的折冲府。如此，便使折冲府类卫官与其他几类卫官之间拉开了空间距离。在具体的充任情况上，也是如此，前四类卫官为门荫群体，而折冲府类卫官则有别，它带有一定的平民色彩。

第二，唐代卫官因出身门第的差异，导致入仕难易程度的不同。大致说来，荫任资格越高，入仕就相对容易，反之亦然。故卫官内部形成了事实上的等级结构，在这个金字塔顶端的是千牛，其次是三卫，折冲府系统卫官则居于整个金字塔的底端。

第三，卫官入仕虽然不是以充任武官为主，但它也是武官来源的重要途径之一。

第四，卫官群体的衰落，是能力因素战胜门第因素的必然结果。因为以安史之乱为界，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卫官群体在官僚机构中充任重要职位的比例呈下降趋势，“唐后期，这一下降趋

势的速度更为加快，一直延续到北宋。……但北宋门荫入仕的群体，虽然人数比唐更为膨胀，而起点更低、升迁更慢，登相位者更少，社会地位也更低，这点正是官僚政治逐渐强化的具体体现”。而且，“隋唐五代，是身份性社会向非身份性社会转化时期，门荫制在唐初，仍具有较浓厚的身份性色彩，当身份色彩逐渐淡薄后，门荫制则主要反映了中央集权下官僚集团的等级特权，它的衰落成为历史的必然”①。

① 宁欣：《唐代门荫制与选官》，《中国史研究》1993 年第 3 期，第 78、81 页。

第四章　科举入仕

唐代科举分为常科和制科，作为选拔武官的科举，也不例外，有武举和武制科两种形式。武举创立于武周长安二年(702)，宫崎市定认为：任用武官为目的的武举，“几乎没有多大意义。这是由于武将要在战场立功才能证实他的才能，兵法和武技的演习并不能考验个人的实力”①。尽管如此，武举作为制度化选拔武官的一种方式，仍有研究的必要，尤其是唐代作为这种制度的创立王朝，其开创性意义不可忽视。因为宋、明、清三朝一直在沿用它，然而，宋人对唐代武举却抱歧视态度，认为“其选用之法不足道”②。正是由于宋人的这种蔑视态度，故留下来的相关材料有限，我们只能通过一些零碎的史料来做探讨。

第一节　唐代武举

对唐代武举的研究，目前学界主要从制度层面进行探讨，缺乏实证性说明。高明士曾曰：“今检〔唐代〕武举及第实例，只得郭子

---

① 〔日〕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1卷，中华书局，1992，第195页。

② 《新唐书》卷44《选举志》上，第1170页。

仪一人。”[①]近年来，墓志的不断出土，为研究唐代武举提供了契机。孟二冬在《登科记考补正·附考·武举》一栏中，列举了19位武举及第人物，但并没有作具体分析，而且很多人物是否应此科还值得商榷[②]。相对于庞大的文科及第人群而言，武举登科者数量有限。我们虽不能以一叶知秋，但如何以有限的资料去窥知唐代武举的一些基本情况，却是治史者不可忽视的问题。

一　制度概述

武举创立于武周长安二年，贞元十四年（798）废除，元和三年（808）又重新恢复[③]。其设立，“开始纳军事将帅的选拔于科举轨道，使得选拔任用制度化、规范化”[④]。由于武举制度方面的研究著述颇多（见《绪论》研究综述部分），故笔者仅利用已有成果，就其具体的选拔程序、考试内容、及第后的除官等制度作一番大致叙述。

1. 选拔程序

唐代没有设立有关武科的学校，因此，武举也就不存在生徒

---

① 高明士：《唐代的武举与武庙》，《第一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台湾学生书局，1989，第1036页。

② 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其所列之张山舄、郑瞻、黄师，皆为长安二年（武举创立之年）以前人物，故他们不可能应此科。张仁愿在万岁通天二年（697）以前已官至侍御史，故不可能应武举，即使所应为武科，也是制举，《旧唐书》卷93《张仁愿传》，2981～2983页。另其所列之李经、元峄为“宾荐擢第”、“应宾擢第”，虽然他们武艺高强，但由此判断其以武举擢第，仍嫌牵强。其所列之伊慎，孟氏据其“善射中鹄，补广州绥南府折冲都尉”而判定其“当为武举及第”，仍然证据不足。周宝，以武选授官，武选与武举有严格区别，故不应为武举。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第1366～1369页。

③ 《新唐书》卷44《选举志》上，第1170页；《（宋本）册府元龟》卷639、640《贡举部·条制》第一、第二，第2098、2105页。

④ 任立达、薛希洪著《中国古代官吏考选制度史》，第191页。

一说，主要是乡贡，军队也可能向朝廷贡举人才（具体事例见后文）。在地方，负责选拔武举的官员是三府（京兆、河南、太原）的兵曹参军事和各都督府的兵曹参军事，以及各州的司兵参军事，“每岁贡武举人，有智勇谋略、强力悍材者，举而送之。试长跺、马枪、翘关、擎重，以为等第之上下，为之升黜。从文举，行乡饮酒之礼，然后申送”①。即武举考生不能随便应考，必须得到地方政府的举荐，才能到兵部参加省试。在礼仪方面，要“举行乡饮酒礼”，其仪节“在太公庙举行”；天宝六载（747）以后，又规定武举人在赴京师之前，“尚须拜谒太公庙”②。这些礼仪，显然是受到文科考生的直接影响。武举考生到中央应考，还必须具备“文状”，这些文状如《通典》在选试规定中所云，要写明包含资绪、郡县乡里名籍、父祖官名、内外族姻、年齿形状、优劣课最、谴负刑犯等③，严格资格审查并防止作弊行为。武举考生每年十月“随朝集使以至省，勘责文状而引试焉。亦与计科偕”④。即在朝集使的带领下，赴尚书省报名应考。

2. **考试内容**

武举最初由兵部员外郎主持，其“掌贡举及诸杂请之事”⑤。开元二十六年（738），改由兵部侍郎负责⑥，这与文科考试在开元二十四年（736）改换主考官存在某种一致性⑦。

---

① 《大唐六典》卷30“兵曹、司兵参军”条，第526页。

② 高明士：《唐代的武举与武庙》，《第一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第1025页。

③ 《通典》卷15《选举》三，第360页。

④ 《大唐六典》卷5“兵部郎中员外郎”条，第123页。

⑤ 《大唐六典》卷5“兵部郎中员外郎”条，第123页。

⑥ 《唐会要》卷59“兵部侍郎”，第1030页。

⑦ 《通典》卷15《选举》三，第355～356页。

武举的考试内容分为平射和武举两科，平射科："试射长垛，三十发不出第三院，为第"；武举科的考试内容有七项：射长垛、骑射、马枪、步射·射草人、材貌、言语、举重[①]。所需要注意的是，平射科有两类，一是常举的平射科，二是制举的平射科，二者存在差异，主要是考试内容的不同。前者考试内容已如上述，后者的考试内容为："谓善能令矢发平直，十发五中，五居其次，为上第；三中，七居其次，为下第。"[②]

玄宗天宝元年（742），对长垛一项的考试内容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改，"自今以后，应试选举人，长垛宜以十只箭为限，并入第一院，与两单上；八只入第一院，两只入第二院，与一单上次上；十只不出第三院，与单上；十只不出第四院，与次上。余依常式"[③]。

由上可知，唐代的武举考试只注重军事技艺，而没有文化课的策试内容，这为一般的军人子弟或普通平民应考减少了文化障碍。

3. 及第后的除官

对于武举及第后的叙官，《大唐六典》载：

> 武贡之第者，勋官五品已上、并三卫、执仗、〔执〕乘、若品子年考已满者，并放选；勋官六品已上（下）、并应宿卫人、及品子五考已上者，并授散官。谓军士战官（谓已下五字，疑衍）余并帖仗，然后授散官[④]。

① 《大唐六典》卷5"兵部郎中员外郎"条，第123页。
② 《大唐六典》卷5"兵部郎中员外郎"条，第123页。
③ 《唐会要》卷59"兵部侍郎"，第1030页。
④ 《大唐六典》卷5"兵部郎中员外郎"条，第124页；另参见《唐会要》卷59"兵部尚书"，第1029页。

“武贡之第者”当指武举和平射二科及第者，其及第后的叙官有三种情况：一，勋官五品以上、并三卫、执仗、执乘、若品子年考已满者及第后，可立即参加铨选；二，勋官六品以下、并应宿卫人及品子五考以上者及第后，只能授予散官；三，一般平民应试者，及第后须先帖仗，然后授予散官。从这个授官制度规定来看，武举及第后的授官品级是非常低的，有的甚至不能直接参加铨选，还要帖仗一段时间，才有应选资格，这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的应考热情。

以上笔者从制度层面概略叙述了唐代武贡举的一些基本情况，以下就具体实例进行分析。

二　及第人物与授官情况

笔者所见唐代武贡举及第者的事例如下。

1. 董虔运

陇西狄道人，曾祖恽，隋朝散大夫、扬州海陵县令；祖谦，游击将军、左金吾卫积善府折冲；父雅，“晦迹藏用，闲居理道”。公“初应武举，擢第，授右羽林军押飞骑引驾”，后“解褐授泽州沁水府左果毅”。历任汝州龙兴府右果毅、左羽林军长上果毅、京兆府义丰府右果毅，依旧长上。开元十年（722），卒于河南府履顺里之私第，春秋五十九[①]。

按董氏年寿，其应于武举初创不久及第。祖官游击将军，从五品下。唐代叙阶之法，“三品已上荫曾孙，五品已上荫孙，孙降子一等，曾孙降孙一等”[②]，故董虔运有资荫。及第后，授右羽林军押飞骑引驾，即获一差遣职任。最高官至果毅都尉，正六品下至从五品下，因为上府果毅都尉，从五品下；中府，正六品

① 《汇编》开元155，第1263页；《补遗》第6辑，第397页。

② 《大唐六典》卷2“吏部郎中”条，第32页。

上；下府，正六品下。①

2. 包思恭

“进陵（注：疑当为晋陵）吴郡人也”，高祖智贤、曾祖文景、祖三尚，并“逍遥幽寂，散适闲居”；父宝寿，“乃信行丈夫，淑人君子。寻师讲读，游诣秦川；慕恋长安，便居京兆。”开元十二年（724），“终于长安县休佯坊（注：疑当为休祥坊）私第”，年八十六，葬于京城西龙首乡岐村界龙首原。子包思恭，“武举及第，任坊州杏城府别将，又转果毅折冲，寻加云麾将军，任郎将、中郎。又改冠军大将军、行右威卫将军、上柱国，封谷城县开国侯。”②

按包宝寿生卒年计，包思恭当于武举创立不久及第。志文载，包宝寿因“慕恋长安，便居京兆”。所以，包思恭有出生于长安的可能；而且，由包宝寿之卒葬地点可知，其家人时已移居长安。志文表明，包氏父祖无官，然包思恭及第后却任以坊州杏城府别将（从七品下至正七品下）一职，授官较高。而且又是以庶人身份应举，按庶人及第之规定，应先帖仕，考满后才能授予官职。可志文反映出，包思恭及第后便授予别将一职，与制度记载出入较大。或许，墓志隐藏了其帖仕的事实，也可能是其及第等第较高，故不次拔擢。《大唐六典》云：“其高第者，以奏闻”③，即不必按照制度的规定除官。官至右威卫将军，从三品。

3. 李倕倕

陇西狄道人，“公五代祖肇，周左金紫光禄大夫、大都督、鸿胪卿、邺县开国侯；高祖庆，隋大都督仪同三司、车

① 《大唐六典》卷25“诸府折冲都尉”条，第458页。

② 《补遗》第7辑，第367页。

③ 《大唐六典》卷5“兵部郎中员外郎”条，第124页。

骑大将军、濮阳县开国子、食邑四百户；祖师福，蒋王东阁祭酒；父释子，皇任盐、甘、肃三州刺史、使持节鄯州都督”。公“常有言曰：大丈夫不继单于颈，不碎颜良军，曷以答圣朝之休美，绍先人之鸿业？遂投笔戎幕……虽历年勤戍，空疲汗马之劳；入贡西曹，一举高第，旨授左领军执戟。年卅有九，以开元十七年己巳载（729）六月暴亡轩禁。开〔元〕十八庚午岁（730）十二月廿九日，陪葬于北邙山平乐乡先茔之东礼也”①。

按其终年，李氏应于开元年间及第。偪偪祖上仕周隋，很可能属于关陇集团，陇西为其郡望。“西曹”在唐代为兵部的别称②，故李氏是入贡兵部。从志文来看，李氏弃文从武的目的，是欲“绍先人之鸿业”，在前线建功立业，然而却一无所获，最后选择武举之途，进入仕宦生涯。但英年早逝，死时仍停留在正九品官位上。

4. 夏侯杲

夏侯思泰，谯郡人。“曾祖勔，银州司马；祖弼，郓州录事参军；父留生，并参玄守白，弱不好弄”。从墓志题名“大唐故朝议郎行尚书都事上柱国夏侯府君墓志并序”来看，夏侯留生的职事官位为从七品上的尚书都事，散官官位为正六品上的朝议郎，开元二十六年卒于京兆府万年县崇义坊私第，年六十一。

---

① 《汇编》开元317，第1376页；《补遗》第1辑，第123页。

② 〔唐〕独孤及撰《毘陵集》卷15《送吏部杜郎中兵部杨郎中入蜀序》：“二公罢東、西曹”，显然东曹代指吏部，西曹代指兵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第119页。西曹在唐代还有他指，如唐韦应物撰《韦苏州集》卷5“答刘西曹”一文，称其“时为京兆功曹”，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第39页。但是从有选举权这一事实来看，此处的“西曹”当指兵部无疑。〔清〕梁章钜《称谓录·兵部》亦云：崔豹《古今考》，“兵部称西曹”，天津市古籍书店，1987，第774页。

“归殡于河南府河南县平乐乡之北原”。“次子左卫翊卫武举及第兵部常选杲等”①。

按《大唐六典》卷5“兵部郎中员外郎”条规定：“武贡之第者，勋官五品以上、并三卫〔、〕执仗、〔执〕乘、若品子年考已满者，并放选。”表明三卫成员武举及第后可立即参加铨选。夏侯杲以三卫身份及第后，便具备了参加铨选的资格（兵部常选）。以谯郡为郡望，而葬于河南府，表明其家族有可能是从谯郡迁至河南府的。此方墓志撰写于开元二十六年，在这之后，夏侯杲具体历官如何，不得而知。

5. **张嘉祐**

“范阳人，相国河东公季弟。曾祖长度，光禄勋；祖俊兴，赠慈州刺史；考思义，赠秦州都督”。公生秦长晋，“弱冠武举及第，充衬庙辇脚，补右领军司戈，换同轨府果毅，知含嘉仓幹，其出内转伊川府折冲”。后历转鄯州别驾－忻州刺史－并州司马、燕公军使－卫尉少卿、进副大使－光禄少卿－右金吾将军－贬补（浦）阳府折冲－都水使者、仍作副使－率更令－义府司马，抵讳，改棣王府－相州刺史－左金吾将军。开元廿九年（741）终于安邑里私第，天宝元年迁葬东都汉原②。

“相国河东公”指玄宗时宰相张嘉贞，即张嘉祐之兄，嘉祐两《唐书》有传，附于其兄传之后。按《新唐书·张嘉贞传》，“本范阳旧姓，高祖子吒，仕隋终河东郡丞，遂家蒲州，为猗氏人”。不曾言其父、祖、曾祖做官之事；墓志载其父、祖之赠官，显然是张嘉贞发达以后的事。其曾祖官光禄勋，也可能是张嘉贞发达以后的赠官。范阳为其郡望，家实居蒲州，

① 《汇编》开元474，第1482～1483页；《补遗》第6辑，第425～426页。

② 《汇编》天宝003，第1532～1533页。

这与墓志言张嘉祐“生秦长晋”比较相符。《旧唐书·张嘉贞传》载：开元初，嘉贞为嘉祐请求改官，时嘉祐官鄯州别驾；由于张嘉贞之奏请，遂改为忻州刺史。故张嘉祐应是在开元初年以前及第的。

墓志详细记载了张嘉祐的一生，而两《唐书》本传仅从其任右金吾将军时记事，此前事迹一无所知，这方墓志填补了两《唐书》记载的疏略　但是，两《唐书》对张嘉祐晚年做官的时间记载详细，又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墓志记载的不足。“自右金吾将军贬浦阳府折冲，至〔开元〕二十五年（737），为相州刺史。……经三考，改左金吾将军”①。说明张嘉祐是在开元二十八年（740）再拜金吾将军一职的。墓志、本传相互补充，张嘉祐的事迹就显得比较清晰和完整了。

张嘉祐为庶人身份，及第后，首先“充衬庙辇脚”，没有品级；后“补右领军司戈”，正八品下。张嘉祐一生文武兼资，最高官至从三品的金吾将军。

6. 马元瑒

扶风人。曾祖开，隋政平府鹰扬郎将、泗州刺史；祖文举，唐右骁卫大将军、使持节廿七州诸军事、松州刺史等；父大福，唐明威将军、宣化府折冲都尉、赤水道子总管。公“弱冠，资门荫补左卫翊卫。……又应平射举擢第，解褐右卫左执戟。秩满，迁左卫右司戈。未几，换左武卫中候”。“以天宝叶洽岁夷则月乙卯日，遘疾云亡于长安城西之别舍，享年五十有五。”②

《补遗》后面之注云：“天宝叶洽岁夷则月乙卯日”，据方诗

① 《旧唐书》卷99《张嘉祐传》，第3093页；另参见《新唐书》卷127《张嘉祐传》，第4449页。

② 《补遗》第7辑，第50页。

铭《中国史历日和中西历日对照表》，当为天宝二年（743）五月十七日。按马元瑒生卒年计，约在开元年间及第。四代皆为武职，是典型的武官世家。出身门第较高，应举前充任三卫。由马氏及第后便放选的事实来看，符合武贡举及第后的规定。“武贡之第者，勋官五品已上、并三卫、执仗、〔执〕乘、若品子年考已满者，并放选”。而制举之平射科及第后，“勋、散、卫官、五品已上官子孙，帖仗二年而选；次第者，其应选，则据资优直（直当作与）处分，应帖仗，则三年而选”①，故马元瑒必为武贡举及第。其一生中最高官至左武卫中候，正七品下，属于低级武官。

7. **瞿昙譔**

“公讳譔，字贞固。发源启祚，本自中天，降祉联华，著于上国，故世为京兆人也。烈曾讳逸，高道不仕；烈祖讳罗，皇朝太中大夫、司津监，赠太子仆；烈考讳悉达，皇朝银青光禄大夫、太史监、江宁县开国男食邑五百户赠汾州刺史”。公“学必造微，艺皆至极。筮仕之首，以武举及第，授扶风郡山泉府别将，恩旨直太史监，历鄜州三川府左果毅，转秋官正，兼知占候事。及国家改太史监为司天台，有诏委公。纂叙前业，发挥秘典，以赐绯鱼袋，寻正授朝散大夫守本司少监。广德初，公质事误王（主），削去冠爵”，后迁任司天监。“公妙年从宦，六十五而即冥”，薨于大历十一年（776）②。

由“妙年从宦”一语及瞿昙譔年寿推算，其当于开元后期及第。志文表明，其祖宗系从域外（中天竺）迁至长安的，家世掌管天文历法工作。《旧唐书》载：天后时，其祖父瞿昙罗造

① 《大唐六典》卷5“兵部郎中员外郎”条，第124页。

② 《汇编》大历049，第1791～1792页；《补遗》第1辑，第130～131页。

《光宅历》①；父瞿昙悉达，太史监，正三品；集有《大唐开元占经》110卷②。瞿昙譔在上元二年（761）和宝应元年（762）皆有奏文，时分别任司天秋官正和司天少监③。唐代，五品已上官员子孙皆有用荫资格，故瞿昙譔有资荫。然而其生活的时代（玄、肃、代三朝），府兵制已趋瓦解，府兵官称主要用来作为阶官化的官称。其武举及第后，其由皇帝恩旨，“直太史监”，掌管天文历法工作，名义上仍授予折冲府官职，实际却与职守分离。因为“直官本身无品级，它需要借充直者原来官品来作为俸禄的供给等级”④。瞿昙譔经一段时间的迁转，才摆脱以武将充任直官的身份，正式进入司天台正员官行列，后来升至司天台最高长官司天监，正三品，也是其一生所任之最高官职。

8. 郭子仪

代为太原著姓，“今为华州郑县人”，曾祖昶，唐凉州司法；祖通，美源县主簿；父敬之，官至左威卫郎将、寿州刺史⑤。公“武举及第，授左卫长上，改河南府城皋府别将，又改同州兴德府右果毅，左金吾卫知队仗长上，又改汝州鲁阳府折冲知右羽林军长上，又迁桂州都督府长史充当管经略副使”等职⑥。在两《唐书》本传中，皆载子仪“以武举异等补左卫长史（文官，从六品上）”⑦。高明士认为：其及第后的释褐官职远较秀才、明

① 《旧唐书》卷32《历志》一，第1152页。

② 《新唐书》卷59《艺文志》三，第1545页。

③ 《旧唐书》卷36《天文志》下，第1324、1336页。

④ 李锦绣著《唐代制度史略论稿》，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第5页。

⑤ 《文苑英华》卷880《郭子仪家庙碑》，第4640～4641页。

⑥ 《金石萃编》卷92《郭氏家庙碑》碑阴，《石刻史料新编》一般类，第2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第1537～1539页。

⑦ 《新唐书》卷137《郭子仪传》，第4599页；另参见《旧唐书》卷120《郭子仪传》，第3449页。

经、进士为高，“由此看来，武举及第，即授予从六品上之官职，似违乎常情；此事或许以子仪一切条件特异，乃予以超擢之故”①。但从笔者所见到的武举及第者事例来看，一般皆授予武职，而且释褐官品以八九品居多；另外，在《郭氏家庙碑》碑阴中，也未见到他充任左卫长史一职，故两《唐书》本传的记载可能有误，而碑铭记载比较符合客观事实。《金石录补》也认为“宜以碑为信”②。郭子仪一生功勋卓著，肃宗时为使相，后官至太尉，正一品，薨于建中二年（781）③。

9. **张晕**

“其先清河人也。曾祖顗，皇朝唐元功臣忠武将军、左清道率；祖克恭，皇朝游击将军、雍州归政府折冲都尉；父处廉，皇朝太仓令。府君即先君之第二子也。少年豪侠，志气风云，弃笔从戎，留心学剑。应武举擢第，以常选授官，历职优深，加拜五品，大历十三年（778）五月十三日暴卒于金堤府之任也，时年六十三。于戏！远之巴蜀，永别乡关，亡櫬委灰，归魂未葬”。以夫人奄逝之年（贞元四年，788）“拜手招魂，合祔葬于万年县龙首乡原，礼也”④。

张晕生活的年代与瞿昙譔几乎相同，按生卒年推算，应举及第时间也当在开元后期以后。志文没有详细记载其及第后具体的授官经过，但从题名“唐故游击将军行蜀州金堤府左果毅都尉张府君夫人吴兴姚氏墓志铭并序”来看，其职事官的最高官位是果毅都尉，正六品下至从五品下；游击将军，从五品下。唐代，

---

① 高明士：《唐代的武举与武庙》，《第一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第1037页。

② 《石刻史料新编》一般类，第2册，第1541页。

③ 《旧唐书》卷120《郭子仪传》，第3450、3465页；另参见《新唐书》卷137《郭子仪传》，第4600、4608页。

④ 《汇编》贞元018，第1849～1850页；《补遗》第4辑，第68～69页。

“以职事高者为守，职事卑者为行，仍各带散位”①。故张氏的职事官位应为正六品。这里的加拜五品，当指其散阶本品。及至张晕成年，府兵制已经废弛，并呈现出阶官化现象，天宝八载（749）以后尤为明显，果毅都尉仅表示其武官的身份和地位，不可能实任其职。从张氏卒于巴蜀地区及时间推断，有可能在地方藩镇任职。由于墓志的含晦隐涩，我们难以详知当时情形。张氏一生的活动应以军旅为主，最后也卒于军中。志文称“其先清河人也”，应指其郡望；从“拜手招魂”，与妻合葬在万年县来看，极可能在其父祖时，家人已移居关内。

10. **诸葛澄**

“其先琅琊人也，承蜀相武侯亮胄胤。曾祖□□，考士牟，初受太子文学，次迁崇玄弘文馆大学士，累授□□府。君器宇冲邈，调韵不群，才智天生，识量神假。□□有室，以武举擢第，拜左武卫执戟，宝鼎铉之清阶也。□□左金吾卫郎将，出入禁卫，警跸严廊，号令清严，亲□□展宸。”诸葛氏卒于河阴县三山乡三山里之私第，卒年不详。夫人荥阳郑氏，终于元和十五年（820），年七十七。“茔葬于河阳城南六里大和里之北原。”②

按郑夫人年寿，约生于公元744年，即玄宗天宝三载。将此夫妇年龄的差异性考虑在内，那么，诸葛澄成年时也大致在天宝年间或安史之乱前后，其及第时间不可能早于此时。从历官来看，他一直充任中央军职。墓志题“（上缺）左武卫执戟守忠武将军试左金吾卫郎将诸葛府君（澄）墓志铭”，表明左武卫执戟为其职事官位，正九品下，这是诸葛氏的起家官，也是其最高职事官位；散官忠武将军，正四品上；左金吾卫郎

① 《旧唐书》卷42《职官志》一，第1785页。

② 《汇编》宝历010，第2087页；《补遗》第4辑，第109～110页。

将，正五品上，虽然品高，但只是差遣，而不是正除。唐代“《贞观令》，以职事高者为守，职事卑者为行，仍各带散位。其欠一阶，依旧为兼，与当阶者，皆解散官。永徽已来，欠一阶者，或为兼，或带散官，或为守，参而用之。其两职事者亦为兼，颇相错乱。咸亨二年（671），始一切为守”①。故墓志题名“左武卫执戟守忠武将军”。诸葛氏自称琅琊诸葛，不能排除攀附之嫌；但其妻荥阳郑氏为旧族一等高门，旧族最重婚娅，与之结亲者未必可能“攀附郡望”，倘能坐实攀附，则又反映时至中唐士族的陵替。从其逝世地点河阴县、埋葬地河阳县，皆属河南道来看，其家已从琅琊移居河南府。诸葛氏父亲历官太子文学，从六品下；崇玄、弘文馆大学士，五品以上，故其或为品子，或有资荫。

11. □繼

□繼为此方墓志主人张瑗之次女婿。张瑗死于大和二年（828），享龄六十多。有四子，“儿女各二。长男元女不幸少夭。次女适河南尉繼，繼武妙文□，弱冠武举擢第，累迁虢州全节府折冲都尉”②。

因墓主人是张瑗，故有关□繼的记载极为简略。据墓主人的生卒年推算，约生于安史之乱前后，其女婿繼应举及第，大致在宪宗统治前后。从志文表述来看，仅知其通过武举出身，官至折冲都尉，正五品下至正四品上；而实职河南尉。河南县为京县③，尉从八品下。文宗大和年间，府兵制早已不复存在，府兵官称也已阶官化，“折冲都尉”除代表其武将的身份地位外，与其实际职守没有什么关系。

① 《旧唐书》卷42《职官志》一，第1785～1786页。

② 《补遗》第6辑，第143页；《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山西卷，第157页。

③ 《旧唐书》卷44《职官志》三，第1920页。

12. 王濬

事迹见于其孙王恽墓志，故极为简略。王濬父“论，家本晋州洪洞县人，以文德儒成乡荐，登贤良□（方）正，任至本郡守”。而王濬本人“应兵部武举，授官汴州大梁折冲都尉，职兼宣武军倅”，孙王恽终于会昌五年（845），享年五十七[①]。

王濬卒年不详，由其曾任宣武军副帅[②]，以及其孙王恽之年寿推测，其主要活动于安史之乱以后，应武举及第的时间也当在安史之乱前后。从志文记载来看，折冲都尉为其阶官化的职事官称，宣武军副帅为其实际职守，权力不大，因为《新唐书·百官志》将其排在节度使、副大使知节度事、行军司马之后[③]。

13. 廖汾

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卷18《人物·武功》：唐“廖汾，将乐人，有膂力谋略，由武举授九江团练使，讨贼黄林儿有功，拜金吾大将军”[④]。四库本《福建通志》卷31《名宦三·延平府·唐》：“廖汾，字元清，有膂力，多谋略，授九江团练使，讨黄林儿贼有功，拜金吾卫大将军。”[⑤] 显然，廖汾为福建人，至于父祖情况及以后的官历如何，不得而知。文曰“由武举授九江团练使”，团练使作为一地方长官，职位较高，故不可能是其释褐官职。

14. 舒贺

《德兴县志》卷七《人物志·武科》：舒贺，“大中元年

---

① 《汇编》会昌056，第2251页；《补遗》第7辑，第122页。

② 吴廷燮：《唐方镇年表》卷2“宣武”条，宣武军置于建中二年，中华书局，1980，第191页。

③ 《新唐书》卷49下《百官志》四下，第1309页。

④ 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嘉靖《延平府志》（福建省）卷18《人物志》，上海古籍书店，1982，人物四之八。

⑤ 《福建通志》卷31《名宦三·延平府·唐》，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28册，第503页。

（847）武进士，历官节度使”；同书卷8《人物志·名臣》：“舒贺，大中间行军团练使，拜踏白将军，领节度副使。讨黄巢，贺灼艾飞燕，烧其草薰，人马死者几半。及巢陷长安，贺与郑畋合兵进讨，遂复长安，擢山南东道节度使。朱温篡祚，遣使起贺，以疾辞，明年卒。”① 孟二冬据明张吉《古城集·补遗》载《封屯田员外郎德兴舒公墓志铭》，认为“《德兴县志》当有所本”②。德兴县即唐之饶州乐平县，属于江南西道③，故舒贺为南方人。其父祖情况及登科后的释褐官职皆不详，仅能知道其官至节度使。

三　结论

据以上武举及第者事例，笔者分析如下。

1. 家庭出身对举子的影响

在所列诸位武贡举及第者中，□繇、廖汾及舒贺的家庭出身背景不详，其余11位，张嘉祐、诸葛澄为庶人，剩余人之父、祖辈皆有做官经历，表明武举及第者大多来源于官宦之家。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笔者认为：由于武举以考察技艺为主，而技艺水平的提高需要长时间的演练，方可达到熟练境界，否则很难通过考试。毕竟唐代武举的考试项目多，难度较大，所以，要想一举登科，必须花费相当的时间和精力在武艺的操练上才可，这是有闲阶层容易做到的事。官僚子弟从小生活在衣食无忧的环境之中，宽松的气氛、充裕的物质条件为其潜心练武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而广大庶民子弟需要为生计忙碌，闲暇时间不多。因此，

---

① 〔清〕孟庆云修、杨重雅纂《中国方志丛书》第259册（江西省），清同治十一年（1872）刊本影印，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第818、862页。

② 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第903页。

③ 《太平寰宇记》卷107《江南西道》五，台北：文海出版社，1980，第54页；《旧唐书》卷40《地理志》三，“饶州”，第1604页。

平民子弟在考试中处于劣势，当可理解。武举及第者的家庭出身还反映出武举设置的目的之一，主要还是为官僚子弟解决就业门路；只是其设置后，为平民子弟的应考也提供了机会，所以在武举及第者中，也有少部分庶民子弟。

另外，在有父祖官位记载的9人中，有5位（董虔运、李侃侃、马元瑒、张晕、郭子仪）父、祖或曾祖辈曾为武官，反映出家庭环境对其子孙入仕途径的影响。一方面，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子弟的兴趣爱好；另一方面，身为武官的父祖，还可以对其子孙的武艺练习提供技术上的指导，这是其他家庭所缺乏的优势。

总之，在唐代，家庭环境和社会身份，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举子的个人前途。

2. 贡举部门

唐代没有设立有关武科的学校，因此也就不存在所谓“生徒”一说。许有根认为：武举初创时，举子来源唯有乡贡一途。应举者有勋官、品子以及普通平民[①]。从上列诸例来看，应武举者身份较之复杂。除许氏所指出的外，还有卫官（马元瑒）、普通士兵（李侃侃、张晕）。诚然，由于武科学校之缺乏，武举只存在乡贡一途。但是，乡贡的部门有哪些？仅地方州县吗？由李侃侃、张晕以士兵身份应举的事实来看（李侃侃投笔戎幕，张晕弃笔从戎），唐代军队也应该是乡贡的部门之一。

高明士根据《通典》卷15《选举典》的记载，认为：“军镇既可委节度使铨试武选，当然也可委节度使课试武举”[②]，也肯定军人可参加武举。但节度使是否可代替兵部主持武举事宜，笔者认为还有进一步考证的必要。

---

① 许友根：《武举制度史略》，第10页。

② 高明士：《唐代的武举与武庙》，第1032页。

3. 举子的来源地区

这些武贡举及第者，除□繇来源地点不详，包思恭可能出生于北方外（其父因慕恋长安，移居北方，故不排除包氏出身于北方的可能），其余 12 人，仅 2 人（廖汾、舒贺）来自南方，且都是安史之乱以后的及第者。造成这种南北地域差异的原因，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

首先，是民族迁徙造成的。众所周知，魏晋南北朝时，众多少数民族入主内地，而且历次民族迁徙和民族融合都主要发生在北方，故使得北方比南方拥有较多的胡族文化特性。史念海先生在谈到关东地区的尚武风气时认为："十六国时期不仅战争频繁，而且各族之间的关系也并非都是正常。元魏继起，战争虽有所减少，各族之间的关系还有待于继续融合。在这样情况之下，关东地区人们的身家性命都会受到影响，只讲文事，殆难应付裕如。迄于唐代前期，这些情况虽早已不复存在，但关东尚武的风气却历久未泯。"① 先生虽只谈到关东地区的尚武原因，但实际上，关陇和关东一样，都是民族融合与民族迁徙的主要场所，"游牧民族在他们入主中原之后，不可避免地将其生活方式、社会习俗带入中原，对中原汉族固有的风俗习惯、思想观念产生深刻影响"②，而尚武是胡族的文化特性之一。

相形之下，南方既没有北方民众所面临的危险形势，又没有北方那样复杂的民族关系。因为，历次民族迁徙，主要是汉人迁往南方，对南方社会的影响和冲击力都不如北方大。这种民族构成的差异性，是导致北方比南方更崇尚武力的原因之一。

其次，是由于统治阶级的差异性造成的。北方自十六国以

---

① 史念海著《唐代前期关东地区尚武风气的溯源》，黄永年等主编《中国古代史论集》，西安：陕西师大出版社，1999，第 458 页。

② 段塔丽著《唐代妇女地位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第 146 页。

来，在绝大多数时间里都由胡族统治，其旧有的思想观念多少都会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下来，并对北方汉人产生一定的影响。虽然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政策，但六镇起义“就基本性质来说，是对孝文帝汉化政策的一大反动”①。西魏宇文泰建立府兵制度，其本身也是一种部落兵制；北齐皇室也是一胡化之汉人。这样的统治阶级状况，无疑会对其统治境内的人民带来一定影响，这也是导致北方胡化盛行的原因之一。即使到了唐代“不仅政权上直接承继了北方鲜卑族为主的北朝帝统，而且立国之后，在社会生活中保留了许多北方游牧民族的习俗文化”②。

与北方受胡族统治、胡化风气盛行的情况相比，东晋南朝时，南方一直是汉人统治。士族门阀观念盛行，而士族向来鄙薄武事，“以立军功为耻”③。东晋南朝“兵士身份卑微”，而北朝兵士的身份“不低于平民和一般部落成员，由于鲜卑是统治民族，又由于军功是致身贵显的途径，军人身份甚至更为高贵”④。南北社会风气和统治阶级构成的差异，无疑会培养出南北方人民对武人两种迥然不同的态度。另外，尽管南朝皇帝都由军人起家，按理应该带动整个社会风气的逆转，但事实上，却没能改变南方人民鄙薄武事的传统观念，故整个唐代，南方武举及第者人数不多。

4. 举子及第后的授官和官历

在这 14 人中，除 5 人及第后的授官情况不明外，其余 9 人，1 人授予流外九品，6 人释褐为官，2 人授予出身；从没能立即

---

① 陈寅恪著《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第 280 页。

② 段塔丽著《唐代妇女地位研究》，第 143 页。

③ 唐长孺：《士人荫族特权和士族队伍的扩大》，《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第 69 页。

④ 唐长孺著《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以下简称《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第 214～215 页。

放选者的家庭背景来看，父辈都没有做官经历。这一授官情况，与制度规定大体吻合。又从有记载的6人之起家官来看，1人授予从九品下之官职，3人授予正九品下的职事官位，2人授予从七品下至正七品下的官职。他们释褐官品的差异，是由其身份和及第等第的不同造成的。另外，他们的初始授官皆为武职，表明武举设置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选拔武官人才。

从这些应武举及第者的官历来看，一般都充任将军、中央事务官、地方官，几乎不能进入中央政务官的队伍，这也成为武贡举出身者的主要迁转系统。另外，从他们的军职迁转来看，终于天宝八载（废除府兵制）之前的武举及第者，一般都在卫府和地方军镇系统内迁转①；卒于天宝八载之后诸人，一般在地方藩镇就职或充任南衙将领，反映出兵制变革对他们升迁经历带来的深刻影响。但是，无论制度如何变化，唐代之武举出身者，都很难跻身北衙禁军高级将领的行列。

另外，在这14位武举登科者中，瞿昙譔、包思恭、张嘉祐、廖汾、郭子仪皆官至三品；舒贺官阶不详，但身为节度使的本身，便表明其职位颇高。其余诸位，董虔运、张晕为中级武官；王濬任宣武军副帅，权势不太显赫。剩余者，夏侯皋历官不详；李偘偘英年早逝；□繼的历官也未能记载完毕。

以上事实与一些学者的观点存在分歧，如许友根认为："在武举、武进士的任用上，往往是在国家多事之秋，将帅乏人之际，委以重任；而在边事浸息，承平日久之时，便视如土卒，甚至弃之不用。"② 从上面诸位的官历来看，并非完全如此。如开元中期的包思恭，官至从三品的右威卫将军；薨于开元二十九年的张嘉祐，也官至三品。然而活动于安史乱后的张晕、诸葛澄、

① 董虔运虽充任过北衙禁军官职，但其一生仍以充任府兵军官为主。

② 许友根著《武举制度史略》，第127页。

王濬、□繼等人，地位却并不显赫。故武进士的能否被重用，在唐代恐怕还与国家的政策导向有极大关系。因为，“隋唐建国，文武合一的关陇集团是其统治阶层，主宰唐朝前期的历史发展。为求文、武平衡发展，有关武事方面的建树（指创立武举和武庙），均集中在唐初到唐玄宗时代……唐朝后半期，关陇集团解体，其所坚持的文武平衡发展，乃受到挑战”①。所以，安史乱后的一段时期内，武举及第者并没有得到朝廷重用，武举甚至也被停废了十年。

武举出身并不必然注定这些人终身只做武官，在一定情况下，他们仍可改充文职，即其官职的迁转并不一定被限制在武职行列，仍可去武就文。如张嘉祐，他有着军官、地方行政官员、东宫、王府官员的经历；瞿昙譔及第后，一直从事天文工作；□繼登科后，任河南尉。表明唐代，文武分途并不严格，尤其是中唐以前。北宋时人宋敏求云：“唐文武参用，袁滋自尚书左丞出华州刺史，召为左金吾卫大将军，如是者数人。”② 而且，国家也从制度上规定了文武官职之间的转换办法：“若文吏求为武选，取身长六尺以上，籍年四十以下，强勇可以统人者。武夫求为文选，取书判精工，有理人之才而无殿犯者。”③

5. 唐代武举的历史地位

唐代武举及第者人数非常有限，这与史料记载的缺乏有极大关系，因为我们实际上很难准确统计出唐代武举及第者的人员数目。但是，整个唐代应武举者人数不多，史料已经有所反映，“其实，武举者，每岁不过十数人”④。为何参加武举考试者人员

---

① 高明士：《唐朝的文和武》，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1998 年第 48 期，第 164 页。

② 〔北宋〕宋敏求撰《春明退朝录》卷上，中华书局，1980，第 13 页。

③ 《通典》卷 15《选举》三，第 360 页。

④ 《（宋本）册府元龟》卷 640《贡举部·条制》第二，第 2105 页。

如此有限？笔者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当与整个国家的政策导向和社会风气有关。玄宗以来，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已经形成。安史之乱以后，“国人仇视外族及其文化的态度，日益坚决”①，崇尚武力，无疑为外族文化的特点之一。另外，由于藩镇割据局面的形成，帝王对武将也产生了防范心理；加之当时全国上下都崇拜文学②，进士科逐渐形成一科独胜之局。在这样的国情民风下，无疑更多的人会选择走文科仕进之路，而不会选择武举入仕。另外，武举及第者所授的官品不高，有的甚至不能直接入仕，还要服役一段时间才能取得铨选资格，这也会影响到人们的应考热情。所以，唐代武举的考试规模不大，武举生源的匮乏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而考试规模的大小，将直接决定其选拔出来的武官数量，以及其对整个唐代武官队伍的影响。唐一代，虽然实行了武举，但是由于其选拔出来的武官数量非常有限，因此，不能从整体上牵动唐代的武官队伍。同时也反映出，唐代武官的选拔，武举不是主要方式。但是其作为一种新的选拔武官的思路，对后世武官选拔却提供了诸多借鉴。

武举属于一种开创性的制度，其延续时间仅次于进士科；另外，以武举出身的郭子仪，在安史之乱期间，有再造唐室之功。仅就此两点而言，唐代武举在历史上的作用就不能过分低估。武举制度创立后，改变了科举制单轨运行（仅文科）的状态，使文武考试制度双轨并行，不仅从总体上完善和发展了科举制度，也为武将的选拔、任免提供了正规的考试程序，使武官选拔向制度化方向迈进。但是，由于唐代武举未能与学校教育相结合，弊

---

① 傅乐成著《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唐代研究论集》第1辑，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2，第261页。

② 龚鹏程：《论唐代的文学崇拜与文学社会》，台湾淡江大学中文系主编《晚唐的社会与文化》，台湾学生书局，1990，第14～24页。

病较多；武官选拔途径的众多，也对武举制度造成了重大冲击；加之受当时重文轻武观念的影响，所以，唐代武举并不兴盛。“五代以来皆以军卒为将，此制久废”①。可见，一种制度创立后，其能否得到顺利实施，不仅在于制度本身的完善与否，还与整个社会大环境密切相关。

第二节　唐代的制举武科

“所谓制举者，其来远矣。自汉以来，天子常称制诏道其所欲问而亲策之”②。可见，制举的特点之一就是皇帝亲策。制科与常科相比，举行时间不定，常常根据政治需要下诏举人。“仪凤后，随着制举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制度。在一次制举的过程中，先后就要发（表）布五道诏敕”。即：一，下令举行某科或某些科目制举的诏令；二，公布应举人考试时间的诏令；三，临试时的诏令；四，录取的诏令；五，制举及第后授官的诏令③。

有关制科的研究，成果已经非常丰富。但是，只有一些文章间接涉及制举武科，而且侧重于科目类别及登科者的数量统计④，缺乏专文系统论述。鉴于目前的研究状况，笔者欲在前辈

---

① 诚刚点校《燕翼诒谋录》卷5，中华书局，1981，第44页。

② 《新唐书》卷44《选举志》上，第1169页。

③ 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第79页。

④ 陈东原著《中国教育史》，列出武类8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第172页；黄留珠著《中国古代选官制度述略》，统计出军武类8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第210页；高明士：《唐代的武举与武庙》，统计出唐共有15个相关科目，39位登科人物，有名字记载的33个，《第一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第1016～1069页；黄新宪著《中国考试发展史略》，统计出唐共有15个相关科目，30多位登科者，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第70页；许友根：《唐代科举科目考述》，《海南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统计出唐代制举军武类共16科，第20页。

学者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充分运用墓志材料，对此问题作进一步探讨。

一　及第人物

笔者所见唐代制举武科及第者事例如下。

1. 张山鳥

“南阳人也”。祖文为，上轻车都尉，“大位不济”；父，不仕。公“起家自举，武艺超绝。越阶授皮氏府旅帅”，乾封元年（666）卒，年五十五[①]。

张山鳥的祖父为勋官，比正四品，但却没有任何职事；父不仕，故张山鳥为庶人身份。按张氏年寿，应于贞观至乾封年间（627～666）登科。及第后，授予折冲府旅帅一职，卫官从八品上[②]。这与制举登科后的授官情况大体相符，制举“文策高者特授以美官，其次与出身”[③]。武制科同属于制举，因此授官情况应与此大体相合。张山鳥一生未能正式除官，因此墓志题名中不言其任何官职。

2. 傅爽

“北地泥阳人”。父良，隋青州别驾太中大夫，河、鄜二州刺史。君“唐右武卫仓曹，应武举，制授游击将军长上果毅”，其孙卒于圣历元年（698）[④]。

此处之武举当指制举，因为贡举意义的武举此时并没有创立。右武卫仓曹参军，文官正八品下；武制举登科后，立即改授武职——果毅都尉（上府，从五品下；中府，正六品上；下

---

① 《补遗》第5辑，第338～339页；《续集》开元058，将墓主人姓名录为张山象，有误，第494页；现据《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山西卷改正，第95页。

② 《旧唐书》卷42《职官志》一，第1800～1801页。

③ 《通典》卷15《选举》三，第357页。

④ 《汇编》圣历003，第924页；《补遗》第2辑，第352页。

府，从六品下）。由“制授游击将军长上果毅”一语来看，傅爽所授当为上府果毅。因为，唐代“五品以上皆制授”[①]。傅爽应举后，官品升了十阶，而且由文官改转武职，表明唐代前期的授官与其出身科目是紧密结合的，果毅都尉也是其一生中的最高官职。

3. **娄师德**

郑州原武人，孟二冬考证出其在仪凤三年应猛士举及第[②]，而之前，其以进士擢第，“上元初，累补监察御史。属吐蕃犯塞，募猛士以讨之，师德抗表请为猛士。高宗大悦，特假朝散大夫，从军西讨，频有战功，迁殿中侍御史，兼河源军司马，并知营田事”。仕历：江都尉－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兼河源军司马、并知营田事－左金吾将军兼检校丰州都督－夏官侍郎判尚书事－同凤阁鸾台平章事等，卒于圣历二年（699）[③]。

娄师德应猛士举后，常参与军事活动，在文武官职之间互相迁转，官至宰相。

4. **黄师**

江夏安陆人，曾祖琬，隋任龙骧将军，岚、蔚、胜三州总管。祖满，唐大理寺丞。父粲，蒙州录事参军事。君“幼挺拔山之力；穿杨落雁，多奇饮羽之能。应辟扬明，超名甲第，诏授左骁卫翊府长上，即于洮河道征”，仕历：左骁卫翊府长上－定襄道检校果毅、昭武校尉－防御副使－游击将军、左卫长上，卒于垂拱元年（685），春秋卅八[④]。

---

① 《通典》卷15《选举》三，第359页。

② 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卷2，第80页。

③ 《旧唐书》卷93《娄师德传》，第2975～2976页；另参见《新唐书》卷108《娄师德传》，第4092～4093页。

④ 《汇编》垂拱016，第739～740页。

孟二冬将其归入武举类[①]，但由武举的创立时间（702）来看，显然有误，笔者认为其应为制科。据其官历来看，显然未能得到重用。

5. **王敏**

“其先太原晋阳人也，因官遂居于洛州永昌县焉”。曾祖安，隋雅州刺史；祖济，隋荆州司马；父才，唐并州户曹。君“言行出俗，勇决过人。巧便刀戟，尤工骑射。仪凤三年，应举及第，解褐以上骑都尉任左领军卫长上旅帅。调露二年（680），别奏定襄军行，得勋上柱国。垂拱元年，授右卫长上。载初元年（689），授右豹韬卫临高府长上果毅。……延载元年（694），应举试高第，授左卫白渠府长上折冲”。后历迁桂永道副使－右鹰扬卫翊府右郎将－明威将军－宣威将军－壮武将军，卒于长安四年（704），春秋六十一[②]。

孟二冬认为，“王氏当为武举及第。以上年有‘猛士举’之诏，当属同类”；对于其延载元年所应科目，孟氏认为当为“临难不顾，徇节宁邦科”[③]。按照志文，王氏首次所应科目确应为武科类，但应为制科，而非武举，因为武举创立于长安二年。王氏登科后，“释褐上骑都尉、任左领军卫长上旅帅”。左领军卫旅帅，从六品上阶，属卫官[④]。最高官至翊府右郎将（正五品上）。

6. **刘仁愿**

“雕阴大斌人也”，高祖，散骑常侍，□远将军、徐州大中正，后徙居关内，“寻除镇北大将军，持节都督河北诸军事，绥

① 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附考·武举》，第1366页。

② 《汇编》长安065，第1037页；《补遗》第6辑，第365～366页。

③ 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卷2，第81页。

④ 《新唐书》卷49上《百官志》四上，左右卫三卫旅帅，从六品上；十六卫内的官员品级一般比照左右卫，故唐右领军卫旅帅也当为从六品上（第1281页）。另参见《旧唐书》卷42《职官志》一，第1797页。

州刺史”；曾祖平，任朔方郡守等职；祖懿，周骠骑大将军等职；父大俱，唐使持节同、绥二州总管、兼四州诸军事、绥州刺史等。公“起家为宏（弘）文馆学士□卫□□”；贞观十九年（645），随太宗征高丽，累前后战功，“超拜上柱国，右武卫□□领飞骑，黎阳县开国公，擢授右武卫凤鸣府左果毅都尉”；“显庆元年（656），迁左骁卫郎将。二年（657），应诏举文武高第，升进三阶”。其一生战功卓著。仕历（为求文字简略，凡官位重复者，不书）：果毅都尉－行军子总管－左骁卫郎将－都护等①。

高明士考证出其所应科目为“勇冠三军·翘关拔山之力、智兼百胜·纬地经天之才”②。刘仁愿在参加制科考试前，官位已经很高（左骁卫郎将，武官正五品上），制举登科后，升了三阶，但所授官职不详。后官至都护（正三品）。《元和姓纂》有其父之记载，云其为“晋右贤王豹之后”③，故刘仁愿为匈奴人的后裔。

7. 王修福

“其先太原人，因官今为晋人矣”。曾祖暹，隋潞州司马；祖忻，唐郑州别驾；父朗，明经擢第，未曾言其做官经历，或许还在吏部待选。公“迺学骑射，妙绝时人。宿卫满，授庆州永业府右果毅。……应举及第，转岐州洛邑府左果毅”。后历转庆州永业府右果毅－岐州洛邑府左果毅－折冲都尉－岳岭军副使。开元四年（716）终，葬于晋州城东南三里之原④。

---

① 《海东金石苑》卷1《唐刘仁愿纪功碑》，《石刻史料新编》地方类第2辑，第15册，第11544～11545页。

② 高明士：《唐代的武举与武庙》，《第一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第1040页。

③ 《元和姓纂》卷5，中华书局，1994，第703页。

④ 《汇编》开元131，第1247页；《补遗》第5辑，第331～332页。

由志文来看，王修福似为武举制科及第；孟二冬也持同样观点[①]。由王修福父祖官位来看，门第不显。由于王氏及第前，已是正员官，故此处之应举，当指制举无疑。登科后，官岐州洛邑府左果毅，最多提升两阶；最高官至折冲都尉。

8. 王仁皎

“太原祁人”，曾祖景孝，隋屯田侍郎；祖诠，赠汾州刺史；父文洎，赠右仆射。公“初以翊卫调同州参军，换晋州司兵。应将帅举，授甘泉府果毅，迁左卫中郎将。上升春宫，后正妃壶，擢将作大匠”。后转太仆正卿，“加特进，礼异群公，乃拜开府仪同三司、策上柱国，封祁国公”，开元七年（719）薨[②]。

《新唐书·王仁皎传》载，王仁皎，“玄宗废后父也。景龙中，以将帅举，授甘泉府果毅”，玄宗登基后，“避职不事”[③]。

王仁皎门第较高，以三卫起家，释褐晋州司兵（从八品下至从七品下），制举登科后，授官甘泉府果毅（正六品下至从五品下），至少升了六阶。一生文武兼资，最高官职为从三品之太仆正卿，散官至一品。

9. 赵洁

“天水人也”，高祖弈，北齐左六骠骑府左车骑将军；曾祖翚，周使持节景州诸军事、景州刺史；祖穆，隋登州别驾、朝散大夫；父澹，光州参军，终于利州司法。“公去垂拱中（685～688）武举

---

① 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附考·制科》，第1342页。

② 《文苑英华》卷913《赠太尉益州大都督王公神道碑》，第4805～4806页；另参见《全唐文》卷230，第2325～2326页。《全唐文》载“换晋州司兵”，而《文苑英华》载“换晋州司马”。从文意推测，王仁皎前为同州参军，只有充任司兵参军，才能称为“换”；充任司马，当为“迁”，故《全唐文》所载合理。

③ 《新唐书》卷206《王仁皎传》，第5845页。

及第，制授左羽林卫长上。……后制举英雄盖伐，词令抑扬，公第以甲，授左领军卫司戈”。仕历：左羽林卫长上－左领军卫司戈－左卫司阶－河南府金谷府右果毅都尉－右卫京兆府平乡府折冲都尉－中受降副使－右金衙（吾）卫河南府宝图府折冲－锦州刺史。“终于夷落”，年六十七[①]。

赵洁高祖、曾祖在北齐、北周时官位较高；及至隋唐，父祖官位明显降低。此处提到的武举，按时间来看应为制举，杨希义也持同样观点，认为“这时的武举可能属制举众科之一，且举停不时”[②]。及第后授官左羽林卫长上（从九品下）；赵氏第二次制举及第，授左领军司戈（正八品下），升了六阶。最高官至锦州刺史，锦州，下州，刺史，正四品下。

10. 公孙思观

“其先辽西襄平人，家代因官，居于河洛”。曾祖信，隋左卫中郎将；祖雄，唐左武侯中郎将、右卫将军；父玄表，历官至湖州武康县令。公“宿卫严廊，年才弱冠。长寿初祀（692），□欲搜扬，公以武艺超伦，其年擢第，敕授翊麾校尉行右金吾卫左司戈”。仕历：右金吾卫左司戈（正八品下）－左监门卫左中候－押官－怀州武德府左果毅都尉员外置同正员－陕州河北府折冲都尉、左羽林宿卫押飞骑上下－右武卫洛州怀音府折冲都尉－郎将－胜州长史、兼充东授降城副使－武州刺史（武州，中州，刺史正四品下），开元七年终[③]。

公孙思观之祖父为右卫将军，三品官，则其有资荫。初在宫中宿卫，制举登科后，授右金吾卫左司戈（正八品下），最高官

---

① 《汇编》开元189，第1288页；《补遗》第5辑，第341页。

② 杨希义：《〈千唐志斋藏志〉中隋唐科举制度中史料辑释》，《中原文物》1992年第1期，第41页。

③ 《汇编》开元100，第1222页；《补遗》第1辑，第99页。

至武州刺史，正四品下。

11. **樊庭观**

“南阳人也”，曾祖刚，隋汾州平遥县令；祖裔，唐贝州司户参军事；父贞，邢州沙河县令。公“曾游太学”，弱冠，以明经擢第。“于时玉塞兵连，金河使断。杖剑聿从于幕府……承资入选，释褐授昭武校尉、左玉钤卫长上，次授□州交水府别将，次授越州浦阳府右果毅都尉。次应举及第，授河南府怀音府右果毅都尉。次授轘辕府折冲都尉。以忧去职。服缺，次授京兆府宣化府折冲都尉，仍充都含嘉仓使。累历戎秩，便烦卫禁，勤效斯彰，忠诚克举。已而征材聘勇，悬艺于四科；超等绝伦，收奇于七札”。开元七年，天兵军节度大使王晙奏充横野军副使，仍摄右卫郎将如故。开元十二年，“暴亡于军城官舍”，年四十六[①]。

樊氏明经及第后，没有参加吏部铨选，而是参加兵部武选，改授武职，释褐授昭武校尉、左玉钤卫长上（从九品下）。官至越州浦阳府右果毅都尉时（上府从五品下，中府正六品上，下府正六品下），两应制举。第二次所应科目由“征材聘勇，悬艺于四科；超等绝伦，收奇于七札”一语看，显然为武科。前后官职变化不大，所任右卫郎将并非正除，而是摄职，故其最高职事官仍是其应举前的折冲都尉。

12. **开承简**

广陵江都人，曾祖靖，隋亳州刺史；祖翼，楚州山阳县令；父德仁，不仕。君“神龙中，故人朔方军大总管韩公初奏君为随军要藉。……到军未岁，解褐授丰安军仓曹”。后历转常州司法、按察支使、宣州溧阳县令。“开元十四年（726）国子博士范行恭举公才堪将率（帅），时中书令燕公以兵权事重，尤难其选，

① 《汇编》开元196，第1293～1294页，《补遗》第1辑，第109页。

乃于数千人中得一二贤俊，公居其首，天下以为美谈。惜乎官未授而卒，时年六十有六”①。

开氏以六十几岁的高龄应武制科及第，但未授官而卒。

13. **萧浮丘**

“兰陵人也”，曾祖瑾、祖丕，“并公侯子孙，陈隋冠冕”。父令思，括州括苍县令。君“书剑两习，艺能双美。解褐授魏州参军。秩满，应将帅举，对策高第。历洛州怀音府别将、温城府果毅、秦州清水府折冲并兼长上，又迁左金吾郎将、巡左使。属罹梁山作难，贬授邵州古限镇将。量移，授润州石头镇将。寻授京兆府明光府果毅兼长上。十八年（730）四月十日，恩敕还旧资，授唐州别驾”，开元十九年（731）卒②。

萧浮丘郡望兰陵，为高门大族。公应制举前，为魏州参军（魏州，大都督府，参军正七品下），文官；登科后，为洛州怀音府别将（别将：上府，正七品下；中府，从七品上；下府，从七品下）。萧氏不可能在制举后降官，故怀音府应为上府，其官品与前相比没有变化，唯一不同的就是做官地点离京城更近。最高官至唐州别驾，唐州，上州，别驾从四品下。

14. **臧怀亮**

“东莞莒人也”，曾祖满，隋银青光禄大夫、海州总管；祖宠，唐朝请大夫、灵州长史；父德，唐朝散大夫、原州司马③。颜真卿所撰《臧怀亮墓志》云，其祖父在隋任骠骑大将军④。公“年廿，应穿叶附枝举，登科，擢左玉钤卫翊府长上”，以后历任要职。仕历：翊府长上－左果毅长上充平狄军都虞候总管－折

① 《汇编》开元389，第1425～1426页。

② 《补遗》第2辑，第495页；《汇编》开元364，第1408页。

③ 《续集》开元098，第521页。

④ 《续集》天宝069，第631页。

冲长上－胜州游弈军副使－左郎将充东受降城副使－安北副都护－单于都护－单于副大都护兼朔方军副大总管－灵州都督、丰安军经略大使－鄯州都督，兼河源军经略营田大使－左威卫将军兼洮州都督莫门军经略营田大使、兼陇右节度副大使－胜州都督兼东受降城大使、朔方军节度副大总管－右武卫大将军、节度河东道诸军州兵马－左羽林军大将军－安东大都护、营府都督摄御史中丞、平卢军节度大使、支度、营田、海运大使。开元十七年，薨于京师，年六十八①。

在李邕为之书写的墓志中，言其“少而习书，长而事武”②，即文武双修。郡望东莞臧氏，颜真卿所写墓志云：“其先寓居朔方，今遂为之人也”③，即新贯为朔方；而且由其父祖已在北方做官便可印证此点。按其年寿推算（古人常用虚岁），应于开耀元年（681）登科，之后，一直在军中效劳，官至正三品。

15. 江璀

“济阳金乡人也”。曾祖□，隋太子少詹事；祖仁友，唐徐州长史；父臣，唐棣州阳信县令。公“常以为文武之道，亦可兼之”，遂投弃笔砚，习以射艺，“始应制科，武艺超绝，举及第。无何，调授左卫翊壹府队正长上”。仕历：左卫翊壹府队正长上－左金吾卫司戈－右金吾卫中候－右领军卫司阶－庆王府典军。开元廿一年（733）终，年五十四④。《登科记考补正》考证出，其在神龙三年（707）制举及第⑤。

江璀的祖父官至徐州（上州）长史，五品。本人弃文从武，以武艺超绝科及第，授官左卫翊壹府队正长上，正第七品上阶，

① 《续集》开元098，第521页。
② 《文苑英华》卷949《羽林大将军臧公墓志铭》，第4991页。
③ 《续集》天宝069，第631页。
④ 《汇编》开元392，第1428页；《补遗》第4辑，第425页。
⑤ 孟二冬著《登科记考补正》，第172页。

属卫官[①]。虽武艺高强，却终身在宫中宿卫或为王府官员。官至庆王府典军，正五品上。

16. **管元惠**

平昌人，曾祖崖，隋青州刺史；父琮，唐成均孝廉。君十五读书，廿学剑，“始，门荫为卫官，寻调左金吾长上。一举武可安边，再举武可戢兵。累践甲科，仍安下位。移武城别将、宜春左果毅都尉”。仕历：左金吾卫长上－武城别将－宜春左果毅都尉－义津等三府折冲都尉－檀州刺史兼障塞军使－邕州刺史等－福州刺史兼泉建等六州经略军使，卒于开元二十六年，春秋七十四[②]。

陈仲安先生考证，管元惠当为翊卫出身，官至左金吾卫长上后，应制举武科登第。之所以“累践甲科，仍安下位”，“当与其门资不高有关，也应与当时‘三卫益贱’，‘入官路艰’的整个形势所谓有联系”[③]。唐开元十五年（727），曾制举武足安边科[④]，故管氏可能于此年及第。后官至福州刺史。

17. **袁仁爽**

“陈郡汝南人也”，五代祖宪，陈尚书右仆射；曾祖承祐，隋朝散大夫秘书丞；祖远，唐冠（军）将军；父文喜，不仕。君“应制天阙，阅武王庭，擢为上第，拜左羽卫长上，转迁宁州麟宝府右果毅。又应举，再登甲科，拜雍州辅德府右果毅。秩满，迁京兆府周城府左果毅，又拜陕郡忠孝府折冲都尉，仍充幽州经略军副使。俄属恩制，加游击将军”。卒年八十一，天宝元年葬[⑤]。

由“阅武王庭”可知，袁氏所应为武科。孟二冬认为，其

---

① 《旧唐书》卷42《职官志》一，第1797～1798页。

② 《补遗》第3辑，第11～12页。

③ 陈仲安：《跋管元惠神道碑》，《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5辑，第52页。

④ 《（宋本）册府元龟》卷645《贡举部·科目》，第2136页。

⑤ 《汇编》天宝020，第1544页。

所应为武举[①]。但笔者据“应制天阙”一语，认为似应为制科。袁氏五代祖袁宪，《陈书》中有传，故袁仁爽为陈朝余绪无疑，家为江南侨姓士族，郡望清高。从其葬地及曾祖官隋秘书丞来看，家在国除之时，已移居北方。然至唐代，家族地位明显下降，父亲不仕。袁仁爽最高官至折冲都尉。

18. 郭敬之

代为太原著姓，“后转徙于华山之下，故一族今为华州郑县人”。曾祖履球，隋金州司仓；祖昶，唐凉州司法；父通，美源县主簿。府君“始自涪州录事参军，转瓜州司仓，雍比府右果毅，加游击将军，申王府典军，金吾府折冲兼左卫长上，原州别驾，迁扶州刺史。未上，除左卫威左郎将兼监牧南使，渭、吉二州刺史。侍中牛仙客韪君清节，奏授绥州，迁寿州。累加中大夫，策勋上柱国”；天宝三载卒于京师，春秋七十八[②]。《郭子仪家庙碑》载其“骑射绝伦，……弱冠，以邦乡之赋，骤应将帅之举，四擢高第有声”[③]。

《登科记考》卷二及高明士皆考证出其在光宅元年（684）应韬钤（或曰武艺驰声、将帅举）及第[④]。郭敬之父祖官位不高，他应制举及第后的授官情况不详，最高官至寿州刺史（寿州，中州，刺史正四品上）。

19. 李（季）广琛

开元二十三年（735）智谋将帅科及第，孟二冬等人对其姓李还是姓季做了详细考证，并考证了其以后的仕历情况，大致而言其官历为：乾元元年（758）五月，为荆州长史；同年八月，

---

① 孟二冬著《登科记考补正·附考·制科》，第1341页。

② 《文苑英华》卷880《郭子仪家庙碑》，第4640～4641页。

③ 《金石萃编》卷92《郭子仪家庙碑》，《石刻史料新编》一般类第2册，第1537～1538页。

④ 〔清〕徐松撰《登科记考》卷3，中华书局，1984，第75页。

自清徐等五州节度使兼许州刺史；九月，又为九节度之一；二年（759）四月，贬宣（温）州刺史；上元二年正月，自温州刺史为宣州刺史、浙江西道节度；大历九年（774），为右散骑常侍[①]。故其登科以后的仕途还是比较发达的。

20. **来瑱**

“邠州永寿人也”。父曜，起于卒伍，官至四镇节度使、右领军大将军等。瑱“颇涉书传。天宝初，四镇从职。十一载（752），为左赞善大夫、殿中侍御史，充伊西、北庭行军司马。玄宗诏朝臣举智谋果决、才堪统众者各一人。拾遗张镐荐瑱有纵横之略，临事能断，堪当御侮之任。丁母忧，以孝闻。安禄山反，张垍复荐之，起复兼汝南郡太守，未行，改颍川太守”。后历转汝南郡防御使、河南淮南游奕逐要招讨等使，南阳太守、充山南东道节度防御处置等使。官至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山南东道节度、观察等使，宝应二年（763）薨[②]。

来瑱一生文武兼资，初在方镇任职，后历任地方军镇长官，升至使相。其在安史之乱中功绩卓著，但因位高权重，受代宗猜忌，后被梁崇义所杀。

21. **崔圆**

“清河东武城人也”，父景晅，官至大理评事。“开元中，诏搜访遗逸，圆以铃谋射策甲科，授执戟”。仕历：执戟－会昌丞－司勋员外郎－尚书郎兼蜀郡大都督府左司马、知节度留后－蜀郡大都督府长史、剑南节度－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剑南节度－中书令－罢知政事－太子少师、留守东都－济王傅－怀州刺史－太子詹事－汾州刺史－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观察

---

① 孟二冬著《登科记考补正》卷8，第325页。

② 《旧唐书》卷114《来瑱传》，第3364～3368页；另参见《新唐书》卷144《来瑱传》，第4699～4701页。

使、检校右仆射、兼御史大夫－检校左仆射知省事。大历三年（768）薨，年六十四[①]。

崔圆门第不高，制举登科后，授以武职，后转文职，一生文武兼资，出入将相，官至真宰相。

22. **郭子仪**

父，敬之，见前。郭子仪以武举及第，后“累以武艺登科为诸军使”[②]。可见，郭子仪是屡应制举武科。但制举及第后的授官情况如何，难以详知。郭氏在安史之乱中发挥出优秀的军事才能，其事迹尽人皆知，故无须赘述。肃宗时为使相，后官至太尉，正一品，薨于建中二年[③]。

23. **胡□**

“御史裴周使幽州日。见参谋姓胡。云是易州人。不记名。项有刀痕。问之。对曰。某昔为番官。曾事特进李峤”。后随孙佺北征，“便随入军”。军败，“更不敢觅官。于寺中洒扫。展转至六十。因至盐州。于刺史郭某家为客。有日者见之。谓刺史曰。此人有官禄。今合举荐。前十月当得官。刺史曰。此边远下州。某无公望。岂敢辄荐举人。俄属有恩赦。令天下刺史各举一人。其年五月。郭举此人有兵谋。至十月。策问及第。得东宫卫佐官。仍参谋范阳军事”[④]。

何为番官？《旧唐书·职官志》二云：“分番上下，谓之番官。”[⑤] 并举出没有品级的“赞者”为例。可见，番官不是品官，

---

① 《旧唐书》卷108《崔圆传》，第3279～3280页；另参见《新唐书》卷140《崔圆传》，第4641～4642页。

② 《（宋本）册府元龟》卷650《贡举部·应举》，第2171页。

③ 《旧唐书》卷120《郭子仪传》，第3450页、3465页；另参见《新唐书》卷137《郭子仪传》，第4600、4608页。

④ 《太平广记》卷169《李峤》，第1237页。

⑤ 《旧唐书》卷43《职官志》二，第1846页。

大体相当于“吏”的身份，因此，胡某在应举之前，并没有得官。石云涛考证出，“胡某为幽州参谋，当在天宝三载”，并认为《登科记考》的考证即胡某在天宝十三载（754）及第的说法是错误的[①]。根据石云涛此条注文，先天元年（712）三月，以孙佺为幽州大都督，代薛讷；六月“庚申，幽州大都督孙佺与奚酋李大酺战于冷陉，全军覆没”[②]。“由先天元年算起，又三十年乃玄宗开元二十九年。胡某于这一年应制举及第”[③]。但是，据史书记载，开元二十九年并没有开设制科，而天宝元年刚好开设制科“军谋越众或武艺绝伦”[④]。故笔者认为，所谓的三十年后，当从先天元年后算起，三十年刚好是天宝元年。因此，胡某应制科及第的时间当为天宝元年。

胡氏制举登科后，授予东宫卫佐官（官品不详），由于当时官职分离，故他并没有在东宫就职，而仍在范阳充当使府僚佐——参谋。但是，“节度使府参谋几乎成了可有可无之闲职。开元中就曾一度废罢。后来文宗开成年间，中书、门下之奏便说‘参谋之职，尤是冗长’，终于罢置”[⑤]。可见，虽制举登科，却并未能在朝廷谋取职位，而是在藩镇就职，地位也较低。

24. 王翃

“并州晋阳人。少治兵家。天宝中，授翊卫尉、羽林军宿卫。擢才兼文武科，出为辰州刺史”。仕历：翊卫尉－辰州刺史－秘书少监－朗州刺史－容管经略使－御史中丞、招讨处置使－金紫

---

① 石云涛：《唐代幕府制度研究》，第95页；《登科记考》卷9，第333页。

② 《资治通鉴》卷210，唐玄宗先天元年二月“幽州大都督薛讷镇幽州二十余年”条及同年六月庚申条，第6672页。

③ 石云涛：《唐代幕府制度研究》第三章注21，第160页。

④ 《（宋本）册府元龟》卷645《贡举部·科目》，第2136页。

⑤ 石云涛：《唐代幕府制度研究》，第95页。

光禄大夫－河中少尹、领节度后务－汾州刺史，振武军使绥、银等州留后－京兆尹－太子詹事－大理卿－福建观察使－东都留守。贞元十八年（802）卒[①]。

王翊文武兼资，初以翊卫尉的身份应将帅举，登科后，出为辰州刺史（辰州，下州，刺史正四品下）；据《旧唐书·王翊传》，“翊自折冲授辰州刺史，迁朗州”故此处的翊卫尉应指折冲都尉（正五品下至正四品上），而登科后原则上不会降官，故王氏可能升了二至四阶，最高官至正三品的大理卿。孟二冬引日本藏〔万历〕《粤大记》卷八，认为天宝时还有一韩翊也“擢才兼文武科”[②]。但是从其个人传记的所述内容来看，显然与王翊为同一人。天宝时，确有韩翊其人，天宝十三载登进士科；德宗时，还有一同名同姓的韩翊，时为江淮刺史，但“未能确考其人”[③]。

25. 夏侯审

《唐才子传校笺》考证出：“建中元年（780）礼部侍郎令狐垣下试军谋越众科第一，释褐校书郎。又为参军，仕终侍御史”；“贞元五、六年（789、790）间为监察御史或殿中侍御史，屡迁至祠部郎中，恐已至贞元中后期。”[④] 可见，夏侯审在登科前无官，及第后，授予校书郎一职（文官从九品上），此后，一直从事文职工作，最高官至祠部郎中（正五品上）。

26. 朱放

南阳人，“大历中，嗣曹王皋镇江西，辟为节度参谋。……贞元二年（786），诏举韬晦奇才。诏下聘礼，拜左拾遗，不就。表谢

① 《新唐书》卷143《王翊传》，第4691～4692页；另参见《旧唐书》卷157《王翊传》，第4143～4145页。

② 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附考·制科》，第1353页。

③ 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卷4，中华书局，2000，第20～29页。

④ 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卷4，第67～70页。

之。忘怀得失，以此自终”①。但是，据傅璇琮考证，朱放当为襄州人，拜拾遗官后，“便起身赴京”，“然朱放赴京后并未就任”，故云“不就”；他大致生于开元中，卒年不晚于贞元四年②。

27. 樊宗师

祖泳，父泽。在韩愈为宗师所撰墓志中，云：宗师“自祖及绍述三世，皆以军谋堪将帅策上第以进”③。表明樊泽与其父樊泳都是应军谋宏远、堪任将帅科及第的。

但是，在樊泳墓志中，未曾言其登武制科一事，只云与王缙、邓景山一道登贤良方正科，历任太原祁县尉、采访判官等职，故韩愈所载可能有误④。另外，孟二冬认为，樊泽也非军谋堪将帅科及第，据两《唐书》本传，当为举贤良对策及第⑤。樊泽官至检校尚书右仆射、节度使。

樊宗师“始为国子主簿，元和三年，擢军谋宏远科，授著作佐郎。历金部郎中、绵州刺史。徙绛州，治有迹。进谏议大夫，未拜卒。……然力学多通解，著《春秋传》、《魁纪公》、《樊子》凡百余篇，别集尚多。韩愈称宗师论议平正有经据，尝荐其材云”⑥。

樊宗师以国子主簿（文官从七品下）的身份登科后，授官著作佐郎（从六品上），文职，升了五阶。其一生并未从事任何军事行动，虽武制举登科，最高成就却在经学方面，为当时的经学大师。可见，当时制举武科选拔出来的人才，已经与其科目脱节。最高官至绵州刺史，绵州、上州刺史从三品。

---

① 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卷5，第342、347、348页。

② 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卷5，第342、343、348、349页。

③ 《全唐文》卷563《南阳樊绍述墓志铭》，第5705～5706页。

④ 《续集》贞元029，第753页。

⑤ 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卷11，第477页。

⑥ 《新唐书》卷159《樊宗师传》，第4953页；另参见《全唐文》卷563《南阳樊绍述墓志铭》，第5705～5706页。

28. 马季龙

“汝州郏城人，其先自右扶风徙焉。父珉，官至左玉钤卫仓曹”。季龙“尝举明《孙》《吴》，俶傥善兵法，官至岚州刺史、幽州经略军使”①。《新唐书·马燧传》亦载：“季龙，举孙吴倜傥善兵法科，仕至岚州刺史”。岚州、下州刺史官正四品下。《登科记考》卷7认为，马季龙在开元九年（721）及第，并举杨若虚、张仲宣、元□之名②。孟二冬也持同样的观点③，然陈飞对此表示异议，但也未能考证出具体的时间④；高明士认为，马季龙可能在景龙年间登科⑤。在没有可靠的史料之前，笔者暂时采用《登科记考》及《登科记考补正》的看法。

另外，还有一些出身和仕历不明的制举武科及第者，如吴思、李商卿，长庆元年（821）十二月辛未，制曰：“军谋宏远，堪任将帅第三等人吴思、第五等人李商卿……宠之命秩，允答嘉猷。其第三等人、第三次等人委中书门下优与处分；其第四次等人、第五上等人，中书门下即与处分。甲申，以登制科人前试弘文馆校书郎庞严为左拾遗……前试太常寺协律郎吴思为左拾遗、内供奉……前乡贡进士李商卿为崇文馆校书郎”⑥。

试官吴思登科后，授予从八品上之左拾遗一职；前乡贡进士李商卿及第等级低于吴思二等，故授予从九品下之崇文馆校书郎一职。他与吴思及第等级相差两等，授予的官品却差了五阶。

通过以上事例，可将史料所见唐代武制科登科者的情况列表如下（见表5、表6）。

---

① 《旧唐书》卷134《马燧传》，第3689页。
② 《登科记考》卷7，第226～227页。
③ 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第721页。
④ 陈飞：《唐代试策考述》，第345～346页。
⑤ 高明士：《唐代的武举与武庙》，第1042页。
⑥ 《（宋本）册府元龟》卷644《贡举部·考试》二，第2128页。

表5　白身类武制举登科及授官情况

人　名	籍　贯	及第后授官	最高官
张山鳥	南阳	皮氏府旅帅（卫官）	卫官
黄　师	江夏安陆	左骁卫翊府长上（从九品下）	游击将军（散阶从五品下）
王　敏	其先太原晋原，今居洛州永昌县	右领军卫长上旅帅（卫官）	翊府右郎将（正五品上）
赵　洁	天水	长上（从九品下）	锦州刺史（正四品下）
臧怀亮	朔方	长上（从九品下）	大将军（正三品）、节度使
江　璀	济阳	三卫队正（卫官）	庆王府典军（正五品上）
袁仁爽	陈郡	长上（从九品下）	折冲都尉（正五品下至正四品上）
崔　圆	清河	执戟（正九品下）	宰相，官职三品
夏侯审	不详	校书郎（从九品下至从九品上）	祠部郎中（正五品上）
李商卿	不详	崇文馆校书郎（从九品下）	不详

表6　官员（包括卫官、吏和试官）武制举登科及授官情况

人　名	籍　贯	及第前身份	及第后授官	最高官
傅　爽	北地泥阳	右武卫仓曹	果毅	果毅
娄师德	郑州原武	监察御史	朝散大夫、职事官未变	宰相
刘仁愿	雕阴	左骁卫郎将	不详	都护（正三品）
王修福	晋	庆州永业府右果毅	岐州洛邑府左果毅	折冲都尉
王仁皎	太原	晋州司兵参军	果毅	太仆卿（正三品）
公孙思观	河洛	宿卫（卫官）	司戈（正八品下）	武州刺史（正四品下）

续表 6

人　名	籍　贯	及第前身份	及第后授官	最高官
王　翃	并州	折冲都尉	辰州刺史	大理卿（正三品）
樊庭观	南阳	果毅都尉	果毅都尉	折冲都尉摄右卫郎将
开承简	广陵江都	宣州溧阳县令	未授官而卒	宣州溧阳县令
萧浮丘	兰陵	魏州参军	别将（从七品下至正七品下）	唐州别驾（从四品下）
管元惠	平昌	左金吾长上	别将	福州刺史
郭敬之	华州	不详	不详	寿州刺史（正四品上）
季广琛	不详	不详	不详	曾为浙江西道节度使、右散骑常侍
来　瑱	邠州	行军司马	不详	使相，检校官至二品
郭子仪	华州	不详	诸军使（不详，五品以上）	宰相，后官至一品太尉。
朱　放	襄州	节度参谋	左拾遗（从八品上）	未就任
樊宗师	河中	国子主簿	著作佐郎（从六品上）	绵州刺史（从三品）
马季龙	汝州	不详	不详	岚州刺史（正四品下）
胡　口	易州	番官	东宫卫佐官、范阳参谋（不详）	东宫卫佐官、范阳参谋
吴　思	不详	试官（试太常寺协律郎）	左拾遗内供奉（从八品上）	不详

二　结论

由以上诸例和表5、表6、附表3，大致可以看出以下问题。

1. 应试者身份复杂

上述事例表明，唐代参加制举武科考试者身份复杂，大体而言有以下几类：第一，庶人，如张山鳥；第二，卫官，如公孙思观等；第三，现役军官，如刘仁愿、王修福等；第四，使府僚佐，如行军司马来瑱、节度参谋朱放；第五，现任文职官员，如王仁皎、樊宗师等；第六，科举落第者，如李商卿；第七，吏或试官，如胡□、吴思。

总之，应试者身份复杂，表明唐代的制举武科是向社会大多数人开放的。无论官僚还是庶民，都有机会应考。对官僚而言，这是其官职升迁的途径之一；对庶民而言，则为他们提供了一条向上流动的途径。在这些应试者中，有部分文官和科举落第者应考，他们所应科目一般为谋略类。显然这是他们利用自身的文化优势，为官职升迁或人仕寻找捷径。因为，他们登科后，很多仍然充任文官，而没有改转武职，樊宗师、李商卿都是如此。

2. 来源地区和家庭背景

在有籍贯记载的25人中，19人来自北方，6人来自南方，造成这种地域差异的原因，大致有三：第一，南北民族特性不同。北方在魏晋南北朝时，常有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并将其崇尚武力的胡族文化特性也带进此地；而南方，历次战乱，主要是汉人大量南迁，对南方社会的影响和冲击力都不如北方大。第二，北方因常遭到游牧民族的侵袭，人民生命财产受到威胁，故被迫修练武事[①]。第三，北朝统治阶级有尚武习气，而南朝士族却鄙

① 史念海：《唐代前期关东地区尚武风气的溯源》，《中国古代史论集》，第458页。

薄武事①。

从有家世背景记载的22位登科者来看，仅2人父祖不仕（张山鸟、袁仁爽）。呈现这种差异性的原因，我们可从制举武科的考试内容来分析。据附表3，唐代制举武科的考试内容可大致分为两类，一是武艺，二是谋略。首先，就武艺的考试而言，正如武举科的考试一样，要想登科，必须花费时间和精力来练武，否则很难及第。这是有闲阶层容易办到的事；对一般平民子弟而言，他们中很多人需要为生计而忙碌、奔波，因此，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物质上，大都不如官僚子弟的环境优越，在考试中处于劣势，也理所当然。其次，就兵法谋略的考试而言，兵法的学习属于文化教育范畴，平民子弟与官僚子弟相比，在这一点上更不占据优势。因为，唐代印刷术不发达，书籍有限，得书艰难②，因此文化的普及率较低。而且，无论是私家教育还是官方教育，提供给官僚子弟的机会要远远多于平民子弟，故官僚子弟登科之机会多于平民，也不足为奇。另外，就父祖在朝为官一点来看，子弟登科后，释褐的机会也较平民多，“名族人物既罗布朝列，左提右契，子弟登庸之机会自胜于寒人”③。虽然这些登科者父祖未必都是名族，但仅就在朝为官一点来看，在社会关系资源方面，也较平民子弟占据优势。

此外，有许多为文官子弟应武制科，显示出文武官僚家庭内部在职业上仍具有一定的流动性。但这也从另一角度折射出，由

---

① 唐长孺：《士人荫族特权和士族队伍的扩大》，《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第69页；唐长孺著《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第214～215页。

② 孙国栋：《唐宋之际社会门第之消融——唐宋之际社会转变研究之一》，《新亚学报》第4卷第1期，1959年，第223页。

③ 孙国栋：《唐宋之际社会门第之消融——唐宋之际社会转变研究之一》，《新亚学报》第4卷第1期，第220页。

于文科考试竞争的激烈，一部分文官子弟为了寻求做官的捷径，才选择了武制科。因为安史乱后的武制科及第者，绝大部分都是授予的文官，武制科选拔将帅人才的目的，已经发生了变质，这将在后面分析。

3. 开科情况

对于唐代制举科目，陈飞从广义的角度将其分为“制目”和“试目”两类，“制目一般只表明天子所欲选择的人才类型，但未必能够完全得到执行；试目则表明已经得到落实，但未必与制目完全一致”；并统计出“其全部数量多达982个，其中制目688个，试目294个”①，文科类占据多数。笔者借鉴陈先生广义的制举概念，运用其已有的《唐代制举科目年表》（简编）②，并借鉴高明士先生所列唐代制举武科表格③，列成附表3。

高明士将岳牧举归入武科类，笔者认为其可能是出于考试内容而言的；不过陈东原、侯绍文、许友根等人将岳牧举归入吏治类④。两相比较，笔者更倾向于后者，因为在所收集到的史料中，凡岳牧举登科者皆授予文官，如员半千，高宗“上元初，应八科举，授武陟尉。……寻又应岳牧举”，“擢为上第。垂拱中，累补左卫胄曹，仍充宣慰吐蕃使”，其一生从未任过武职⑤。殷楷“高宗朝四岳举高第，释褐拜雍州新丰尉，累迁大理丞。天授中（690～692）以议狱平反，为酷吏所陷，贬台州永宁丞”，也

① 陈飞：《唐代试策考述》，第251、262页。

② 陈飞：《唐代试策考述》，第296～416页。

③ 高明士：《唐代的武举与武庙》，《第一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第1040～1046页。

④ 高明士：《唐代的武举和武庙》，《第一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第1041页；陈东原：《中国教育史》，第172页；侯绍文著《唐宋考试制度史》，第45页；许友根：《唐代科举科目考述》，《海南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第20页。

⑤ 《旧唐书》卷190中《员半千传》，第5014～5015页。

未充任过武职[①]。左光胤“初以国子进士擢第，是岁复以岳牧举策高第，制授濮州鄄城主簿”，仕历：濮州鄄城主簿－曹州济阴尉－秘书省正字－河南府河清主簿，天宝二年终[②]。

但是许友根所归纳的军武类科目（16科）也未必全然准确，如其中的超绝科和绝伦科未必指的是武艺或谋略，而真正的武科则标明有武艺绝伦等字样。故在科目的取舍标准上，笔者基本上采纳高明士的观点，将文武合一类的科目纳入武科。而在科目数量的统计上，则采用陈飞广义的制举概念，将唐代制科分为制目和试目两类。从附表3可知，安史乱前的武制科制目有23个，试目17个，共40个；安史乱后的武制科制目有24科，试目9个，共33个。从时段（前期618～755；后期755～907）来看，前期的开科频率要高于后期。但事实上，从文宗大和二年至僖宗光启元年（885），将近60年的时间唐代没有开设武制科举人（见附表3）。其间原因，因史料不足，还有待于未来之研究。

由附表3可知，唐代开设制举武科有一定的规律可循，一是在帝王初即位时开科举人：如武则天光宅元年临朝称制，玄、肃、代、德、穆、敬宗皆是如此。二是在发生重大战事之际，通过制举的方式选拔将领：如高宗朝，从仪凤元年至调露元年（676～679）连续四年开设武科，当与战争形势有很大关系。因为仪凤元年闰三月，吐蕃侵扰唐朝边境，之后连续两年唐与吐蕃进行了大规模的战争[③]；调露元年，因突厥起事，唐朝又发三十万军队攻打突厥[④]。肃宗朝，适逢安史之乱，国家急需军事人

① 《全唐文》卷624《大平军节度使殷公家庙碑》，第6303页。

② 《汇编》天宝037，第1555页。

③ 《资治通鉴》卷202，唐高宗仪凤元年三月“闰月，吐蕃寇鄯、廓、河、芳等州”条，第6379页；唐高宗仪凤二年（677）十二月“命刘仁轨镇洮河军“条，第6384页；同书同卷唐高宗仪凤三年九月丙寅条，第6385页。

④ 《资治通鉴》卷202，唐高宗调露元年十一月癸未条，第6393页。

才，故开科频繁。所以，制举武科之开设，或是应时务之需，或是新帝王为了显示自己的有所作为，故开科选拔天下人才。

另外，我们还能见到一些有关武制科的试策内容，如“知合孙吴可以运筹决胜策”，杨若虚、张仲宣有对策[①]；“沈谋秘略科策”三道，王昂有对策[②]。从这些策问内容来看，一般的将士显然无法应考，因为他们的文化水平有限。可见，谋略类的武制科科目，倒是为文人应考提供了便利，成为他们升迁或入仕的阶梯。

4. 及第后的授官

由以上事例可知，安史之乱以前，凡应制举武科及第者，一般授予武职（武官或卫官），即使他们之前是文官，登科后一般也改从武职，充分体现了武制科选拔将帅的目的。但是，安史乱后的情况则发生了重大变化，很多制举武科及第者，一般授予文官，而且是清显的职位，以后也大多终生充任文官。这种极度反差，表明唐代制举武科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笔者看来，这种现象主要是两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是重文轻武的观念影响。如崔圆，开元年间武制举登科后，“授执戟。自负文艺，获武职，颇不得意”，后来改从文职[③]。二是与帝王对军人的猜忌有关。众所周知，德宗猜忌武臣，故其可能不愿将这些武制科及第人士差遣至部队担任将领。

附表3中所列30人中，登科前为非官员者10人，官员20人，其中，郭敬之、季广琛、郭子仪、马季龙登科前官职不详。以上诸位登科后的授官情况如下。

---

① 《文苑英华》卷478，试策内容主要为：一，关于安边御敌之术；二，对前朝将领的评价，第2439～2443页。

② 《文苑英华》卷480，第2451页。

③ 《旧唐书》卷108《崔圆传》，第3279页。

第一，白身类。张山鬲、王敏、江璀3人授予卫官，其余7人授予九品职事官。表明白身制举登科后，一般授予九品官职。另外，我们从《为邵翼作上张兵部书》一文可知，制举登科后，有“待罪末品，参一旅之长，受偏师之任”的可能，即授旅帅之职（卫官），这与张山鬲、王敏、江璀的授官情况相符。故白身武制举登科后，或仅能获得出身（如授予卫官），或释褐为九品官职，这是当时的常见现象。

第二，官员类。卫官和试官登科后，一般授予八品官职；职事官登科后，官品则在原有基础上有所上升，如刘仁愿，在原官品基础上升进了三阶。

另外，还可看出，武制举登科后，主要由兵部侍郎授官[①]。但是，安史乱后的很多武制举登科者却授予文职，无疑其应由吏部授官，反映出安史乱后，兵部选拔武将权力的削弱，其任命官吏的职能有被吏部合并的趋势，其间也暗含着武制科性质的变化。

总之，安史乱前的武制举登科者，尚能安插到军事部门，充任军职，体现出国家选拔将帅的目的。但安史乱后的武制举登科者，则以充任文官为主，而且是授予一些清显的职位，如学官、中央谏监官，唯个别例外，这就使得武制科的存在价值受到质疑。

5. 任官情况

从任官经历来看，有仕历记载的27人中，2人终身未能释褐为官，官至五品以上者22人，其中，娄师德、崔圆曾为国家宰相，郭子仪曾为使相。这种状况，反映出制举及第者一般皆能升至五品，仕途相对较为平坦。朱放未能入仕，是自己主动辞官的结果。张山鬲终生未仕，可能与其父祖无官有关。官场或许如

① 《文苑英华》卷670《为邵翼作上张兵部书》，第3445～3446页。

贾雄所言："仕无中人，不如归田。"[①] 因为，"唐代除门第因素外，出现科第等因素，任何单一因素率皆由下品官入仕，在其有生之年升至中品官，极其可能，若想官拜上品，则需要有额外因素或遭逢特殊机缘。官宦的腾达，其所以由一项因素发展成多项因素，原因甚多，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圈内竞争'"[②]。高官子弟登科后，在圈内竞争中无疑处于优势地位。

安史之乱前，这些及第人士一般以充任地方官或中央事务官为主，难以进入中央政务官行列（仅娄师德）。而安史乱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开始进入政务官行列，如崔圆身任宰相、夏侯审升至祠部郎中、樊宗师就任金部郎中等。而且，安史乱后还有一特殊现象，即乱后登科者，或授予学官，如夏侯审、李商卿释褐校书郎，樊宗师及第后官拜著作佐郎，或授予谏监官，如吴思、朱放授予左拾遗。其中，左右拾遗、著作佐郎属于清官[③]，校书郎属于次清官[④]，表明安史乱后制举武科及第者在授予官职方面，实际上较安史乱前清显，以后的仕途也较乱前为佳。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这里存在的问题，即武科及第人物充任文官，在文官系统内进行迁转，而没有相应地充任武官，为军队服务。这暗示着科目性质的变化，虽云武制科，却是为文官队伍招揽人才，不向军队提供后备力量，这种机制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军队的建设和发展。帝王不重视军将的本身，便向世人表明唐代军人的地位较安史乱前下降。

从教育的视角看，唐代很多人文武（指武艺，非兵家）兼

---

① 《续集》开成005，第927页；《补遗》第3辑，第203页。

② 毛汉光：《唐代大士族的进士第》，《中研院成立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1978，第594页。

③ 《大唐六典》卷2"尚书吏部"，第34页。

④ 毛汉光在《唐代荫任之研究》一文，将其归属于"次清官"类，《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第55本第3分，第466～467页。

修，如刘仁愿虽为有名的武将，却是由“弘文馆起家”，接受过正规的文化训练；臧怀亮，“少而习书，长而事武”；江璀亦认为：“文武之道，亦可兼之”，后投笔从戎；萧浮丘，“书剑两习，艺能双美”；樊庭观“弱冠明经擢第，后弃笔从戎”；管元惠，“十五读书”，“廿学剑”。这些文武双修者大部分集中在安史乱前，反映了唐前期的教育还没有完全向文科倾斜。正是由于这些武将接受过文化教育，故素质较高，在所列诸人中，皆官至五品。而安史之乱后，文武双修者少见。这可能与整个唐代的社会风气和国家的政策导向有关。唐代，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在玄宗时期已告明朗，当时进士科逐渐形成一科独胜之局[①]，故更多的人专注于文化知识的学习，走文科仕进之路，而不是以武人仕。这样的文化氛围必然影响朝廷对军事将领的选拔，影响人们的从军热情。

从文武官职的迁转来看，这些武制举登科者中文武兼资的较多，如公孙思观、赵洁、郭敬之、崔圆、刘仁愿、王仁皎、萧浮丘等，充分反映出唐代通才型官僚体系的设计思路[②]，这也与唐代文武参选的社会状况相符。因为，唐代前期，国家从制度上规定文武官职之间可以互相转换[③]。但是，从武周开始崇重进士科以来，文武分离的趋势也就日益明显，重文轻武的社会风尚日渐严重，至晚唐僖宗时，朝廷甚至明令禁止文武官职之间互相改转。广明元年（880）诏令：“人仕之门，兵部最滥，全无根本，颇坏纪纲。近者武官多转人文官，依资除授，宜惩僭幸，以辨品流。自今后武官不得转人文官选改，所冀轮辕各适，秩序区分，

① 龚鹏程：《论唐代的文学崇拜与文学社会》，《晚唐的社会与文化》，第14～24页。

② 卢建荣：《唐代财经专家之分析——兼论唐代士大夫的阶级意识与理财观念》：《中研院史语所集刊》1983年第54本第3分，第157页。

③ 《通典》卷15《选举》三，第360页。

其内司不在此限。”[①] 这虽有政治的因素，但此诏无疑会更进一步加深文武之间的隔阂和对立。

安史之乱结束前，确实选拔出了不少有名的将领，如刘仁愿、臧怀亮、崔圆、来瑱等。安史乱后，由于形势的急剧变化，社会上重文轻武观念的影响，以及帝王对军人态度的逆转，使得大部分武制科及第者被授予文职，而不是领军作战。这样，武制科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理由，遭到废除成为历史的必然。

本章以上论述归纳如下。

第一，唐代武举与武制科都是通过考试程序来选拔武将，但是，二者在考试内容、选拔武将所发挥的作用上存在差异。武举主要考试技艺，武制科的科目类别则有一定的灵活性与机动性，大体分为技艺和谋略两类。反映出开设武举的目的主要是选拔一般军官，武制科则主要为了选拔领兵统帅。武举为常科，原则上每年举行一次；而制科举行时间不定。因此，武举在选拔武官方面的作用，无疑大于武制科。而且，安史之乱以后的武制科，基本上与武将选拔脱节，主要为文官队伍招揽人才。

第二，由这两种途径入仕，登科者绝大部分都来自北方，而且大部分为官僚子弟，反映出个人入仕受家庭和社会环境双重因素的影响。

第三，科举入仕对武官而言，并不是入仕的主流途径，因为一方面应试者数量有限，另一方面它只注重武艺的表演和纸上谈兵的功夫，缺乏实战经验。因此，在战乱时期，这种入仕途径容易受到军功入仕的冲击。五代时期，无论是武举还是武制科都难以见到，不能不说与此有极大关联。

---

① 《旧唐书》卷19下《僖宗本纪》，第705页。

第五章　唐代中后期方镇使府武职僚佐的辟署制

所谓“中后期”，在本文特指安史乱后至唐代灭亡的这一时段，因为节度使体制的成立，是早在安史之乱以前的事。为了研究方便，笔者特将时段放在安史之乱以后。这一时期之方镇使府，主要指节度使、观察使、经略使和都团练、都防御使府。至唐代后期，东都留守也幕府化[①]。根据石云涛对唐代幕府制度类别的划分[②]，笔者在研究中，为了避免概念混乱，主要探讨藩镇幕府，其余幕府制度，概不涉及。

辟署制是唐代中后期藩镇选用文武僚佐的一种典型用人制度，长期以来，学界对此问题的探讨不断深入，而且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尤其以严耕望、砺波护、张国刚、卢建荣、戴伟华、石云涛、渡边孝等人的成果为代表（见《绪论》综述部分），但其内容主要集中在文职僚佐的辟署和武职僚佐的职名、

---

① 石云涛著《唐代幕府制度研究》，第233页。

② 石云涛著《唐代幕府制度研究》将唐代的幕府制度分为唐前期的行军幕府、开元天宝时期的边镇幕府、唐后期的行营统帅幕府、唐后期的藩镇幕府几类；而且认为，唐代幕府有下列形式：（1）总管府，后改为都督府；（2）大都护府；（3）经略使府；（4）节度使府；（5）观察使府；（6）团练防御使府；（7）诸使；（8）兵马留后；（9）两京留守；（10）盐铁、度支及场院使；另外，石氏认为：州县僚佐“不能作幕职看待”，见其目录及39~40页。

职级考证上，忽略了对武职僚佐辟署问题的研究。陈志学《唐代武官的入仕途径》一文，虽专门谈到武职僚佐的辟召问题，但碍于篇幅限制，仅寥寥数语，未能展开系统论述[①]。结合以上研究，笔者欲重点探讨安史乱后方镇使府武职僚佐的辟召问题，包括辟署方式·对象、武职僚佐的官职奏请·迁转及社会构成。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有助于了解唐代藩镇内部的军事人员结构、中央和地方藩镇在军队用人权方面的消长关系及其对唐代政局所造成的影响。

第一节　辟署方式及对象

唐代方镇使府武职僚佐主要包括都知兵马使、正兵马使、副兵马使、都虞候、虞候、都押衙、押衙、都教练使、教练使、十将、副将、散兵马使、散十将等[②]。与文职僚佐的辟署相比（他们都是方镇主动辟请来的，原则上要求有一定的出身，一般而言是科举及第者或前资官、现任、现选官员[③]），武职僚佐的辟署方式和对象则与之有一定程度的不同，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　辟署方式

唐代中后期，藩帅辟用将佐，一般采用如下几种方式。

1. 藩帅主动辟请

如德宗贞元时，襄阳节度使樊泽主动辟请史用诚，“由褥礼

① 陈志学：《唐代武官的入仕途径》，《中华文化论坛》2002年第3期，第64页。

② 张国刚：《唐代藩镇军将职级考略》，《唐代政治制度研究论集》，第163～171页。

③ 石云涛：《唐后期有关方镇僚佐辟署对象的限令》，《唐研究》第三卷，第274～277页。

以接之，选右职以署之”[1]；元和年间，侍中彭城公“以缯帛数辈厚致”周玙，周氏“至则忻然”，乃授其散兵马使一职[2]；卒于乾符四年（877）的师弘礼，“司空陇西公之节制鄜畤也，知公而特请行焉。到郡，补节度押衙”[3]。

2. 被辟者旅居方镇或投奔藩帅而被辟召

如蔡雄，安史之乱期间，“来游蓟门。获前连帅朱公上宾待之，署幽州卢龙节度押牙”[4]；卒于大和四年（830）的张遵，“年廿，亲裴氏怀恋伯兄，遣省伯舅于镇州”；镇帅王公见之，“与语良久，便授押衙”[5]。论博言，“大和初，由咸镐抵关东，太保李公一见欣然，署幽州节度散兵马使”[6]。

3. 公开招募才能之士

如咸通十一年（870），闻蛮寇将入成都，西川节度使卢耽与前泸州刺史杨庆复，针对“将士不习武备”的现状，“揭牓募骁勇之士，补以实职，厚给粮赐，应募者云集”[7]。唐林景玄，“京兆人，侨居雁门，以骑射畋猎为己任。郡守悦其能，因募为衙门将”[8]。

4. 因军功而署以军职

如唐僖宗乾符二年（875），“浙西狼山镇遏使王郢等六十九

---

① 《文苑英华》卷910《唐左羽林军大将军史公神道碑》，第4787页。

② 《补遗》第3辑，第234页；《续集》大中056，第1009页。

③ 《汇编》广明001，第2499页；《补遗》第1辑，第425页。

④ 《续集》贞元074，第787～788页；《补遗》第4辑，第475～476页。

⑤ 《续集》大和032，第905页；《补遗》第4辑，第129～130页。

⑥ 《补遗》第7辑，第141页。

⑦ 《资治通鉴》卷252，唐懿宗咸通十一年正月“西川之民闻蛮寇将至”条，第8153～8154页。

⑧ 萧逸校点《宣室志》卷8，《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第1053页。

人有战功，节度使赵隐赏以职名”①；乾符五年（878），“王郢之乱，临安人董昌以土团讨贼有功，补石镜镇将。……临安人钱镠以骁勇事〔董〕昌，以功为石镜都知兵马使”②。

5. 由他人推荐

如德宗时名将李晟，推荐朱忠亮“于浑瑊，署定平镇都虞候”③；卒于咸通丙戌岁（七年，866）的张周抗，经丞相推荐，“持函来见府主，署兵马使”④。府主即藩帅，此函显然为推荐人所写。

6. 因亲戚、故旧关系而被辟召

如卒于元和九年（814）的吴少阳，“初，吴少诚父翔在魏博军中，与少阳相爱，及少诚知淮西留守，乃厚以金帛取少阳至，则名以堂弟，署为军职，累奏官爵”⑤。令狐梅，元和十二年（817），伯舅“作镇义成，取以为节度押衙”⑥。卒于广明元年（880）的柳延宗，从舅淮南节度使燕公“署〔之〕西川节度押衙，授殿中侍御史”⑦。

可见，唐代藩镇的辟署方式大体有：藩帅主动辟请、被辟者主动投奔、公开招募、军功、他人推荐和依靠社会关系等。显然，能够被藩帅辟请的原因，除才能因素外，社会关系在其间也起着强有力的作用。

---

① 《资治通鉴》卷252，唐僖宗乾符二年四月“浙西狼山镇遏使王郢等六十九人有战功”条，第8178～8179页。

② 《资治通鉴》卷253，唐僖宗乾符五年十二月“王郢之乱”条，第8210页。

③ 《旧唐书》卷151《朱忠亮传》，第4056页。

④ 《汇编》广明003，第2501页；《补遗》第7辑，第425～426页。

⑤ 《旧唐书》卷145《吴少阳传》，第3947页。

⑥ 《补遗》第6辑，第168～170页；《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14，第55页。

⑦ 《汇编》广明004，第2501～2502页；《补遗》第1辑，第426页。

二　辟署对象

石云涛考证出：肃、代之际，“肃宗对防御使僚佐的辟用在地域和身份上作了‘本州官’的明确规定”，而且，禁止藩镇辟用中书、门下两省供奉官及谏官[①]。与文职僚佐的辟署相比，武职僚佐的辟署对象相对较为灵活，情况大致如下。

1. 现任官员

如卒于贞元二十年（804）的卢翊，被辟之前，为楚州宝应县主簿，淮南节度使张公“作镇淮泗，弹压海岱，幸公亲贤，屈以副贰，署公都押衙同节度副使、泗州都团练兵马使”[②]；卒于元和四年（809）的吴少诚，以王府户曹参军的身份入幕荆南节度，“留为衙门将”[③]；刘全谅“以父勋授别驾、长史。建中初，刘玄佐为宋亳节度使，召署为牙将”[④]。

2. 前资官

如卒于开成三年（838）的柳正封，“以吏部常选授陈州宛丘县尉”，“异藩知公有运策之谋，钦公有诀胜之计，才罢历住（任），牒书忽来，署灵州节度押衙兼太子宾客”[⑤]。卒于贞元十五年（799）的张任，“从勋荫调集，受太常寺主簿。居无何”，父死守丧，“三年血泣。终制之日，屏居深山”，“豳公聆其风而辟焉，署河东节度左马军使，兼掌牙卫”[⑥]。卒于咸通十三年（872）的郭克全，吉州长史任后，“称疾退闲数载”，后来，“相国范阳卢公出镇汉沔，知公才敏有方，委以腹心。遂投笔署充当

① 石云涛著《唐代幕府制度研究》，第239页。
② 《汇编》贞元133，第1935页；《补遗》第1辑，第249页。
③ 《旧唐书》卷145《吴少诚传》，第3945页。
④ 《旧唐书》卷145《刘全谅传》，第3938页。
⑤ 《汇编》开成031，第2190页；《补遗》第1辑，第317页。
⑥ 《续集》贞元055，第773页。

府节度押衙，知臼口巡务”①。

3. **有出身者**

如张谅，曾祖，唐恒王府参军；祖，殿中侍御史；父，黎州刺史，充本州招讨使。“公即使君长子也”，“后以选部有期，将荣结绶，未几，丁使君丧”。从这寥寥数语，便可判定，张谅已经取得了铨选资格。至咸通年间，其舅建节秦州，张谅便不远千里来投拜，于是其舅便为之“奏职牙庭”，寻授“殿中侍御史，充天雄军节度九军都知兵马使”②。

4. **军将子弟**

如高霞寓，“初效质贞元中故太师彭郡刘公，以名家子擢充补步军副将”③；卒于大和九年（835）的杨孝直，“生于将门，幼习武略，故王令公武俊临镇之岁，从事戎旃，获居将校”④。

5. **他镇武职僚佐**

如同州押衙兼兵马使萧君，贞元初，韩滉辟为上将，“克镇江浒”；四年（788），宣歙都团练使刘赞又“奏充右厢兵马使兼押衙守右卫率府率”⑤。另外，节度使移镇时，也可以带领部分将校随从，如卒于咸通十二年（871）的郭克勤，“范阳卢公出镇回中。署公为军职焉。后迁□镇，皆委以腹心，视为耳目”⑥；卒于宝历二年（826）的郑仲连，“右仆射孟公董戎三城，署公都虞候，转河清镇遏兵马使。洎孟公移镇泽潞，公又随之，充节度押衙兼府城都虞候”⑦。

---

① 《续集》咸通092，第1105页；《补遗》第3辑，第274页。

② 《汇编》咸通037，第2407页；《补遗》第1辑，第390～391页。

③ 《汇编》大和066，第2144页。

④ 《汇编》大和090，第2160页。

⑤ 《汇编》永贞004，第1943页；《补遗》第7辑，第74～75页。

⑥ 《续集》咸通091，第1104页。

⑦ 《汇编》宝历019，第2092～2093页；《补遗》第4辑，第114页。

6. **白身**

如“术者李琢能言祸福”，藩帅刘从谏“辟署大将”①；方士吕用之“坐妖党亡命归〔高〕骈，骈厚待之，补以军职”②；渔师雷满有勇力，“荆南节度使高骈擢满为裨将，将镇蛮军从骈淮南”③。

7. **罪人及盗贼**

如元和年间，董重质得罪被斥，武宁军节度使李愬“请赐军中自效，许之，乃署为牙将”④；咸通四年（863），“南诏陷安南，敕徐泗募兵二千赴援，分八百人别戍桂州”；都虞候许佶、军校赵可立、姚周、张行实“皆故徐州群盗，州县不能讨，招出之，补牙职”⑤。

总之，武职僚佐的辟署，没有严格的身份限制，从整体来看，其群体素质较文职僚佐低下，人员混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中晚唐军人的地位，这可能也是其得不到文官群体尊重的原因之一；另外，武职僚佐的辟署不受地域限制，他们可以先后接受不同藩镇的辟请，加强了藩镇之间的横向交流。

第二节　方镇使府武职僚佐的官职奏荐及迁转

在藩镇兵制下，并非所有的武职僚佐都具备奏请官职（指

① 《新唐书》卷214《刘从谏传》，第6019页。

② 《资治通鉴》卷254，唐僖宗中和二年（882）四月“初，高骈好神仙”条，第8264页。

③ 《新唐书》卷186《邓处讷传》，第5421页。

④ 《新唐书》卷154《李愬传》，第4877页。

⑤ 《资治通鉴》卷251，唐懿宗咸通九年（868）六月“初，南诏陷安南”条，第8120～8121页。

试官、检校官、职事官和宪官）的资格，因此，那部分可以被表奏者，无疑成为武职僚佐的上层，从而与仕宦发生联系。而低级武职僚佐，必须经过迁转，达到一定职级后，方有奏官资格。所谓职级，“就是军将升迁的职位等级”，主要有都知兵马使、正兵马使、副兵马使、都虞候、虞候、十将、副将；而这些职级序列的形成有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故“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都知兵马使以下的各级军将仍然保留使职的形式，一般仍必须带禁卫军将军以至府兵军将的称号，以表示其地位的升迁”①。

一　方镇使府武职僚佐的官职奏请

1. 武职僚佐官职奏请的混乱期（安史之乱至穆宗长庆元年，755～821）

安史之乱爆发后，由于战争事急，很多旧制度都遭到严重破坏。乱后，人员任免的一些非常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遗留了下来，而新制度还未酝酿成熟。故乱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将士官职的表奏和迁转都处于混乱状态。这也与当时的社会大环境有关，因为“藩镇对抗朝廷最激烈的时期是在宪宗以前”②。这种制度混乱表现在：

> 至德以后，天下用兵，诸将竞论功赏，故官爵不能无滥。及永泰以来，天下稍平，而元载、王缙秉政，四方以贿求官者相属于门，大者出于载、缙，小者出于卓英倩等，皆

① 张国刚：《唐代藩镇军将职级考略》，《唐代政治制度研究论集》，第157、159、162页。

② 〔日〕堀敏一：《藩镇亲卫军的权力结构》，《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4卷，第587页。

如所欲而去。及常衮为相，思革其弊，杜绝侥幸，四方奏请，一切不与；而无所甄别，贤愚同滞。崔祐甫代之，欲收时望，推荐引拔，常无虚日；作相未二百日，除官八百人，前后相矫，终不得其适。[1]

〔贞元〕四年二月敕：诸道幕府判官、及诸军将，比奏改官，例多超越。应从散秩入清望官，并折资处分。[2]

杜佑亦云："天宝以后，边帅怙宠，便请署官，易州遂城府、坊州安台府别将、果毅之类，每一制则同授千余人，其余可知。虽在行间，仅无白身者。"[3]

以上史料表明，由于缺乏制度约束，当时藩镇武职僚佐的官职奏请弊端重重。尽管贞元四年，朝廷下令减缓将士改迁官职的速度，但仍没有对各藩镇表奏武职军将的人员数目做出限定。因此，淮西之乱平定后，"李愬奏请判官、大将以下官凡百五十员；上不悦，谓裴度曰：'李愬诚有奇功，然奏请过多。使如李晟、浑瑊，又何如哉！'遂留中不下。"[4]

显然，这是制度不完善导致的结果。若政策明文限定各道表奏人数，李愬就不可能为如此众多的将士奏请官职；同时，也好用制度对将士作交代。所以，在中央、地方关系较为紧张的唐代

---

① 《资治通鉴》卷225，唐代宗大历十四年（779）五月"常衮性刚急"条，第7257～7258页。

② 《唐会要》卷78"诸使杂录"上，第1440页；《（宋本）册府元龟》卷630《铨选部·条制》第二，载"贞元四年正月一日诏"，二者在时间上存在差异，第2031页

③ 《通典》卷148《兵》一，第3780页；另参见《资治通鉴》卷222，唐肃宗宝应元年（762）五月"史朝义自围宋州数月"条胡注，第7127页。

④ 《资治通鉴》卷240，唐宪宗元和十三年（818）二月"李愬奏请判官"条，第7748页。

中后期，如何处理好朝廷与藩镇的关系，规范武职军将的改迁制度，显得尤为必要。

经过宪宗时期的一系列平叛战争和晚年的军制改革（819），中央的权威在某种程度上又得以树立，因此，朝廷不断下令对武职僚佐的官职奏请和迁转进行规范，逐步推进地方藩镇的中央化进程。

2. 奏请官职的法令修正期（长庆二年至黄巢之乱前，822～875）

（1）从职级上对奏官对象做出限定。

穆宗长庆二年敕略云："其职名是兵马使、都虞候、押衙以上，前后并未曾奏官者，亦仰量绩效奏官。"① 即职级达到兵马使、都虞候、押衙以上，还未曾奏官者，可以向朝廷奏请官职。由于诏敕没有奏官人数的限制，"于是商贾、胥吏争赂藩镇，牒补列将而荐之，即升朝籍。唐末藩镇列将带朝衔者，著之朝籍"②。而当时"方镇嗜利者，即以大将文符给之，伪其职秩。年月未几，则求荐闻。必曰：某以岁久，宜迁；某以殊勋，合奖。宰臣奏拟下得正官，欲望兵复于农，官清其品，难矣"③。即商贾、胥吏以财货贿赂藩镇，购买军将职级；诸道藩镇也在利益的驱使下，将军职卖与他们，并为其伪造职级；隔一段时间后，为其奏请官职。可见，工贾胥吏通过以钱买官的方式，步入仕途，其中介便是藩镇。这表明，由藩镇武职僚佐→奏官而厕身官僚行列，成为下层民众、胥吏进入官场的一道门径。

---

① 《唐大诏令集》卷65《叙用勋旧武臣德音》，第363页。

② 《资治通鉴》卷242，唐穆宗长庆二年三月"初，上在东宫"条，第7812页。

③ 《（宋本）册府元龟》卷631《铨选部·条制》第三，第2034页；另参见《旧唐书》卷16《穆宗本纪》，第496页。

（2）对奏官员额和宪官资格的限定。

开成元年（836）十一月，中书门下奏：准太（元?）和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敕，……其御史中丞以上官，并须因有战功，方得奏请。诸道团练下万人以上军，所奏不得过殿中侍御史。如未有宪官者，不在奏限。万人以下军，不因战功，并不得奏论请。敕旨，依奏。[①]

即将全国藩镇按军队人数多寡分为三类：3万人以上、3万~1万人之间、1万人以下。其中，3万人以上军队，准奏4人；万人以下军队，不许奏请（军功者除外）；敕文显然没有对3万~1万人之间的军队奏官人数做出明确限定，按理应该在4人以内。3万人以上军队，正常奏请或迁转宪官者，对任职经历做出了要求，但所奏宪官不得超过侍御史（从六品下）；团练级别以下、万人以上军队，所奏宪官不得超过殿中侍御史（从七品下）。奏请御史中丞（正四品下）以上宪官，须有军功；万人以下军队，没有军功，便不得奏请宪衔。可见，军功资格在奏请宪官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然而这道诏敕，容易造成地区之间的不平衡，因为，在和平年代，万人以下的军队单位可能多年都不能为一名军将向朝廷奏官。所以懿宗咸通十二年，中书门下奏：

准今年六月十二日敕，厘革诸道及在京诸司奏官并请章服事者。……诸道节度及都团练防御使下将校奏转试官及宪御等，令诸节度事（使）每年量许五人，都团练防御量许

① 《唐会要》卷79“诸使杂录”下第1447页，“太和”年号无十一年，仅九年，故笔者怀疑此诏时间可能应该是“元和”十一年。

三人为定，不得更于其外奏请。其御史中丞已下（上），即准敕文条疏，须有军功，方可授任。……敕旨从之。①

即改变过去单纯以军队人数多寡来划分藩镇类型的做法，将藩镇由三类改为两类：节度类和都团练·防御类。各镇的奏官名额为：节镇每年许为5名军将奏请试官或宪官；团练、防御级方镇，每年可奏请3名将校；同样强调军功资格。这道诏敕，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协调了地区之间奏官人数不平衡的状况。

为武职僚佐奏请检校官、试官及宪官，能带来怎样的实惠？石云涛认为："不经表奏的又非幕府正职，将来的升迁就有很大障碍"；另外，"方镇使府参佐带郎官、御史者在冬荐之范围"；"方镇使府罢使郎官、御史和检校五品以上不具备吏部选集条件者，可以通过冬荐制而迁转"②。这主要指文职僚佐。与此比附，武职军将带有同样官职，也理应享受同等待遇。我们还可以从几位武职僚佐的迁转事例，窥知其获得宪官或检校、试官后，仕途所发生的具体变化。如：

师弘礼：节度押衙－监察御史－鄜、坊、丹、延四州都游奕使－银青光禄大夫、荣王府谘议－藤州刺史－资州刺史兼安夷军使、殿中侍御史、柱国③。

周玙：节度散兵马使－正兵马使知都虞候事－节度押衙兼司宾务－侍御史、国子祭酒－节度都押衙－妫州刺史－涿州刺史、永泰军营田团练等使－平州刺史、卢龙节度留后、柳城军等使④。

张遵：节度押衙－兼内院兵马使－监察御史、依前押衙－殿

① 《旧唐书》卷19上《懿宗本纪》，第678页；另参见《（宋本）册府元龟》卷632《铨选部·条制》第四，第2041页。

② 石云涛著《唐代方镇幕府制度研究》，第330、293页。

③ 《汇编》广明001，第2499页；《补遗》第1辑，第425页。

④ 《续集》大中056，第1009页；《补遗》第3辑，第234～235页。

中侍御史－宁远将军守左武卫将军、检校大理卿、兼侍御史－右骁卫将军－邢州刺史、御史中丞－洺州刺史－右龙武军将军知军事－楚州刺史－亳州刺史－御史大夫－邕州刺史、本管经略招讨处置等使[①]。

周元长：团练衙官－衙前虞候－瀛州衙门职－衙将兼永宁军副－卢龙节度押衙－摄蓟州司马－正议大夫、检校太子中允、兼监察御史、权知蓟州军州事－殿中侍御史－两节度都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使持节檀州诸军事、檀州刺史、兼殿中侍御史，充威武军团练等使[②]。

以上几位都经历了这样一种官职迁转过程：藩镇武职僚佐→奏请宪官、检校官或试官→官职上升。可见，只要奏请了宪官或检校官、试官，便取得了充任其他朝廷官职的资格。与前述制度相符，我们所见到的奏请检校、试官及宪衔者，职级一般也是达到押衙、兵马使者（军功出身者例外）。

3. 正员官的奏请

安史乱后，随着藩镇割据局面的逐步形成，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表现之一，就是在地方官阙的争夺上。按照制度规定，地方行政官员由中央选任，但藩帅往往自己派遣武职军将充任地方官，占据文官官阙，也就在某种程度上堵塞了文官的仕进之路。藩镇奏请正员官，是唐代中后期的一突出现象。如元和七年，“医士崔环，自淮南小将，为黄州司马。敕至南省，吏部尚书郑余庆执之，封还。以为诸道散将，无故受正员五品官，是开侥幸之路，且无阙可供。言或过理，由是稍忤时宰，改太子少傅”[③]。可见，对藩镇奏请正员官进行制度规范，显得必要。

---

① 《续集》大和032，第905页；《补遗》第4辑，第129～130页。

② 《续集》开成014，第933页；《补遗》第4辑，第145～146页。

③ 《唐会要》卷58“吏部尚书”，第1005页。

敬宗宝历二年，朝廷规定："自今已后，诸司诸使，天下州府选限内，不得奏六品已下官。敕旨，依奏。"①

文宗大和二年（828），针对藩镇军将大量充任地方行政官员，导致文官仕途堵塞的现象，朝廷下令云："文武名分，授受各殊，其诸使诸道将校等，自今后宜依注例，除旧有正官外，并不得兼授正官"②。严禁奏请武职僚佐充任地方正员文官。但诏令事实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实施，因此，文宗开成三年十二月诏曰：

> 应诸道奏请军将兼巡内州别驾、长史、判司等，近日诸色入流人多，官途隘窄，诸道军将，自有衣粮，优厚之处，仍兼月俸。若更占州县员阙，则文吏无所容身，须有申明，人知分限。起今已后，诸道节度、团练、防御等使，不得更奏大将充巡内上佐等官。今日已前见任者，且任依前守官③。

"上佐"指别驾、长史和司马④，这则诏令规定武职军将不许奏请本镇境内的上佐等官，至于其他地方行政官职，则在许可的范围之内，否则朝廷不会只对上佐等官职的奏请加以限定。同时，它也是针对当时地方藩镇不断奏请武职僚佐充任地方正员文官之事实的部分承认和部分限定。武宗时，又对奏请军将充任正员官的资格进行限定："今日已后，非因战功，不得请正官。其已有正官者，或因停替，亦须待三五年后，方得

① 《（宋本）册府元龟》卷631《铨选部·条制》第三，第2035页。
② 《（宋本）册府元龟》卷631《铨选部·条制》第三，第2036页。
③ 《（宋本）册府元龟》卷631《铨选部·条制》第三，第2039页；另参见《唐会要》卷69"别驾"，第1215页。
④ 《通典》卷33《职官》一五，第910页。

奏请。”[①] 将军功作为奏请正员官的唯一条件，而不重视其资限。宣宗时强调，军将奏请正员官，必须有“殊功”，“诸军将非有殊功者，不在奏无（兼）州县官限。素非吏部注拟之处，即不在此限，仍委中书门下准此处分”[②]。

懿宗咸通七年，再次重申，军将不许奏请上佐官，同时还强调军功资格；此外，针对“近日诸道不守条章，或分两三度奏来”的现象，规定：“从今以后，诸道军将官，并限七月表到京。令之初行，宜武臣之叙进，据所合奏人数一表，令如有别劳效者，即待明年七月，不得两度贯行欺隐”[③]。即每年只许表奏一次，统一集中在七月。

总之，从武宗至懿宗时期的诏敕，为武职僚佐充任正员文官提供了制度保障，故唐后期出现大量军将充任地方行政官员的情况，不过这也是中央和地方实力互相较量的结果。中央对地方藩镇是既有让步，也有限制。其让步表现在，将上佐以下的州县官职划入军将可以充任的范围；限制政策表现在：将上佐官列入朝廷的任命范畴，并严格规定武职僚佐奏请正员官的军功条件。显然，这是朝廷在被迫承认地方军事集团的既得利益同时，对局势进行有限度的控制而已。中央和地方藩镇争夺文官官阙，实质上是地方军官集团和文官集团之间争夺官阙的矛盾。双方实力的消长，直接影响到地方政府的性质，是朝文官化还是军事化方向发展，一切视双方的实力而定。不幸的是，唐亡于藩镇，最终地方军人集团战胜中央，从而导致晚唐五代地方政府的军事化。随着五代地方政府变为中央朝廷后，中央政府的军事化也随之完成，这种情况到五代末期才开始发生变化，“后周太祖郭威和周世宗

① 《文苑英华》卷429《会昌五年正月三日南郊赦文》，第2174页。
② 《文苑英华》卷430《大中元年正月十七日赦文》，第2179页。
③ 《唐大诏令集》卷72《乾符二年南郊赦》，第405页。

柴荣开始采取一系列集中权力和安定封建秩序，巩固自己统治，促使全国统一的措施，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限制武将权力，重用文臣”①。

二　方镇使府武职僚佐的迁转

方镇使府武职僚佐的迁转，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藩镇内的迁转，一是藩镇外的迁转。以下就这两种情况进行探讨。

1. 藩镇内的迁转

使府武职僚佐在藩镇内的迁转，表现为职级和所带检校官·试官·宪官的迁转。这两套体制并非同时并轨运行，即有职级不一定有官称，而且试官、检校官和宪官一定是从中央那里奏请来的，但职级基本上出于藩帅自己的任命。在现实中有“‘官’升而‘职’不变，‘职’改‘官’不迁，‘官’降‘职’依旧，‘官’‘职’俱改迁等种种差异。一般职的改易完全由方镇署定，而官的升迁则须奏报中央任命”②。所以，唐代中晚期藩镇武职僚佐的升迁，存在两条轨道，即职级和朝廷官职，这两条轨道并非永远平行，在一定情况下，又交叉在一起。

有关方面的制度出台，时间相对较晚，笔者所见到的专门针对武职僚佐之升迁改转制度，最早是穆宗长庆二年的诏令：

> 自今已后，诸道节度、都团练、经略等使下，各随本处，其大将名目，已曾受监察以上官者，并限三周年，量与改转。如有功效合非时与改者，不在此限③。

---

① 宁可：《宋代重文轻武风气的形成》，《学林漫录》第3辑，中华书局，1981，第63页。

② 张国刚著《唐代藩镇研究》，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第185页。

③ 《唐大诏令集》卷65《叙用勋旧武臣德音》，第362~363页；另参见《旧唐书》卷16《穆宗本纪》，第495页。

即藩镇军将只要带有监察御史（正八品上）以上的宪官，三周年改迁一次，当然，立有军功者例外。这是从军将所带宪衔方面做出的改转年限规定，并未对职级本身做出相应要求。故文宗开成元年，朝廷同意中书门下的奏请，即：

> 诸道节度使下，都押衙、都虞候，约五年以上，方得改转；押衙、兵马使，约七年以上，方得改转。[①]

将原来以宪官为标准的改迁制度，转换为以职级为基础，达到一定职级（都押衙、都虞候、押衙、兵马使），任职一定年限后，才具备改转官职的资格。

对武职僚佐改转官职的资格限定，无疑有利于加强中央权威。这一动作的本身，也是朝廷企图逐步实现集权的过程。但黄巢之乱后，由于中央政府衰弱不堪，故诏令也就变为一纸空文。

2. 藩镇外的迁转

使府武职僚佐藩镇外的迁转主要表现为入朝为官和随藩帅移镇二途。

（1）入朝为官。

藩镇军将入朝为官的途径，陈志学认为常见的有两种，即以武勇被中央王朝拔用、以幕僚被中央王朝征用[②]。除此之外，实际上还有藩镇将领主动向朝廷推荐以及藩帅归朝时带入朝廷二途。

第一，藩镇向朝廷推荐。如节度使刘总离镇时，“仍籍军中宿将，尽荐于阙下，因望朝廷升奖”[③]。而且，国家对推荐入朝

---

① 《唐会要》卷79“诸使杂录”下，第1447页。

② 陈志学：《唐代武官的入仕途径》，第64页。

③ 《旧唐书》卷129《张弘靖传》，第3612页。

的军将还有人数和级别限制，〔大和〕四年（830）四月朝廷规定：使府将领要拥有举荐资格，必须具备双重条件，即“官至常侍、大夫，职兼〔都〕知兵马使、都押衙，功绩显著，本道官职可奖者”；“军官未至常侍、大夫，职兼都虞候、都知兵马使、都押衙者，不在荐送限”；对于节度使移镇或“停罢其使”的“随从元从军将，只合本道量才驱使。不情愿住者，一任东西，不合更来朝廷，别求侥幸。敕旨，依奏”[①]。此道令文，目的在于限制诸道向朝廷过多地推荐军将，以减轻朝廷的任官压力。

第二，随藩帅归朝。在会昌三年（843）的诏敕中，曾提到：

> 比来节将移改，随从将校过多，非唯妨夺旧人职员，兼亦费用军资钱物。……自今以后，节度使等如罢镇赴阙，应将官吏将健随赴上都者，并随使停解。纵有带宪官充职，亦勒停。其间或有是功勋重臣旧将校，人数稍多者，离镇后，新停解，即须具人数闻奏，当与量事宜处分[②]。

反映了藩帅入朝时，可以带领将校随同，然而，一旦离镇，其原有的官职便一律作废。到朝廷后，原功勋重臣旧将校，由中央根据具体情况重新予以安置。

（2）随藩帅移镇。

藩帅移镇时，带领原武职将领前往的事例较为常见，如前文所言之郑仲连、郭克勤，皆曾随藩帅移镇。另魏博节度使田弘正移镇成德军时，带领部分将校前往，并为他们奏请官职：“〔吕〕晃已下四十有一人，实从魏来。或驱或殿，被坚执锐，可谓有劳。宜以宫坊之僚、宪府之职，随其名秩，序而宠之。

① 《唐会要》卷79“诸使杂录”下，第1446页。

② 《唐会要》卷79“诸使杂录”下，第1449页。

可依前件。”①

会昌三年，朝廷针对“比来节将移改，随从将校过多”的情况，从数目上进行限定：“节度使移镇，军将至随身不得六十人，观察使四十人，经略都护等三十人。宜委监察军使，及知留后判官具名闻奏。如违此数，知留后判官，量加惩罚，监军使别有处分。”②这一规定，一方面使僚佐随藩帅移镇制度化；另一方面，又是对僚佐随藩帅移镇的部分限定。

第三节　方镇使府武职僚佐的社会构成和地域分布

唐代中后期，藩镇军官的选任主要通过辟署制进行，这种任命方式选拔出来的军官群体其社会构成怎样？在地域分布上又有何特点？这是本节所要探讨的问题，因为这些因素也潜在地影响着唐代的军官选任。

一　使府武职僚佐的社会构成

传统观点一般认为，“辟召的广泛使用打破了中央政府对进入官场的途径的严格控制，使一个崭新的阶级中的人们能够取得在官场任职的前程，因为这些人由于出身和未受过传统教育，在以前是被排除在外的”③。然而，日本学者渡边孝通过对浙西、淮南两方镇文职僚佐的考察，发现在两藩镇中，文职僚佐出身于贵族阶层者，占了全部人数的大约2/3；出身不明者占20%；庶

① 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卷48《魏博军将吕晃等从弘正到镇州，各加御史大夫、宾客等制》，中华书局，1979，第1011页。

② 《唐会要》卷79“诸使杂录”下，第1449页。

③ 〔英〕崔瑞德主编《剑桥中国隋唐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第22页。

姓出身者淮南占 14%，浙西占 11%。故渡边氏认为：传统观点认为幕职官是新兴阶层进入官僚集团的阶梯，这种看法是难以成立的；与当时的科举制度一样，辟召制与其说是新兴阶层进出的阶梯，还不如说是门阀贵族阶层利用他们在中唐以来逐渐回复的政治势力，在辟召过程中逐渐占据支配地位①。

相较之下，唐代方镇使府武职僚佐的辟召情况怎样？“辟召入仕之武官，多是父祖无闻者”吗？② 方镇使府武职僚佐的辟署，能否为下层民众提供进入官场的机会？武职僚佐的职位究竟为哪一阶层所控制？为弄清这些事实，笔者对建中元年以后，曾充任过方镇使府武职僚佐者进行了一番系统的资料收集、整理，共收录了 165 人，对其出身等情况进行了考察（见附表 4）。

综合渡边氏、毛汉光对社会人群的划分方法③，本表共收录贵族（士族）阶层 4 人，庶姓 130 人，三代不仕者 9 人，两代不仕者 1 人，曾祖·祖不详、父不仕者 1 人，出身完全不详者 20 人。则士族阶层占了 2.42%，庶姓类占了 78.79%，其余阶层占了 18.79%（即下层民众）。其间军将子弟有 95 人，占 57.58%。

这一数据表明，武职僚佐之社会构成，庶姓类占了 3/4 多。而庶姓与传统的旧门阀士族有别，他们是通过多种途径在唐代崛起的官僚群体。由附表 4 中事例可知，武职僚佐的辟署制向这些官僚群体敞开了大门，成为他们进出官场的阶梯。与文职僚佐的

---

① 〔日〕渡边孝：《唐后半期の藩镇辟召制についての再检讨》，《东洋史研究》60～1，2001，第 46、53 页。

② 陈志学：《唐代武官的入仕途径》，《中华文化论坛》2002 年第 3 期，第 64 页。

③ 笔者将唐代的社会人群划分为三类，士族主要指关陇、山东和江左的大姓贵族，世系连贯者；庶姓指唐代以来的新兴阶层，他们依靠门荫、科举、军功、辟署等方式入仕，世系不连贯，而且不具备士族的文化特性；下层民众主要指父·祖·曾祖无闻（不详）和不仕者。参考〔日〕渡边孝《唐后半期の藩镇辟召制についての再检讨》，第 45 页；毛汉光《唐代统治阶层的社会变动》，台湾政治大学 1968 年博士论文，第 22～23 页。

辟署相比，武职僚佐的辟署制提供给新官僚的机会要大得多。但数据表明，这些新兴的社会群体一旦占据有利的政治地位，便力图垄断权力，为子孙的仕途开辟道路，故表中大部分武职僚佐的职位被他们所控制，下层民众较难突破此道障碍。在武职僚佐的充任表中，下层民众仅占18.79%，反映出他们在这一职位充任上的劣势地位。但军队毕竟为下层民众提供了自我表现的机会，因此，他们通过此途仍有充任武职僚佐的可能。士族阶层所占比例较小的原因，在于绝大部分文化士族都不屑于通过此途入仕，而走文科仕进之路；不过，在激烈的竞争面前，为了保持家族地位（权力、威望、财富）——以从军之道而步入官场也不失为一个办法。

武职僚佐中，军将子弟占据多数，反映出藩镇兵制下，职业世袭现象的普遍性。这种职业世袭与兵制有极大的关系，因为，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实行了长任兵制[①]，长任兵制的特点之一就是子孙世袭当兵[②]。安史之乱以后的节镇兵，很多也都是职业兵，世代相袭。这样的军事状况，为军队内部的官职世袭提供了机会。正是由于这种职业世袭，才在一定程度上堵塞了下层民众利用此途进入官场的道路。可见，文职僚佐被贵族阶层利用来作为他们的晋升之阶；而武职僚佐被唐代以来的新官僚群体、尤其是被军官阶层所控制，作为他们子弟出入官场的通道。武职僚佐职位存在的世袭现象，表明朝廷已经慢慢失去了对这些官职的控制，从而削弱了中央对这些军队的控制力。

二　使府武职僚佐的地域分布

据附表4，唐代中后期使府武职僚佐人员的构成中，显然，

① 《资治通鉴》卷214，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五月癸未条，第6829页。
② 王永兴著《唐代前期军事史略论稿》，第104页。

北方籍人士占了极其重要的地位。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无疑与唐朝藩镇的军事布局有关。元和二年（807）李吉甫所撰《元和国计簿》，其中提到当时全国方镇共48个[①]。张国刚先生根据杜牧和李吉甫的论述，又把唐代藩镇划分为四个类型，即河朔割据型、中原防遏型、边疆御边型、东南财源型[②]。而在这些方镇中，南方藩镇的数量相对有限，48个方镇中，南方（东南和西南）藩镇仅有18个，分别为山南西、西川、东川、黔中、桂管、容管、邕管、安南、岭南、浙东、浙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荆南。可见，南方藩镇在数量上不如北方多。兵力上也是如此，东南型藩镇驻兵少，因为其驻兵目的不是为了军事用途，而是为了防御盗贼[③]。西南边疆御边型藩镇，“随着咸通年间开始的南诏等周边诸民族反抗的激化，唐王朝从中原防遏型藩镇派遣了大量兵士出征”[④]。如咸通年间，由于南诏寇边，五年（864）五月的制文略云：“宜令徐泗团练使选揀召募官健三千人，赴邕管防戍”[⑤]；其中“武宁兵七百戍桂州”[⑥]。可见，西南边疆御边型藩镇本地驻兵也不多，否则就不会从外地调兵戍守。这种军事布局，无疑会导致各地参军人数的不平衡。北方由于是军事重镇，因此，当地参军者相对较多；南方则反之亦然，从而导致南北两地使府武职僚佐人数的差异。

---

① 《资治通鉴》卷237，唐宪宗元和二年十二月“是岁，李吉甫撰《元和国计簿》上之”条，第7647页。

② 张国刚著《唐代藩镇研究》，第81页。

③ 张国刚著《唐代藩镇研究》，第101页。

④ 〔日〕山根直生：《唐朝军政统治的终局与五代十国割据的开端》，《浙江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第73页。

⑤ 《旧唐书》卷19上《懿宗本纪》，第656～657页。

⑥ 《新唐书》卷148《康日知传》附承训传，第4774页。

另外，社会和家庭的文化氛围对一个人从军入仕也有影响。内地在重文轻武的文化背景下，很多人愿意以科举入仕；而边境由于常年是征战之地，加上文化的落后，军人地位较高，因此当地百姓更宁愿以武入仕。如王逆修，“公代贯磁州人也，家亦先寄河北。征战之地，唯求武知”[1]。河北三镇一带，“繁刑暴赋，唯恤军戎，衣冠仕人，遇如奴虏”[2]，这样的文化氛围无疑会刺激当地人的从军热情。

家庭文化氛围对一个人仕途的影响，正如以上所统计，超过半数的武职僚佐人员为军将子弟，这便是强有力的证明。

本章以上论述可归纳如下。

第一，藩镇使府武职僚佐的辟署无多大身份限制，辟署方式灵活多变。

第二，安史乱后，由于国家处于重建过程中，在秩序还未完全稳定下来之际，武职僚佐的官职奏请和迁转都极为混乱。经过德宗、宪宗时期一系列平叛战争，朝廷又逐渐将藩镇纳入中央化轨道。表现在用人制度上，就是从穆宗时起，国家便逐步规范藩镇使府武职僚佐的官职奏请资格和迁转年限。与文职僚佐不同的是，武职僚佐的奏官，更强调军功而不是资历，这与其本身的职业生涯有关。

第三，使府武职僚佐所奏官职原则上应为试官、检校官和宪官，但随着藩镇权势的扩大，中央权威的日渐削弱，藩镇逐渐为武职僚佐奏请正员文官，或以摄的名义差遣他们去管理地方行政事务。“甚至不履行奏授手续，直接占住官阙”[3]。唐文宗时，诸道大将占据州县员阙的情况已十分严

---

① 《补遗》第7辑，第97页。

② 《通典》卷40《职官》二二，第1109页。

③ 宁欣：《唐代的选人与官阙》，《人文杂志》1991年第5期，第98页。

重，中央政府虽三令五申，但并不能起多大作用[1]。尤其是黄巢之乱以后，中央对地方藩镇处于完全失控状态，这种失控表现在用人制度上，便是由于“中央权威失坠，根本不存在中央对地方的限制问题，而地方割据盛行，各行其是，任免官员，随心所欲。官制非常混乱，摄职更加普遍。军事方面的僚佐势力大增，极大程度地控制了地方行政事务”[2]。中唐以来，不仅地方行政在逐渐军事化，地方的财政官吏也逐渐军将化[3]，最终导致藩镇军将逐级控制了地方大权，渐渐摆脱中央王朝的控制，独立倾向不断增强。

所以，五代时期全国范围内的军事化绝非短时期内能够办到，它经历了中晚唐以来一个漫长的武职僚佐取代地方文官的权力转换过程。这种权力转换的本身，使得文官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无疑也加大了文武官僚群体之间的矛盾，其矛盾的实质，是中央与武将对地方行政职位的争夺。

第四，唐代中后期，充任武职僚佐者，大部分仍是中低级官僚子弟，尤其是军将子弟，反映出这一时期的职业世袭现象。这种职业世袭的根源，应归结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的长任兵制，即军队的职业化和存在的子孙世袭当兵现象。以上事实还表明，军队里兴起的这些新兴军官阶层，一旦占据有力的政治地位，便把力图这些官僚职位传给其家庭成员，结果就是使朝廷逐渐丧失了对这些官僚职位的控制。因此，我们不能对唐代武职僚佐的平民性色彩作过高估计。

---

① 张国刚：《唐代阶官与职事官的阶官化》，《中华文化论丛》1989 年第 2 期，第 84 页。

② 陈志坚著《唐后期中央和地方关系研究——以州的制度为中心》，北大 2000 年博士论文，第 83 页。

③ 李锦绣著《唐代财政史稿》（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第 576～590 页。

第五，唐代武职僚佐的人员构成，北方籍人士占了绝对重要地位，这与唐代的军事布局有关。唐代，重要藩镇一般集中在北方边疆和中原一代。另外，一个人从军入仕，还受到社会和家庭双重文化环境的影响，军官的充任情况便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点。

第六章　其他选任方式

唐代武官的选任方式非常烦杂，除以上几章谈到的以门荫、军功、科举、辟署制选拔武官外，事实上还有来朝蕃客授官、文转武职、荐举、投诚等多种方式。

第一节　来朝蕃客授官

何谓“蕃”？唐代“蕃”的地域范围如何？《新唐书·西域传》对此有明确的界定：“东至高丽，南至真腊，西至波斯、吐蕃、坚昆，北至突厥、契丹、靺鞨，谓之‘八蕃’，其外谓之‘绝域’。”① 众所周知，唐朝前期，国力强盛，征服了周边的很多少数民族政权。当然这种“征服”，有的是靠使用武力，有的则是他们主动内附。对于这些被征服的民族政权，唐朝有时对他们实行内徙政策，置于军镇城傍②；有的则仍然留在原地，置羁縻府州进行管辖。那些被强制征服或主动款附归朝的部落首领，唐朝中央一般要授予其官职，甚至直接用之在朝廷做官。因此，本节的研究对象，主要就是那部分初入唐朝的蕃客——少数民族首领。而诸国蕃胡“凡内附后所生子，即同百

① 《新唐书》卷221下《西域传》下，第6264页。

② 王永兴著《唐代前期军事史略论稿》，第102页。

姓，不得为蕃户也”①。故这些内附首领的后代也就不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因为他们的身份与汉民的差异日渐减小。但是，在蕃蕃族由于其部落组织保存完好，与内附蕃族存在较大差异，其后代仍当为蕃客。

一　来朝蕃客授官的历史原因

大量授予来朝或款附归朝的蕃客官职，为有唐一代的特色。现实中不仅能见到实例，而且有制度可循。唐朝之所以授予这些蕃客官职，大体原因在于以下几点。

第一，唐初诸帝本身为一胡化混血之人，因此，较少民族偏见。如李渊之母独孤氏、李世民之母窦氏、高宗之母长孙氏，皆为鲜卑族，因此，他们为胡汉混血自无可疑②。这样的民族出身，才使得他们对诸族爱之如一、华夷无差。因为，他们本质上与诸族是同类的。血统的混杂，为唐室诸帝任用诸族为官，减少了心理障碍。

第二，蕃客本身的社会影响和骑射技术是唐朝授予他们武官的重要原因。关于此点，陈寅恪先生在《论唐代之蕃将与府兵》一文中有详尽分析，兹不赘述③。

总之，唐朝大量授予来朝或款附归朝的蕃客官职，主要原因在于以上两点。

二　授官机构和授官制度

对于蕃客的官职授予，唐朝中央设有专门的机构来管理此

---

① 《大唐六典》卷3“户部郎中员外郎”条，第69页。

② 陈寅恪著《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第1页。

③ 陈寅恪著《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三联书店，第296～310页。

事；同时，还设有一批固定的官职以授予初附首领。

1. 授官机构

蕃客初入朝廷，一般由鸿胪寺依据其“蕃望大小”，“比类流例”授官；但是也有例外，如开元六年（718），吐火罗特勤仆罗申诉：“石国、龟兹，并余小国王子首领等，入朝元无功效，并缘蕃望授三品将军”；而他自己“身特勤，本蕃位望与亲王一种，比类大小，与诸国王子悬殊，却授仆罗四品中郎”①。即仆罗的蕃望与其所获得的官职存在距离，因此，仆罗不满，上表申诉。这一事实反映出，制度在实际操作中，往往会有一定的灵活性，制度与现实之间经常会存在一定的距离。虽然唐朝明文规定，以蕃望高下授官，但是，“唐朝给羁縻府州诸国君长的封号，完全依照其亲疏关系处理”；“石国、龟兹在唐朝直接控制下”，故授予其王子三品将军也属正常；而吐火罗与唐朝关系较远，所以地盘虽大，叶护也只得四品郎将②。

在蕃蕃将及其子孙的册封、袭官爵等事，由鸿胪寺掌管③。此外，对于在蕃蕃将和来朝蕃客的官职授予及人员流动情况，中央皆有专门的档案记载，开元十六年（728）五月敕：“诸蕃应授内外文武官，及留宿卫长上者，共为一甲；其放还蕃者，别为一甲。仍具形状年几同为一奏”④。表明在蕃蕃将和入朝蕃客授官后，中央在档案管理上另立一系统；而入朝蕃客被放还者，又另立一档案，与朝廷其他官员的档案管理进行严格区分。

2. 蕃客的官职授予

来朝蕃客和在蕃蕃客的官职授予，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况。

---

① （宋本）《册府元龟》卷999《外臣部·请求》，第4040页。

② 刘统著《唐代羁縻府州研究》，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第34页。

③ 《旧唐书》卷44《职官志》三，第1885页。

④ 《唐会要》卷75“附甲”，第1372页。

（1）授予武散官。

唐朝中央对于初附蕃客的官职授予，有明确的制度规定，并随着时代发展，不断完善。可大致划分为两个时期。

第一，德宗贞元以前，来朝蕃客的武散官授予。

《旧唐书·高宗本纪》记载了授予蕃客官职的重要原因：显庆三年（658）二月，苏定方攻破西突厥，“收其人畜前后四十余万。甲寅，西域平，以其地置濛池、昆陵二都护府。复于龟兹国置安西都护府，以高昌故地为西州。置怀化大将军正三品，归化将军从三品，以授初附首领，仍分隶诸卫。”[①] 显然，设置这两个官职的目的，就是为了授予归附的少数民族首领，以表明其与唐朝的隶属关系。然而，《唐会要》记载的官称与《旧唐书》存在出入：“显庆三年八月十四日，置怀德大将军，正三品；归化将军，从三品；以授初投首领，仍隶属诸卫，不置员数，及月俸料。”[②]《大唐六典》、《旧唐书·职官志》、《新唐书·百官志》和《通典》皆记载为“怀化大将军”、“归德将军”[③]。显然，《唐会要》的记载有误。

从一些具体实例来看，贞观二十年（646），唐朝曾拜回纥酋长“吐迷度为怀化大将军兼瀚海都督”[④]；总章元年（668）十一月，“授婆罗门卢伽逸多怀化大将军”[⑤]。贞元十一年（795）八月，“黄少卿攻陷钦、横、浔、贵四州，吐蕃渠帅论乞髯〔、〕荡没藏〔、〕悉诺律以其家属来降，明年并

① 《旧唐书》卷4《高宗本纪》上，第78页。

② 《唐会要》卷100“归降官位”，第1798页。

③ 《大唐六典》卷5“兵部郎中”条，第114页；《旧唐书》卷42《百官志》一，第1792页；《新唐书》卷46《百官志》一，第1197页；《通典》卷40《职官志》二二，第1094页。

④ 《旧唐书》卷195《回纥传》，第5196页。

⑤ 《唐会要》卷100“归降官位”，第1798页。

以为归德将军”[①]。贞元十二年（796）八月癸酉，“以乞髯子汤忠义为归德将军”[②]。这些授官实例，反映出唐朝与诸族之间的政治关系。

在《新唐书·百官志》一中，唐代蕃客所授三品武散阶有四等，即怀化大将军，正三品上；怀化将军，正三品下；归德大将军，从三品上；归德将军，从三品下。比《大唐六典》、《通典》、《旧唐书》、《唐会要》的记载要多出两个将军名号。笔者认为，根据唐代职官的设置理念，三品官仅正、从，无上、下之分，因此，怀疑《新唐书·百官志》的记载可能有误。

显庆三年设置的授给少数民族初投首领的武散阶名号，显得有些单调和粗略，因为其授予对象仅只“初投首领”，对于地位低于“首领”的蕃客来唐后，又该如何授予官职，直至德宗时期，唐朝才做出制度化的规定。

第二，德宗贞元以后，来朝蕃客的武散官授予。

安史之乱使唐朝疆界发生了急剧变化：陇右原来属于唐朝国土，安史之乱期间，因为调兵进入中原平叛，使这一带的兵力空虚，从而给吐蕃占领这一地域留下了空隙。安史之乱后，陇右陷于吐蕃，很多来唐的少数民族首领和使者、官员无法回国，因此，在唐朝滞留下来。他们完全靠国家供给，成为唐朝沉重的经济负担。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宰相李泌将他们编入神策军：“先是，天宝末，西域朝贡酋长及安西、北庭校吏岁集京师者数千人，陇右既陷，不得归，皆仰禀鸿胪礼宾，月四万缗，凡四十年，名田养子孙如编民。至是，〔王〕锷悉藉名王以下无虑四千

① 《旧唐书》卷196下《吐蕃传》下，第5258页。标点据同书卷13《德宗本纪》下补加，第380页。

② 《旧唐书》卷13《德宗本纪》下，第384页。

人，畜马二千，奏皆停给。宰相李泌尽以隶左右神策军，以酋长署牙将，岁省五十万缗”①。《资治通鉴》对这一事件也有记载，并详细记录了这些民族政权首领或官员的授官情况：“〔李〕泌皆分隶神策两军，王子、使者为散兵马使或押牙，余皆为卒，禁旅益壮。”②

显然，这里所授予的只是军将的职名，而不是官称。如何授予这些日益增多的内附蕃客官职，是朝廷亟待解决的问题。德宗贞元十年（794）七月，“吐蕃大将论乞髯、阳没藏、悉诺律以其家内附，授归义将军。因置四品已下武官，以授四夷归附者”③。章群先生认为“归义将军或即归德将军”④。《唐会要》将这些官职的设置时间记载为贞元十一年：“今蕃人向化，近日渐多，名位高卑，须有等级”，增置了四品及其以下的武散官名号⑤。二者在时间记载上存在差异，其间正误，有待于进一步考证。这一时期所设置的武散官名号分别为：

怀化中郎将，正四品下；归德中郎将，从四品下；怀化郎将，正五品下；归德郎将，从五品下；怀化司阶，正六品下；归德司阶，从六品下；怀化中候，正七品下；归德中候，从七品下；怀化司戈，正八品下；归德司戈，从八品下；怀化执戟长上，正九品下；归德执戟长上，从九品下⑥。并规定了相应的俸禄，“仍定怀化大将军以下俸钱有差”⑦。

---

① 《新唐书》卷170《王锷传》，第5169页。

② 《资治通鉴》卷232，唐德宗贞元三年（787）七月“时关东防秋兵大集”条，第7493页。

③ 《旧唐书》卷13《德宗本纪》下，第380页。

④ 章群著《唐代蕃将研究》，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第27页。

⑤ 《唐会要》卷100“归降官位”，第1799页。

⑥ 《新唐书》卷46《百官志》一，第1197页。

⑦ 《唐会要》卷71“十二卫”，第1288页。

唐代职事官“皆带散位，谓之本品”①，这批武散阶名号就是唐朝中央专门授予这些初附蕃客的，如此一来，朝廷对于蕃客的任官就进一步朝制度化方向发展。

“怀化大将军、归德大将军，配诸卫上下；余直诸卫为十二番，皆月上。忠武将军以下、游击将军以上，每番，阅强毅者直诸卫；番满，有将略者以名闻”②。他们通过上番，可以参加铨选，然后进入职事官队伍。但是，蕃人所任武散官，与普通卫士和汉人军官相比，有一定的区别，“蕃人任武官者，并免入宿；任三卫者，配玄武门上（者），一日上、两日下；配南衙者，长番，每年一月上”③。可见，蕃客番上与唐朝其他武官相比，具有一定的优待，“并免入宿”。

（2）员外武官的授予。

蕃客还可以注拟员外官，唐代中央对此有明文规定：天宝七载（748），朝廷下令停废内外六品以下员外官，但“皇亲幼小、及诸色承优授官、军功、伎术、内侍省、左右龙武军、并诸蕃官等，不在此例”④。蕃客不仅可以注拟低品员外官，还可以注拟高品员外官，现实中不乏其例。如：

黑齿常之，百济西部人。“初在本蕃，仕为达率兼郡将，犹中国之刺史也。……龙朔三年（663），高宗遣使招谕之，常之尽率其众降。累转左领军员外将军”⑤。

“乾元二年（759），回纥骨啜特勤等率众从郭子仪与九节度于相州城下战，不利。三月壬子，回纥王子骨啜特勤及宰相帝德等十五人自相州奔于西京，肃宗宴之于紫宸殿，……乙未，以回

① 《旧唐书》卷42《职官志》一，第1805页。
② 《新唐书》卷46《百官志》一，第1197页。
③ 《大唐六典》卷5“兵部郎中”条，第116页。
④ 《唐会要》卷67“员外官”，第1180页。
⑤ 《旧唐书》卷109《黑齿常之传》，第3294页。

纥王子新除左羽林军大将军员外置骨啜特勤为银青光禄大夫、鸿胪卿员外置”①。

员外武官的大量存在，为武官集团的膨胀从制度上提供了便利。

（3）武职事官的授予。

蕃客的官职授予，除了武散官、员外武官以外，授予武职事官者也不在少数，特别是在入朝蕃将中，较为常见。

如阿史那社尔，贞观十年（636）“入朝，授左骁卫大将军，处其部于灵州。诏尚衡阳长公主，为驸马都尉，典卫屯兵”②。论弓仁，本吐蕃族也，“圣历二年（699），弓仁以所统吐浑七千帐自归，授左玉钤卫将军”③。

三　来朝蕃客授官的方式

以上我们从制度层面探讨了唐代蕃客的授官情况，现实中，蕃客授官更体现出其多样性和灵活性。唐代来朝蕃客的授官方式，大致可分为以下情形。

1. 主动内附授官

如裴绰，疏勒国王，“武德中来朝，授鹰扬大将军，封天山郡公，因留阙下，遂为京兆人”④。契苾何力，“其先铁勒别部之酋长也。父葛，隋大业中继为莫贺咄特勤……特勤死，何力时年九岁，降号大俟利发。至贞观六年（632），随其母率众千余家诣沙州，奉表内附，太宗置其部落于甘、凉二州。何力至京，授左领军将军”⑤。阿史那社尔，突厥处罗可汗之次子，贞观十年

① 《旧唐书》卷195《回纥传》，第5201页。
② 《新唐书》卷110《阿史那社尔传》，第4115页。
③ 《新唐书》卷110《论弓仁传》，第4126页。
④ 《旧唐书》卷146《裴玢传》，第3969页。
⑤ 《旧唐书》卷109《契苾何力传》，第3291页。

“入朝，授左骁卫大将军”①。

2. 降将授官

如颉利可汗，贞观四年（630）被俘至京师，太宗“遂授右卫大将军，赐以田宅”②。思摩，颉利族人也，“武德初，数来朝贡，高祖封为和顺郡王。及其国乱，诸部多归中国，唯思摩随逐颉利，竟与同擒。太宗嘉其忠，除右武侯大将军、化州都督”③。仆骨歌滥拔延，铁勒人，“贞观二十年，铁勒九姓大首领率其部落来降……授歌滥拔延为右武卫大将军、金微都督”④。

3. 质子宿卫授官

质子即外族差遣王室成员到唐廷宿卫，他们有的是出于被迫，更多的则是主动提出申请。如高宗初年，唐廷“谋取西、庭二州，刺史骆弘义以闻，高宗遣通事舍人乔宝明驰抚，因令贺鲁遣子咥运入宿卫。咥运中悔，劫于势，不得去，拜右骁卫中郎将”⑤。宁远国，“〔天宝〕十三载（754），王忠节遣子薛裕朝，请留宿卫，习华礼，听之，授左武卫将军”⑥。米继芬，其先西域米国人也，代为君长，祖，任本国长史；“父讳突骑施，远慕皇化，来于王庭。……特承恩宠，累践班荣，历任辅国大将军、行左领军卫大将军。公承袭质子，身处禁军”，为左神策军散副将、游骑将军守左武卫大将军同正兼试太常卿，永贞元年（805）终⑦。质子“多为王子或王弟”⑧，他们来唐宿卫，一般

---

① 《新唐书》卷110《阿史那社尔传》，第4114～4115页。
② 《旧唐书》卷194上《突厥传》，第5159页。
③ 《旧唐书》卷194上《突厥传》，第5163页。
④ 《旧唐书》卷121《仆固怀恩传》，第3477页。
⑤ 《新唐书》卷215下《突厥传》下，第6060～6061页。
⑥ 《新唐书》卷221下《西域传》下，第6250页。
⑦ 《补遗》第3辑，第143页；《续集》永贞003，第796页。
⑧ 章群著《唐代蕃将研究》，第101页。

要授予军职。关于质子入朝宿卫的情况，章群先生在其大作《唐代蕃将研究》一书中有详细讨论，可资参考。

4. 入朝使者授官

唐廷对于来朝的部分外交使节，也授以官职。如室利佛逝，“咸亨至开元间，数遣使者朝，表为边吏侵掠，有诏广州慰抚。又献侏儒、僧祇女各二及歌舞，官使者为折冲”①。“大历中，诃陵使者三至。元和八年（813），献僧祇奴四、五色鹦鹉、频伽鸟等。宪宗拜内四门府左果毅，使者让其弟，帝嘉美，并官之”②。外国使者不可能真正在唐廷为官，因此，授予他们的武官名号基本上都是一些闲散的官称，而没有任何职事。

5. 袭父官

夷狄君长之子袭官爵的情况在唐代较为常见，凡袭官爵者，“皆辨其嫡庶，详其可否，以上尚书”③。如仆固怀恩，铁勒部落仆骨歌滥拔延之曾孙，“世袭都督”④。马驰先生对唐代蕃客袭官爵的情况有详尽论述⑤，故略而不论。

总之，在唐朝官僚体系中，尤其是在武官群体中，有着数量众多的蕃客。在民族交往日益频繁的唐朝，如何规范和制度化初投蕃客的官职授予，是当时朝廷面临的重要问题。从初唐至中唐，朝廷都在不断完善相关方面的制度规章，中央不仅设置专门的机构来管理蕃官，而且也有专门的武散阶授给初附首领。从这些事实来看，唐代官阶制呈现出明显的胡汉二元色彩，即带有一定的民族特色，这为后世多民族国家的官员管理和任命提供了借鉴和典范，在今天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以武官名号大量授予初

---

① 《新唐书》卷222下《南蛮传》下，第6305页。
② 《新唐书》卷222下《南蛮传》下，第6302～6303页。
③ 《大唐六典》卷18“鸿胪卿”条，第361页。
④ 《旧唐书》卷121《仆固怀恩传》，第3477页。
⑤ 马驰著《唐代蕃将》，三秦出版社，1990，第55～64页。

附蕃客，为朝廷重用蕃将及其后裔提供了制度上的便利，对唐代军队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唐朝很多名将，都是这些初附蕃客的后裔，如李光弼、裴玢等[①]，这一现象在唐代有其深刻的制度根源，即唐朝初附蕃客的授官制度。

第二节　唐代宦官的武官授予

众所周知，唐朝宦官专权的主要原因在于其掌握了北衙禁军。而安史之乱以后的北衙禁军，神策军为其主力，其兵员在德宗贞元时期曾扩编至15万人[②]。作为神策军、神威军高级将领的护军中尉、中护军，是唐朝专门为宦官设置的专职武官名号，他们在唐代中后期政治舞台上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因此，本节就主要对唐代宦官授予武官一事作重点讨论。

一　宦官授予武官的历史原因

唐朝建立初年，“太宗诏内侍省不立三品官”[③]，以限制宦官权力的过度膨胀。但是，从武则天以来，宦官人数不断增多，官品也在不断提高。从玄宗开始，宦官已经大量染指武官名号，有的甚至统兵出征，如：杨思勖，“从玄宗讨内难，擢左监门卫将军，帝倚为爪牙”，后来又多次带兵出征[④]；吐突承璀也曾以“招讨宣慰使”的身份率军出征[⑤]。

宦官真正掌握北衙禁军兵权，获得稳定的专职武官名号是在

① 《旧唐书》卷110《李光弼传》，第3303页；《新唐书》卷110《裴玢传》，第4129页。

② 齐勇锋：《说神策军》，《陕西师大学报》1983年第2期，第96页。

③ 《新唐书》卷207《宦官传》上，第5855页。

④ 《新唐书》卷207《宦官传》上，第5857页。

⑤ 《新唐书》卷207《宦官传》上，第5869页。

安史之乱以后。宦官为何被授予专职武官名号并统领北衙禁军，历来学者都在进行不断的探讨，相关论著也层出不穷[①]。结合近年来的研究成果，笔者将唐代宦官掌握北衙禁军的原因，归纳为关键在于宦官取得了皇帝的政治信任。

神策军原为防御吐蕃而设置的戍边部队，安史之乱期间，调入中原参加平叛。代宗广德元年（763），吐蕃攻入长安，神策军在宦官鱼朝恩的率领下，因救驾有功，从边军升为禁军。建中四年（783），“及泾师乱，帝召近卫，无一人至者，惟〔窦〕文场等率宦官及亲王左右从。至奉天，帝逐〔白〕志贞，并左右军付文场主之”[②]。这一事件使德宗认为，只有宦官最可信，因此，将夺回给士人的神策军兵权又重新交给了宦官，并设置护军中尉和中护军，“分提禁兵”[③]，正式确立了宦官统领神策军、神威军的制度。“护军中尉和中护军，都是正式的军将职称”[④]，分别为神策军和神威军的正式高级将领。除掌握神策军、神威军兵权外，宦官还以辟仗使的身份掌握北衙六军兵权；飞龙兵也是唐后期北衙禁军的一支重要武装，其兵权也由宦官掌管[⑤]。因此，唐代中后期，宦官控制了整个唐代北衙禁军兵权，并逐渐制度化。

由上可知，宦官掌握北衙禁军兵权的原因，主要在于其通过捍卫皇权，维护封建秩序，而赢得了皇帝的政治信任。政治信任

---

① 余言：《略论唐代宦官监军和宦官专典禁军的制度》，《中学历史教学》1980年第2期，第5页；齐勇锋：《说神策军》，《陕西师大学报》1983年第2期，第95页；黄修明：《唐代后期的宦官典军制度》，《南充师院学报》（哲社版）1988年第1期，第108页；牛志平：《唐代宦官》，史念海主编《唐史论丛》第5辑，三秦出版社，1990，第52～53页等。

② 《新唐书》卷207《宦官传》上，第5867页。

③ 《新唐书》卷207《宦官传》，第5856页。

④ 牛志平：《唐代宦官》，史念海主编《唐史论丛》第5辑，第68页。

⑤ 齐勇锋：《唐后期的北衙六军、飞龙、金吾、威远和皇城将士》，《河北学刊》1989年第2期，第79页。

对于高级军官的选任具有极端的重要性。毕竟，高级军官的政治向背，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的政权稳固和统治阶级的地位稳定。由于以上因素，直接导致了统治阶级对高级军官的选拔予以更多的关注。德宗将神策军兵权从士人之手而转交给宦官，便是很好的明证。

二　宦官授予武官的历史现状

从宦官所获得的武官官称来看，大体为两大系统，即职事官系统和使职系统。具体如下。

1. 职事官官衔

主要是南衙十六卫的将军官衔，玄宗时，“中官稍称旨者，即授三品左右监门将军，得门施棨戟”①。这些武官官称最常见者为监门卫将军，如高力士、程元振皆授此官号②；此外，宦官有时还授以左右卫，左右骁卫、左右领军卫将军等官衔③。张国刚先生认为：“南衙诸卫成为闲职后，将军、大将军便成了武臣以至宦官表示资望的迁转之阶”④。事实上，早在南衙诸卫成为闲散之职以前，宦官便开始染指南衙将军的头衔，这也可以说是其权力开始向军事方面渗透的一个信号。

2. 禁军使职官称

唐代北衙禁军的主力——神策军，由于其为中央禁卫军，因此，有与六军诸卫一样的职事官系统；又因其由藩镇边军发展而来，故“又有一套类似于藩镇军将职级和幕府的使府官系统”；其使府僚佐系统主要有：护军中尉、副中尉（护军副使）、神策

---

① 《旧唐书》卷184《宦官传》，第4754页。

② 《旧唐书》卷184《宦官传》，第4757、4761页。

③ 《旧唐书》卷184《宦官传》，第4767页；另参《新唐书》卷207《宦官传》，第5871～5873页。

④ 张国刚著《唐代官制》，三秦出版社，1987，第117页。

军判官·勾覆官·支计官·表奏官·孔目官·驱使官；军将有神策军虞候、都虞候、神策兵马使、神策押衙、散兵马使、神策将（正将）、副将、散将和散副将等[1]。宦官所带的禁军使职官称，最有名的就是护军中尉和中护军，此外，还有神策军护军中尉副使、六军辟仗使、威远军使、飞龙使等[2]。这些官称大部分由宦官专任，士人不得染指；虽然宦官的身份与普通人有异，但从实际职掌来看，无疑他们也应为武官的组成部分之一。这正如本文的绪言所云，我们对武官身份的判定，主要是根据其职事，亦即“职位”，而非“品位”。

宦官还充任一些由士人充任的禁军军职，如：鱼朝恩，代宗永泰二年（766）为右监门大将军、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神策军兵马使[3]；刘希暹、王驾鹤，大历五年（770）分别为神策军都虞候和都知兵马使[4]；可见，唐代中后期，宦官以军将的名义在社会上出现，已经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自从护军中尉、中护军设置后，“北衙诸军之权总于这些宦官使职手中，将军、大将军实际并无兵权，与南衙诸卫将军一样成了勋臣供养之职”[5]。

总之，宦官充任“武官”，掌握北衙禁军兵权，根本原因在于皇帝对他们的政治信任。宦官统兵，在唐代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因为它是武官领域内出现的异质现象，给唐代政治带来了诸多消极影响，虽然其初衷是出于维护皇权的需要，但最后一定程度上却成为威胁皇权的工具。

---

① 张国刚：《唐代的神策军》，《唐代政治制度研究论集》，第116～120页。

② 黄修明：《唐代后期的宦官典军制度》，《南充师院学报》1988年第1期，第108～109页。

③ 《旧唐书》卷11《代宗本纪》，第283页。

④ 《资治通鉴》卷224，唐代宗大历五年“观军容宣慰处置使”条，第7210页。

⑤ 张国刚著《唐代官制》，第118页。

第三节　其他选任方式

唐代武官的选拔，除以上途径外，还有以下几种。

一　由文转武

唐代文武分途并不严格，尤其是五品以上官员的选任机构合一，为出将入相、由文转武提供了制度上的便利。高级文官转任武官的事例极为常见，北宋时人宋敏求云："唐文武参用，袁滋自尚书左丞出华州刺史，召为左金吾卫大将军，如是者数人。"① 又郭元振，"举进士，授通泉尉"，迁右武卫铠曹，"大足元年(701)，迁凉州都督、陇右诸军州大使。……神龙中，迁左骁卫将军，兼检校安西大都护"②。裴光庭，"早孤。母库狄氏，则天时召入宫，甚见亲待，光庭由是累迁太常丞。后以武三思之婿缘坐，左迁郢州司马。开元初，六迁右率府中郎将，擢授司门郎中"③。

对于六品及其以下的低级文官，国家也从政策上为他们转任武职，提供了制度保障。开元十九年（731）四月二十六日敕："吏部选人请武选者，宜取强壮身材六尺以上，籍年四十以下，堪统领者。"④ 具体事例如卒于开元十年（722）的于璡，"解褐万州司法参军，非其好也。俄从武调授右监门卫司阶，迁右武卫贵安府长上果毅"⑤。卒于开元十二年（724）的樊庭观，明经擢

① 《春明退朝录》卷上，第13页。
② 《旧唐书》卷97《郭元振传》，第3042～3044页。
③ 《旧唐书》卷84《裴光庭传》，第2806页。
④ 《唐会要》卷59"兵部尚书"，第1029页。
⑤ 《补遗》第5辑，第336页。

第，改从武选，“释褐授昭武校尉、左玉钤卫长上”①。卒于天宝四载（745）的陈敬玄，“年廿八，解褐桐庐丞。……秩满，属凶奴犯塞，边军失守。公志怀远略，愿灭胡尘，遂求转武职，授彭州天水府左果毅”②。

文转武职的事例在安史之乱以后，逐渐减少，尤其是晚唐时期，更多的是武职请求改转文职者。僖宗广明元年（880）的制文明确提到：“近者武官多转入文官，依资除授，宜惩僭幸，以辨品流。自今后武官不得转入文官选改，所冀轮辕各适，秩序区分，其内司不在此限。”③ 严禁武官改转文官。

二　荐举

荐举是朝廷选拔官吏的一种重要方式，大致可分为两大类，即公荐和私荐：前者包括举人自代、常参官和地方长官荐举、宰臣及部门长官举荐、差遣使职荐举、冬荐、泛荐和诏荐等几种；后者主要指私人之间的推荐，如直接请托于选司掌选者④。由于宁欣先生对此问题已经做过较为深入细致的研究，而且唐代也没有规定文武官职必须分开荐举，因此适用于文官的荐举制度，很大一部分也适用于武官。故本人在此无需赘述，只是聊举几例，证明在武官选任制度中，荐举的广泛存在。如：

> 赵国珍，牂柯之苗裔也。天宝中，以军功累迁黔府都督，兼本管经略等使。时南蛮阁罗凤叛，宰臣杨国忠兼剑南节度，遥制其务，屡丧师徒。中书舍人张渐荐国珍有武略，

① 《汇编》开元196，第1293～1294页；《补遗》第1辑，第109页。
② 《续集》天宝049，第615～616页；《补遗》第6辑，第76页。
③ 《旧唐书》卷19下《僖宗本纪》，第705页。
④ 宁欣：《论唐代荐举》，《历史研究》1995年第4期，第125～129页。

习知南方地形，国忠遂奏用之。[1]

天宝末年，“玄宗眷求良将，委以河北、河东之事，以问〔郭〕子仪，子仪荐光弼堪当阃寄。十五载（756）正月，以光弼为云中太守，摄御史大夫，充河东节度副使、知节度事”[2]。

在一些敕文中，也反复提到武官的荐举问题，如建中元年（780）的敕文云：

> 常参官及节度、观察、防御、军使、城使、都知兵马使、诸州刺史、少尹、赤令、畿令、并七品已上清望官，及大理司直评事，授讫三日内，于四方馆上表，让一人以自代。其外官与长吏勾当，附驿闻奏。其表付中书门下。每官缺，即以见举多者，量而授之。[3]

其中的节度、防御、军使、城使、都知兵马使和常参武官等武职属于荐举范畴。

长庆二年（822）三月的诏敕：“武班之中，淹滞颇久。又诸荐送大将，或随节度使归朝。自今已后，宜令神策六军军使及南衙常参武官，各具历任送中书门下，素立大功及有才器者，量加奖擢”④，也提到地方使府荐送到朝廷的将领之事。

在使府武职僚佐的辟署中，也存在推荐一途，如第五章所云之朱忠亮，李晟将其“荐于浑瑊，署定平镇都虞候”⑤；卒于咸通

① 《旧唐书》卷115《赵国珍传》，第3374～3375页。
② 《旧唐书》卷110《李光弼传》，第3304页。
③ 《唐会要》卷26“举人自代”，第490页；另参《（宋本）册府元龟》卷630《铨选部·条制》第二，第2029页。
④ 《旧唐书》卷16《穆宗本纪》，第495页。
⑤ 《旧唐书》卷151《朱忠亮传》，第4056页。

七年（866）的张周抗，经丞相推荐，“持函来见府主，署兵马使”①，府主即藩帅。

可见，在唐代武官选任制度中，荐举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从举主来看，一般为高级将领或其他文官；从被推荐者来看，则职位高低不等；从荐举充任的职位而言，有荐举作高级将领者，也有荐举充任一般基层武将者。所以，唐代武官的荐举体现出多元化、多层次的特点。

三　投诚

这是唐代武官来源的重要途径之一。战争中，常有敌军投降，或敌军将领主动投奔的情况，对于敌军中的出色将领或兵士，唐朝中央也常授之以武官。如唐初名将李勣，原为李密部下，武德二年（619），李密“为王世充所破，拥众归朝”，李勣也随后归唐，高祖“诏授黎阳总管、上柱国、莱国公。寻加右武侯大将军”②。刘德威，“武德元年（618），〔李〕密与王世充战败入朝，德威亦率所部随密归款。高祖嘉之，授左武侯将军”③。尚可孤，“隶范阳节度安禄山，后事史思明。上元中归顺，累授左、右威卫二大将军同正，充神策大将”④。降将授官的情况，有唐一代屡见不鲜。

四　卫士、白丁、官健因年劳或才能授官

唐代一部分武官是从卫士、白丁或官健中选拔的，他们除依靠军功升入仕途外，还有一途即年劳或才能。积年劳授官

---

① 《汇编》广明003，第2501页；《补遗》第7辑，第425～426页。
② 《旧唐书》卷67《李勣传》，第2484页。
③ 《旧唐书》卷77《刘德威传》，第2676页。
④ 《旧唐书》卷144《尚可孤传》，第3911页。

者，如卒于神功二年（698）的葛威德，父祖无闻，“少以嫖姚之才，人光供奉之选。御桥骖驾，犯清跸而不惊；辇道啼鸟，应鸣弓而自落。便蕃左右，星岁重深。赠上柱国，拜元城府左果毅”①。卒于贞元九年的李元谅，“少从军，备宿卫，积劳试太子詹事”②。

以才能授官者如冯思顺，曾祖表、祖喜、父仁，皆不仕；君“干能弧矢，艺绝武材。以开元二载（714）补右羽林军平射飞骑，至廿三载（735），授和义郡百支镇副”③。贾雄，曾祖、祖、父，不仕；公“贞元之初，以武艺绝伦，授朔州尚德府折冲都尉。以奖其能也”④。

可见，普通士兵只要表现突出，才能出众，也有机会升进武官行列。

五　征召入仕

即政府主动下诏征求武官人才，如元大亮，“公以圣历元年（698）二月十二日有诏征求，就家拜授。荣恩曲洽，天眷冥扶。……擢授兴教府左果毅都尉”⑤。卒于开元五年（717）的甄亶，“誉满乡曲，声闻厥庭。天后临朝，再加辟命。皆辞以亲老不赴。……复有制征焉，刺史独孤庄率府僚敦谕，起于坟左，乃授左金吾中候”⑥。

---

① 《文苑英华》卷910《唐元城府左果毅赠郎将葛公碑》，“神功”年号无“二年”，仅只“元年”，则神功二年应顺推，为圣历元年，即公元698年，第4789页。

② 《旧唐书》卷144《李元谅传》，第3916页。

③ 《续集》天宝091，第648页；《补遗》第5辑，第397页。此两处的“载”当为“年”。

④ 《续集》开成005，第927页；《补遗》第3辑，第203页。

⑤ 《补遗》第3辑，第42～43页。

⑥ 《文苑英华》卷913《广州都督甄公碑》，第4806～4807页。

六　以亲戚授官

本文的“亲”特指皇亲宗室，“戚”指外戚。唐代皇亲授武官者，不乏其人。如唐高祖堂弟李神通，曾为右翊卫大将军、左武卫大将军①；高祖之子李元吉、李元景、李元嘉也官至十六卫将军②；太宗之子李泰、李慎、李福也官至十六卫将军③。唐朝帝王授予诸子武官，多集中在玄宗以前，玄宗登基以后，为了防范皇室成员，“诸子多不出閤”④，以后诸帝也大体沿袭这一政策。因此，皇子、亲王充任武官人数，与唐代初期相比，大大减少，原因就在于帝王对于家族成员的戒备之心。

以外戚授官者如终于开元二十七年（739）的柳嘉泰，“以公女兄为妃，则申王之旧（舅）。以外戚解褐，授左金吾卫中候”⑤。钟恭容，“开元初，圣主龙飞，六宫旷职。君之女弟，名因礼进，明德举也。师训嫔御，楷模中禁。帝用嘉之，特锡明命。解褐授左威卫中候”⑥。郑光，孝明皇太后弟也，“宣宗即位，光兴民伍，拜诸卫将军，迁累平卢军节度使”⑦。以外戚授官，是裙带关系的典型反映。

七　特例选官

唐代武官选任的特例较多，郭绍林认为，选拔军事人才的异途有因借题发挥使皇帝中意而提拔者，利用体育爱好而猎取军职

---

① 《旧唐书》卷60《宗室传》，第2340～2341页。
② 《旧唐书》卷64《宗室传》，第2421、2424、2427页。
③ 《旧唐书》卷76《宗室传》，第2653、2664、2665页。
④ 《新唐书》卷49下《百官志》四下，第1305页。
⑤ 《文苑英华》卷908《右武卫将军柳公神道碑》，第4777～4778页。
⑥ 《续集》天宝070，第632页；《补遗》第5辑，第389页。
⑦ 《新唐书》卷206《外戚传》，第5853页。

者，中央禁军将校借贿赂宦官而谋取军镇节度使职务者[1]事实上，除郭氏列举的异途外，还有：

以尚主拜官。如高宗时的程处亮，“以功臣子尚太宗女清河长公主，授驸马都尉、左卫中郎将”[2]。薛伯阳，“以尚公主拜右千牛卫将军、驸马都尉”[3]。

以钱买官。如开元二年九月，“太常少卿姜晦上疏，请以空名告身，于六胡州市马，率三十匹马酬一游击将军。时厩中马缺，乃从之”[4]。除以马买武官外，晚唐还存在直接的以钱买官现象，这在刘允章的《直谏书》一文中，有明确体现[5]。

依靠关系获官。如唐末时人陈敬瑄，“田令孜兄也。少贱，为饼师，得隶左神策军。令孜为护军中尉，敬瑄缘藉擢左金吾卫将军、检校尚书右仆射、西川节度使”[6]。

因国家庆典授官。如梁朝，曾祖、祖、父，不仕；“公因广德元年，山陵行从，及册立承忧，起家授泽州高平府别将”[7]。卒于大和七年（833）的车益，祖不详；父说，唐朝议郎鄜州直罗县令。“国有庆命，官无遗贤，授公游骑将军京兆真化府折冲都尉”[8]。

总之，唐代武官的选拔方式纷繁复杂，除正规途径外，异途也花样众多。以钱买官、改伪为真、媚道求进、无功受赏等现象较为常见[9]，这是选拔制度不完善的表现之一。

---

① 郭绍林：《唐代选拔军事人才的途径》，《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2 年第 3 期，第 87～88 页。

② 《旧唐书》卷 68《程知节传》附，第 2504 页。

③ 《旧唐书》卷 73《薛稷传》附，第 2592 页。

④ 《唐会要》卷 72“马”，第 1302 页。

⑤ 《全唐文》卷 804《直谏书》，第 8449 页。

⑥ 《新唐书》卷 224 下《陈敬瑄传》，6406 页。

⑦ 《续集》元和 046，第 832～833 页；《补遗》第 5 辑，第 424 页。

⑧ 《汇编》大和 060，第 2139 页；《补遗》第 5 辑，第 432 页。

⑨ 《全唐文》卷 804《直谏书》，第 8449 页。

结　语

武官选任制度的建立，是军队发展的需要、政治的需要，同时也是整个中央集权化进程的一部分。武官选任的结果，特别是一些高级将领和关键位置的军将选任，是政治力量的合理体同。

一

本书是对唐代武官选任制度做初步研究，归纳起来，唐代武官铨选程序和选任途径有如下特点。

1. 唐代武官选任制度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

与唐代兵制发展的三阶段相适应，唐代武官选任制度也经历了三个明显的发展过程，即玄宗以前、玄宗时期以及安史之乱以后。

玄宗以前，武官的选任权力集中在朝廷，实行兵部负责中低级武官铨选，宰相负责高级武官选任的分层任命模式，这一时期的武官选任，体现出浓厚的中央集权色彩。

玄宗朝，是唐代武官选任制度发生变化的时代，当时新旧两种体制并存，即边镇（节镇）幕府军将的奏授辟署制和朝廷的兵部铨选同时存在。虽然节度使由朝廷任免，但是“唐朝对于边疆节度使的控制已经不是建立在制度的监督或者制约上，而是建

立在皇帝对于军事统帅的个人恩信之上”[①]。唐朝皇帝不仅对节度使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对其属下武官的任命也主动下放权力，由节度使负责所属军官的铨试。现实中，节镇武官实际上是通过奏授辟署制任命的，即节度使的辟署计划和朝廷的官职任命相结合。这样一种任官模式，对原有的武官铨选制度造成了强烈冲击，一方面削弱了兵部的铨选权力，另一方面又使武官选任权呈现出下移趋势，助长了藩镇割据局面的形成。

安史之乱后，节度使体制从边疆延伸到内地，边镇幕府奏授辟署制也随之向内地推广，并实现了普遍化和制度化。北衙禁军的军官选任，自德宗贞元十二年（796）以来，也被统兵宦官所掌管，由护军中尉等牒送中书门下，为所属武将奏请官职。兵部所掌控者仍然为部分低级武官的任命，只是其铨选对象已经减少。可见，安史之乱以后的武官制度，实际上形成了四个武官选任部门，即藩镇、北衙禁军、兵部和中书门下。兵部权力的极度削弱，是由于方镇跋扈于外，宦官擅兵于内。在兵部之外，中书门下和藩镇、北衙禁军构成了另一占主导地位的武官任命系统。原则上，后两个部门的武官任命，都必须向中书门下汇报，由中书门下审批确认。这一事实表明，中书门下将藩镇和北衙禁军的低级军官全部纳入到了敕授官范围。但实际上，中书门下在藩镇和北衙禁军的军官任命中，所起的实际作用比较有限，通常都是例行奏授手续而已。这种武官任命的格局，一方面与军队的领导体制有直接联系，安史之乱以后，唐朝中央没有建立一个统一的最高军事行政机构，藩镇军、南·北衙禁军互不统属，这便为军权的分割、武官任命系统的各自分立，从制度上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这也是中央与地方藩镇，南衙朝官与北衙宦官之间长期

① 张国刚：《唐代中央军事决策与军队领导体制论略》，《南开学报》2004 年第 1 期，第 51 页。

斗争的结果。

2. 唐代武官选任途径众多、选任对象繁杂

唐代武官选任途径众多，大体有军功、门荫、科举、辟署、蕃客入朝、由文转武、荐举、征召、从行伍中选拔、宦官授以武官、投诚、以钱买官、以皇亲宗亲或外戚授官以及其他的一些特例选官等。选任途径的众多，是唐代武官选任制度不成熟、不完善的侧面体现。唐代武官选任对象较为庞杂，卫官、普通士兵、文官、宦官、平民百姓、来朝蕃客等，都有应选资格。在乱世，甚至奴隶也可以通过参军的方式步入军官阶层，如大唐初年的钱九陇、马三宝等①。安史之乱以后，很多破产农民和无业游民也投身军戎，充当职业雇佣军②，他们也成为基层军官的来源之一，这为军官群体一定程度的平民化奠定了基础；但另一方面，藩镇体制下的军官群体又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世袭现象，这就必然影响到唐代中后期的军官选拔。

唐代武官选任制度的不成熟性，是由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决定的。唐代仍然是一个以家族制度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皇权也是建立在家族制度基础之上的，因此，各种封建宗法关系存在于社会当中，对当时的选官制度造成了诸多不利影响，如依靠关系授官、门荫选官等便是宗法制度在选官制度中的具体反映。

二

唐代武官选任从制度层面上看，我们可以将之大体分为军

① 《旧唐书》卷57《钱九陇传》，第2299页；《旧唐书》卷58《平阳公主传》，第2315页。

② 张国刚著《唐代藩镇研究》，第69页。

功、门荫、科举、辟署等诸种途径。但是，透过制度表层，本人认为，实质上牵动唐代武官选任的，是以下三大因素。

1. 政治信任

古代中国，任何一个皇帝要维护本朝统治，都必须握住军权。因为，军队既是维护国家政权的机器，也是推翻国家政权的工具。但是，皇帝不可能对任何军务都事必躬亲。因此，如何选用忠诚可靠的武将就成为帝王格外关注的问题。唐代也不例外，政治信任因素在高级将领的选拔中，尤其引人注目。最典型者莫过于德宗正式将北衙禁军兵权交给宦官一事，使宦官充任北衙禁军高级将领职务制度化。德宗这一举动的原因在于，他认为武将不可靠。因为之前不仅有安史之乱，就是在他统治时期发生的朱泚之乱中，武将的举动也令之失望，他们救驾不力，有的甚至公开叛乱（如稍后的李怀光）。而宦官却护驾有功，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些事件使德宗认为，宦官最可信；而且宦官本身为刑余之人，没有夺取皇位的可能。所以，德宗将禁军兵权毅然交给了宦官。尽管部分武将的军事才能明显优于宦官，但是由于他们身为士人，故未能获得北衙禁军的统兵权。

政治信任因素在其他高级将领的任命中，也体现得非常明显。如在平定安史之乱中立下了汗马功劳的郭子仪、李光弼二人，叛乱平定后，皇帝不仅没有重用他们，反而受到猜忌，李光弼因此郁郁而死[①]，郭子仪也在一段时间内被闲置[②]。

玄宗时期，诸王子多不出閤，充任高级武将者也无法与其前朝相比，根本原因也在于玄宗对皇室成员的防范甚严，即对他们失去了政治信任。除了高级将领的选任外，其他将领的选任也一定程度上受到政治信任因素的影响，如任用敌将、任用款附归朝

① 《旧唐书》卷110《李光弼传》，第3311页。

② 《旧唐书》卷120《郭子仪传》，第3454页。

的外族将领等，某种程度上也是基于一种政治信任。

可见，唐代武官选任中，政治信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潜在因素。在高级将领的选任中，政治信任有时是第一位的，才能因素则可能会屈居第二。

2. 才能

才能因素是贯穿于唐代武官选任制度中的一条明显主线，因为，以军功和科举选拔武官，实际上就是依靠才能。军功是战争紧急状态下才能的最佳体现；科举选拔武官，是应举者军事技能或军事谋略的体现，优秀者才能跻身武官行列。征召、荐举、蕃客入朝授以武官，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其军事才能突出。藩镇辟署任用武职僚佐，一般也会考虑被辟者的军事才能。一些藩帅甚至不惜重金，聘请有才者。如德宗贞元时期，襄阳节度使樊泽主动辟请史用诚，“由褥礼以接之，选右职以署之”①。元和年间，侍中彭城公“以缯帛数辈厚致”周玙，辟用其为武职僚佐②。方镇辟署制下武职僚佐的官职升迁，有些宪衔的授予，朝廷就明确规定须有军功，如开成元年（836），中书门下奏：“其御史中丞以上官，并须因有战功，方得奏请。”“敕旨，依奏。”③ 而军功是才能在紧急状态下的最佳体现。即便是门荫入仕，里面也夹杂了才能因素，因为官僚子弟要经过适当的考核和简选程序才能入仕，这本身也是对其才能提出的合理要求。可见，唐代武官选任制度中，贯穿了一条明显的主线，即才能因素，这是其较为合理的成分，也是唐代武官军事素质的基本保证。

3. 裙带关系

中国古代王朝是建立在家族制度基础之上的，因此文武官僚

---

① 《文苑英华》卷910《唐左羽林军大将军史公神道碑》，第4787页。

② 《续集》大中056，第1009页；《补遗》第3辑，第234页。

③ 《唐会要》卷79“诸使杂录”下，第1447页。

的选任，都存在着明显的裙带关系因素，尽管这种因素在官员选任中不一定占据主地导位，但仍占有一席之地，唐代也不例外。在我们所归纳的唐代武官选任途径中，以门荫、外戚、依靠关系授官等，都是裙带关系在武官选任制度中的明显体现。以这种方式任命的武将，有的才能并不突出。唐代最为典型的事例就是武懿宗，其为武则天宗亲，“神功元年（697），孙万荣败王孝杰兵，诏懿宗为神兵道大总管讨之，而娄师德、沙吒忠义并为总管，兵凡二十万，次赵州。懿宗闻贼且至，惧不知所出，欲弃军走，或劝曰：‘贼虽众，无辎载，以钞剽为命，若按兵老之，击其归，可成大功。’懿宗不暇计，退保相州，贼遂进屠赵州。”[①] 胆怯而且没有军事才能的武懿宗，因为外戚关系，被任命为统兵大将，结果还未交战便败逃。又如陈敬瑄，僖宗时护军中尉“田令孜兄也。少贱，为饼师，得隶左神策军。令孜为护军中尉，敬瑄缘藉擢左金吾卫将军、检校尚书右仆射、西川节度使”[②]。

我们并不否认以裙带关系任命的武将中不乏有才能者，但那毕竟是少数。以裙带关系任命武官，本身就是对才能因素一定程度的否定，对武官选任制度的正常运作，也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以裙带关系任命武官的后果，必将导致武官素质和军队实力的下降。

三

唐朝是一个文治武功都堪称的时代，前期，其武将在开疆拓土方面创造了辉煌业绩；而安史之乱及其以后，王朝自身却受到武将的威胁，最后唐亡于藩镇。这些现象我们都不得不与唐代的

---

① 《新唐书》卷206《武懿宗传》，第5842页。

② 《新唐书》卷224下《陈敬瑄传》，第6406页。

武官选任制度联系起来，因为，武官选任制度直接关系到朝廷对军队的控制力度。

武官选任的过程，原本是统治阶级希望通过人员的重新任免与组合，来巩固自己统治、加强对军队控制的过程。然而，事情的发展并不一定朝着既定的方向前进，唐代武官选任制度前后变化所带来的不同后果，便清晰地说明了这一点。

从官员选任角度来探讨中央对地方的控制问题，笔者并非第一人。近年来，已有学者从唐代节度使的选任角度，来讨论唐代中央对地方的控制问题[①]。他们主要从上层军官的选任角度来进行分析，笔者在此所云者，主要是从整个武官，尤其是基层武将的选任角度，来讨论唐代中央对地方军队，顺带涉及对北衙禁军的控制问题。

玄宗以前，全国军官由朝廷统一任命，因此，这一时期朝廷对于全国军队的控制非常有力，所有军队都受中央的有效指挥和调动，他们是名副其实的中央军。

玄宗时期，承继睿宗以来的节度使体制，并进一步发展。边镇节度使主要通过奏授辟署制为属下武将奏请官职，在合法外衣

---

① 如台湾学者王寿南先生根据唐代主要藩镇藩臣（节度使）的任期、藩镇受镇原因、藩镇未至镇原因、被贬被诛情况，详细研究了唐朝中央对藩镇控制力的演变过程，指出：代宗朝可以称之为唐中央对藩镇控制力薄弱的第一个时期；德宗朝为唐朝中央对藩镇控制力薄弱的第二个时期；宪宗朝是安史之乱后中央对藩镇控制力最强的一段时间，穆宗、敬宗对藩镇的控制力又大大减弱；自文宗到僖宗乾符年间，全国藩镇，除河北三镇仍不禀命，昭义一镇，初期尚跋扈外，均属恭顺，这一时期为中央与藩镇之间的和平共处时期；黄巢起义后，中央对藩镇的控制力日渐薄弱，终于完全消失。见王寿南著《唐代藩镇与中央关系之研究》，台北：大化书局，1978，第 54～80 页。李文澜《从唐代地方长官的选任看中央与地方的政治关系——以山南荆楚为例》，通过对山南东道、荆南镇、鄂岳镇节度使的任职情况分析，如任期、任前职务、离任去向、出身等问题的分析，探讨中央对这三镇的控制情况，见《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 19 辑，第 153～163 页。

的遮蔽下，一部分有野心的节度使便利用为属下武将奏授官职的机会，乘机扩张政治势力，如安禄山。奏授辟署制原本是朝廷针对边镇军将在战争紧急状态下，不能及时到朝廷赴选而采取的一种选官模式。但是，朝廷忽略了这种任官模式所带来的重要政治后果，即节度使与边将之间有可能结成利益集团。因为，玄宗时期的节镇军队，与府兵不同，节镇兵在开元二十五年（737）实行了重要改革，即长任兵制的实施。长任兵制的特点之一就是职业兵、兵员子弟可以世袭，家口也常住边地。这样一种军事制度再与节度使的选任权力相结合，就容易为节度使与边将之间利益集团的形成奠定基础，从而加速节镇军队的地方化，削弱了朝廷对节镇军队的控制力。

安史之乱后，由于朝廷威势下降，叛乱也没有被彻底平定，中央对安史余部采取姑息政策。为了制衡边疆藩镇，节度使体制从边疆延伸到内地，原来通行于边疆节镇的奏授辟署制度也延伸到了内地，并实现了制度化和普遍化。原则上中低级武职僚佐由藩帅授予职名，朝官和宪官由藩帅向朝廷奏请，但事实上，高级武职僚佐也往往由藩帅自行任命。使府武职僚佐沿袭玄宗时期边疆节镇的发展趋势，日渐发展为脱离中央的群体。宪宗时期平定部分叛乱藩镇后，中央不断出台政策对武职僚佐的官职奏请、考核、迁转等进行规范，并不断完善，推进其中央化进程，使武职僚佐的任命逐步成为中央政府宏观调控下的藩帅自辟制。藩镇辖下的将领，其官职升迁改转，居间都有节度使这一环节，由节度使为其向中书门下奏请官职。因此，实际上掌控藩镇将领升迁的仍然不是朝廷，而是藩帅。“唐末，藩镇诸州听命帅府，如臣之事君，虽或因朝命除授，而事无巨细皆取决于帅，与朝廷几于相忘”①。由于藩帅是地方军官的直接利益源泉，因此，地方军官

① 《燕翼诒谋录》卷1，第7页。

的效忠对象就从效忠朝廷到效忠地方藩镇，他们中很多人为了地方利益，甚至不惜与朝廷对抗，从而大大削弱朝廷对地方军队的控制力度。

同样局面也发生在北衙禁军。虽然北衙禁军为天子亲军，但是自从宦官充任护军中尉、中护军等高级北衙将领职务以来，北衙禁军内部武将的任免权实际上被宦官操纵，这为宦官与所属武将之间亲从关系的建立奠定了制度基础，从而大大削弱唐朝天子对北衙禁军的掌控，使北衙禁军反而成为宦官威胁皇权的工具。这一局面的发生，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选任制度造成的。

河朔三镇的武官选拔，从安史乱后基本上都由当地节度使自行任免，中央很少过问，即便是藩帅一级的高级将领，也主要是由当地军人自行拥立[①]。这样一种官员任命格局，导致朝廷对此地域内军队实质上的完全失控。

概言之，不同的选拔主体培养出不同效忠对象的军官群体，中央控制下任命的武官一般能够听命于朝廷，地方藩镇控制下任命的武官则一般听命于地方藩帅，宦官控制下任命的武官一般听命于宦官。一旦军官脱离中央控制，成为脱节性群体后，由于效忠对象的变化，如果遇上反动军官的煽动，代之而起的可能就是暴乱或地方军队对中央的叛乱，甚至是对中央权力的直接占有或僭夺。可见，选任制度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军队控制和国家政权的稳定。

① 谷川道雄：《关于河朔三镇藩帅的继承》，《第一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台湾学生书局，1989，第903～913页。

附　录

附表1　唐代千牛入仕表

人　名	出　身	释褐官品	仕　历	卒葬年	史料来源
李道玄	右千牛(正六品下)	洛州总管①(视品官)	洛州总管－洛州刺史－山东道行军总管	武德五年(622)	《旧唐书》卷60《李道玄传》,第2353页
王师表	左千牛备身	尚辇直长(正七品下)	尚辇直长－许州临颍、博州堂邑、沧州乐陵、绵州万安、果州西充五县令－以后不详	不详,其父卒于贞观十五年(641)	《全唐文》卷193,第1951页
杨师道	上仪同、备身左右(正六品下)	尚桂阳公主,(驸马都尉,武散官,从五品下)除吏部侍郎(正四品上)②	吏部侍郎－太常卿－侍中、参豫朝政－中书令(正三品)－吏部尚书－工部尚书－太常卿	贞观廿一年(647)	《新唐书》卷100《杨师道传》,第3927~3928页;参见《旧唐书》卷62《杨师道传》,第2383~2384页

① 唐初,总管没有品阶;而隋代,据《隋书》卷28《百官志》下,总管分为上、中、下三等:上总管,视从二品;中总管,视正三品;下总管,视从三品。唐初制度多沿袭隋代,故在这一官职品阶的界定上,笔者采用了隋代的品阶。

② 起家便升至五品以上,令人疑惑,中间可能有省略,故存疑。

续附表 1

人　名	出　身	释褐官品	仕　历	卒葬年	史料来源
李道宗	左千牛备身	灵州总管	灵州总管－鸿胪卿－左领军、大理卿－灵州都督－大同道行军总管－刑部尚书－礼部尚书－晋州刺史－礼部尚书－太常卿－特进	永徽四年(653)	《旧唐书》卷60《李道宗传》，第2354～2356页
执失奉节	千牛备身、转右屯卫长上校尉(正六品上)	右骁卫善福府右果毅都尉(上府从五品下，中府正六品上，下府正六品下)	善福府右果毅都尉－常乐府左果毅都尉－加上骑都尉	显庆元年(656)	《补遗》第3辑，第362～363页；《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1，第29页
杨思讷	左千牛	纪王府录事参军(从六品上)	纪王府录事参军－益州德阳县令－鄜州司马－凉州司马－凤州刺史(下州，正四品下)	龙朔元年(661)	《补遗》第7辑，第268页
史怀训	太子右千牛备身	不仕		龙朔二年(662)葬	《补遗》第6辑，第356页。
李　震	千牛备身	城门郎(从六品上)	城门郎－尚乘奉御－宗正少卿－泽州刺史－赵州刺史－梓州刺史(正四品下)	麟德二年(665)	《补遗》第2辑，第205～207页；《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一，第38页
杨弘武	左千牛备身	不详	永徽中，为吏部郎中－中舍人－司戎少常伯－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	总章元年(668)	《旧唐书》卷77《杨弘武传》，第2675页

续附表 1

人　名	出　身	释褐官品	仕　历	卒葬年	史料来源
李孝同	左千牛备身	右卫交川府右果毅都尉	交川府果毅都尉－右卫亲卫府左郎将－中郎将－左千牛中郎将兼检校左卫将军－左骁卫将军－普州刺史－播州刺史－右卫将军(从三品)仍旧北门供奉	总章二年(669)	《全唐文》卷992,第10273～10274页
王大礼	右千牛备身	象池府果毅	驸马都尉、象池府果毅－绥州刺史－歙州刺史(从三品)	总章二年	《补遗》第1辑,第48～49页;《汇编》开元175,第1278页
孙　安	千牛	符玺郎(从六品上)	符玺郎－隰城令－会州佐－益州九龙令－硖州司马－襄州司马－青州长史(上州,长史从五品上)	咸亨二年(671)	《汇编》开元139,第1253页;《补遗》第5辑,第333页
韩　昭	东宫千牛－上台千牛－左卫翊□府校尉－右勋府校尉(正六品上)	陈王府典军(正五品上)	陈王府典军－东宫率府郎将(正五品下)－左骁卫万岁府折冲都尉(上府正四品上,中府从四品下,下府正五品下)	咸亨三年(672)	《汇编》咸亨065,第555～556页;《补遗》第2辑,第244页

续附表 1

人　名	出　身	释褐官品	仕　历	卒葬年	史料来源
元　环	左千牛备身	右卫兵曹参军（正八品下）	右卫兵曹参军－宁王府友－尚衣奉御－尚乘奉御－右监门卫中郎将－左监门卫将军（从三品）－卫尉少卿－虢州刺史－怀州刺史－丰王府长史－颖王府司马	上元元年（674）	《续集》大历040，第719页；《补遗》第5辑，第409～410页
杨□哲	千牛	岐州司户参军事（从八品下至从七品下）	岐州司户参军事	上元二年（675）	《汇编》上元016，第604页
阎　庄	左千牛	以军功加骑都尉－拜朝散大夫、守江王友（从五品下）	江王友－相州司马－太子右典戎勋府郎将－左典戎亲府中郎将－东宫宫城副留守－太子左司御卫副率－东宫宫城正留守－太子家令（从四品上）	上元二年	《补遗》第5辑，第10～11页
赵　杰	千牛备身	益州归德府果毅	益州归德府果毅－招慰讨击使－左屯卫郎将（正五品上阶）	其子卒于仪凤三年（678）	《续集》开元084，第511页

续附表 1

人　名	出　身	释褐官品	仕　历	卒葬年	史料来源
唐嘉会	太子千牛	东宫通事舍人（正七品下）	东宫通事舍人－虞部员外郎－交河道行军铠曹－卫州别驾－豪州司马－殿中省尚衣奉御－兰州司马－献陵令兼雍州三原县令－奉膳大夫－司禋大夫－始州长史兼玉河道行军司马－陕州长史－忻州刺史（下州，正四品下）－殿中少监	仪凤三年（678）	《续集》仪凤008，第233页；《补遗》第2辑，第269～270页
高　慜	千牛	不详	官至滑州刺史、将作大匠、金紫光禄大夫、太常卿（正三品）、洪州都督、上柱国、申国公。	卒年不详，其子卒于永隆二年（681）	《全唐文》卷215，第2178～2179页
高　某	千牛备身	海监府左果毅都尉	海监府左果毅都尉－右师（率）府郎将（正五品上阶）－尚辇奉御－尚衣奉御－循州司马	永隆二年	《全唐文》卷215，第2178～2179页
胡玉竭	太子千牛	晋州司兵参军事（从八品下至从七品下）	晋州司兵参军事	其子卒于永淳元年（682）	《汇编》永淳012，第693页
李　嘉	太子左千卫（牛）	越王府户曹参军（正七品上）	太子千牛－越王府户曹参军（正七品上）－隰州县令（正七品上）	永淳元年（682）	《全唐文》卷195，第1977～1978页

续附表 1

人　名	出　身	释褐官品	仕　历	卒葬年	史料来源
安元寿	由秦府右库真拜右千牛备身	果毅都尉	妫泉府果毅都尉—蕲川府果毅－义仁府折冲都尉－右骁卫郎将－左监门卫中郎将－云麾将军－右骁卫将军－右威卫将军(从三品)	永淳二年(683)	《续集》光宅003,第271～272页
崔知温	左千牛	初仕官不详	累转灵州都督府司马－兰州刺史－尚书左丞－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兼修国史－中书令(正三品)	嗣圣元年(684)①	《旧唐书》卷185上《良吏》上，第4791页;《新唐书》106《崔知温传》，第4040页
杨德裔	太子左千牛备身(正七品上)	秀容县令(上县,从六品上)	秀容县令－华亭、福昌、洛县令－颍州、幽州二司马－尚书郎、御史中丞－饶州、括州、越州都督府长史－棣(上州,刺史从三品)曹、恒、常四州刺史	文明元年(684)	《全唐文》卷195,第1978～1979页

① 《旧唐书·崔知温传》载,崔氏卒于永淳三年,而永淳无三年,仅二年。故史书所载的永淳三年当为嗣圣元年(684),或文明元年(684),或光宅元年(684),笔者采纳离永淳二年最近的一个年号嗣圣元年。

续附表 1

人　名	出　身	释褐官品	仕　历	卒葬年	史料来源
王方翼	右千牛	安定县令（上县，从六品上）	安定县令－瀚海都护司马－朔州尚德府果毅－肃州刺史－检校安西都护－庭州刺史－夏州都督（中都督府，都督，正三品）	卒于武后时（690～705）	《新唐书》卷111《王方翼传》，第4134～4136页
韦待价	左千牛备身	永徽中，江夏王道宗得罪，待价以婿贬卢龙府果毅	卢龙府果毅－兰州刺史－凉州大都督府司马－肃州刺史－右武卫将军－检校凉州都督－天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燕然道行军大总管－文昌右相、同凤阁鸾台三品－安息道行军大总管	武后时卒	《新唐书》卷98《韦待价传》，第3904页
庞同本	左千牛	纪王府户曹参军事（正七品上）	纪王府户曹参军事－秦州都督府户曹、杞王府属－洛州福昌县令－鄯州都督府司马、兼检校河兰鄯廓等州营田事－鄜州司马－隆郑二州长史－淄州刺史－建韶二州刺史、广州都督府长史－蔚州刺史－右勋卫一府右郎将、检校右千牛卫中郎将、兼检校洺德二州刺史－兖州都督－左千牛卫将军（从三品）、兼检校太子右卫率	长寿二年（693）	《补遗》第7辑，第327～328页

续附表 1

人　名	出　身	释褐官品	仕　历	卒葬年	史料来源
张玄封	左千牛	尚舍直长(正七品下)	尚舍直长－雅州司兵－渠州麟水县令－合州司马－渝州司马－绛州夏县令－润州丹徒县令－泗州司马－泽州司马(上州,从五品下)	长寿三年(694)	《汇编》长寿034,第857～858页;《补遗》第2辑,第331～332页
契苾明	太子左千牛	朝散大夫、太子通事舍人(正七品下)	太子通事舍人里行－奉辇大夫－左武卫大将军、贺兰州都督－左骁卫大将军(正三品)－燕然道镇守大使－右豹韬卫大将军－左豹韬卫将军并充怀远军经略大使－镇军大将军行左鹰扬卫大将军	证圣元年(695)	《全唐文》卷187,第1897～1899页
于遂古	皇帝千牛	特加四阶,除左武卫龙首府右果毅都尉	龙首府右果毅都尉－榆林府右果毅－永平府左果毅都尉－永平府折冲都尉－隰州刺史(下州,正四品下)	圣历元年(698)	《续集》圣历019,第374页;《补遗》第3辑,第30～31页
秦怀道	太宗文皇帝左千牛	□州司士参军(从八品下至从七品下)	□州司士参军－常州义兴县令	其子卒于圣历二年(699)	《汇编》圣历015,第935页;《补遗》第5辑,第251～252页

续附表 1

人　名	出　身	释褐官品	仕　历	卒葬年	史料来源
秦　俏	大行皇帝千牛	潞州司法参军（大都督府，正七品下）	潞州司法参军（大都督府，正七品下）	圣历二年	《汇编》圣历015，第935页；《补遗》第5辑，第251～252页
萧　缮	左千牛	渝州万寿县令（中下县，令从七品上）	渝州万寿县令－隆州晋安县令－宋州司马－雅州司马－永州长史－潭广二州司马－泸州长史－开州刺史－道州刺史－永州刺史（中州，正四品下）	圣历二年	《续集》圣历011，第369页；《补遗》第5辑，第247～248页
戴希晋	左千牛备身	不仕		圣历二年终，春秋廿有一	《汇编》圣历049，第964页；《补遗》第3辑，第515～516页
封言道	左千牛备身	承议郎、行通事舍人	通事舍人－尚书司门郎中－汝州刺史－汴州刺史－齐州刺史－蕲州刺史－金州刺史－虔州刺史－广州都督－广州刺史－沧州刺史－瀛州刺史－青州刺史－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扬州别乘－怀州刺史	圣历二年	《唐淮南道大长公主驸马封言道墓志考释》，《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4期，第66～68页

续附表 1

人　名	出　身	释褐官品	仕　历	卒葬年	史料来源
			-汴州刺史-贵州刺史-温州刺史-滁州刺史-淄州刺史-普州刺史-鳌州刺史-宋州刺史		
于大猷	左千牛备身	缘坐左迁梓州参军事(从七品下)	梓州参军事-桂州都督府功曹参军-苏州司兵参军-并州大都督府士曹参军-洛州□□参军-□州□官县令-德州司马-汾州长史-随州刺史(正四品下至从三品)-雍州明堂县令	圣历三年(700)	《全唐文》卷237,第2394~2396页
武懿宗	太子右千牛备身	泽州司法参军事(上州,从七品下)	泽州司法参军事-泉州司兵参军事-都水监丞-水衡都尉-司农卿-殿中监-左右金吾大将军(正三品)-司属卿-洛州长史-魏、汴、同、许四州刺史-怀州刺史-营缮大匠-神兵军大总管-太子詹事	神龙二年(706)	《补遗》第2辑,第14~15页;《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3,第132页。参《旧唐书》卷183《武懿宗传》,第4737页
阚嗣恭	右千牛备身左右	沧州司仓参军事(上州,诸曹参军从七品下)	沧州司仓参军事	其女儿卒于景龙二年(708)	《汇编》景龙012,第1085页

续附表 1

人　名	出　身	释褐官品	仕　历	卒葬年	史料来源
颜　瑶	右千牛	秦州都督府士曹参军事(从七品下至正七品下)	秦州都督府士曹参军事(从七品下至正七品下)	景龙二年	《唐文拾遗》卷 65，第 11100 页
豆卢望①	太子左千牛	遂州司兵参军(中都督府，从七品上)	遂州司兵参军－尚食直长－右监门□□□－卫尉寺丞－詹事丞－尚书库部郎中－主爵郎中－太子右卫率府中郎将－左卫勋府中郎将－太子左清道副率－冀州刺史－怀州刺史－兵部□□－检校同州刺史－太仆卿－左千牛将军－婺州刺史－越州都督－太府卿－鸿胪卿－中书令－检校太常卿、西京留守－太府卿－刑部尚书－太子詹事－尚书右仆射－尚书仆射(从二品)知军国重事，兼检校安国相王府长史，兼中书令、知兵部事、监修国史	景龙三年(709)	《补遗》第 7 辑，第 30～31 页；参见《旧唐书》卷 90《豆卢钦望传》，第 2921～2922 页
卢元衡	千牛备身	贝州司功参军事(望郡，从八品下、正八品下、从七品下)	贝州司功参军事－沣州司功－扬府功曹参军事(大都督府，正七品下)	葬于景龙三年	《补遗》第 7 辑，第 347～348 页

① 《旧唐书·豆卢钦望传》云，其名“钦望”；《新唐书》本传亦作如是载。而墓志云：“公讳望，字思齐”。笔者认为，《旧唐书》、《新唐书》本传的名字记载可能有误，应以墓志为主。

续附表 1

人　名	出　身	释褐官品	仕　历	卒葬年	史料来源
□　瑶	右千牛	秦州都督府上曹参军事(中都督府,诸曹参军从七品上)	秦州都督府士曹参军事	景龙四年(710)终,春秋廿二	《汇编》景龙044,第1111页
邓　温	太子左千牛	鄜邑左果毅都尉	鄜邑果毅都尉－灌钟府折冲都尉－金谷府左果毅都尉－淮阴府折冲都尉－检校西州都督、西州刺史－杭州刺史－贝州刺史－秦州刺史(中都督府,正四品下至从三品)－定远将军、右卫率(正四品上),加忠武将军	太极元年(712)	《续集》延和001,第449页;《补遗》第4辑,第404～405页
独孤思行	太子左千牛	齐州判佐①(齐州,上州,判佐如司法、司户等参军,从七品下)	齐、卫、洛三判佐－尚乘直长－永宁令－尚乘奉御兼陇右西使－洮、叠、原三州上佐－奉御兼知北使－虞候率－渭(不详)、沅(下)、开(下)、洋州刺史(正四品下至从三品)	先天二年(713)	《续集》开元075,第504页;《补遗》第2辑,第17页

① 《通典》卷33《职官》一五:司功、司仓、司户、司兵、司法、司士等六参军,"自司功以下,通谓之判司"。故判佐应为这六参军之一,第910～911页。

续附表 1

人　名	出　身	释褐官品	仕　历	卒葬年	史料来源
陆景融	千牛	新郑县令（望县，从六品上至从七品下）	累迁工部尚书（正三品）、东京留守	卒年不详，其兄陆象先卒于开元年间（713～741）	《新唐书》卷116《陆景融传》，第4238页
王　崇	左千牛	兖州司功参军（从八品下至从七品下）	兖州司功参军－许州司户－黔州石城县令－太子舍人	其女儿卒于开元二年（714）	《汇编》开元007，第1153～1154页
李元谨	太子左千牛	尚舍直长（正七品下）	尚舍直长（正七品下）	其子卒于开元七年（719）	《续集》开元029，第472页
郑君琏	左千牛	不详	云麾将军、右卫郎将	其子卒于开元八年（720）	《汇编》开元194，第1292页
崔　瑛	左千牛备身	蜀州司士参军事（从八品下至从七品下）	蜀州司士参军事（从八品下至从七品下）	开元十六年（728）卒，年二十七	《汇编》开元285，第1352页；《补遗》第7辑，第371页
陶　禹	右千牛	尚食直长（正七品下）	尚食直长－家令丞－典设－符宝郎－濮州司马－卫州长史－太子中允仆－郑王府长史－国子司业（从四品下）－绵、泽、陈三郡牧（刺史）	开元十九年（731）	《汇编》开元320，第1378页；《补遗》第4辑，第418页

续附表 1

人　名	出　身	释褐官品	仕　历	卒葬年	史料来源
皇甫慎	左千牛	尚舍直长(正七品下)	尚舍直长－尚乘直长－监门卫长史(从六品上)	开元十九年卒	《汇编》开元324，第1381页；《补遗》第2辑，第486页
薛　璿	左千牛	魏王府骑曹参军(正七品上)	魏王府骑曹参军－郑州司户参军事－符宝郎－太子右赞善大夫－黄州司马－滁州别驾－贝州司马－靖陵令－太庙令－左卫中郎兼恭陵使－陇州刺史(上州，刺史从三品)－内率兼乔陵使、检校右领军卫将军	开元廿年(732)	《汇编》开元347，第1395～1396页；《补遗》第1辑，第126～127页
卢全操	右千牛备身	尚辇直长(正第七品下阶)	尚辇直长－通事舍人－泽州晋城县令－襄州襄阳县令－尚乘奉御－邠州别驾－泽州别驾－房州刺史(上州，从三品)	开元廿三年(735)	《汇编》开元421，第1447～1448页；《补遗》第2辑，第507～508页
房　宣	千牛	洛州参军(从八品上至从七品下)	洛州参军－武卫仓曹－尚乘直长－岐州司仓参军	开元廿七年(739)	《汇编》开元505，第1502页

续附表 1

人　名	出　身	释褐官品	仕　历	卒葬年	史料来源
裴　稹	左千牛备身	太子通事舍人（正七品下）	太子通事舍人－太常寺主簿－京兆府司录参军－起居郎－给事中（正五品上）－尚书祠部员外郎	开元二十八年（740）①	《全唐文》卷393，第3994～3995页；《汇编》开元523，第1515～1516页
杨仲宣	右千牛	太庙丞（从七品上）	太庙丞－蕲州司户参军－嵩州台登县尉－河阳县尉－蒲州司法参军－监察御史－汾州孝义县令－华州下邽、河南巩县令－礼部员外郎－左司员外郎－吏部员外郎－吏部郎中（正四品上）	开元二十九年（741）	《全唐文》卷235，第2372～2373页
苏　咸	左千牛	尚食直长（正第七品上下阶）	尚食直长－尚□奉御－左卫郎将－蕲川府右果毅－襄、怀等州尚从都尉－陇州司马－济、滑二州别驾－左司御率－左□卫将军（从三品）－东都副留守	开元廿九年（741）	《汇编》开元537，第1526页；《补遗》第1辑，第150页

① 《汇编》云，裴稹“以开元廿八年十二月十九日，终于长安光德里私第”；而《全唐文》卷393《唐故尚书祠部员外郎赠陕州刺史裴公行状》云，裴稹“开元二十九年某月日，薨于私第”。笔者认为应以墓志为主。

续附表 1

人　名	出　身	释褐官品	仕　历	卒葬年	史料来源
孙　俊	千牛	不详，第六政除嘉州刺史	不详－嘉州刺史－安北都护－灵州都督－邢州刺史－左羽林卫将军(从三品)	葬于开元二十九年(741)	《补遗》第3辑，第69～70页
薛待聘	右千牛	通事舍人(从六品上)	通事舍人(从六品上)	不详，其曾孙卒于天宝元年(742)	《全唐文》卷403，第4117页
姚　奕	右千牛	太子舍人(正七品下)	太子舍人－睢阳太守－太仆卿－礼部侍郎－尚书右丞－永阳太守	卒于天宝年间（742～756）	《新唐书》卷124《姚奕传》，第4388页；《旧唐书》卷96《姚崇传》附，第3029页
曹惟思	千牛备身	泽州判司(泽州，上州，诸曹参军事从七品下)	泽州、相州判司－蜀郡法曹参军(蜀郡大都督府，诸曹参军正七品下)－章仇兼琼时为西山运粮使	安史之乱(755)前后①	《太平广记》卷126《曹惟思》，第892～893页
李　萼	左千牛	不详	不详－京兆府折冲都尉－右率府郎将(正五品下)	卒于安史之乱时(755～763)	《汇编》贞元028，第1858页；《补遗》第1辑，第221页

① 据《新唐书》卷42《地理》六，章仇兼琼曾在天宝年间给万岁池筑堤，“积水溉田”，第1079页；另《新唐书》卷206《杨国忠传》，也载其为剑南节度使时，与宰相李林甫不合之事。可见，章仇兼琼为玄宗时人，则曹惟思由千牛备身入仕，也在开元、天宝时期，卒年也应在安史之乱前后，第5846页。

续附表 1

人　名	出　身	释褐官品	仕　历	卒葬年	史料来源
李怀一	左千牛	并州晋阳县尉（从八品下）	并州晋阳县尉（京县，尉从八品下）	不详，其孙卒于上元元年（760）	《全唐文》卷784，第8198页
慕容曦皓	千牛备身	尚舍直长（正第七品上阶）	尚舍直长－押蕃浑使－尚衣奉御－左武卫大将军（正三品）、大同军使	宝应元年（762）	《续集》大历008，第697页；《补遗》第2辑，第28～29页
苏　震	千牛	殿中侍御史（从七品下）	殿中侍御史－长安令－御史中丞－文部侍郎－河南尹－济王府长史－绛州刺史－户部侍郎（正四品上）、判度支－太常卿（正三品）	卒于代宗时（762～779）	《新唐书》卷125《苏震传》，第4403页
裴　定	左千牛备身	不详	不详	父卒于贞元九年（793）	《全唐文》卷506，第5150页
崔　葛	左千牛备身	华州郑县主簿（望县，从九品上至正九品下）	华州郑县主簿－好畤县尉（畿县，正九品下）	贞元十四年（798）	《续集》贞元050，第769页；《补遗》第2辑，第32页
卢　翊	右千牛备身	汴州浚仪县主簿（望县，从九品上至正九品下）	汴州浚仪县主簿－楚州宝应县主簿－昭义军都押衙同节度副使、泗州都团练兵马使－检校太子宾客（正三品）－以本官兼监察御史	贞元廿年（804）	《汇编》贞元133，第1935页；《补遗》第1辑，第249页

续附表 1

人　名	出　身	释褐官品	仕　历	卒葬年	史料来源
韦　武	右千牛	长安丞（京县丞，从七品上）	长安丞－殿中侍御史－以仓部员外郎充水陆转运使判官－刑部员外郎－绛州刺史－京兆尹（从三品）	元和元年以后（806～）①	《新唐书》卷98《韦武传》，第3905页
于　頔	千牛备身	华阴尉（望县，县尉从九品下至从九品上）	华阴尉－黜陟使刘湾辟为判官－答蕃判官、监察御史－山南东道节度使－加同平章事②	元和二年（807）以后③	宋本《册府元龟》卷729《幕府部·辟署》第四，第2555页
崔　某	右千牛备身	周至县尉（畿县，尉正九品下）	周至县尉－三原、蓝田县尉－许州临颍、汝州龙兴县令－河南县尉－扬州录事参军－太子司议郎－归州刺史－永州刺史（永州，中州，刺史正四品上）	元和五年（810）	《全唐文》卷589，第5953页

① 《旧唐书》卷14《宪宗本纪》上，元和元年（806）五月“以兵部侍郎韦武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第417页。

② 分别见《资治通鉴》卷228，建中四年（783）六月“庚午，答蕃判官监察御史于頔”条，第7347页；同书卷236，顺宗永贞元年（805）“十二月，甲辰”条，第7623页。

③ 《资治通鉴》卷237，元和二年（807）十二月“山南东道节度使于頔惮上英威”条，其“为子季友求尚主”，第7647页。

续附表 1

人　名	出　身	释褐官品	仕　历	卒葬年	史料来源
韦　顗	千牛备身	鄠县尉（畿县，尉正九品下）	鄠县尉－万年尉－御史－补阙－尚书郎－给事中－尚书左丞－户部侍郎－中丞－吏部侍郎（正四品上）	宝历元年（825）	《旧唐书》卷108《韦顗传》，第3278～3279页；参见《新唐书》卷118《韦顗传》，第4269～4270页
王　潜	千牛	初仕官不详	累迁将作监－左散骑常侍、泾原节度使－荆南节度使－检校尚书左仆射（从二品）	大和年间（827～835）	《新唐书》卷191《王潜传》，第5508页
包　陈	千牛备身	华阴尉（望县，上中下县尉从九品下至从九品上）	华阴尉－荆南永安军判官、左卫兵曹－授□理评事－山南东道营田判官、监察御史里行，剑南、西川判官，殿中侍御史－雅州刺史（下都督府，正四品下至从三品）、本州经略使，福王府长史，□王傅（从三品），国子祭酒，致仕	大和二年葬（828）	《汇编》大和011，第2102页；《补遗》第1辑，第288～289页

续附表 1

人　名	出　身	释褐官品	仕　历	卒葬年	史料来源
周　宝	千牛备身	良原镇使	良原镇使 - 军将 - 金吾将军 - 检校工部尚书、泾原节度使 - 镇海军节度兼南面招讨使 - 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天下租庸副使	光启至文德元年（885 ~ 888）	《新唐书》卷186《周宝传》，第5415 ~ 5417页
魏叔瑜	左千牛	洛州司兵（洛州，大都督府，参军正七品下）	洛州司兵 - 司议郎 - 职方郎中 - 太子洗马 - 怀州长史 - 庆慈仪豫四州刺史（正四品下至从三品）	卒年不详	《全唐文》卷227，第2296页
李齐物	左右千牛备身	尚辇直长（正第七品下阶）	尚辇直长 - 许州司马 - 华州司兵 - 鸿胪丞 - 尚辇奉御 - 北都军器监 - 长安令 - 将作少匠 - 殿中少监 - 太府少卿 - 怀、陕二州刺史 - 特加银青光禄大夫、鸿胪卿 - 河南尹仍水陆运使 - 竟陵郡太守 - 将作监重授鸿胪卿（正三品）	卒年不详	《颜真卿集》，第160 ~ 161页①

① 〔清〕黄本骥编订，凌家民点校、简注、重订《颜真卿集》，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

附表2　唐折冲府卫官充任表

人　名	籍　贯	父祖情况	迁转情况	折冲府所在地①	卒葬年	文献来源
唐神护	西州交河县人	父祖不详	岸头府旅帅	陇右道（西州）	贞观十八年（644）葬	《汇编》贞观104，第75页
韩　通	河南人	祖礼，齐任易州刺史；父钦，隋任怀州温县令	鄜城府校尉	河北道（相州）	贞观十八年	《汇编》永徽116，第206页
郭长生	并州太原人	祖祎，河东郡承（丞）；父达，郡博士	起家授宣惠尉，俄迁武安府队正	陇右道（凉州）	夫人卒于永徽二年（651）	《续集》永徽012，第62页
刘　氏	不详	不详	大明府校尉	关内道（京兆府）	其妻卒于永徽三年（652）	《续集》永徽016，第64页；《补遗》第6辑，第243页
李　强	河南人	祖君华，隋文城县长；父文雅，隋五台县尉	柱国、河内侯－仪同－金墉府校尉－朝议郎行朔方右二监－爱州司马	河南道（河南府）	永徽四年（653）	《汇编》永徽119，第208页

① 参考张沛编著《唐折冲府汇考》"诸卫、率府统折冲府表"，三秦出版社，2003，第326～364页。

续附表 2

人　名	籍　贯	父祖情况	迁转情况	折冲府所在地	卒葬年	文献来源
张元峻	高昌人	父祖不详	（高昌国）教郎将军－国亡入朝，摄唐蒙□州白石府校尉	未详	永徽四年葬	《续集》永徽023，第69页
张团儿	高昌人	不详	（高昌国）东宫府门子弟将－唐授洛州怀音府队正－骁骑尉－征事郎、西州交河县尉	河南道（河南府）	永徽四年葬	《续集》永徽022，第68页
李　表	洛州河南县人	曾祖感，魏郡功曹、申州别驾；祖钟，周洺州录事参军、卫州临清县令；父通，隋青州司法参军、扬州总管府录事	洛讷府队正	河南道（河南府）	永徽六年(655)	《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3，第123页；《补遗》第2辑，第134页
张　羊	南阳白水人	祖荣，隋敏政府鹰扬；父胜，监门直长、左武右府引驾。	勋官一转（武骑尉）－永嘉府队副	河南道（河南府）	显庆元年(656)	《汇编》显庆001，第229页；《补遗》第2辑，第137页

续附表 2

人　名	籍　贯	父祖情况	迁转情况	折冲府所在地	卒葬年	文献来源
刘住隆	不详	不详	岸头府校尉	陇右道（西州）	其妻卒于显庆五年(660)	《汇编》显庆137，第316页
王　敏	太原人	祖多，齐宋城令；父穆，隋恒安府鹰扬郎将。	永嘉府队正－授轻车都尉	河南道（河南府）	显庆六年(661)葬	《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4，第68页；《补遗》第6辑，第279页
龙　澄	陇西人	祖真，隋任鹰扬；父伽，板授辽州刺史	西明府旅帅－骁骑尉－（折冲府）校尉	未详	龙朔元年(661)葬	《续集》龙朔003，第119页；《补遗》第6辑，第281～282页
□世通	扬州江部（都）人	父祖不仕	大明府校尉	关内道（京兆府）	龙朔二年(662)	《续集》龙朔022，第132页；《补遗》第3辑，第380页
氾武欢	不详	不详	岸□（头）府队副	陇右道（西州）	龙朔二年	《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新疆卷，第156页；《补遗》第7辑，第265页

续附表 2

人　名	籍　贯	父祖情况	迁转情况	折冲府所在地	卒葬年	文献来源
薛　岳	河东龙门人	曾祖晖，魏左仆射；祖康，周镇南将军、雍州刺史；父粲，隋绛州李壁县中正	皮氏府校尉－上骑都尉－郑、吉昌二县令	河东道（绛州）	龙朔二年	《续集》龙朔020，第131页；《补遗》第6辑，第291页
冯　乞	洛州河南县	父□，梁州录事参军	永泰（嘉）府校尉	河南道（河南府）	子卒于麟德元年（664）	《汇编》麟德029，第415页；《补遗》第2辑，第196页
冯　安	洛州河南县	祖，汝州刺史；父，永嘉府校尉	释褐中（伊）川府校尉	河南道（河南府）	麟德元年	《汇编》麟德029，第415页；《补遗》第2辑，第196页
董文行	洛阳人	父诃，隋任荆州太守	洛汭府校尉	河南道（河南府）	其儿卒于麟德元年	《续集》麟德001，第141页
高　感	渤海人	曾祖遵，齐任并州都督府录事参军；祖胤，隋任绵州龙安县令。父□，不仕	上骑都尉－左威卫戡黎府旅帅	河东道（潞州）	麟德元年	《续集》永隆001，第246页；《补遗》第5辑，第189～190页。
程　买	不详	不详	洛汭府队正（以后不详）	河南道（河南府）	母卒于麟德二年（665）	《汇编》麟德065，第437页。

续附表 2

人　名	籍　贯	父祖情况	迁转情况	折冲府所在地	卒葬年	文献来源
侯僧达	河南人	父祖不详	怀音府队正、飞骑尉	河南府（河南道）	麟德二年	《汇编》麟德041，第423页；《补遗》第6辑，第302页
温　濬	太原祁人（河东道）	父祖官位不详	队副－队正－传芳府旅帅	未详	麟德二年	《续集》麟德023，第155页；《补遗》第6辑，第305页
张山鳥	南阳人	祖文为，释褐授上轻车都尉；父□，不仕	制举登科，授予皮氏府旅帅	河东道（绛州）	乾封元年（666）	《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山西卷，第95页；《补遗》第5辑，第338～339页
郭君副	并州太原人	父祖不详	左屯卫郯廓府队正－加武骑尉	河南道（河南府）	乾封二年（667）葬	《汇编》乾封047，第474页；《补遗》第2辑，第218页
仵　钦	蓟县人	曾祖泰，齐骠骑将军、云州刺史；祖礼，隋虎奔（贲）郎将；父德，隋怀信府车骑。	上轻车都尉－开福府旅帅	河北道（幽州）	总章元年（668）卒	《汇编》咸亨024，第526页

续附表 2

人　名	籍　贯	父祖情况	迁转情况	折冲府所在地	卒葬年	文献来源
梁　方	河南緱氏人	曾祖哲，周河阳镇将；祖达，隋仪同；父粲，泾阳令	右戎卫郑鄙府队副	河南道（河南府）	总章元年	《汇编》总章016，第491页；《补遗》第2辑，第222页
穆（程）士基	广平人	曾祖虔，隋任开府；祖，吏部文林郎；父硕，不仕	右武卫怀一（音）府队正（以后不详）	河南道（河南府）	父卒于总章二年（669）	《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5，第100页；《补遗》第2辑，第228页①
董　轴	陇西狄道人	祖拟，周泾州刺史；父诃，不仕	洛汭府队正	河南道（河南府）	咸亨二年（671）	《汇编》上元003，第594～595页；《补遗》第2辑，第256页
董　师	陇西人	曾祖树，齐并州别驾；祖俊，隋冀州南宫县令；父钦，朝散大夫	从善府旅帅	河东道（潞州）	咸亨三年（672）	《续集》垂拱022，第295页

① 《补遗》的录文与《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有出入，故括号内为笔者据《隋唐五代墓志汇编》的拓本修改；另外，张沛编著《唐代折冲府汇考》一书，将穆硕和程硕列为两人，按照志文内容，显然为一人的墓志，第279、116页。

续附表 2

人　名	籍　贯	父祖情况	迁转情况	折冲府所在地	卒葬年	文献来源
王　义	并州太原人	父雄，隋并州晋阳令	洛讷府校尉	河南道（河南府）	子卒于仪凤四年(679)	《汇编》仪凤037，第650页
董大智	洛阳人	祖宫，隋陕州司户参军；父弘，唐上轻车都尉	上护军、永嘉府校尉（以后不详）	河南道（河南府）	其父卒于永隆元年(680)	《续集》神龙003，第408页
张相欢	高昌人	不详	高昌国伪王帐右，投化归朝，补怀音府队正，后升为旅帅。	河南道（河南府）	永隆二年(681)	陈国灿著《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第383～384页
韩德信	不详	不详	洛讷府队副、上柱国	河南道（河南府）	其妻卒于永淳元年(682)	《汇编》永淳008，第689～690页
金　杰	天水人	父师，隋平乡府校尉	洛讷府校尉	河南道（河南府）	子葬于文明元年(684)	《汇编》文明007，第718页；《补遗》第2辑，第287页
刘公绰	上党壶关人	祖雅，隋并州太原县令。父仵，隋洺州武安主簿	上柱国－右卫从善府校尉	河东道（潞州）	光宅元年(684)	《汇编》久视018，第980页；《补遗》第5辑，第258页

续附表 2

人　名	籍　贯	父祖情况	迁转情况	折冲府所在地	卒葬年	文献来源
韩　郎	洛州河南县人	曾祖哲，齐颍州别驾；祖玄，隋相州邺县令；父通，隋扬州江都县丞	上柱国－洛讷府旅帅	河南道（河南府）	垂拱元年（685）	《汇编》垂拱015，第739页；《补遗》第2辑，第296页
氾建□	不详	不详	西州高昌县前庭府队正、上骑都尉	陇右道（西州）	垂拱二年（686）葬	《汇编》垂拱026，第746页
王遮弼	不详	不详	〔岸〕头府队正	陇右道（西州）	垂拱四年（688）葬	《续集》垂拱025，第297页
安　贵	雍州周至人	祖建，周骠骑大将军；父子，隋岐州雍北府车骑	上护军、高四府校尉	未详	子卒于永昌元年（689）	《续集》天授002，第307页
董　师	陇西人	祖、父不仕	从善府旅帅	河东道（潞州）	天授二年（691）葬	《续集》天授005，第309页
邢　政	河间鄚人	曾祖、祖、父皆不仕	右威卫丹川府校尉、加上柱国	河东道（泽州）	如意元年（692）	《汇编》长寿002，第833页

续附表 2

人　名	籍　贯	父祖情况	迁转情况	折冲府所在地	卒葬年	文献来源
冯　名	新平郡人	祖略，齐上党郡守；父进，隋蓋州神农县令	漳源府校尉	河东道（潞州）	久视元年（700）合葬	《汇编》久视017，第980页
张思俭	固节县人	曾祖文，隋易州司马；祖善，唐檀州燕乐县令；父举，不仕	良乡府队正（以后不详）	河北道（幽州）	父卒于大足元年（701）	《汇编》长安002，第992页
张　诠	清河人	祖哲，伪任兵部侍郎；父默，伪任中兵校郎	天山府校尉、上柱国	陇右道（西州）	长安三年（703）	《续集》长安018，第401页；《补遗》第7辑，第335页
冯　雅	上党人	祖殊，齐洺州司马；父郎，隋相州录事参军	轻车都尉－八谏府校尉	河东道（潞州）	神龙元年（705）	《续集》景龙004，第429页
李修己	怀州河内人	祖莊，隋青州司户；父楷，唐怀州市令	上柱国、景福府校尉	河北道（怀州）	神龙三年（707）	《续集》神龙025，第425页

续附表 2

人　名	籍　贯	父祖情况	迁转情况	折冲府所在地	卒葬年	文献来源
郭冯德	上党人	曾祖、祖、父不仕	八谏府队副	河东道（潞州）	景龙元年（707）	《汇编》开元203，第1298页；《补遗》第7辑，第367～368页
李　度	上党人	曾祖、祖、父，不仕	上柱国、折冲府校尉	未详	景龙四年（710）	《续集》景云002，第442页
成　达	不详	不详	岸头府旅帅	陇右道（西州）	开元二年（714）	《续集》开元004，第456页
胡　善	安定人	父祖不详	外军（折冲府）校尉①	未详	其孙女卒于开元十三年（725）	《续集》天宝003，第583页
刀柱柱	高昌人	不详	〔蒲〕昌府旅帅	陇右道（西州）	不详	陈国灿《吐鲁番出土文献所见之唐代军府》，《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6辑，第82页

① 唐代折冲府分为内外府，故外军校尉，当指地方折冲府校尉。而且《新唐书》五五《食货志》五，在谈到折冲府卫官的职分田时，称“外军校尉一顷二十亩，旅帅一顷，队正、副八十亩”，第1394页。可见，外军校尉当指折冲府校尉无疑。

附表 3　唐代制举武科科目及登科表

及第者	登科时间	应举科目	史料来源
	贞观三年(629)	制目:文武材能,灼然可取	《册府元龟》卷 67,第 755 ~ 756 页
	显庆二年(657)	制目:勇冠三军,翘关拔山之力;智兼百胜,纬地经天之才;蕴奇策于良平,驰功绩于卫霍;踪二起于吴白,轨双李于牧广;赏纤善而万众悦,罚片恶而一军惧	《唐大诏令集》卷 102《采访武勇诏》,第 519 ~ 520 页
刘仁愿	显庆二年	试目:文武(高明士认为可能是应显庆二年的"勇冠三军、翘关拔山之力、智兼百胜,纬地经天之才"科)	见前(指文章正文,以下同)
张山鳥	乾封元年(666)之前	试目:武艺超绝科	见前
傅　爽	不详	不详	见前
	仪凤元年(676)	制目:射能穿札,力可翘关,将帅子孙、素称勇烈	《(宋本)册府元龟》卷 645,第 2135 页
	仪凤二年(677)	制目:奇谋异算、决胜千里,或投石拔距、勇冠三军;猛士(有膂力雄果,弓马灼然)	《唐大诏令集》卷 102《京文武三品每年各举所知诏》及《求猛士诏》,第 520 页

续附表 3

及第者	登科时间	应举科目	史料来源
娄师德、王敏	仪凤二年	试目:猛士	见前
	调露元年(679)	制目:文武兼资,材堪将相	《(宋本)册府元龟》卷 645,第 2135 页
臧怀亮	开耀二年(682)	试目:穿叶附枝举	见前
	光宅元年(684)	制目:武艺驰声	《唐大诏令集》卷 3《改元光宅诏》,第 16 页
郭敬之	光宅元年	试目:摺钤科(或曰武艺驰声、将帅举)	见前;另参《全唐文》卷 96,第 995 页
	垂拱元年(685)	制目:武可以定边疆、蕴梁栋之宏材、堪将相之重任	《文苑英华》卷 462《举贤制》,第 2354 页(科目时间为陈飞所考证①)
黄　师	垂拱元年以前	不详	见前
赵　洁	垂拱中(685~688)	不详	见前
	永昌元年(689)	制目:蕴韬钤之略,可以振耀天威	《文苑英华》卷 462《求访贤良诏》,第 2354 页(科目时间为陈飞所考证②)
公孙思观	长寿初祀(692)	试目:武艺超伦	见前

① 陈飞著《唐代试策考述》,第 324 页。

② 陈飞著《唐代试策考述》,第 326 页。

续附表 3

及第者	登科时间	应举科目	史料来源
	长安二年(702)	制目:英谋冠代、雄略过人,总韩、白以先驱,掩孙、吴而得俊。或力能拔距、勇绝蒙轮,冒白刃其如归,舍苍璧而不顾。或捷如迅电、走若追风,弯弧则七札洞开,奔陈则重围自溃	《文苑英华》卷462《搜访贤良诏》,第2354~2355页;陈飞考证出此则史料当为长安二年①
	神龙三年(707)	制目:猛士武艺超绝	《旧唐书》卷7《中宗本纪》,第143页
邵翼②、江璀		试目:武艺超绝	《登科记考》卷4,第145页;另见前
	景龙元年(707)	沈谋秘算	《登科记考》卷4,第143页
王仁皎	景龙中③(707~710)	将帅举	见前
	景云元年(710)	制目:韬略孙吴,识天时人事	《唐大诏令集》卷102《博采通经史书学兵法诏》,第520~521页
	睿宗太极元年(712)	制目:才堪军将	《(宋本)册府元龟》卷645,第2136页
	玄宗先天元年(712)	制目:堪充将帅	

① 陈飞著《唐代试策考述》,第331页。

② 《文苑英华》卷670《书》四,第3445~3446页;另参见《全唐文》卷323,萧颖士撰《为邵翼作上张兵部书》,第3272页。

③ 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将此条时间"移至本年(景龙三年)",第179页。

续附表 3

及第者	登科时间	应举科目	史料来源
	玄宗先天二年(713)	制目:武勇谋略	《唐大诏令集》卷 102《诸州举实才诏》,第 521 页
王修福	开元四年(716)以前	不详	见前
	开元四年	制目:武力超伦、声侔敌国	《唐大诏令集》卷 104《遣王志愔等各巡察本管内制》,第 531 页
樊庭观	开元七年(719)以前	不详	见前
马季龙 杨若虚 张仲宣 元　□	开元九年(721)	制目:智合孙吴,可以运筹决胜;有勇齐贲育,可以斩将搴旗;或临戎却寇,堪为一保之雄。	《(宋本)册府元龟》卷 645,第 2136 页
		试目:知合孙吴可以运筹决胜	《登科记考》卷 7,第 226~227 页;《登科记考补正·附考·制举》,第 1354 页
	开元十一年(723)	制目:(武德功臣及元从子孙)才堪文武	《旧唐书》卷 8《玄宗本纪》上,第 185 页
	开元十二年(724)	制目:奇材异略、堪任将帅	《全唐文》卷 223《举陈光乘等表》,第 2251 页
房自谦 裴敦复 崔泽①		试目:将帅	《(宋本)册府元龟》卷 645,第 2136 页
开承简	开元十四年(726)	试目:才堪将率	《汇编》开元 389,第 1426 页

① 《补遗》第 2 辑《大唐将帅举文武及第前振威副尉守右卫蒲州永安府左果毅都尉崔泽夫人张氏(端)墓志铭并序》,第 502 页;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将崔氏附于此后,笔者采用其观点,第 272 页。

续附表 3

及第者	登科时间	应举科目	史料来源
		制目:草泽有文武高才	《旧唐书》卷 8《玄宗本纪》上,第 190 页
郑　昉 樊　衡	开元十五年(727)	试目:武足安边	《(宋本)册府元龟》卷 645,第 2136 页
管元惠	不祥		《补遗》第 3 辑,第 11～12 页
萧浮丘	开元十八年(730)之前	试目:将帅举	见前
郭子仪	开元中(713～741)	试目:武艺超绝	见前
	开元二十三年(735)	制目:知勇堪将帅	
张重光 李(季)广琛① 崔　圆		试目:智谋将帅	《(宋本)册府元龟》卷 645,第 2136 页;另见前
袁仁奭☆	天宝(742)之前	不详	见前
	天宝元年(742)	制目:军谋越众、武艺绝伦	《唐大诏令集》卷 4《改元天宝赦》,第 21 页
令狐朝等七人(胡某可能就是其中之一)		试目:军谋越众科	《(宋本)册府元龟》卷 643,第 2124 页

① 原作李广琛、岑仲勉等人考证出当作季广琛,具体考证见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卷 8,第 735 页。

续附表 3

及第者	登科时间	应举科目	史料来源
来　瑱	天宝十一载(752)	试目:智谋果决、才堪统众	见前
	天宝十三载(754)	制目:军谋出众,武艺绝伦	《唐大诏令集》卷9《天宝十三载册尊号赦》,第55页
		制目:武艺绝伦	《(宋本)册府元龟》卷645,第2136页;另见前
	至德元年(756)	制目:武艺绝伦	
	至德二年(757)	制目:军谋制胜、武艺绝伦	
	乾元元年(758)	制目:掌兵马军将①	《唐大诏令集》卷9《乾元元年册太上皇尊号赦》,第57页。
	肃宗上元元年(760)	制目:武艺文才,俱堪济理;权谋可以集事,材力可以临戎。	《唐大诏令集》卷4《改元上元赦》,第23页
王　栩	肃宗上元元年	试目:才兼文武科	见前
	宝应元年(762)	制目:军谋制胜、明习韬钤	《唐大诏令集》卷69《元年建卯月南郊赦》,第384页
	大历五年(770)	制目:智谋经武	《唐大诏令集》卷84《大历五年大赦》,第482页
	大历六年(771)	试目:智谋经武	《(宋本)册府元龟》卷643,第2125页

① 陈飞《唐代试策考述》认为:"此为安史之乱后之非常时期,故不可以常例循之,具有制举性质",第370页。笔者对此持保留态度,但仍列出以备参考。

续附表 3

及第者	登科时间	应举科目	史料来源
	大历十四年(779)	制目:军谋宏远、武艺殊伦	
夏后(侯)审 平知和 郑　儋 丁　悦 凌　正 周　渭	建中元年(780)	试目:军谋越众	《(宋本)册府元龟》卷 645,第 2137 页
	兴元年年(784)	制目:识洞韬略、堪任将帅	《唐大诏令集》卷 5《奉天改兴元元年赦》,第 28 页
	贞元元年(785)	制目:识洞韬略、堪任将帅	《(宋本)册府元龟》卷 645,第 2137 页
许　赞		试目:识洞韬略、堪任将帅	
	贞元二年(786)	制目:韬晦奇才	《登科记考》卷 12,第 441 页。
朱　放		试目:韬晦奇才	
胡　证	不详	不详	《登科记考补正·附考·制科》,第 1356 页
	贞元九年(793)	制目:洞识韬略、堪任将帅	《登科记考》卷 13,第 477 页;《全唐文》卷 461,第 4711 页
	贞元十四年(798)	制目:百只箭人、三十只箭人	《(宋本)册府元龟》卷 640,第 2105 页
樊　泽	德宗时(780~805)	试目:军谋宏远、堪任将帅	见前
	元和二年(807)	制目:军谋宏远、堪任将帅	《唐大诏令集》卷 70《元和二年南郊赦》,第 391~392 页
樊宗师	元和三年(808)	试目:军谋宏远、堪任将帅	见前

续附表 3

及第者	登科时间	应举科目	史料来源
	元和七年(812)	制目:才兼文武	《唐大诏令集》卷 117《宣慰魏博诏》,第 611 页
	元和十四年(819)	制目:军谋宏远、堪任将帅	《(宋本)册府元龟》卷 645,第 2137 页
	元和十五年(820)	制目:才兼文武	《唐大诏令集》卷 117《宣慰镇州诏》,第 611 ~612 页
	长庆元年(821)	制目:军谋宏远、堪任将帅	《唐大诏令集》卷 70《长庆元年正月南郊改元赦》,第 392 页
吴　思 李商卿		试目:军谋宏远、堪任将帅	
	长庆四年(824)	制目:军谋宏远、材任边将	《(宋本)册府元龟》卷 645,第 2137 页
	宝历元年(825)	制目:军谋宏远、材任边将	
裴　俦 侯平章		试目:军谋宏远、材任边将	
	大和元年(827)	制目:军谋宏远、堪任将帅	《唐大诏令集》卷 5《改元太和赦》,第 29 ~30 页
	大和二年(828)	制目:军谋宏远、堪任将帅	《(宋本)册府元龟》卷 645,第 2137 页
郑　冠 李　式		试目:军谋宏远、堪任将帅	
	光启元年(885)	制目:军谋弘远	《唐大诏令集》卷 103《搜访兵术贤才诏》,第 524 页
	天复元年(901)	制目:军谋宏远	《唐大诏令集》卷 5《改元天复赦》,第 33 页
	天祐元年(905)	制目:武艺绝伦	《册府元龟》卷 68,第 768 页

附表 4　唐代中后期方镇使府武职僚佐任职表(780～907)*

姓　名	出身地域	父祖情况	武职僚佐名称	卒葬年	史料出处
张怀实	真定人	父奉忠,唐云麾将军试鸿胪卿	成德军大将监知兵马	建中三年(782)	《汇编》建中 013,第 1829 页;《补遗》第 4 辑,第 465～466 页
冯河清	京兆人	不详	泾原节度兵马使	建中四年(783)	《旧唐书》卷 125《冯河清传》,第 3549 页
贾隐林	京兆华原人	祖会,不仕;父,不详;叔父贾循,平卢军节度副使、博陵太守等	永平军兵马使	建中四年左右卒	《新唐书》卷 192《贾隐林传》,第 5534 页;另参《旧唐书》卷 144《贾隐林传》,第 3920～3921 页

* 附表 4 所收之武职僚佐,其充任军职的年代皆在 780～907 年,因为肃宗时期安史之乱,代宗时期藩镇割据形成,德宗始平藩,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武职僚佐的任职情况,故笔者选用在建中元年(780)以后充任使府武职僚佐者事例。所用史料或为本人墓志,或是父祖情况有一定记载者、或为本人传记。凡是父祖情况无载者不在本表收入之限,个人独立的墓志和列传除外,因为这种情况(其父祖不载)一般都是父祖无闻者。

续附表 4

姓　名	出身地域	父祖情况	武职僚佐名称	卒葬年	史料出处
石演芬	西域胡人	不详，李怀光养为子，怀光朔方节度使	朔方邠宁节度兵马使、右武锋都将	兴元元年（784）左右卒	《旧唐书》卷 187 下《石演芬传》，第 4907 页
张嘉宾	清河武城人	曾祖文叔，徐州长史；祖海，廓州司马；父尚元，赠光州刺史	河东、昭义、河阳三节度都知兵马使、九州都知团练兵马使等	贞元元年（785）	《续集》贞元 003，第 736 ~ 737 页；《补遗》第 7 辑，第 400 页
张令贲		父，张嘉宾	天宁军副将	父卒于贞元元年	
张令光		叔父，张嘉宾	保宁军虞候	叔父卒于贞元元年	
蔡　雄	信都人	曾祖贞，虢州别驾；祖建，沧州乐陵令；父济，泽州司户	幽州卢龙节度押牙	贞元三年（787）	《续集》贞元 074，第 788 页；《补遗》第 4 辑，第 475 ~ 476 页
程日华	定州安喜人	父元皓，安禄山帐下将、定州刺史	成德军节度押牙	贞元四年（788）	《旧唐书》卷 143《程日华传》，第 3903 ~ 3904 页
舍利石铁	北方人	父葛逻旃，蕃州刺史	节度先锋马军兵马副使	贞元六年（790）	《续集》贞元 014，第 743 页
王崇俊	太原人	曾祖福，唐恒王府户曹参军；父元贞，太原府晋源府折冲都尉	鄜坊节度后军兵马使	贞元八年（792）	《汇编》贞元 050，第 1872 页；《补遗》第 7 辑，第 67 ~ 68 页
王良剑		父，王崇俊	节度散将	父卒于贞元八年	

续附表 4

姓　名	出身地域	父祖情况	武职僚佐名称	卒葬年	史料出处
张传弓	上谷郡	父名讳不详，虢州金门府折冲都尉	义武节度衙前将	母葬于贞元八年	《汇编》贞元 048，第 1870～1871 页
乐昇进	南阳郡	高、曾、祖，名讳不详，累有官勋，具体不详；父，不详	河阳节度同十将	贞元八年	《汇编》大和 001，第 2095 页；《补遗》第 4 辑，第 119 页
张敬诜	冯翊同川人	祖元长，左金吾卫大将军、太常卿；父崇让，抚州长史	东都留守押衙	贞元十年(794)	《汇编》贞元 061，第 1880 页
杨光宪	不详	父名讳不详，明威将军守左清道率府率	朔方节度先锋十将	母卒于贞元十一年(795)	《续集》贞元 033，第 757 页
曲　环	陕州安邑人	父彬，南使正监	邠、陇两军都知兵马使	贞元十二年(796)	《旧唐书》卷 122《曲环传》，第 3501～3502 页
臧昌裔	郡望东莞，太原人	曾祖怀义，绛州朔田府折冲；祖方直，安北都护、镇北军使；父晔，朔方节度十将等	淮南节度押衙	母卒于贞元十二年	《汇编》贞元 083，第 1895～1896 页；《续集》元和 058，第 841～842 页
臧昌嗣			丹延节度正将		
臧继宗		父，臧昌裔	淮南节度衙前虞候	祖母卒于贞元十二年	
张　倜	蒲州河东人	曾祖谅，陕州录事参军；祖寓，卫州司马兼大理评事；父怀，银青光禄大夫试太子宾客	节度都虞候	贞元十三年(797)	《补遗》第 6 辑，第 108～109 页

续附表 4

姓　名	出身地域	父祖情况	武职僚佐名称	卒葬年	史料出处
刘全谅	怀州武陟人	父客奴，平卢军节度使	宋亳节度都知兵马使	贞元十五年(799)	《旧唐书》卷 145《刘全谅传》，第 3938～3939 页
杨朝晟	夏州朔方人	不详	朔方军右先锋兵马使、左厢兵马使、邠宁都虞候等	贞元十六年(800)	《旧唐书》卷 122《杨朝晟传》，第 3503～3504 页；《新唐书》卷 156《杨朝晟传》，第 4897 页
李　良	其先陇西著姓，因官徙关东，今为汝人	高祖亮，唐德州刺史；曾祖简，汝州长史；祖灌，许州别驾；父羽客，泗州别驾	淮西节度十将、节度都虞候、节度先锋兵马使	贞元十六年	《汇编》贞元 101，第 1909～1910 页；《补遗》第 3 辑，第 134～135 页
靳朝俊	延安郡丰林人	曾祖□，朝议郎试绛州长史；祖恒礼，坊州鄜县尉；父颉，银青光禄大夫试卫尉卿员外置同正员	平卢淄青节度兵马使	贞元十六年	《续集》贞元 076，第 789 页
郑　玉	荥阳人	曾祖亮、唐莫州司马；祖备，泾州四门府折冲；父泰，左武卫大将军、试太常卿	唐兴军都虞候兼押衙	贞元十八年(802)	《汇编》贞元 128，第 1931 页

续附表 4

姓　名	出身地域	父祖情况	武职僚佐名称	卒葬年	史料出处
刘　昌	汴州开封人	不详	宣武军左厢兵马使	卒于贞元十八年左右①	《旧唐书》卷 152《刘昌传》,第 4070~4071 页
卢　翊	郡望范阳,大门盛族	曾祖元庄,普、嘉等州刺史;祖知远,资州刺史、光禄卿;父谦,宋州司马兼左赞善大夫	淮南节度都押衙、同节度副使、泗州都团练兵马使等	贞元廿年(804)	《汇编》贞元 133,第 1935 页;《补遗》第 1 辑,第 249 页
刘　谈	易州易城盐台里人	祖敬宗,遂城府折冲;父仁贵,朝散郎试德州司士参军	都知兵马使押牙	贞元廿一年(805)	《汇编》贞元 140,第 1940 页;《补遗》第 4 辑,第 476 页
萧　君	郡望兰陵	五代祖鄱阳王恢;曾祖□,蔡定二州刺史;祖温,郑州别驾;父□,长寿县令	宣歙都团练右厢兵马使兼押衙、都虞候等	贞元廿一年	《汇编》永贞 004,第 1943 页;《补遗》第 7 辑,第 74~75 页
高幼成	渤海蓨县人	高祖偘,左监门卫大将军、辽东·陇右两道持节大总管;曾祖崇礼,左卫率府中郎将;祖元琮,遂州司户参军;父岑,太子左赞善大夫	邠宁节度押衙兼右随四厢兵马使	母葬于元和二年(807)	《汇编》元和 016,第 1960 页

① 《旧唐书》卷 152《刘昌传》,刘昌贞元三年率士众八千“北出五原”,“寻以本官授京西北行营节度使。岁余,授泾州刺史,充四镇、北庭行营,兼泾原节度支度营田等使。……复筑连云堡,受诏城平凉,……昌在西边仅十五年”而卒。由贞元三年开始推算,刘昌当在贞元十八年以后卒。第 4071~4072 页。

续附表 4

姓　名	出身地域	父祖情况	武职僚佐名称	卒葬年	史料出处
曹　乂	不详	曾祖横、祖锴、父岑，“并唐已来，文武不坠”	东都留守都虞候	元和二年葬	《汇编》元和 019，第 1963 页
秦　应	不详	父名讳不详，左□武军将军	镇海军正将	母卒于元和二年	《续集》元和 017，第 812 页
秦　岌			河阳军兵马副使		
郭超岸	汝州叶县人	曾祖礼、祖俨、父名讳不详，不仕	节度先锋兵马使兼押衙	元和三年（808）	《续集》元和 028，第 820 页
王大剑	太原郡人	曾祖浑，泾原节度衙前兵马使、骠骑大将军试鸿胪卿；祖鈇，朔方防秋兵马使守左金吾卫大将军试太常卿；父令均，左神策军兵马使、检校太子宾客	山南东道节度押衙、右厢步军使	元和四年（809）	《汇编》元和 034，第 1974 页
王义温		父，王大剑	荆南节度散将	父终于元和四年	
严　砺	梓州盐亭人	严震同宗（世为田家）	山南东道节度都虞候	元和四年	《旧唐书》卷 117《严砺传》，第 3407 页；同书同卷《严震传》，第 3404 页
伊　慎	兖州人	父祖不详	江西节度都知兵马使	元和六年（811）	《旧唐书》卷 151《伊慎传》，第 4054～4056 页

续附表 4

姓　名	出身地域	父祖情况	武职僚佐名称	卒葬年	史料出处
秦士宁	不详	曾祖邈，唐江州长史；祖庭秀，左羽林军将军知军事；父让，河阳军武牢镇遏兵马使、同都团练副使等	河阳节度马军十将、左厢马军虞候	元和七年(812)	《汇编》元和062，第1991～1992页；《补遗》第6辑，第477页
裴　玢	京兆人	五代祖疏勒国王，武德中来朝，受鹰扬大将军；曾祖至父不详	鄜坊都虞候	元和七年	《旧唐书》卷146《裴玢传》，第3969页
陈志清	颍(颍)川	父名讳不详，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子宾客	临洮军副将	元和八年(813)	《汇编》元和075，第2000页
朱忠亮	汴州浚仪人	父祖不详	定平镇都虞候	元和八年	《旧唐书》卷151《朱忠亮传》，第4056页
范希朝	河中虞乡人	父祖不详	邠宁虞候	元和九年(814)	《旧唐书》卷151《范希朝传》，第4058～4059页
崔　郾	太原祁人	父祖不详	幽州节度押衙	夫人葬于元和九年	《汇编》元和077，第2002页
王　锷	太原人	父祖不详	江西节度都虞候	元和十年(815)	《旧唐书》卷151《王锷传》，第4059、4061页；参《新唐书》卷170《王锷传》，第5168～5170页

续附表 4

姓　名	出身地域	父祖情况	武职僚佐名称	卒葬年	史料出处
刘臣德	郡望彭城，今河阳人	曾祖河石、祖敬宾，不仕；父希阳，左金吾卫大将军	河阳军散十将	母卒于元和十年	《汇编》元和 081，第 2005 页
石默啜	乐陵郡	不详	义武军节度易州高阳军都知兵马使	元和十二年(817)	《汇编》元和 106，第 2024 页
孟　维	平昌人	曾、祖、父不仕	郑滑节度十将	元和十二年	《汇编》元和 113，第 2029 页
李景先	波斯人	波斯国王之甥；曾祖益初，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右武卫将军；祖志皇，广州别驾；父素，司天监	河中府散兵马使	父卒于元和十二年	《汇编》元和 128，第 2039 页
李景伏			晋州防御押衙		
王　□	郡望琅琊	祖列，成德军马军兵马使、试特进；父皋，试太常卿	成德军马军左厢兵马使	女儿卒于元和十二年，年二十七。	《续集》元和 070，第 851 页
韩公武	颍川人，世居滑之匡城	曾祖、祖，不闻；父韩弘，宣武军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加同平章事。	宣武马步都虞候	元和十四年（819）以后	《旧唐书》卷 156《韩公武传》，第 4136 页；同书同卷《韩弘传》，第 4134 页
王承宗	蓟	祖武俊、父士真，皆成德军节度使	河朔都知兵马使	元和十五年(820)	《旧唐书》卷 142《王承宗传》，第 3878、3883 页

续附表 4

姓　名	出身地域	父祖情况	武职僚佐名称	卒葬年	史料出处
田弘正	平州人①	祖延恽，安东都护府司马；父庭玠，沧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横海军使	魏博衙内兵马使	长庆元年（821）	《旧唐书》卷 141《田弘正传》，第 3848～3852 页；另参《新唐书》卷 148《田弘正传》，第 4781 页
康志达	本会稽人，今为京兆长安人	曾祖延庆，唐左威卫大将军；祖孝义，万安府折冲；父日知，兵部尚书、左威卫上将军	幽州卢龙军节度衙前兵马使	长庆元年	《续集》长庆 002，第 859 页；《补遗》第 5 辑，第 431～432 页
卜　璀	河东人	曾怡、父隣，不仕	襄州节度押衙兼管内诸州营田都知兵马使	长庆二年（822）	《汇编》长庆 015，第 2069 页
韩　弘	滑州匡城人	父祖不详	宣武军都知兵马使	长庆二年	《新唐书》卷 158《韩弘传》，第 4944 页；《旧唐书》卷 156《韩弘传》，第 4134～4136 页
王逆修	代贯磁州	曾祖，不详；祖元爱，摄洺州临洺县主簿；父谏，摄邢州内丘等县令	天德等军州都防御马步都虞候	长庆三年（823）	《补遗》第 7 辑，第 97～98 页

① 据《旧唐书》卷 141《田承嗣传》、《田弘正传》，田弘正与田承嗣为同宗，因为田弘正“祖延恽，魏博节度使承嗣之季父也”；而田承嗣，“平州人”。故据此推测，田弘正也当为平州人，第 3837、3848 页。

续附表 4

姓　名	出身地域	父祖情况	武职僚佐名称	卒葬年	史料出处
何公质	灵武人	曾祖诠，丹州别驾；祖游仙，灵州大都督府长史；父文哲，右领军卫上将军	朔方节度押衙兼节院兵马使	母卒于长庆四年（824）	《续集》大和 020，第 893～896 页
程　皓	京兆人	祖伦，汾州司马；父璿，左金吾卫仓曹参军	江西左厢教练使	长庆四年	《汇编》长庆 032，第 2081 页
诸葛立则	琅琊人	祖士牟，崇玄、弘文馆大学士；父澄，左武卫执戟、试左金吾卫郎将	兖府左厢马步都虞候	母宝历元年改葬（825）	《汇编》宝历 010，第 2087 页
诸葛立成			河阳军后院十将		
刘　悟	怀州武陟人①	祖客奴、叔父刘全谅，皆历任平卢军节度使	淄青节度都知兵马使	宝历元年	《旧唐书》卷 161《刘悟传》，第 4230～4231 页
何　洪	金陵人	曾祖从源，潮州司马；祖肃，广州浈阳县令；父，左卫长史	福建团练押衙	宝历二年（826）	《汇编》宝历 016，第 2091 页
杨　赡	弘农人	父孝直，邓州长史兼山南东道团练使、兼侍御史等	郑滑亲事兵马使、凤翔节度押衙	宝历二年	《汇编》宝历 017，第 2091 页；《补遗》第 4 辑，第 113 页

① 据《旧唐书》卷 145《刘全谅传》、《旧唐书·刘悟传》，刘全谅的父亲为刘客奴，官至平卢节度使；而刘悟的祖父也为刘客奴，二人事迹完全相同。故刘悟与刘全谅为同宗，刘全谅怀州武陟人，故刘悟也当为此地人。前书第 3938～3939 页；后书第 4230 页。

续附表 4

姓　名	出身地域	父祖情况	武职僚佐名称	卒葬年	史料出处
郑仲连	荥阳人	七代祖伟，后魏尚书右仆射；高祖玄敏，蕲州长史、司农丞；曾祖由古，河清县令、宣州司马；祖广嗣，左司御率府兵曹参军事；父楚卿，杞王府司马	河阳节度押衙、泽潞节度押衙兼府城都虞候等	宝历二年	《汇编》宝历 019，第 2093 页；《补遗》第 4 辑，第 114 页
李光颜	本河曲人，家于太原	本河曲部落稽阿跌之族；父良臣，袭鸡田州刺史，隶朔方军	忠武军都知兵马使	宝历二年	《旧唐书》卷 161《李光颜传》，第 4218～4219 页；同书同卷《李光进传》，第 4217 页
王　逢	许州人	父沛，忠武军节度使等	忠武军都知兵马使	卒于大和以后（827）	《旧唐书》卷 161《王沛传》及附传，第 4224～4225 页；参《新唐书》卷 171《王逢传》，第 5190 页
刘　翟	其先彭城人	曾祖孝臣，试太子通事舍人，申豪宣彭四州都督；祖沔，金紫光禄大夫、赵州长史；父迪，朝散大夫、镇州节度随军	节度押衙、马步都将	大和三年（829）	《补遗》第 7 辑，第 102～103 页

续附表 4

姓　名	出身地域	父祖情况	武职僚佐名称	卒葬年	史料出处
史宪诚	灵武建康人	祖道德，开府仪同三司、试太常卿；父周洛，官至魏博兵马大使、检校太子宾客兼御史中丞	魏博中军都知兵马使	大和三年	《旧唐书》卷 181《史宪诚传》，第 4685～4686 页；参《新唐书》卷 210《史宪诚传》，第 5935～5936 页
史用诚	河南人	曾祖惟静，检校太子宾客兼侍御史、河南节度先锋兵马使；祖勤，试太常卿兼侍御史、河南节度兵马使；父播，检校国子祭酒、河东节度军马都兵马使兼御史中丞	襄阳节度马军兵马使	大和四年（830）	《全唐文》卷 747，第 7732～7733 页
张　遵	其先南阳人，后迁于陕之平陆	曾祖议福，蔚州刺史；祖守环，左羽林大将军；父献弼，忠、万二州刺史兼本州团练使	节度押衙兼内院兵马使	大和四年	《续集》大和 032，第 905 页；《补遗》第 4 辑，第 129～130 页
高霞寓	代居燕	曾祖永兴，唐左卫翊府中郎将；祖行仙，京兆府折冲、静边军使；父栖严，左金吾卫大将军员外置同正员兼殿中监	幽州节度步军副将、幽州节度押衙	大和七年（833）	《汇编》大和 066，第 2144 页；《补遗》第 6 辑，第 145～146 页

续附表 4

姓　名	出身地域	父祖情况	武职僚佐名称	卒葬年	史料出处
周　玙	其先出于汝南，世为河中河西人	曾祖思仁，右卫长史；祖知远，朔方兵马副使；父道荣，左卫兵曹参军、广州司马	节度散兵马使、正兵马使知都虞候事、节度都押衙等	夫人卒于大和七年	《续集》大中 056，第 1009～1100 页；《补遗》第 3 辑，第 234 页
杨弘庆	弘农人	曾祖林，云麾将军试左金吾卫大将军；父璿，朝请郎试左率府长史	义武军节度十将	大和八年(834)	《汇编》大和 083，第 2155 页；《补遗》第 7 辑，第 413 页
王廷凑	不详，世隶安东都护府	曾祖五哥之，左武卫将军同正；祖末怛活，父升朝，世为王氏骑将，累迁右职	成德衙内兵马使	大和八年	《旧唐书》卷 142《王廷凑传》，第 3884～3885、3888 页；参《新唐书》卷 211《王廷凑传》，第 5959～5961 页
张君平	深州饶阳县人	曾祖颐，绛州长史；祖徽、父承泰，不仕	成德军节度十将	大和八年	《汇编》大中 081，第 2310～2311 页
杨志诚	不详	不详	幽州后院副兵马使	大和八年	《旧唐书》卷 180《杨志诚传》，第 4675～4677 页
杨孝直	家于燕垂	曾祖模、祖翰，皆委身卢龙军，名居列将；父达，成德军中军都兵马使、御史中丞等	山南东道节度押衙	大和九年(835)	《汇编》大和 090，第 2160 页；《补遗》第 4 辑，第 139～140 页

续附表 4

姓　名	出身地域	父祖情况	武职僚佐名称	卒葬年	史料出处
刘克勤	不详	父名讳不详，平卢军节度押衙兼充左厢兵马使、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中丞。	平卢军衙前虞候	母卒于大和九年	《汇编》大和 095，第 2163 页
冯　植	上党	不详	陕虢都防御押衙	夫人卒于开成元年(836)	《汇编》开成 004，第 2171 页
王智兴	怀州温县人	曾祖靖，左武卫将军；祖环，右金吾卫将军；父缙，太子詹事。	徐州（武宁军节度）都押衙①	开成元年	《旧唐书》卷 156《王智兴传》，第 4138～4140 页
李载义	幽州	代以武力称，继为幽州属郡守（刺史）。	幽州衙前都知兵马使	开成二年(837)	《旧唐书》卷 180《李载义传》，第 4674 页；参《新唐书》卷 212《李载义传》，第 5978 页
周元长	汝南人	曾祖钊，大同军使、平州刺史、卢龙节度留后；祖赞，邢、洺二州刺史；父平，幽府参军等。	团练衙前虞候、卢龙节度押衙等	开成二年	《续集》开成 014，第 933 页；《补遗》第 4 辑，第 145～146 页

① 《新唐书》卷 65《方镇》二：元和二年，“置武宁军节度使，治徐州”。第 1814 页。

续附表 4

姓　名	出身地域	父祖情况	武职僚佐名称	卒葬年	史料出处
仇志诚	郡望安南郡	不详	节度左射生兵马使、振武节度衙前虞候等	开成四年(839)	《续集》开成 022，第 938 页；《补遗》第 4 辑，第 493 页
何进滔	灵武人	曾祖孝物、祖俊，并本州军校；父默，夏州衙前兵马使、检校太子宾客试太常卿。	魏博衙内都知兵马使	开成四年左右	《旧唐书》卷 181《何进滔传》，第 4687 页
李　厚	陇西	父名讳不详，东都留守、防御押牙、检校太子宾客。	淮南节度衙前兵马使	母卒于开成四年	《汇编》开成 034，第 2193 页
张佑明	阴山人	公之先祖乙失活，开元中已全部归阙，建中中，赐姓张。父庭光，易州刺史；伯父，张孝忠，恒冀易定沧五州观察等使。	同十将、易州都押衙	开成五年(840)	朱学武《河北涞水唐墓清理简报》，《文物春秋》1997 年第 2 期，第 26 页
陆　偘	吴郡（苏州）人	父峴，幽州节度押衙、蓟州刺史、静塞军营田等使。	幽州节度押衙	母卒于会昌二年(842)	《汇编》大中 141，第 2361 页
石　雄	不详	不详	徐州右厢捉生兵马使	卒于会昌三年(843)以后	《旧唐书》卷 161《石雄传》，第 4235～4237 页
元昇进	陇州汧源人	祖名讳不详，仕宦与否不详；父延宾，本州防御讨击副使、特进兼试殿中监	陇州防御同十将	会昌五年(845)	《续集》会昌 022，第 960 页

续附表 4

姓　名	出身地域	父祖情况	武职僚佐名称	卒葬年	史料出处
张　津	（清河）徐方人	祖绍元，泗州连水县主簿；父干，伏落府折冲	徐州节度衙内兵马使	子卒于会昌五年	《续集》会昌 024，第 961 页
王时邕	太原人，现居燕	曾祖洪，瀛州录事参军；祖解公，涿州范阳县丞；父杲，瀛州河间县主簿、幽府功曹参军	幽州节度押衙	会昌五年	《续集》会昌 030，第 966 页；《补遗》第 4 辑，第 172～173 页
宋　晖	其先广平人；今为兖州金乡县人	祖环，不仕；父玉，唐文林郎试左卫兵曹参军	经略副使兼衙前兵马使	子卒于会昌六年(846)	《汇编》会昌 054，第 2250 页；《补遗》第 7 辑，第 121 页
宋自昌		父宋晖，官至经略副使兼衙前兵马使、光禄卿试太子通事舍人	十将、都虞候、沧州节度押衙等	会昌六年	
张英杰	上谷人	父庭光，易州刺史兼御史大夫	义武军节度押衙	子卒于大中元年(847)	《汇编》大中 006，第 2256 页
张　亮		父张英杰，官至义武军节度押衙兼侍御史	河阳军节度押衙	大中元年	
张亮之兄			凤翔节度马军都教练使	弟张亮卒于大中元年	
魏　爽	河北人	曾祖、祖、父，不仕	东都留守防御散将	父卒于大中二年(848)	《汇编》大中 023，第 2268 页
张　铢	上谷人	曾祖庭光，上谷太守；祖英竭，官不详；父政文，永清军使	义武军节度衙前虞候	兄终于大中二年	《汇编》大中 026，第 2270～2271 页

续附表 4

姓　名	出身地域	父祖情况	武职僚佐名称	卒葬年	史料出处
王智崇	京兆三原人	高祖琼、曾祖驯，不仕；祖恒，左羽林军将军；父常散，江州彭泽县尉	武昌军节度押衙	母卒于大中二年	《汇编》大中 028，第 2272 页
李审规	先郑州原武县人，后徙居河阴	曾祖端甫，青州北海县令；祖子筠，怀州河内县令；父清，不仕	振武节度押衙	大中三年(849)	《续集》咸通 103，第 1115 页；《补遗》第 3 辑，第 276 页
朱　萱	其先吴郡人，公淮海人	曾祖宾、祖迁、父惟，不仕	忠武军节度兵马使	大中四年(850)	《续集》大中 074，第 1025 页
何　溢	京兆鄠杜人	曾祖弘靖，左武卫将军；祖慎言，太原府少尹；父崇光，右领军卫将军	剑南西川西山中北路兵马使	大中四年	《汇编》大中 047，第 2284 页；《补遗》第 1 辑，第 347 ~ 348 页
张季戎	南阳人	曾祖严，华州华阴县尉；祖赡，齐州长史兼侍御史；父洮，左武卫将军	防御使都押衙兼都虞候等	大中五年(851)	《汇编》大中 056，第 2292 页；《补遗》第 1 辑，第 350 ~ 351 页
冯审中	不详	曾祖泰，邠州司士参军；祖系，银州抚宁县令；父浼，鸿胪寺丞	河东节度押衙	大中六年(852)	《汇编》大中 069，第 2302 页；《补遗》第 4 辑，第 192 页
魏弘章	巨鹿曲阳人	曾祖峻川，不仕；祖叔元，留守右屯营军押衙；父，不详	东都留守散兵马使	大中七年(853)	《汇编》大中 078，第 2308 页

续附表 4

姓　名	出身地域	父祖情况	武职僚佐名称	卒葬年	史料出处
郑恭楚	郡望荥阳	曾祖神则，卫州刺史；祖穆，磁州滏阳县令；父宴，右率府羽林将军	使厅副将、正十将、衙前兵马使等	大中七年	《续集》大中 039，第 997 页；《补遗》第 4 辑，第 192～193 页
契苾公度		六代祖契苾何力，左领军将军；五代祖峰，左武卫大将军；曾祖嘉宾，左金吾卫大将军；祖漪，胜州刺史充本州押蕃落义勇军等使；父通，振武、麟胜等州节度使	节度押衙	母卒于会昌六年(846)，父卒于大中八年(854)	《汇编》大中 012，第 2260 页；《续集》大中 044，第 1000 页
契苾公文			节度押衙		
契苾公廉			□州节度□□兵马使		
契苾公应			河东节度押衙、左骁雄兵马使		
契苾公瑜			灵武节度押衙、都知兵马使		
契苾公武			沧州节度押衙		
契苾公约			邠宁节度押衙		
契苾公绶			河中衙前兵马使		
令狐梅	家于敦煌，西州著姓	七代祖熙，仕隋入唐，行纳言事；六代祖德棻，为国子祭酒、监修国史；五代祖修穆，朔州刺史；高祖孝哲，	节度马军右厢兵马使等	大中八年	《补遗》第 6 辑，第 168～170 页；《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 14，第 55 页

续附表 4

姓　名	出身地域	父祖情况	武职僚佐名称	卒葬年	史料出处
		洛川县令；曾祖温，邓州录事参军等；祖彰，义成军节度使等；父通，历宿陈寿淄唐泗等六州刺史			
萧德源	兰陵人	祖敬从，灵州节度从事、试大理评事；父仲堪，蔡州郾城镇遏兵马使、检校太子宾客兼殿中侍御史	河东节度押衙、左右厢军使	女儿卒于大中九年(855)，年廿四	《汇编》大中 098，第 2326～2327 页
朱　清	不详	曾祖渐，定州唐县丞；祖离，昭义行军司马、魏相洺等州刺史；父□，尚衣奉御	河中衙前兵马使	大中十年(856)	《续集》大中 029，第 990 页；《补遗》第 7 辑，第 131～132 页
王元逵	世隶安东都护府	父廷凑，成德节度使	成德都知兵马使	大中十一年(857)	《旧唐书》卷 142《王元逵传》，第 3888～3889 页
王绍鼎		父元逵，成德节度使	成德节度都知兵马使	卒于父大中十一年	《旧唐书》卷 142《王绍鼎传》，第 3889 页
王绍懿			成德节度都知兵马使		《旧唐书》卷 142《王绍懿传》，第 3889 页
鲁　美	郡望扶风，今为□南人	祖麟，不详；父荣，试左卫兵曹参军	襄州节度押衙充左厢马步都虞候	大中十一年	《续集》大中 060，第 1012～1013 页；《补遗》第 7 辑，第 132 页

续附表 4

姓名	出身地域	父祖情况	武职僚佐名称	卒葬年	史料出处
宋再初	广平人	祖晶，景州刺史；父迪，德州刺史	幽州节度押衙	大中十二年(858)	《续集》大中 070，第 1021 页；《补遗》第 4 辑，第 217 页
宋可嗣		父宋再初，官至蓟州刺史、幽州节度押衙	卢龙节度衙前兵马使	父卒于大中十二年	
董唐之	檀州人	曾祖杰，定州节度衙前将、试云麾将军；祖彦□，檀州营田将、试武骑尉；父沟，不仕	卢龙节度衙前兵马使	大中十二年	《续集》大中 071，第 1022 页；《补遗》第 3 辑，第 238 页
吴　清	渤海人	祖京，不仕；父玉，节度十将、试殿中监	节度副将	咸通二年(861)	《汇编》咸通 013，第 2387 页；《补遗》第 7 辑，第 138 页
严　密	天水人	祖、父不仕	团练押衙	咸通四年(863)	《汇编》咸通 036，第 2406 页
张　谅	清河人	曾祖聿，唐恒王府参军；祖咏，殿中侍御史；父经，黎州刺史充本州招讨使	天雄军节度九军都知兵马使	咸通五年(864)	《汇编》咸通 037，第 2407 页；《补遗》第 1 辑，第 390 ~ 391 页
李英信	陇西人	祖□□，沧州刺史；父忠义，成德军马步兵马使、试太常卿兼侍御史	成德军节度押衙	子卒于咸通五年	《汇编》咸通 070，第 2433 页

续附表 4

姓　名	出身地域	父祖情况	武职僚佐名称	卒葬年	史料出处
论博言	其先吐蕃人	先祖论钦陵，吐蕃尚书令；曾祖布支，左卫大将军等；祖惟贞，英武军使、颍州刺史等；父修，宁州防御使、宁州刺史等	幽州节度散兵马使、衙前兵马使等	咸通六年（865）	《补遗》第7辑，第141～142页
张周抗	南阳人	曾祖仙，不详；祖□，右金吾大将军；父矩，左武卫长史	昭义兵马使	咸通七年（866）	《汇编》广明003，第2501页；《补遗》第7辑，第425～426页
张虔裕		父张周抗，昭义军右衙马军使、检校太子宾客等	昭义军衙前将	父卒于咸通七年	
魏虔威	巨鹿人	父顼，东都留守、右厢都押衙、都虞候、检校太子宾客兼黄州长史等	节度散兵马使	咸通九年（868）	《汇编》咸通074，第2437页；《补遗》第1辑，第401～402页
元　郾	河南人，近世徙乡壶关	曾祖纠，河南府巩县令；祖鼒，洺州长史；父运，潞州司仓参军	河阳节度押衙	咸通十年（869）	《续集》咸通079，第1094～1095页；《补遗》第7辑，第421～422页
元　齐			节度先锋兵马使	兄卒于咸通十年	
孙劭殷	乐安郡	父名讳不详，检校国子祭酒兼彭州别驾	西川节度押衙	母卒于咸通十一年（870）	《续集》咸通064，第1083页

续附表 4

姓　名	出身地域	父祖情况	武职僚佐名称	卒葬年	史料出处
王公晟	太原	曾祖清，摄贝州录事参军；祖选，摄瀛州河间县尉；父盈，检校鸿胪卿	幽州随使节度押衙	咸通十一年	《汇编》咸通 083，第 2443 页
王弘楚		父王公晟，幽州随使节度押衙、检校国子祭酒兼侍御史	节度衙前散虞候	父卒于咸通十一年	
魏　顼	巨鹿人	曾祖、祖、父，不详	留守右厢都押衙、都虞候	咸通十一年	《汇编》咸通 086，第 2446 页
唐思礼	鲁国人	祖已上四三世，不仕；父贤，官至和州长史	汴州节度亲事都头兵马使	咸通十二年(871)	《续集》咸通 078，第 1094 页；《补遗》第 3 辑，第 271 页
张允伸	范阳人	曾祖秀，檀州刺史；祖岩，纳降军使；父朝掖，赠太尉	幽州押衙兼马步都知兵马使	咸通十三年(872)	《旧唐书》卷 180《张允伸传》，第 4679～4680 页；参见《新唐书》卷 212《张允伸传》，第 5982 页
郭克全	太原人	曾祖兴，邵州邵阳县丞；祖镒，湖州司兵参军；父宗衡，右骁卫长史	节度押衙	咸通十三年	《补遗》第 3 辑，第 274 页
阎好问	河南人	祖昱，贝州长史试大理评事；父晋，不仕	节度都虞候、都押牙	咸通十四年(873)	《汇编》咸通 106，第 2460 页

续附表 4

姓　名	出身地域	父祖情况	武职僚佐名称	卒葬年	史料出处
安玄明（朗）	武威人	曾祖言，华州镇国军同关镇迁（遏）使；祖靖，潘州刺史；父贯言，容州普宁县令，又招讨巡官知顺州军州事	□容经略押衙充海门防戍军都知兵马使	乾符二年（875）	《续集》乾符 006，第 1122 页
王幼虞	河东人	曾祖昌、祖文礼、父仲甫，不仕	泾原节度押衙	乾符三年（876）	《续集》乾符 008，第 1123～1124 页
师弘礼	平原人	曾祖鹤，右赞善大夫；祖盈，右骁卫大将军；父易从，皇城留守、检校工部尚书	节度押衙	乾符四年（877）	《汇编》广明 001，第 2499 页；《补遗》第 1 辑，第 425 页
张　洙	清河人	高祖景仁、曾祖昊、祖南素，不仕；父师儒，官至宣州南陵县尉	义武军节度都押衙	父卒于乾符五年（878）	《汇编》广明 005，第 2503 页
茹弘庆	燕都人	祖□，节度堂前兵马使；父公弁，不详，累授以嘉职	亲事副将充使宅将副将等	乾符五年	《续集》乾符 031，第 1140 页；《补遗》第 4 辑，第 263 页
成惠通	上谷人	曾祖、祖不详；父环，不仕	平卢军先锋副马军兵马使	子卒于乾符五年	《汇编》乾符 027，第 2491 页
高宗敏	不详	父名讳不详，灵台司辰官	桂州卢龙军散兵马使	母卒于乾符六年（879）	《续集》乾符 027，第 1137～1138 页

续附表 4

姓　名	出身地域	父祖情况	武职僚佐名称	卒葬年	史料出处
柳延宗	河东人	曾祖茂春，扬州左司马；祖公济，易定节度使；父当，左骁卫大将军	西川节度押衙、宣武军节度押衙	广明元年(880)	《汇编》广明 004，第 2502 页；《补遗》第 1 辑，第 426 页
耿宗倚	巨鹿人	曾祖俊，永清高阳县丞；祖造，不仕；父君用，幽州节度押衙知雄武军营田等事	卢龙镇将虞候、随使兵马使、节度押衙等	广明二年(881)	《续集》中和 004，第 1148 页；《补遗》第 4 辑，第 264 页
王景胤	世隶安东都护府	曾祖廷凑、祖元逵，父绍鼎，皆成德节度使	成德节度中军兵马使	弟景崇卒于中和二年(882)	《旧唐书》卷 142《王景胤传》，第 3889 页
王景崇			成德节度都知兵马使	中和二年	《旧唐书》卷 142《王景崇传》，第 3890 页
敬延祚	平阳郡人	曾祖包，掇幽都县令；祖辉，宣州右丞相；父全纪，北衙将判官	幽州随使节度押衙	中和二年	《汇编》中和 005，第 2509 页；《补遗》第 3 辑，第 288 页
乐彦祯	魏州人	父少寂，澶、博、贝三州刺史	节度马步军都虞候	中和四年(884)以后	《旧唐书》卷 181《乐彦祯传》，第 4689 页
王重荣	河中人	父纵，盐州刺史	河中马步军都虞候	光启三年(887)	《旧唐书》卷 182《王重荣传》，第 4695、4697 页

续附表 4

姓　名	出身地域	父祖情况	武职僚佐名称	卒葬年	史料出处
郭　顺	太原人	不详	靖难军节度都兵马兼押衙	光启四年(888)	《续集》文德 002，第 1152 页
唐　青	鲁国人	父弁，义成军节度兵马使兼御史中丞	义成军节度押衙	孙卒于乾宁三年(896)	《续集》乾宁 004，第 1162 页
唐敬德		父唐青，义成军节度押衙、检校左散骑常侍。	义成军节度押衙	子卒于乾宁三年	
唐令璠	鲁国人	曾神弁，祖唐青，见前；父彦随常州刺史	衙前兵马使	父卒于乾宁三年	《续集》乾宁 004，第 1162 页
唐令温			衙前兵马使		
罗元实	上谷人	祖秀、父亮，不仕。	高阳军押衙兼衙前使	父卒于乾宁四年(897)	《续集》乾宁 006，第 1163 页

参考文献

1. 史料

〔唐〕长孙无忌撰，刘俊文注释《唐律疏议笺解》，北京：中华书局，1996。

〔唐〕李隆基撰，〔唐〕李林甫注，〔日〕广池千九郎校注，〔日〕内田智雄补订《大唐六典》，西安：三秦出版社，1991。

〔唐〕杜佑撰，王文锦、王永兴等点校《通典》，中华书局，1988。

〔唐〕颜真卿著，〔清〕黄本骥编订，凌家民点校、简注、重订《颜真卿集》，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

〔唐〕林宝撰，岑仲勉校记《元和姓纂》（附四校记），中华书局，1994。

〔唐〕白居易著，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中华书局，1979。

〔唐〕李德裕撰，傅璇琮、周建国校笺《李德裕文集校笺》，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唐〕独孤及撰《毘陵集》，上海古籍，1993。

〔唐〕韦应物撰《韦苏州集》上海古籍，1993。

〔唐〕封演撰，赵贞信校注《封氏闻见记校注》，中华书局，2005。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

〔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
〔宋〕王溥撰《唐会要》，中华书局，1955。
〔宋〕王钦若等编《（宋本）册府元龟》，中华书局，1989。
〔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中华书局，1960。
〔宋〕李昉等编《文苑英华》，中华书局，1966。
〔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
〔宋〕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版。
〔宋〕宋敏求撰《春明退朝录》，中华书局，1980。
〔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中华书局，1961。
〔宋〕王谠撰，周勋初校正《唐语林校正》，中华书局，1987。
〔宋〕洪迈撰，孔凡礼点校《容斋随笔》，2005。〔宋〕王林撰《燕翼诒谋录》，中华书局，1981。
〔宋〕钱易撰，黄寿成点校《南部新书》，中华书局，2002。
〔宋〕王应麟撰《玉海》，京都：中文出版社，1977。
〔宋〕乐史撰《太平寰宇记》，台北：文海出版社，1980。
〔宋〕陈傅良撰《历代兵制》，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元〕马端临著《文献通考》，商务印书馆，1936。
〔清〕王夫之著《读通鉴论》，中华书局，1975。
〔清〕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1984。
〔清〕董诰等编《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
〔清〕徐松撰《登科记考》，中华书局，1984。
〔清〕徐松撰，孟二冬补正《登科记考补正》，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
〔清〕吴廷燮撰《唐方镇年表》，中华书局，1980。

〔清〕梁章钜著《称谓录》，天津古籍，1987。

〔清〕郝玉麟等监修，谢道承等编纂《福建通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清〕孟庆云修，杨重雅纂《中国方志丛书》第259册（江西省），清同治十一年（1872）刊本影印，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清〕永瑢等奉敕修纂《历代职官表》，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　（福建省），上海古籍书店，1982。

《石刻史料新编》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

《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1992。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1～7辑），三秦出版社，1994～2000。

丁如明、李宗为、李学颖等校点《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中华书局，2000。

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日〕仁井田陞著，栗劲、霍存福等编译《唐令拾遗》，长春出版社，1989。

2. 近人论著

陈东原著《中国教育史》，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1980。

陈飞著《唐代试策考述》，中华书局，2002。

陈国灿著《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

陈茂同著《中国历代选官制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陈寅恪著，万绳楠整理《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合肥：黄山书社，1987。

陈寅恪著《寒柳堂集》，上海古籍，1980。

陈寅恪著《金明馆丛稿初编》、《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

陈寅恪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华书局，1977。

陈寅恪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陈志坚著《唐后期中央和地方关系研究——以州的制度为中心》，北京大学2000博士论文。

段塔丽著《唐代妇女地位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傅璇琮著《唐代科举与文学》，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

高明士著《隋唐贡举制度》，台北：文津出版社，1999。

谷霁光著《府兵制度考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

侯绍文著《唐宋考试制度史》，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3。

黄留珠著《秦汉仕进制度》，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

黄新宪著《中国考试发展史略》，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

雷海宗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商务印书馆，2001。

李锦绣著《唐代制度史略论稿》，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李树桐著《唐史别裁》，台湾商务印书馆，1995。

李新达主编《中国军事制度史·武官制度卷》，郑州：大象出版社，1997。

李治安主编《唐宋元明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6。

刘海峰著《唐代教育与选举制度综论》，文津出版公

司，1991。

刘展主编《中国古代军制史》，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

刘昭祥、王晓卫著《历代兵制浅说》，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

吕思勉著《隋唐五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吕思勉著《中国制度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马驰著《唐代蕃将》，三秦出版社，1990。

毛汉光著《唐代统治阶层的社会变动》，台湾政治大学1968年博士论文。

毛汉光著《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毛汉光著《中国中古政治史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孟宪实著《唐前期军镇研究》，北京大学2001年博士论文。

宁欣著《唐代选官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

钱穆著《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6。

钱穆著《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2001。

任立达、薛希洪著《中国古代官吏考选制度史》，青岛出版社，2003。

石云涛著《唐代幕府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孙国栋著《唐代中央重要文官迁转途径研究》，香港：龙门书店，1978。

孙继民著《敦煌吐鲁番所出唐代军事文书初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孙继民著《唐代瀚海军事文书研究》，兰州：甘肃文化出版

社，2002。

孙继民著《唐代行军制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

唐长孺等编《汪篯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唐长孺著《唐书兵志笺正》，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

唐长孺著《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

汪篯著《汉唐史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王勋成著《唐代铨选与文学》，中华书局，2001。

王亚南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王永兴著《唐代前期军事史略论稿》，北京：昆仑出版社，2003。

王钟陵主编，王炎平著《槐花黄，举子忙》，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

王仲荦著《隋唐五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吴宗国著《隋唐五代简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

吴宗国著《唐代科举制度研究》，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

吴宗国主编《盛唐政治制度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

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许有根著《武举制度史略》，苏州大学出版社，1997。

严耕望著《唐史研究丛稿》，香港新亚研究所，1969。

阎文儒著《唐代贡举制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

俞鹿年著《中国政治制度通史·隋唐五代》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6。

曾一民著《唐代考课制度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

张国刚著《唐代藩镇研究》，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

张国刚著《唐代官制》，三秦出版社，1987。

张国刚著《唐代政治制度研究论集》，文津出版公司，1994。

张沛编著《唐折冲府汇考》，三秦出版社，2003。

张兆凯著《汉——唐门荫制度研究》，长沙：岳麓书社，1995。

章群著《唐代蕃将研究》，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

赵冬梅著《北宋武选官及其选任制度研究》，北京大学1998年博士论文。

赵冬梅著《武道彷徨——历史上的武举和武学》，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0。

赵雨乐著《唐宋变革期之军政制度——官僚机构与等级之编成》，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

3. 参考论文

〔英〕崔瑞德著、张荣芳译《唐代藩镇势力的各种类型》《大陆杂志》1983年第66卷第1期，第39~47页。

陈国灿著《吐鲁番出土文献所见之唐代军府》，《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6辑，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第73~84页。

陈苏镇：《北周隋唐的散官与勋官》，《北京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第29~36页。

陈寅恪：《论唐代之蕃将与蕃兵》，《金明馆丛稿初编》，三联书店，2001，第296~310页。

陈志学：《试论唐代武官的入仕途径》，《中华文化论坛》，2002年第3期，第57~65页。

陈志学：《唐代武举述论》，《四川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第94~99页。

陈仲安：《跋管元惠神道碑》，《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5辑，第51~54页。

冯金忠、郝黎：《论唐代的“出将入相”》，《河北学刊》2001年第1期，第108~111页。

冯培红：《晚唐五代宋初归义军外职军将研究》，《敦煌学辑

刊》1997 年第 1 期，第 52 ~ 65 页。

冯培红：《晚唐五代宋初归义军武职军将研究》，《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第 94 ~ 178 页。

傅乐成：《唐代宦官与藩镇的关系》，《汉唐史论集》，台北：联经事业出版公司，1977，第 191 ~ 208 页。

傅乐成：《唐代夷夏观念之演变》，《汉唐史论集》，第 208 ~ 226 页。

傅乐成：《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唐代研究论集》第一辑，新文丰出版公司，1992，第 239 ~ 282 页。

傅玫：《唐代的勋官》，载于《庆祝杨志玖教授八十寿辰中国史论文集》，天津古籍，1994，第 93 ~ 107 页。

高凤林：《略谈唐朝的铨选制度》，《山东师大学报》1985 年第 4 期，第 31 ~ 36 页。

高明士：《唐朝的文和武》，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1998 年第 48 期，第 145 ~ 166 页。

高明士：《唐代的武举与武庙》，《第一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台湾学生书局，1989，第 1016 ~ 1069 页。

高卫星：《关于中国古代官吏选拔选拔制度的几个问题》，《郑州大学学报》1995 年第 3 期，第 19 ~ 24 页。

龚鹏程：《论唐代的文学崇拜与文学社会》，台湾淡江大学中文系主编《晚唐的社会与文化》，台湾学生书局，1990，第 1 ~ 97 页。

管益农：《中国古代的武举制度》，《华夏文化》1995 年第 4 期，第 14 ~ 15 页。

郭润涛：《中国幕府制度的特征、形态和变迁》，《中国史研究》1997 年第 1 期，第 3 ~ 14 页。

郭绍林：《唐代选拔军事人才的途径》，《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2 年第 3 期，第 87 ~ 88 页。

韩昇：《中古社会史研究的数理统计与士族问题——评毛汉光先生〈中国中古社会史论〉》，《复旦学报》2003年第5期，第91~98页。

何汉心：《唐朝制举和制科》，中国唐代学会编辑委员会编辑《第二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文津出版社，1993，第1215~1223页。

洪陆训：《文武关系之理论、研究途径和类型学》，《东亚季刊》第26卷第1期，1994，第57~85页。

侯灿：《解放后新出吐鲁番墓志录》，北京大学中古史中心主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五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第563~617页。

黄进兴：《武庙的崛起与衰微（七至十四世纪）——一个政治文化的考察》，载于周质平主编《国史浮海开新录——余英时教授荣退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第249~280页。

黄修明：《唐代后期的宦官典军制度》，《南充师院学报》1988年第1期，第107~112页。

江炳伦：《谈军人与政治发展》，《东方杂志》复刊第4卷第6期，1970年12月，第31~35页。

金滢坤：《中晚唐铨选制度变化与科举及第入幕的关系》，《人文杂志》2002年第4期，第110~116页。

雷渊深、季德源：《中国历代军事职官制度》，《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4期，第3~19页。

李方：《唐西州军政官吏的本地升迁》，《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六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第253~282页。

林伯原：《论唐代武举的建立及到两宋的发展》，《体育科学》1989年第1期，第16~19页。

刘安志：《唐五代押牙（衙）考略》，《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

料》第16辑，第62～72页。

刘后滨：《唐前期中书省地位的变化与中书门下体制的建立》，吴宗国主编《盛唐政治制度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第264～294页。

刘后滨：《从三省体制到中书门下体制——隋唐五代》，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133～221页。

刘健、唐永干：《论“武选”的缘起与功能——中国古代“武选”“武举”丛论之一》，《南京体育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第79～81、142页。

楼劲、李华：《唐仕途结构述要》，《兰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第117～127页。

卢建荣：《地方军事化对唐代后期淮北地区政治与社会的冲击》（780～893），《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1999年第27期，第17～54页。

卢建荣：《唐代财经专家之分析——兼论唐代士大夫的阶级意识与理财观念》，《中研院史语所集刊》，1983年第54本第4分，第157～223页。

卢建荣：《中晚唐藩镇文职幕僚职位的探讨》，中国唐代学会编辑委员会编辑《第二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文津出版社，1993，第1237～1271页。

毛汉光《科举前后清要官形态之比较研究》，中研院编印《中研院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历史考古组（上册），1981年版，第379～404页。

毛汉光著《魏博二百年史论》，《中国中古政治史论》，上海书店2002，第349～417页。

毛汉光：《唐代大士族的进士第》，《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上海书店，2002，第334～364页。

毛汉光：《唐代荫任之研究》，《中研院史语所集刊》，55本第3分，1984年，第459~542页。

毛原：《从“告身”看唐代官吏的任用制度》，《内蒙古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第38~41页。

孟宪实：《唐代前期的使职问题研究》，吴宗国主编《盛唐政治制度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第176~263页。

苗书梅：《宋代武官选任制度初探》，《史学月刊》1996年第5期，29~38页。

牛志平：《唐代宦官》，史念海主编《唐史论丛》第5辑，三秦出版社，1990，第50~96页。

宁可：《宋代重文轻武社会风气的形成》，《学林漫录》第三集，中华书局，1981，第59~66页。

宁欣：《唐代铨选制度的完善及流弊》，《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4期，第87~93页。

宁欣：《唐代的选人与官阙》，《人文杂志》1991年第5期，第95~100、102页。

宁欣：《唐代门荫制与选官》，《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3期，第76~82页。

宁欣：《论唐代荐举》，《历史研究》1995年第4期，第125~134页。

宁志新：《唐朝使职若干问题研究》，《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第52~70页。

潘孝伟：《唐代的武举》，《安庆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1期，第43~49页。

齐勇锋：《唐后期的北衙六军、飞龙、金吾、威远和皇城将士》，《河北学刊》1989年第2期，第77~82页。

齐勇锋：《说神策军》，《陕西师大学报》1983年第2期，第94~103页。

任士英：《唐代流外官的管理制度》，《中国史研究》1995 年第 1 期，第 80 ~ 89 页。

任士英：《唐代流外官制研究》（上、下），史念海主编《唐史论丛》第五、六辑，三秦出版社，1990、1991，第 276 ~ 304、160 ~ 240 页。

任士英：《唐代尚武之风与追求功名观念的变迁》，郑学檬、冷敏述主编《唐文化研究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第 283 ~ 293 页。

荣新江：《唐五代归义军武职军将考》，《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1993，第 76 ~ 87 页。

石云涛：《唐代幕府辟署制之认识》，《许昌师专学报》1997 年第 1 期，第 92 ~ 97 页。

石云涛：《唐后期方镇僚佐迁转》，《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 14 辑），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第 140 ~ 152 页。

石云涛：《唐后期有关方镇使府僚佐辟属对象的限令》，《唐研究》第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第 259 ~ 278 页。

史念海：《唐代前期关东地区尚武风气的溯源》，黄永年等主编《中国古代史论集》，陕西师大出版社，1999，第 457 ~ 487 页。

宋德熹：《唐代后半期门阀与官宦之关系》，淡江大学中文系主编《晚唐的社会与文化》，1990，第 113 ~ 161 页。

孙国栋：《从梦游录看唐代文人迁官的最优途径》，《唐宋史论丛》（增订版），香港：商务印书馆，2000，第 17 ~ 36 页。

孙国栋：《宋代官制紊乱在唐制的根源》，《唐宋史论丛》（增订版），第 197 ~ 210 页。

孙国栋：《唐代中书舍人迁官途径考释》，《唐宋史论丛》（增订版），第 37 ~ 80 页。

孙国栋：《唐宋之际社会门第之消融》，香港：《新亚学报》

第4卷第1期，1959，第211～304页。

孙国栋：《晚唐中央政府组织的变迁》，《唐宋史论丛》（增订版），第187～195页。

孙继民：《唐代行军统帅僚属制度及其对藩镇形成的影响》，《河北学刊》1992年第6期，第91～98页。

唐长孺：《吐鲁番文书中所见的西州府兵》，《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第31～32页。

唐长孺：《唐代色役管见》，《山居存稿》，中华书局，1989，第166～194页。

唐群：《武则天开创武举时的形势分析》，收入赵文润、李玉明主编《武则天研究论文集》，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第321～325页。

王永兴：《关于唐后期方镇官制新史料考释》，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第267～276页。

王永兴：《唐天宝敦煌差科簿研究——兼论唐代色役制和其他问题》，中古史研究中心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中华书局，1982，第63～166页。

吴宗国：《唐贞观二十二年敕旨中有关三卫的几个问题——兼论唐代的门荫制度》，载北京大学中古史中心编《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论文集》第三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第149～175页。

许友根：《唐代科举科目考述》，《海南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第15～21页。

严耕望：《唐方镇使府僚佐考》，《唐史研究丛稿》，香港：新亚研究所，1969，第177～236页。

杨树藩：《中国古代的勋制》，中国历史学会编印发行《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第16期，第1～15页。

杨西云：《唐代门荫制与科举制度的消长关系》，《南开学

报》1997 年第 1 期，第 60 ~ 65 页。

杨希义：《〈千唐志斋藏志〉中隋唐科举制度中史料辑释》，《中原文物》1992 年第 1 期，第 38 ~ 48 页。

杨志玖、张国刚：《“辨贵贱、叙劳能”——隋唐五代品阶勋爵制度》，《文史知识》198512 期，第 76 ~ 82 页。

杨志玖、张国刚：《唐代藩镇使府辟署制度》，《社会科学战线》1984 年第 1 期，第 130 ~ 137 页。

于赓哲：《由武成王庙制变迁看唐代的文武分途》，《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 19 辑，2002，第 133 ~ 141 页。

余新忠：《唐代勋官的实际意义》，《铁道师范学院学报》1996 年第 2 期，第 33、34、39 页。

余言：《略论唐代宦官监军和宦官专典禁军的制度》，《中学历史教学》1980 年第 2 期，第 1 ~ 7 页。

张国刚：《唐代藩镇军将职级考略》，张国刚著《唐代政治制度论集》，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第 157 ~ 174 页。

张国刚：《唐代的蕃部与蕃兵》，《唐代政治制度研究论集》，第 93 ~ 111 页。

张国刚：《唐代的神策军》，《唐代政治制度研究论集》，第 113 ~ 141 页。

张国刚：《唐代阶官与职事官的阶官化》，《中华文史论丛》1989 年第 2 期，第 71 ~ 90 页。

张国刚：《唐代北衙六军述略》，《唐代政治制度研究论集》，第 143 ~ 156 页。

张国刚；《唐代中央军事决策与军队领导体制论略》，《南开学报》2004 年第 1 期，46 ~ 54 页。

4. 日、韩论著

爱宕元：《唐代的官荫入仕——以卫官之路为中心》，刘俊文主编《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六朝隋唐卷），上海古籍，

1995，第 244 ~ 275 页。

渡边孝：《唐・五代における衙前の称について》，《东洋史论》6，1988，第 16 ~ 34 页。

渡边孝：《唐・五代藩镇における押衙について》（上、下），《社会文化史学》28、30，1991、1993，第 33 ~ 55 页、第 103 ~ 118 页。

渡边孝：《唐代藩镇における下级幕职官について》，《中国史学》第 11 卷，2001，第 83 ~ 107 页。

渡边孝：《唐后半期の藩镇辟召制についての再检讨》，《东洋史研究》60 ~ 1，2001，第 30 ~ 68 页。

宫崎市定著《东洋的近世》，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中华书局，1992，第 195 页。

谷川道雄：《关于河朔三镇藩帅的继承》，《第一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台湾学生书局，1989，第 903 ~ 913 页。

堀敏一：《藩镇亲卫军的权力结构》，刘俊文主编、黄约瑟译《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中华书局，1992，第 585 ~ 648 页。

砺波护：《唐代使院的僚佐和辟召制》，《神户大学文学部纪要》2，1973，第 85 ~ 119 页。

砺波护：《中世贵族制的崩溃和辟召制——以牛李党争为线索》，《东洋史研究》21，3，1962，第 1 ~ 26 页。

砺波护著《唐代政治社会史研究》，京都：同朋舍刊，1986。

妹尾达彦：《“才子”与“佳人”——九世纪中国新的男女认识的形成》，邓小南主编《唐宋女性与社会》，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第 695 ~ 722 页。

日野开三郎：《唐代翊卫考》，《东洋史学》28，1965，第 1 ~ 15 页。

日野开三郎著《唐代藩镇の支配体制》，京都：同朋

舍，1982。

日野开三郎著《支那中世の军阀》，东京：三省堂刊，1942。

杉井一臣：《唐代の常选にっいて》，《东方学》第81辑，1991，第43～56页。

山根直生：《唐朝军政统治的终局与五代十国割据的开端》，《浙江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第71～80页。

松永雅生：《唐代の勋官にっいて》，《西日本史学》12，1952，第20页。

西村元佑著《通过唐的敦煌差科簿看唐代均田制时代的徭役制度》，《敦煌学译文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第978～1233页。

郑炳俊：《唐后半期の地方行政体系にっいて》，《东洋史研究》第51卷第3号，1992年12月，第379～412页。

中村裕一著《唐代制敕研究》，东京：汲古书院，1991。

〔韩〕金铎敏：《唐代前期的官人范畴——以卫官为中心》，〔韩〕《魏晋隋唐史研究》第六辑，2000年8月，第119～143页。

〔韩〕金锡佑：《唐代百姓勋官考论》，《东方论坛》2004年第6期，第89～97页。

5. 英文译著

〔美〕包弼德著、刘宁译《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英〕崔瑞德主编《剑桥中国隋唐史》（汉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英〕马丁·阿尔布罗著，阎步克译《官僚制》，北京：知识出版社，1990。

S. N. 艾森斯塔得著，阎步克译《帝国的政治体系》，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

后　记

当我终于掩卷合笔时，暂时松了口气。但心中却惴惴不安，毕竟，我的功力尚浅，书中难免存在一些错误。一想到可能会面对学界的批评和指责时，不免汗颜。但是，作为一名真正的学者，只有勇于接受别人善意的批评，才能不断地充实、提高自己，使自己日渐走向成熟。因此，我还是鼓足了勇气，将此书出版，敬请各位学贤指正。

本书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与原论文相比，已经做了非常大的改动。如绪论、第一章、第三章、第五章和结论，尤其是绪论、第三章和结论部分，改动的幅度较大；第六章更是后来新添加的内容。

文章的写作和修改，凝聚着博士生导师王小甫先生大量的心血。从题目的选定到每一章节的修改，都是在业师的精心指导下进行的。如果没有他的悉心指导，整篇文章的完成是难以想像的。导师的敬业精神，每每让我感动，每一稿的修改他都那么认真、仔细，这种治学态度和治学精神，让我永远铭记在心，其为学的慎思和严谨也时刻提醒着我要“用功读书”。上学期间，师母曾给予我生活上很多关心和照顾，也每每让我感动。在此，向尊师和师母一并致以最深切的谢意！

其次，我要感谢所有对本书提出过修改意见的各位先生们，因为，整个书稿的修改思路，基本上是围绕着这些修改意见进行

的。如果没有诸位先生的指点，我很难把文章修改成现在的面貌。这些先生包括邓小南先生、吴玉贵先生、吴宗国先生、荣新江先生、宁欣先生、阎步克先生、张希清先生等，以及一些我不知道的评审专家。正是他们的指点，我的书稿修改才有了方向。在此，向他们致以最诚挚的谢意！当然，文章的修改结果，可能并没有达到导师和各位先生的期望水平，对此，我深表惭愧。

感谢硕士生导师杜文玉先生，是他首次带我进入学术的殿堂，走上了治学之道。正是受他的影响，我才对唐代政治制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感谢吴玉贵先生和杜文玉先生的大力推荐，以及《东方历史学术文库》对本书的接纳和资助出版。

感谢邹水杰先生，论文目录的翻译，他倾注了一定心血，如果没有他的帮助，或许我的翻译将是漏洞百出。

感谢范恩实、朱益同学，在我毕业期间给予的帮助；感谢原室友宋清秀、王华同学，她们在生活上、学习上给我的关心和帮助。

最后，感谢父母对我的养育和教化之恩，如果没有他们对我的无私付出，我不可能走到今天；感谢爱人对我学习上的支持和鼓励，没有他的后勤保障和精神支持，我不可能顺利毕业；感谢孩子一直陪我作毕业论文，他让我在生活中变得更加坚强。

谢谢！谢谢所有关心和帮助过我的人们！

刘琴丽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唐代武官选任制度初探
作者＝刘琴丽著
页数＝２９２
ＳＳ号＝１１７１５４６０
出版日期＝２００６年０６月第１版

前言
目录
绪论
一　问题的提出
二　概念界定
三　唐代以前的武官选任概况
四　唐代武官选任的时代背景
五　研究综述
六　文章内容
七　研究方法及难点突破
第一章　唐代武官的铨选
第一节　安史之乱以前的武官铨选
一　铨选机构及官员
二　铨选对象
三　铨选时间
四　南曹磨勘
五　铨试内容
六　注拟、过官及殿庭谢恩
第二节　安史之乱以后武官铨选制度的演进
一　兵部铨选职能的继续弱化
二　地方藩帅有权选任本镇武职军将
三　护军中尉等北衙禁军统兵宦官有权选任属下军将
四　中书门下的武官选任权力
五　墨敕授官
第二章　军功入仕
第一节　墓志所见唐代的勋官入仕
一　勋官入仕者获取勋官的现状及社会构成
二　勋官的放选时间
三　勋官的释褐官品及官职
四　勋官的仕途前景
第二节　直接军功入仕
一　军功奖赏的制度规定
二　军功入仕者的实际授官状况及仕途前景
三　军功滥授现象
第三章　门荫入仕——以卫官为中心
第一节　唐代卫官述论
一　卫官的类别和配置部门
二　卫官的考课与简选
三　卫官入仕为武官的情况
四　卫官系统内部的迁转
五　卫官制度的衰落
第二节　千牛入仕
一　千牛的入仕率极高

二　千牛入仕一般循吏部选
三　千牛的释褐官品
四　千牛的释褐官职
五　千牛的仕途前景
第三节　墓志所见唐折冲府卫官
一　充任情况
二　入仕情况及在官僚群体中的角色地位
三　余论
第四章　科举入仕
第一节　唐代武举
一　制度概述
二　及第人物与授官情况
三　结论
第二节　唐代的制举武科
一　及第人物
二　结论
第五章　唐代中后期方镇使府武职僚佐的辟署制
第一节　辟署方式及对象
一　辟署方式
二　辟署对象
第二节　方镇使府武职僚佐的官职奏荐及迁转
一　方镇使府武职僚佐的官职奏请
二　方镇使府武职僚佐的迁转
第三节　方镇使府武职僚佐的社会构成和地域分布
一　使府武职僚佐的社会构成
二　使府武职僚佐的地域分布
第六章　其他选任方式
第一节　来朝蕃客授官
一　来朝蕃客授官的历史原因
二　授官机构和授官制度
三　来朝蕃客授官的方式
第二节　唐代宦官的武官授予
一　宦官授予武官的历史原因
二　宦官授予武官的历史现状
第三节　其他选任方式
一　由文转武
二　荐举
三　投诚
四　卫士、白丁、官健因年劳或才能授官
五　征召入仕
六　以亲戚授官
七　特例选官
结语

附录
附表１　唐代千牛入仕表
附表２　唐折冲府卫官充任表
附表３　唐代制举武科科目及登科表
附表４　唐代中后期方镇使府武职僚佐任职表（７８０～９０７）
参考文献
后记